



深圳社会科学

2020年 第3期 总第11期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 I N S H E N Z H E N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主办

深圳社会科学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 I N S H E N Z H E N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主办

2020年 第3期 总第11期



主管：深圳市人民政府

主办：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编辑出版：《深圳社会科学》编辑部

主编：谢志岩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 1023 号市府二办附楼

电话：0755-88134161/88134156/88134897

传真：0755-88119335 邮编：518028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4-1738/C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671-3575

发行范围：国内外发行

国内订阅处：全国各地邮政局

国内总发行：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46-591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邮发代号：C9399

装帧设计：深圳市亚洲铜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排版制作：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深圳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年5月10日

定价：RMB: 15.00 元 HK\$: 20 US\$: 5

ISSN 1671-3575



9 771671 357205



深圳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SHENZHEN



深圳社会科学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 I N S H E N Z H E N

编辑委员会

学 术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珺 甘 阳 乐 正 冯达文 任剑涛
李凤亮 李若建 李 萍 肖 滨 吴重庆
陈金海 周叶中 单世联 袁 征 唐 杰
陶一桃 黄卫平 彭立勋

主 任 吴定海

副 主 任 陈少兵 王为理 谢志焜 罗 思 张玉领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映灵 刘婉华 李朝晖 何国勇 陈长治
袁义才 莫大喜 董晓远

主 编 谢志焜

编辑部主任 刘婉华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主办

目 录

2020年第3期（总第11期）

2018年9月创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5 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方法论思想探析
..... 秦培涛 黄志高
- 13 疫情大考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 祝小茗 李菽林

疫情应对研究

- 21 应急行政视域下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正义性辨析
..... 赵莹莹
- 31 以全产业链联动方式推动疫情冲击下的制造业复工复产
..... 徐 可

经济学

- 41 基于遗传算法投影寻踪模型的智能制造能力评价
——以中国31个省市区数据为例
..... 陈 钢 薛 莉 张 彬
- 50 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竞争力影响的误差修正模型分析
..... 俞裕兰 杨靛青
- 59 农民工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未来收入关系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张楠楠 陈山泉

哲学

- 68 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当代价值
——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 和东红 刘青青
- 75 自私、合作与美德的本质
..... 郭 晓

投稿邮箱 szshkx@szass.com

深圳社会科学
(双月刊)

政治学·社会学

- 82 治理理论的中国场景：复合治理的勃兴
.....许珂 周伟
- 88 农村政治精英的形成机制：政治忠诚、市场能力与社会资本
.....庄玉乙 胡蓉
- 101 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
.....付钊

历史学

- 113 近代早期华工出国史若干问题研究
.....李中跃
- 121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妇女运动
.....赵佳佳

语言学

- 131 眼动追踪技术与翻译过程研究：基于知网数据的计量分析
.....刘永杰 许悦萌 牛一琳
- 142 物质、转义、述行：意识形态的认知结构与语言机制
——论保罗·德曼的美学意识形态理论孙云霏

教育学

- 151 主要城市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分析
——兼论提升深圳高等教育竞争力路径
.....郑婉茵 王艺儒 黄卫华
- 158 英文摘要
-
-

SOCIAL SCIENCES IN SHENZHEN

No. 3, 2020

CONTENTS

STUDY 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 Analysis of Xi Jinping's Methodological Thoughts of Preventing and Mitigating Major Risks in the New Era *QIN Peitao & HUANG Zhigao* (5)

Succeeding in Fighting against the 2019-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Highlights the Advantag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U Xiaoming & LI Shulin* (13)

RESEARCH O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 Analysis of the Justice of Restricting Citizens' Basic Ri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ergency Administration *ZHAO Ying-ying* (21)

Diversified and Overall Countermeasures to Resume Work and Production in Manufacture Industry against the Epidemic *XU Ke* (31)

ECONOMICS

Evaluation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Based on Projection Pursuit Model of Genetic Algorithm
—Data from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CHEN Gang, XUE Li & ZHANG Bin* (41)

Error Correction Mode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Digital Trade Competitiveness *YU Yulan & YANG Dianqing* (50)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educational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Future Income of Migrant Workers—Based on CFPS *ZHANG Nannan & CHEN Shanquan* (59)

PHILOSOPHY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Engels' Theory of Historical Resultant For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HE Donghong & LIU Qingqing* (68)

Selfishness, Cooperation and Virtue *GUO Liang* (75)

POLITICS & SOCIOLOGY

The Chinese Scenario of Governance Theory: The Emergence of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XU Ke & ZHOU wei* (82)

Political Elite Formation in Rural China: Political Loyalty, Market Capacity and Social Capital *ZHUANG Yuyi & HU Rong* (88)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Participates i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How Is It Possible and What Can Be Done? *FU Zhao* (101)

HISTORY

Research on Several Issues of the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Workers in Modern Times *LI Zhongyue* (113)

Guangdong Women's Move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during the All-round Anti-Japanese war *ZHAO Jiajia* (121)

LINGUISTICS

Eye-tracking Technology and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CNKI *LIU Yongjie, XU Yuemeng & NIU Yilin* (131)

Substance, Paraphrase and Narration: Cognitive Structure and Language Mechanism of Ideology—On Paul de Man's Theory of Aesthetic Ideology *SUN Yunfei* (142)

EDUC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Potential Competitive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Major Cities—On the Way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henzhen *ZHENG Wanyin, WANG Yiru & HUANG Weihua* (151)

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方法论思想探析*

秦培涛 黄志高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新时代重要的课题。当前该如何应对大疫情风险是现实最紧迫的任务。因此, 研究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方法论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们应着重从目标、历史、实践等三个维度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方法论思想。从目标维度来看, 习近平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纳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中进行统一谋划; 从历史维度来看, 习近平从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光辉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从实践维度来看, 习近平将重大风险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综合体”进行整体性治理。

[关键词] 习近平 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20)03-0005-08

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和人民健康的重大风险。如何防范化解重大疫情风险, 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我们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中找到解决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 面对新时代出现的或者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 习近平

收稿日期: 2020—04—01

***基金项目:** 本文为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习近平制度治党思想研究”(项目编号:SK2018A0049)、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研究项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社会治理思想研究”(项目编号:SK2016A0072)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秦培涛,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黄志高,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中共党史。

总书记适时提出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和新举措,形成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中蕴含的方法论思想是新时代应对重大风险的“锦囊妙计”。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方法论思想,有助于指导我们在实践中更有效地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有助于指导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助于指导我们更好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目标维度: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中统一谋划

习近平深刻认识到新时代应对重大风险对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重大意义,因此,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升并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中,并进行统一谋划。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高度来长远谋划新时代该如何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反映出习近平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远见卓识的政治智慧和驾驭全局的政治能力。

(一)认识和把握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与实现民族复兴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前进道路上,来自各方面的困难、风险、挑战肯定还会不断出现。”^{[1](P402)}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必将机遇和风险并存。风险挑战必然客观存在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必然影响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整个进程。因此,重大风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2]可以这么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应对风险挑战、进行伟大斗争的历史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然包括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的风险斗争史。因此,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置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中进行系统谋划和整体推进,有其必然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极为关键的一步。当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形势的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疫情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乃至实现民族复兴梦目标任务的重大影响,他指出,“要准确把握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的阶段性变化,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和应对举措,确保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3]。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的高度上,科学阐释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与实现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深化了我们对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问题的全面认识。

(二)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升并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中

习近平将重大风险认识论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际行动,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升为国家政治意志,并通过国家重大决策部署保障其有效实施。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大议题纳入事关民族复兴的国家战略中进行统一谋划,这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1. 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置于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占据着统领的地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的阶段性目标。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把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三大攻坚战”之一,并将其列于首位,这足以说明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乃至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的重要性。“四个全面”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2020年必须完成的国家重大战略目标和任务，“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重要举措，“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必须通过“三大举措”打赢的“攻坚战”，“三大举措”是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方法。

2. 将“伟大斗争”纳入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战略框架中。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重大风险”是“伟大斗争”的重要对象和基本内容。

“四个伟大”不是简单组合的并列关系，而是内在联系极为紧密的有机整体。“伟大斗争”是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必要条件，而搞好“伟大斗争”必须建设好“伟大工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进行“伟大斗争”的保障。这就要求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结合“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目标和实践。“四个伟大”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中蕴含着新时代重大风险斗争的重要方法。

3. 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国家安全是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关乎安邦定国，关乎民族复兴，关乎人民安居乐业。为应对新时代中国国家形势的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当代中国国家安全风险的实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适时地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1](P200)}，这是对国家安全风险防控思想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安全风险防控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方法论思想，是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上升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从而确立“国家总体安全观”在国家安全风险应对中的指导地位，保证“国家总体安全观”在国家安全风险防控实践中的贯彻落实。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总体安全造成了重大影响，为了更加有效地防范重大疫情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习近平适时地提出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中，他指出，“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要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平时和战时结合、预防和应急结合、科研和救治防控结合，加强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和能力建设”^[4]。

二、历史维度：从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光辉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5]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中国共产党近一百年“风险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必须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置于中国共产党整个近百年“伟大斗争”的历程中去考察，既要分析和总结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历史经验，以此继承和弘扬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优良传统，又要结合新时代的鲜明特征和具体实际，采取有效战略措施战胜当前重大风险，以此为未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宝贵经验。

（一）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实践历史与经验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历史蕴含着丰富的风险应对智慧和经验。系统回顾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的宏阔历史，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历史经验，能够为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历史借鉴和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中应对重大风险的历史实践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一是扭转大革命失败的困局，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二是破解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危局，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夺取国家政权，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四是正确处理“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保持国内政局稳定；五是走出十年“文革”的阴霾，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六是沉着应对20世纪末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七是积极应对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社会基本稳定和持续发展；八是众志成城、全力应对特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疫情（1998年特大洪灾、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2019—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并举。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重大风险的经验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战胜重大风险的根本保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具备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重大风险的初心、使命、责任、担当和能力；二是人民群众是战胜重大风险的根本力量，只有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集聚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才能战胜风险；三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战胜风险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才能做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才能“对症下药”，从根本上战胜风险；四是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是战胜风险的重要方法；五是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是战胜风险的基础保障；六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是战胜风险的重要法宝。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历史传承与借鉴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无论怎样都不能脱离当前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必须结合这种斗争去总结、学习和运用历史上的革命经验。”^[6]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的历史经验，传承中国共产党“风险斗争”的优良传统是应对重大风险的重要方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历史传承与借鉴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传承中国共产党“风险斗争”的历史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斗争历史的传承，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7]。中国共产党在应对重大风险的历史实践中积累的丰富“斗争经验”和铸就的伟大“斗争精神”，是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方法的重要来源，需要在实践中得到继承和发扬。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年轻干部要到重大斗争中去真刀真枪干”^[7]，这是因为只有在风险斗争的一线中才能真正考验和锻炼党员干部，才能真正做到“百炼成钢”“无坚不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8]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传承党的“风险斗争”的历史优良传统，除了应必须自觉参加“风险斗争的实践”，还应努力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重大风险斗争实践中学习和思考，以此改造和提高自己。可以说，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其自我发展的需要。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广大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传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斗争精神”，他们在“抗疫”斗争中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在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历练自己、提高自己和成就自己，他们成为新时代的楷模和风险斗争的“英勇战士”。

2. 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历史中一以贯之的政治要求和基本方法。从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的历史中不难发现,防范化解各重大风险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习近平指出:“要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从党和国家大局出发看问题、想问题,清醒看到存在的困难和面临的挑战,坚决打好防范和管控重大风险攻坚战。”^{[9](P385)}“自觉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战胜风险的基本遵循。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10]在“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和“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增强风险应对的意识和能力;在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全国一盘棋”,共同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当前,战胜疫情风险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习近平指出,“打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必须加强党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领导”^[11]。新时代如何打赢重大风险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方法就是要“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坚持党的领导”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方法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方法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3. 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指出:“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正所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9](P40)}战胜风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战胜风险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重大风险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才能取得风险斗争的伟大胜利。习近平指出:“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11](P20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1](P200-201)}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国家安全风险防控指导思想中的体现和运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相统一的风险应对方法论思想。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重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12]。“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在国家风险治理中的现实体现,是中国战胜疫情所坚持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根本方法,是对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重大风险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思想理论的重要内容。

4. 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勇于和敢于跟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才能正确判断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作出科学决策,成功应对各种重大风险。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方法,不会因历史和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习近平总书记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到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中,强调“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其核心要义就是要立足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形势的具体实际,实事求是分析和解决中国安全问题。在“抗疫”的斗争中,党中央要求要实事求是做好防控工作,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切实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13]“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就是疫情防控中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方法。“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是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方法论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风险斗争”方法论思想的历史继承和发展。

三、实践维度：将重大风险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综合体” 进行整体性治理

“重大风险”就是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敌人”。毛泽东指出：“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14]因此，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具有整体性治理思维，将重大风险置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宏大历史进程中进行整体性考量与把握。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整体性思维理念，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纳入到国家总体安全和民族复兴的国家战略布局中进行系统、辩证的考察，从而实现重大风险的整体性治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重大风险的整体性治理，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新时代各领域重大风险，以此探寻最优的治理方案；二是将整体性认识论转化为整体性施政策略。

（一）从整体着眼新时代各领域重大风险，寻求最优治理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实际，坚持运用整体性治理思维认识和把握当前我国存在的各重大风险，精准施策。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从全局的高度关注影响国家总体安全的重大风险，全面概括新时代面临的各重大风险，加强各重大风险的针对性治理；二是着眼于国家总体安全的大局，注重各重大风险间的相互联系及体现出的整体性特征，将各重大风险的治理与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大局全局有机结合起来。

1. 全面概括新时代面临的各重大风险，加强各重大风险的针对性治理。搞清要应对哪些重大风险，是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首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国家总体安全的高度，正确分析和科学判断新时代面临的重大风险，他指出，“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9] (P81)} 习近平全面廓清了当前影响国家总体安全的各重大风险，明确了新时代要应对什么样的重大风险，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全面的治国理政新思维。习近平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安排和部署如何防范化解各重大风险，会议采用整体部署与分类施策相结合的方法，既对新时代该如何防范化解各重大风险作总体要求和统一部署，又具体分析各重大风险的现状及应对存在的问题，精准施策，提出有效的治理措施。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不仅全面指出了新时代该应对哪些风险，还提出了各重大风险治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方法和具体措施，其是新时代战胜各种风险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2. 科学分析各重大风险的整体性特征，强化“一体化”治理和协同治理。习近平高度重视各种风险的普遍联系性，强调各种风险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他指出，“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风险综合体”^{[9] (P82)}。实际上，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各重大风险间的联系和整体性特征，强化重大风险的整体性治理，会极大增强风险应对的实效性。“风险综合体”是习近平对新时代各类风险内在规律的整体性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风险认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风险综合体”认识论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各重大风险“一体化”治理的新战略，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1] (P200-201)} 构建“一体化的国家安全体系”离不开风险的协同治理、系统治理和全面治理，离不开风险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一体化的国家安全体系”是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

的创新性战略举措，是习近平整体性思维在国家安全治理实践中的具体反映。面对全球性风险挑战，习近平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15]全球性风险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风险，仅仅依靠一个或几个国家是不行的，需要全世界的国家联合起来，协同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重大风险，这就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风险，习近平指出，“病毒没有国界，不分种族，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国际社会只有形成合力，才能战而胜之。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面加强国际合作”^[1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重大风险的协同治理，这是习近平提出的全球重大风险的治理方案。

（二）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整体性实施策略

当今重大风险的多样性、复杂性、联动性、综合性决定了仅仅依靠“单兵作战”或者简单的“兵来将挡”是难以完成“风险斗争”的伟大胜利，这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各方，形成“立体化”的整体应对体系。

1.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分析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必要性，他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1](P84)}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为了从整体上有效应对重大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组织需要与安排，是为了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战略的机构改革与创新。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将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部门如国家安全部、外交部、军队、公安、武警、司法等集于一体的国家安全最高决策应对机构，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并直接领导国家安全工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有助于从整体上规划国家安全战略，提升国家安全工作统筹协调的效率和能力，有助于从整体上协调应对跨部门的重大风险，从而有效避免低效的事务性和应急性安排，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习近平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应对重大风险的重要组织策略，全面提升了国家整体应对重大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2. 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新时代领导干部的整体性政治要求。领导干部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少数”，如何发挥其关键作用是应对重大风险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了更好发挥领导干部在应对重大风险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其提出了整体性的政治要求，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同时还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大家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7]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既是新时代领导干部的初心和使命，又是其政治职责、政治任务、政治担当和政治自觉。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要求具有整体性，这是因为：一是要求对象的整体性，将所有的领导干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要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新时代每一名领导干部的使命和担当；二是要求内容的整体性，将新时代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具备的素质如强烈的风险意识、顽强的斗争精神、较强的应对能力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统一要求。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必备素质有三个方面：一是要强化风险意识。习近平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1](P200)}“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治党治国重大原则反映或具体到风险应对的实践中，就是要强化风险意识，“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

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7]同时,还要从战略全局认识和把握重大风险对国家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影响,强化重大风险的危机意识,从而自觉增强重大风险应对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二是要永葆风险斗争精神。精神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斗争精神是我们战胜重大风险的思想武器。新时代领导干部永葆什么样的风险斗争精神,习近平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他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7]三是要提高风险应对能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加强风险应对能力建设,将驾驭风险的本领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提高风险应对能力作为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通过理论学习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7]要到重大风险斗争的实践中去学习历练、积累经验、增长才干。

3. 加强风险应对制度建设。制度是应对风险挑战最有效的方法,应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和有效的风险应对制度,从而以制度的优势和威力战胜重大风险。制度的建设和创新其本身就是动态的整体系统,要“抓住其动力学特征,分析其因素、结构和功能,以找出一种动态、整体、有效的分析方式”,^[17]因此,整体性是制度建设和创新的固有属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两次党的重要会议上,专门研究同一个重大问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足以说明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2019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的现实需要,“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18]。可以这么讲,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有效应对重大风险的过程,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个”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十三个”需要“坚持和完善”的制度和制度体系,实质上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举措。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重大风险,习近平非常注重通过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来解决疫情暴露出的短板、漏洞和弱项等问题。习近平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指出,要通过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举措来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19]制度是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根本方法,只有坚持和巩固、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才是战胜重大风险的根本出路。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

-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人民出版社,2017:15.
[3]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 研究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

(下转第40页)

疫情大考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祝小茗 李菽林

(1.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吉林 延边 133613;
2.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31)

[摘要] 2020年春天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也是一场艰辛困难的防控疫患的阻击战。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防控形势呈现积极向好的发展态势。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需求,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弘扬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与世界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彻底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的总体战和阻击战。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防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

[中图分类号] D61; D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20)03-0013-08

人类文明的进化史,是一部驯化和驾驭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历史,而中华民族总是在逆境和磨难中成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在风险与挑战中前行壮大。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打破了宁静的生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卫生突发事件。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当前已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平稳恢复的态势。同时,本着公开透明和负责任态度,中国向近八十个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非盟

收稿日期: 2020-04-14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十九大精神研究专项课题“新时代‘两步走’战略的认知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8-ZX-SJ-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祝小茗,男,博士,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 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李菽林,男,湖南长沙人,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企业治理。

提供援助，分享防控、诊疗经验，与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举行卫生专家视频会议。无论是从政府还是从民间，无论是从物资援助还是从技术合作，时刻传递着同舟共济的中国担当，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极大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彰显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显著优势

回顾近百年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家的发展变化以及所创造的伟大奇迹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面也曾经谈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1]在13个显著优势里面，这一条也被放在了第一条，并在这一次疫情防控中得到了考验与检验。

一是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多次对防控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并深入到抗疫的第一线调查研究作出部署。2020年1月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习近平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指出必须高度重视疫情，全力做好防控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1月22日，鉴于疫情迅速蔓延、防控工作面临严峻挑战，习近平明确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正月初一，中央专门召开会议来讨论疫情防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对于如何来防控这一次疫情，防控疫情应该采取的措施等等，都有了非常明确的指示，党中央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成立了由李克强总理任组长专门负责的应对疫情工作的领导小组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部署。在此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时刻跟踪疫情蔓延形势和防控工作进展情况，不断作出口头指示和批示，亲自在北京、武汉抗疫前线指导疫情的防控问题，李克强总理在武汉考察，到了抗疫的第一线。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始终在抗疫的第一线指挥部署。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之下，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之下，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疫情才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二是党员干部展现“硬核”担当。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是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能力素质的一次大考。对于各级领导来说，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不仅需要一叶知秋的细微洞察力，更需要勇挑重担的领导魄力。这不仅是一种服务大局、顾全大局的全局意识，是一种不畏艰险、愈险愈强的拼搏精神。在艰难困苦面前是否敢于争先，在利益矛盾面前能否敢于亮剑，在群众危难面前可否敢于靠前，在风险考验面前，能不能站得出来、冲得上去、挺得下去，能不能“守初心、担使命”不计个人利益、不惧困难压力，是对广大党员、各级干部的一次重大检验。疫情发生以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的负责同志坚守岗位，靠前指挥，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带班、干部24小时值班和疫情报告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广大党员干部，迅速把握中央和省、市关于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及时传达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和要求，坚定了广大群众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面对看不见的病毒，民众中出现恐慌、传言，各种不同立场的声音在社会蔓延，广大党员干部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定盘针的作用，不信谣不传谣，坚定信心，明辨是非，站稳政治立场，积极参与疫情防治知识普及，引导公众正确理解、主动配合、科学参与疫情防控，众志成城打赢疫情防控战，确保了各项工作领导有力、落实到位。

三是基层党组织积极行动。“一个支部一个堡垒、一名党员一面旗帜”，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无声的斗争之中，党的各级组织迅速行动，组织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我们不难看到，在全国各地一夜之间几乎按下了暂停键，全面进入战时状态，落实“战时机制”。全国各地纷纷采取镇（街道）、村（社区）党员干部带头分片包干、全覆盖登记排查、全方位服务引领等方式，构建起了市、辖市（区）、镇（街道）、村（社区）、村（居）民小组五级防护网络。党员志愿者带头挨家挨户开展宣传摸排，针对居民群众，用“大喇叭”传统工具逐栋喊话，切实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工作优势。非公企业党组织积极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主动慷慨解囊捐钱捐物，为防疫工作贡献力量。有的党组织成立了后勤保障队，有的党组织成立了疫情防控队。正是因为各级党组织积极地行动起来，尤其是基层党组织能够积极地行动起来，才保证了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稳定，人心的安定。

四是普通党员和群众积极投身于疫情防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疫情防控最严峻的时时刻，广大党员群众，坚守初心、担当使命、迎难而上，做到“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组织的工作”“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站在第一线”。^[2]我们不难看到，在疫情防控的最前线，有的医生提交了入党志愿书，有的成立了临时党组织，举行了党员入党的宣誓仪式。上海支援武汉专家组组长张文宏，要求领导先上、党员先上，率先进入重症病房。很多地方的医疗、公安、应急、市场监管等系统的广大党员主动放弃春节假日，带头坚守岗位，带头冲锋在战“疫”一线和急救转运前线。党员骨干带头组成志愿服务队，全体党员佩戴党徽上岗，一支支由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的“党员突击队”冲锋在抗击疫情一线，扎实工作、经受考验，用行动践行了初心和使命，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总之，从这次疫情防控的顶层设计、具体部署、到各项措施的具体落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部署，没有中国共产党协调各方的强大能力，疫情的防控可能不会如此顺利。这一点和西方国家在面对飓风、面对灾难、面临海啸方面所出现的一些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历史反复证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经历的各次自然灾害过程中，哪里有困难，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坚强有力的工作，哪里就有党员先锋做表率的情形发生——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

二、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需求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并且对人类社会形态作出了科学划分。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人类进步的社会历史产物，而社会主义是以人民为本，由于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强调实现人的解放，强调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是因为如此，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人民立场就要以为人类谋解放为它的政治追求，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这与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高度一致的。在这—次疫情的防控过程之中，党和国家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也充分地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全力以赴救治感染患者”“及时收治所有确诊病人”，体现了党对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的高度关怀。随着抗击疫情工作的有序进行，总

书记和党中央又提出，要确保疑似和确诊病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确保一个都不漏，强调务必高度重视对医务人员的保护关心爱护，确保医务人员持续健康投入战胜疫情斗争。^[3]在抗“疫”的大考面前，总书记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冲到一线，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集中精力、心无旁骛把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位。全方位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既是自觉履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具体体现，也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医务人员是战胜疫情的中坚力量，我们党高度重视和关心爱护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要对医护人员进行定期体检，从各个方面提供支持保障，适当照顾他们亲人，当好医护人员与家人的传话筒、联络员，让医护人员心无旁骛打好疫情防治战。

人民群众是疫情防控的主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4]在党中央领导下，广大基层工作人员立足岗位、不辞辛劳，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他们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在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两大环节上，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村镇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整个社会上下联动，形成了群策群力、群防群治、共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和社会氛围。中国内地的所有省市区全部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I级响应机制，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摸排，掌握来自、到过疫情高发地区，或与疫情高发地区人群有过密切接触的群众。积极听取专家意见，果断采取包括区域局部阻隔、适当延长春节假期等措施，有效维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当部分媒体还在鼓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自由”之际，美国工人世界党撰写的《社会主义基础如何帮助中国抗击冠状病毒》尖锐地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属性，就是在危机中或紧急情况下，人民的福祉优先于资本主义利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新冠肺炎病毒的各项措施，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在资本逻辑的运转之下是很难做到的。当美国出现紧急情况或危机时，首要考虑的是维护财产关系。国民警卫队一次又一次地动员起来，阻止绝望的人们‘抢劫’商店以获取所需的物资，政府也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企业囤积、投机和涨价，哪怕是捐赠给慈善机构的食物、水、毯子和发电机，最后也只能被存放在仓库里。”^[5]另据2月8日的《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各地的医院急诊室已经人满为患。包括药物、呼吸机和口罩在内的重要医疗用品严重短缺。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和降低成本，拥有数百家医院的大型营利性医疗集团甚至会对口罩、防护服和手套等短缺用品保留库存。^[6]而在中国，对于新冠肺炎患者都是免费救治。通过比较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以人为本，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珍爱生命，保护人民的本质，充分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制度特色，也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三、彰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独特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切为了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国革命是依靠人民战争取得胜利的，中国的建设和改革也是依靠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取得成功的。我们要取得疫情防控斗争的全面胜利，同样要彰显和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优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运用人民战争的传家宝，迅速打响疫情防控总体战。广大医务工作者不怕牺

牲、连夜奋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而动、敢打硬仗，广大人民群众主动配合、守望相助，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指示号召“宅”家战“疫”；广大公安民警、疾控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等坚守岗位、日夜值守；广大新闻工作者不畏艰险、深入一线，广大志愿者真诚奉献、不辞辛劳。生产工人加班加点增加医护用品的生产供应，志愿者忙碌在疫情防控的各个角落，还有许许多多其他行业的从业者坚守岗位、真诚奉献，全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千方百计筹集医护用品捐赠回国助战“疫”。他们积极参与，积极行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坚持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汇聚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的强大力量源泉。

在这次疫情防控的过程之中，人民群众蕴含着抗击疫情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是我们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硬核支撑。虽然，这次疫情防控的重点在武汉，在湖北，但武汉并不孤单，因为全体中国人民都同武汉，同湖北的人民紧紧地站在一起。在这次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过程中，这种全民动员，齐心协力的情况，处处都能够看到。疫情防控需要财力和物力支持，于是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在极短时间内为疫区投放了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的资金，全国各地向灾区捐款捐物。东北的大米，西北的水果，山东的蔬菜，以及其他全国各地的物资，医疗物资，生活物资等等，源源不断地向武汉，向湖北集中，保证了疫区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

在抗击疫情出现人力资源短缺的吃紧阶段，党和政府动员各方救援力量。一封封饱含决心的请战书，诠释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一个个科研工作者与疫情赛跑，进行科研攻关，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拼搏精神；一批批志愿者涌向湖北，涌向武汉，彰显了中国人民同舟共济、肝胆与共的精神；一群群白衣天使，主动请缨，奔赴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彰显了中国人民的仁心大爱和责任担当。这次的疫情防控过程中，亿万人民群众都投入到了这场无硝烟的、全民的战争中，习近平总书记与全国九千万党员共同缴纳特殊“党费”，形成了巨大的合力共同抗击疫情，彰显了紧紧依靠人民抗击疫情的显著优势。就连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都深深慨叹，“当中国政府对湖北省3500万工人实施部分隔离时，还宣布冻结租金、贷款和信用卡支付。美国政府能做到吗？银行会容忍冻结信用卡债务、汽车付款、保险费和抵押贷款吗？即便是遭遇全民健康危机，美国仍有数百万人在带病上班，因为有4000多万工人没有带薪病假，待在家里照顾生病的家庭成员意味着他们将面临失业的危险。关于到底该如何预防，政府给出的建议仅限于告诉他们去接种疫苗，和一系列咳嗽药和发烧药的广告。为即将面临的健康危机或自然灾害做准备而动用政府资金，这根本不在美国的议事日程上！”^[7]

四、彰显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制度优势。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成绩长期稳定的辉煌成就。无论“两弹一星”的技术突破，还是载人航天技术、高铁技术的突破，都主要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南水北调”工程、三峡水利工程、1998年抗洪、汶川地震的救援和灾后重建，2003举国抗击“非典”、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建设。每一项重大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种优势的彰显和发挥。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可以调动各方面力量和资源解决重大问题；中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可以使地方服从中央统一组织协调；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可以汇聚更加广泛的力量、资源和智慧；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可以使国家能够集中有限资源用于急需的领域、行业。因此，面对疫情蔓延的新形势，我们更需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这一优势。首先，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有效调动各种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应用到抗击疫情战斗中，能够集中力量最大限度地应对疫情挑战。从顶层设计上讲，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这是在疫情防控关键阶段，党中央对各项工作加强统筹协调的重要体现。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成立，将极大地增强应对疫情各项工作的统筹协调力度和集中指挥力度，不仅将增强资源配置力度和政策保障能力，从而将有利于形成疫情防控的制度合力，有效推动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的协同配合。其次，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指出，要善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所谓举国体制，是指我们国家在发展进步、攻坚克难、应对各种灾害挑战方面能够举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解决各种困难，实现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运行机制。面对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传染速度不断蔓延，各地发病人数不断增加，已经不是某一城一地能够应对这种局面。在此条件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来，举全国之力抗击疫情，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强大政治优势，确保党中央能够有效抗击疫情、应对挑战，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再次，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抗击疫情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央下拨了大量的救援物资以及抗击疫情所需资金为疫情阻击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来自四面八方的救援队伍迅速奔赴疫区。从医护人员到广大志愿者，从解放军到群众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去。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打出了一场全民动员的疫情防控战役。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展现出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无畏精神、奉献精神，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源源不断地提供强大精神动力。^[9]

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我们共同见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疫情爆发后，党中央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坚强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同时指出，要加强联防联控工作，加强有关药品和物资供给保障工作，加强医护人员安全防护工作，加强市场供给保障工作，加强舆论引导工作，加强社会力量组织动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这“三个全面”是应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加快蔓延的严重形势的重要工作方针，“六个加强”正是落实这“三个全面”的具体要求，也是在新春佳节之际切实维护好社会大局稳定、平抑社会恐慌情绪的有效举措。加强联防联控工作是防疫工作的着力点；加强有关药品和物资供给保障工作、加强医护人员安全防护工作是防疫工作的基础保障；加强市场供给保障工作和加强舆论引导工作是稳定社会生活正常秩序和人心的两大重要支撑；加强社会力量组织动员是筑牢防疫战胜疫情的强大人民防线的厚实力量。“六个加强”相互支撑、缺一不可，是“动员、部署、加强”一揽子行动方案的具体落实。至此，全国上下形成了全面动员、集中部署、稳步巩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各地、各部门坚决地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统一行动抓好战“疫”力量的区域统筹。各省份各地区因地制宜、量体裁衣，既兼顾到本地区、本部门的防御需要，也考虑到了重点地区和对全国的影响。

正是因为我们具有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我们才看到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上下一盘棋，举全国之力，以“一省包一市”的对口支援方式，组织了2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军队等各个方面，调派了330多支医疗队，调动了4万多名医护人员进行援助。一架一架军用飞机，运送着大型防御物资到达武汉双流的机场，一批一批军队医院的医护人员，奔赴了抗疫的最前线，争分夺秒地阻断疫情蔓延，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病毒防护墙，展现了中国力量。

当世界媒体还在热衷讨论北京大兴机场快速建立起来和那种宏大工程建设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之际，雷神山、火神山这两座医院不到半个月时间就建成并投入使用，再次证明了“中国速递”与“中国力量”。3月8日，全国首个“智能方舱医院”——武昌方舱医院项目通过院方验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和赞赏。从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等的筹建，到防疫物资的生产、运输、调度、供应等，皆是雷厉风行、一呼百应。其行动之迅速有力，令人赞叹，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与伦比的。这不仅体现了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充分地展示了综合竞争国力、科研攻关能力以及高度的社会整合能力，更彰显了中国政府的管理能力和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执政能力。

五、彰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优势

“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倡议是习近平2013年3月23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向世界提出，在201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他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0]2017年10月18日，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继续强调，各国人民要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更明确提出了“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显著优势”。^[11]新冠病毒是一种人类共同面对的灾难，也是对于整个人类的共同的挑战。我们在面对疫情的时候，任何人都是无法独善其身的，病毒的高度的传染性让任何人难以置身事外。当我国已经见到曙光的时候，世界不少国家疫情严重起来。西方一些国家对疫情的应对动作迟缓，一些防控措施朝野难以达成共识，甚至不检测，不报感染数等。面对世界上多点暴发且不断蔓延的疫情，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才能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挑战。疫情没有国界，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12]

诚然，这次疫情对全球的冲击是全面的，各国的不同反应实际上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国家治理体系。在一些社会用难以蠡测未来的前景、具有风险的“群体免疫”来应对之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采取在很多人看来是“裸奔”的方式，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商业本性，注重利益而不注重正义。疫情传播没有国界、阶级和种族之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人逐渐开始认识到，单纯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最终有可能带给人类更大灾难。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取得的积极成果，是中国文化讲究“仁义”，主张“天下一家”，尊重个体和不同社会的“和而不同”的生动体现，即使面对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也要对生命的给予尊重和为拯救生命所做出持续努力，而生命的价值都在拯救生命的不断努力之中得到了终极呈现。他们正在得到世界更多人的理解，时刻传递着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文化意义。

综上所述，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是我们增强定力、坚定信心的基本依

据。“继续在人类的伟大实践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13]，是习近平在2020年春节团拜会上讲话的结束话语，同时也是党和人民不畏风浪、直面挑战的庄严宣言。我们笃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有14亿中华儿女的磅礴力量，有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奋斗，一定能够打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和阻击战，时刻彰显“中国之治”特殊优势，如期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不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四个优势[J].理论导报,2019(09):1.
- [2]吴永胜.战“疫”一线彰显党员本色[N].解放军报,2020-03-25(007).
- [3]周 婷.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彰显中国特色医疗卫生制度显著优势[J].上海经济研究,2020(1):1-9.
- [4]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J].共产党员(河北),2020(05):2.
- [5]吴建永.充分认识中国战“疫”的世界意义[N].天津日报,2020-03-24(009).
- [6]Morning Edition.How New York, California And Washington Are Dealing With COVID-19[EB/OL].<https://www.npr.org/2020/03/25/821285193/how-new-york-california-and-washington-are-dealing-with-covid-19>,2020-04-08.
- [7]Cecelia Smith-Schoenwalder, Staff Writer, U.S. Coronavirus Cases Surpass 55,000 with More Than 800 Deaths[EB/OL].<https://www.usnews.com/news/health-news/articles/2020-03-25/us-coronavirus-cases-surpass-55-000-with-more-than-800-deaths>,2020-04-09.
- [8]汪青松.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103.
- [9]陶一桃.抗击疫情实践中彰显我国制度优势[N].深圳特区报,2020-04-14(B01).
- [10]何 英.大国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79.
- [11]本书编写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0.
- [12]李海青.只有合作才能驱散疫情阴霾[N].光明日报,2020-04-07(002).
- [13]习近平.在二〇二〇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1-24(001).

【责任编辑 许鲁光】

应急行政视域下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 正义性辨析

赵莹莹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在应对新冠疫情等公共突发事件时, 应急行政权的扩张往往延伸至公民基本权利的领域, 使公民基本权利受到限制。依据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 有必要对抗击疫情过程中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正义性刻度进行梳理明确。通过剖析得知, 应急行政中对公民基本权利作出限制有其正义性基础, 并应当从遵循法定原则、发挥宪法解释作用、构建应急行政裁量控制机制三个方面着力。

[关键词] 公共突发事件 应急行政权 公民基本权利 基本权利限制 基本权利保障

[中图分类号] D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20)03-0021-10

公民基本权利作为法治国家内部整个宪法理论与实践的基石, 强调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 是整个社会和全体民众在当今这个走近权利的时代孜孜以求的目标。^[1]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不可侵犯, 但在危机时期, 国家行政权力往往会延伸至通常属于公民自治的领域, 公民权利和自由行使的范围将缩减。^{[2](P98)}霍姆斯曾说: “当国家元首决定有关国家存亡的事情时, 个人的普通权利必须做出有必要的让步”。^①“在自由与政府的永久争议上, 危机意味着更多的政府而较少的自由”。^[3]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规定吸收了这种思想并作出相关规定, 如《匈牙利宪法》第8条第4款规定, 在非常时期、紧急状态或者危险状态时, 公民基本权利可以中止或者

收稿时间: 2020—03—12

作者简介: 赵莹莹,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2018级博士生, 研究方向: 宪法行政法。

①See Mr. Justice Holmes in *Merer v. Peabody* (212 U.S.78,85).

加以限制。^①实践中因行政紧急权力扩张而限制相对人权利的实例比比皆是,较具代表性的案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被拘留案及美国政府在“9·11”恐怖事件发生后采取的一系列应急措施。

我国《宪法》也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2020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席卷全球,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各项应急措施让这种保障与限制间的张力尤为明显,亟需对应急行政中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各项限制是否具正义性进行探讨。需明确的是,突发事件应对中应急行政权并非一种拥有“超宪性”的“特权”,在应急行政情况下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应当作为宪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辅助手段。

一、问题的源起:突发新冠疫情对应急行政的考验

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近年来,发生在我国的“非典型肺炎”、汶川大地震、“甲型流感病毒”、玉树地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危机事件中,行政部门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做出的应急行政决策往往可能更大程度和范围上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应急行政的合法性决定了行政决策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性。同时,实践中应急行政决策往往更多侧重于解决危机的实效性,至于对决策的合法性问题的关注则不甚明显,甚至存在为了决策的实效性而舍弃合法性的情况。如2020年2月2日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卫健局作出《应急处置征用通知书》,认定云南省瑞丽市对发往重庆市的9件口罩进行“依法紧急征用”的行政决策违反了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45条的规定,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征用行为只能针对在本行政区域内的物资,在全国范围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紧急调集人员或者调用储备物资,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的权力只属于国务院。在这次事件中,处于运输过程中的口罩属于跨行政区域的物品,依法只能由国务院进行征用和调用,大理市这种为了本行政区域需要而擅自“暂扣征用”救援物资的行为,不仅会影响疫情防控期间物资的配送流转秩序,更是为紧急状态下应急行政决策的合法性问题敲响了警钟。

(一) 应急行政中对风险深度预测的偏差

应急行政决策的合法性难以把握且受到质疑的根本原因在于突发事件风险深度存在不确定性,预测的偏差使应急决策有可能陷入“过犹”与“不及”的窠臼中。当用概率来构建应急行政过程中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模型时,我们会发现一些风险的程度分布概率可能处于不可知或模糊不清的状况。风险可计算性的有限性导致对突发事件的风险深度的预测偏差,行政机关在这种风险深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被要求迅速、高效地做出决策,自然导致决策的合法性受到考验。

风险深度预测的偏差使应急行政决策一方面存在超越法律规范条件假设的可能性,如2003年在应对“非典型肺炎”的事件中政府采取的隔离措施出现了决策正当但不合法的纠结局面。对于这一问题可通过事后立法进行弥补。另一方面的问题在于如何判断突发事件是否符合既存法律规范的标准,如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人民政府认为可能发生重大或者特别重大突

^①这些基本权利不包括:生命和尊严、自由和个人安全的权利、法律资格的权利(第54—56条);无罪的假设、公平审判、法不溯及既往(第57条第2款—第4款);良心和宗教自由(第60条);男女平等、儿童的权利、少数民族的权利、不得驱逐国民(第66—69条);社会保障的权利(第70条E款)。

事件的,应当立即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虽然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是法律规则中普遍且必要的现象,但实践中突发事件的复杂性及对风险深度把握的不确定性导致行政机关判断是否“可能”的难度系数过高,这种判断失误的代价将是巨大的,如2020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中,由于武汉市政府对疫情防控判断的失误导致疫情向全国各地扩散加重。

对此,应急管理学认为,行政部门在应急处置当中只能选择在当时状况下较优的方案,而无法鉴别出哪项是最优的方案,同时对于应急行政的启动和结束界限也难以准确把握。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受制于应急决策的实效性考量的影响,随着信息、条件、环境的变化,应急措施会表现出“普罗米修斯的脸”,在这种前提之下,对应急决策的合法性把控在应急行政整个过程中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受到削弱,导致出现应急行政中行政权力扩张与公众权利限制过限的问题,如抗击疫情过程中发生的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在接到征用学生寝室的决定后对该校同学个人物品处置不当事件。

(二) 应急行政权力扩张的红线

拉德布鲁赫认为,正义、合目的性与法的安定性是法律理念的三部分,他们三者之间是一种二律背反的关系,合目的性符合相对主义的需求,但在这种情况下,正义和法的安定性超越了国家观与法律观之间的矛盾,也跨越了党派间的纷争。法的安定性代表着秩序与安宁,这是法律要保证的第一大任务。^{[4](P83)} 保罗·库克认为,法律必须为我们保障安定与安宁,因为二者是第一大权益。我们对于法律如何实现间接的目的这一问题,始终未能够达成一致,即使是处在一种有关法律最高目的的基本的、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4](P85)}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51条规定,当发生突发事件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时,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有关部门可以采取保障、控制等必要的应急措施。类似的授权条款为应急行政中行政机关提供了自由裁量权,以期快速且有效地减轻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这引出了在实证主义中,法的安定性同正义与合目的性之间的矛盾。^[5] 因为实证本身就是法的安定性的一项要求,故而法的安定性给法律刻上了很多种特征,而这些特征则与适应个体需要的合目的性有矛盾之处,导致了在应急行政中公民权利的边界更加模糊,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及限制都失去法定依据。

应急行政决策区别于传统的政府决策,其核心目标应当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维护人权、维护国家社会稳定、尽快恢复常态,它往往表现出应急行政权力扩张的外观。^[6] 从经济学角度考虑,一项应急决策的失误或者延时可能导致整个突发事件的反向发展,致使危害扩大损失加剧。^[6] 如何防止在应急行政中决策权的滥用,协调决策权扩张同公民权利限制问题,使两者处于平衡状态,是实现行政部门应对公共突发事件过程中最大限度人权保护目标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也是研究构建公共突发事件解决机制的前提基础。

二、应急行政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多层次剖析

将法的概念从正义观念中摆脱出来是有困难的,维护社会秩序是法的重要作用之一,在这个价值之上,正义也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秩序的可靠基础上,在应对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过程中对原有社会秩序的恢复是应急行政追求的核心目标。在这个基础之上,正义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即赋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与共同福利相一致。^{[7](P325)} 如果说一个社会秩序是合乎正义的,这意味着这种秩序把人们的行为调整得使所有人都感到满意,也就是说,所有人都能在这个秩

序中找到他们的幸福。^{[81] (P43)} 博登海默认为, 正义既关注法律规范以及制度性安排的内容、同时也关注这些规范及制度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增进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方面的价值。^{[71] (P261)} 凯尔森认为“正义”的意思就是认真地适用法律以维护法律秩序, 这便是“在法律下”的正义。^{[81] (P43)} 在强调正义与秩序的关系时, 我们还需要注意在正义的理念和社会利益或福祉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衔接点, 也就是哈特所指出的社会变迁或法律很少能够符合或促进所有人类的共同福祉。在大部分情况下, 法律只能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以造福某个阶级的人民, 在这种时候, 或许可以用“大众的利益”或“共同的利益”加以辩护。马克思也曾指出, “虽然每种自由都被宣布为公民的绝对权利, 然而却总是需要附加说明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自由才是无限制的, 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9] (P323)}

(一) 理论原点: 人性的预设

“人性总是或多或少的同一切科学有着联系, 任何科学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回归到人性当中, 而不论他们与人性离得有多远”。^[10] 现代汉语词典将人性定义为“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11] (P659)} 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 马克思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 要相信无所不在的人性的力量以及人所固有的尊严和价值的力量, 不要过于渲染制度、权力乃至传统的力量, 人本身才是权利的最终基础。^[9] 因此, 正视人性, 立足于人性应当是任何制度和理论都应的出发点, 将是否能够满足人性需求作为构建权利和权利理论的原点。

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理论的理论原点出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提出的著名的“无赖原则”, 他认为任何权利主体都有“无赖”的危险, 因而权利制度安排应当将“人被假定为无赖”作为理论前提假设, 一个强大的制约机制在这种前提下应运而生, 即对权利以法律的力量加以限制。^{[12] (P156)} 美国的宪政学家詹姆斯·麦迪逊曾用“天使”与“人”的关系作比来形容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他指出, 如果政府是天使, 那就不再需要对政府进行外在或内在的监督和控制在。如果公民都是天使, 那就不再需要政府; 但既然人成为“天使”是永远不可能的, 那么对其基本权利进行限制也是必需的。

(二) 逻辑起点: 公共利益的选择

从逻辑起点上分析问题是认识事物本质的刚性需要。利益是促进社会关系形成, 决定社会制度安排的一项基础性因素, 是搭建社会关系过程中的一个最为核心问题。可以说, 以利益为中心是所有的社会基本关系衍生的根基, 社会关系的发展也是始终围绕着利益进行的。尽管有“资格”“自由”等多种对权利的理解, 但权利最根源追求的目标却依旧是利益。对“共同福利”或“共同利益”的追求意味着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决不可以超越的外部界限, 否则全体国民就会蒙受严重损害。尤其是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 “个人权利”与社会“共同利益”之间仿佛天平之两端, 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 行政应急决策对公民的自由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带来的必须是公共利益的增加, 也正是出于对公共利益追求, 人们才能够自愿让渡权利。

“趋利避害”作为生物的本能, 在社会利益驱动机制之下人性的欲望是难以遏止的。一种在物质上和知识上都具高度发展都文明, 并不能确保一种“善的生活”, 除非它也教导人们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用自我约束的方式去调和自我利益, 教导人们尊重他人, 并教导人们去设计调整各种层次的群体生活的共存与合作的适当规则。^{[7] (P328)} 每个人心中都普遍存在此种道德沉沦趋势, 基于人对利益的无限渴求让享有权利的公民滥用权利的可能性陡增。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 乃是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可以说, 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可能相抵触的)权利相协调的任务。^{[7] (P328)}

（三）直接动因：化解冲突

如果一个社会为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自我肯定留有空间，那么在相互矛盾的各项利益之间肯定会有冲突和碰撞。应对突发事件中国家可能为了A利益而损害B利益。对权利进行限制的关键原因就在于权利之间存在冲突。^[13]这种冲突可分为权利与权利间的冲突和权利与权力间的冲突两类。前者是“基本权利体系在动态运动过程中，权利主体在行使其为宪法所确认的基本权利时，往往有可能影响到同样为宪法所保护的其他人的基本权利，从而显现出一种混乱状态。”^[14]权利本身的性质及因社会资源的有限性而引起的分配不均都是这种冲突产生原因。后者是权利与权力的冲突，是权力作为权利的集合代表，作为一种公共强制力，当无法满足所有主体的或全部的要求时，权力为了减少因基本权利间的冲突而引起的资源浪费，利用其强制力对权利进行了有意识的调配。实践中，政府或许希望在某个私人占有的地方开辟公路或者建造建筑物，也可能为了国内安全或民族自卫而设定一些侵犯个人言行自由的约束和限制规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政府可能会征收私人物品或者对某些人的自由加以限制进行隔离。通过颁布评价各种权利重要性和提供调整各种权利冲突的标准的一般性规则，达到避免有组织的社会在作出一些决定时的或然性或偶然性情况。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和、化解上述冲突，无论是权利与权利的冲突或是权利与权力的冲突。使罗斯科·庞德将这一过程称为“价值评价”，他认为，应当采用一种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来替代僵化呆板的评价规则，尽可能多地满足一些权利，同时使牺牲和摩擦降低到最小限度为核心。

（四）正义性基础：合宪性保障权利

保护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根本目的，此目的也成为了基本权利限制的正义性基础。公民基本权利限制来源于权利之间的内在制约，其本质是通过价值的取舍来避免权利冲突问题的发生，是为了实现一定的权利不得限制另一权利的过程。正如庞德所言，各项权利的价值评价的基础来自实践总结而非既定的刻板标准。在突发事件应对中，行政部门由于风险深度的不确定性使得行政权的行使呈现出一定的扩张性，但这种扩张是否正当是以其是否实现了对公民基本权利更高层面的维护为判断标准的。当讨论应急行政视域下行政决策的合法性与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正义性问题时，基本权利的最大保护原则常常作为例证决策制定者的标尺。我国宪法第51条对基本权利限制作出了总体性规定，这是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律依据和正义性基础。对基本权利限制的限制来自德国基本权利限制的规范理论，与我国这种简明扼要的立法概括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以下简称德国《基本法》）共用了18个条文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进行列举。^①宪法一方面坚决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原则，但也例外地允许公权力机关在存在法定事由时采取适度干预的合宪行为。但与此同时，如何保证这些来自公权力的限制最后不会演变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过度干预甚至侵害成为摆在眼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往的人权实践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如果对这种限制本身不加以限制，允许公权力随意地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就可能存在公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过度侵害。

实际上，宪法内的基本权利限定条款虽然是作为“合宪性理由”而存在，但对其的理解不应仅

^①首先，立法者在规范构造和位置安排上将基本权利的限制性规定设置在每一项基本权利规定中进行；其次，在限制的方式上采用的是以法律保留作为主要限定模式的方式；第三，立宪者在《基本法》中基本权利一章的结尾补充了对法律保留一般性限制内容的规定。

限定为是对公权力的授权, 而应同时定位为是对公权力的限制。^{[15](P110)} 学理上将“限制”界定为是对基本权利的合理限定, 限制的对象主要为基本权利享有者的公民, 是宪法为了公共利益等更高价值, 以及基于个体的社会连带性, 而对公民行使权利的界限加以划定。^{[16](P281)} “限制之限制”的要求应伴随着任何公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理论而存在。尤其在危机时期, 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 “限制之限制”要求的必然遵守是应急行政权合法性的支撑, 更是保障应急行政中公民基本权利限制正义性的核心基础。通过立法明示的方式, 将限权同控权相结合, 只有在具备宪法规定的合宪性理由时公权力才能够行使干预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行为, 且这种行为也要受到法定的种种限制。“限制之限制”是宪法内设定任何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遵循的本质与前提, 这是我国宪法关于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受到德国《基本法》的首要启示。因此, 在宪法中设定有关基本权利的限制性规范, 在注重限制规范本身时, 更应注重对这些限制本身的限制, 即以“限制之限制”作为基本权利限制规范的核心。同时, 权利保障同限制之前应当强调主次, 明确限制是为了保障, 保障是主要的, 限制和保障是辩证的统一; 限制是次要的, 限制是手段, 保障才是目的。^{[17](P221)}

(五) 正义性证成与保障: 比例原则与成本收益分析原则的呼应

既然权利冲突具有两种表现形式, 那么与之对应的, 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也具有两种形式: 一是为了保障权利之间的和谐, 对权利自身进行某种限制; 二是为了保障在公共秩序内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和谐状态, 在基于国家的现实国情、国家利益或维护社会秩序需要的前提之下, 应急行政权具有超法规性、集中性、扩张性的特点。^{[18](P70-75)} 如果宪法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忽略了规范本身的理性设计, 而仅止步于政治性的宣示和概念上的列举, 那么在面对公权力侵害时公民将失去保护自身的武器, 同时自身的权利还存在着被公权力利用之虞。如何实现以最小比例的权益牺牲换取最大比例的公共利益回报, 正是公共危机应对成败的关键。权利的合理分配是实现秩序和谐的基础, 而权利分配的实质体现为一项权利许可与限制的综合过程, 和谐的社会秩序需要权利保障与权利限制的双向保障。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满足社会现实需求也需要在宪法价值允许范围内对公民权利作出有条件的、局部的限制, 此时的限制是通过主体所享有的权利重新确定范围以达到满足现实需要的目的。成本收益分析原则要求运用统一标准去分析相关法律规则或行政决策可能出现的各种有利和不利后果的成本及收益, 在此基础上衡量、判断这些举措同其他的可能替代性举措何者在促进社会福利上是最优的。^{[19](P22)}

三、新冠疫情背景下应急行政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正义性刻度

(一) 遵循法定原则

在宪法内对基本权利的限制要件进行清晰的限定和罗列是应急行政权合法介入私人权利领域合宪性需要, 公权力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只能在限制要件的范围内进行, 超过法定范围则是不正义的。因为仅依靠对基本权利限制必定无法实现突发事件状态下保障公民权利的最终目的, 甚至造成公权力的过度扩张, 让整个国家法治秩序失衡。因而必须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本身进行限制, 以防出现侵蚀公民基本权利的情况。

1. 最大保护原则 公民基本权利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最为根本的权利范畴, 无论什么时期出于何种目的, 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将实现对权利的最大保护作为核心。但纵观各国的宪政历程, 出现限制大于权利的现象不乏其例。著名政论家米拉波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初就指出法国的

《人权宣言》中隐含着一种危险，他指出，公民不得滥用权利的思想在国民制宪议会对人权的解释中异常明显，制宪会议时权利的谨慎使对限制过于夸大。以至于权利被义务取代，自由被羁绊取代的结果在种种限制、预防办法和款前精心设置的条件下产生。^{[20](P131-132)}同时代的另一位政论家卢斯塔洛也指出，依照法国《人权宣言》的规定，任何人的意见的发表都不得遭受干涉，除非这种意见扰乱了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这个条件如同一只箍套，可以任意放松或收紧。公众舆论对此不接受也是枉然。^[20]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作为公民的母法和根本大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正是人民自己，理所当然应以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为核心追求目标。但理论追求与现实操作并非总是步调一致的。^[21]虽然我国宪法在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的规定上对限制作了最大克制，以期最大限度地不妨碍或干涉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但也要重视个别法律限制过严的情况，尤其是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受制于应急行政权的扩张性特征影响，在风险深度无法准确把握的情况下，应急行政决策有可能突破法律规定，僭越公民基本权利防线，限制甚至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6](P63)}

我国应急性法律对应急行政行为的规范模式的设定表现为较为宽泛的授权性与少部分强制性规范相结合的特点，总结各类相关的应急性法律可以发现“必要性”一词出现的概率极高，其中《突发事件防治法》中共有21处、《防洪法》中6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7处，“必要时、必要的”等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将对突发事件的判断权赋予了行政机关，使其在实体上获得宽泛的授权。需注意的是，对应急行政主体的强制性更多的限制体现在程序上，宪法和法律中缺乏对国家公权力行使的禁止性要求才是目前我国对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总结一些国家的经验，宪法对公权力行使的禁止性要求有助于防范和避免权力的滥用。^[21]

2. 个别立法禁止原则 个别立法禁止原则，即法律保留原则，是指为了避免行政权的恣意滥用和扩张，不允许由行政权来对国民权利和自由进行限制，而必须由法定的立法机构的立法权所保留。依照法律保留原则的要求，凡涉及公民个人人身、自由、财产等基本权利事项，除非有法律对此作出规定或基于法定理由才可以对其进行限制。^[21]与基本权利限制的立法保留相适应的是，当对权利限制的法律进行解释时，也应该采取最有利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进行。鉴于公民基本权利在宪法秩序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在遵循法律保留原则的基础上，许多国家的宪法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已经转向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已跨越了最原始的保留需求，即便立法中对基本权利做出了某种限制性规定，司法机关也拥有结合个案审查该项限制的权能。

我国现行宪法中未明确规定有关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立法层次。按照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各项限制措施中，略显授权过宽的色彩^①。可以说，为防范和避免授权立法可能导致的侵害公民权利的风险，逐步提高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立法层级，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必经过程和必要措施。因此，笔者认为，需要对纳入禁止的基本权利进行扩大和细化。

3. 指明条款原则 指明条款原则又称明确性原则，是指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条款应做到文意具体明确，不宜使用太过模糊性的表述方式，目的是为了防止和避免法律适用机关扩张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范围和界限。这一原则体现在应急行政过程中主要是行政公开，实现应急

^①只将犯罪与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等强制措施和处罚排除在了行政立法之外。

行政权行使的实体依据和程序监督的公开,满足公众知情权。指明条款原则对立法者具有警示功能,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须尽到相当的谨慎和注意义务,以实现间接对司法和行政的限制。这一原则充分体现了法治国家“法律实证化”与“保护基本权利”的融合。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由于公众对自身权利的重视,对自身生命、健康、财产等面临的风险的担忧程度陡增,极易导致公民同行政部门之间关系紧张,不理解、不配合甚至阻挠、破坏应急行政决策的实施,导致应急行政无法获得预期效果。但受限于立法技术,要求所有法律条文的文章都不生任何歧义也是不可能的。应急行政情况下赋予行政主体以相对更大程度的自由采取相应处置措施的权力是必要的。鉴于此,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尽量及时向公众公开处理内容,以满足公众知情权,具体包括:突发事件的已知及预测的风险深度及可能造成损害程度,针对突发事件采取的应对措施的法律依据,该措施可能对公众权利的限制范围、程度、期限,公众对应急行政部门及行政决策的监督渠道,决策措施相对人的权责及救济途径、方法等相关内容。同时,当应急行政决策与公众基本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是应坚持这样的原则进行理解——将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作为基本,对产生歧义的法律条文作出利于公民权利的解释,而不是偏向限制公民权利的解释。

4. 司法审查原则 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公权力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可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对公民基本权利作出限制的抽象性行为的审查,即立法合宪性司法审查。二是对公民基本权利作出限制的具体行为的审查。这种司法审查方式是现代法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鉴于这类具体限制行为通常是由行政机关作出的,如果对其审查也由行政机关负责,那么很容易出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情形,因而需要由处于第三方位置的司法机关进行审查,以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国际上各国通常认为,公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权等基本权利是可司法性权利、具体性权利,为此,我国也应积极吸纳经验,创造条件将基本权利纳入司法保护的范畴当中。^[21]

(二) 发挥宪法解释作用

虽然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在形式上表现为宪法或法律(此处为狭义的“法律”)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出某些方面的限制,但限制的实现不仅需要在宪法或法律文本中规定,以获得其形式合法性和正当性,更需要以有效的方法贯穿到宪法实践当中。^[22]宪法解释是依据法定的程序,探寻宪法规范内涵并使之同不断变动的社会生活相互适应,进而影响宪法发展的一种活动。宪法解释的实践目标在于追求解释的正当性、合理性,以期实现宪法秩序的稳定性,以及宪法规范对于现实生活的适应性与有效性。发挥宪法解释的功能,不仅有助于客观认识实践种的宪法现象,而且有助于总结经验,对完善宪法运行机制提供合理的实践与理论基础。

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进行宪法解释通常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对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限制进行直接的解释,另外一种是对基本法律中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律规定依据宪法精神和原则进行解释。在这些宪法解释的过程中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得以具体化,最终使公民基本权利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同时,宪法解释也使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内涵与外延拥有了开放性的意义,避免了通过修改宪法或法律来实现适应社会变化的要求,满足了宪法及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实践价值变迁的需要。

(三) 构建应急行政裁量控制机制

1. 应急行政中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律保留应成为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作为以德国为主要代表的国家所奉行的一种基本权利限制制度,强调任何情况下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必须以代议机关通过的法律为准,与之相适应的是,涉及一项法律的解释时,应该采取最有

利公民权利之方式。^[21]^①分权式国家架构下的法治理念使法律保留原则有了产生的土壤。其思维进路是：第一，国会代表由直接委派或选举产生，会理性地行使权力；第二，即便国会通过了对人民不利的或有害的法律，那也是人民自己作出的选择；第三，行政权力的扩张是权力官僚化的通常表现形式，这可能会使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受到威胁。在我国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理论体系内，将应急行政中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的法律保留作为我国宪法原则的应然性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民主权原则决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基本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构成了国家政治体制的核心，是我国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根本政治制度。公民基本权利作为民主的起点和归宿，只能由人民代表依照人民的意志通过法律的形式予以保障或限制。其次，在我国的法治体系结构中，行政权和司法权不是平行于立法权的，而是位居于立法权之下的权力。在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时，应当突显立法权的地位与作用。再次，由于我国宪法尚不能直接在司法中适用，应在宪法中将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保留的原则予以宣示。最后，我国的法治实践进程也表明了我国正力图接受并贯彻法律保留原则的基本精神，尤其是我国已加入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充分展现了尊重公民基本权利的意愿。

2. 构建公民基本权利保护视角下的应急行政裁量控制机制 在实现应急行政中公民权利的保障以及避免公权力的滥用方面，法律保留原则的确立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但随着各国法治实践的发展，许多局限性也相继暴露。一方面，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性质和功能无法与不同权力的具体表现相契合。立法权虽然是民意的代表，但在应对突发事件状态下，立法机关也可能制定出不符合理性甚至是违法人民利益的法。第二，随着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公法领域同司法领域界限的日益模糊，在紧急状况下，行政权的扩张成为了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鉴于应急行政中法律保留原则存在的局限，以公民基本权利为本位构建行政裁量控制机制就尤为重要。人民主权原则厘清了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中，国家公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只是人民的受托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23] (P99)}具有最高效力的宪法由人民通过选举代表或直接参与立宪而制定，再通过宪法来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整个国家体系在宪法中加以规定。人民对国家公权力的要求通过宪法体现为对公权力的分配，进而通过法治的方式使得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方面权力形成一种既配合又相互制约监督的国家权力体系。因此，真正实现应急行政权根源于人民的授权和委托，是公民权利的派生物。^[25]其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一个重要部分，行使的最终目的应定位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既是一国宪制的最本质要求，也是国家立宪立国之本，更是我们探讨应急行政视域下公民基本权利限制正义性的落脚点。所以，不论是设计还是行使作为应急行政权中的行政裁量权，都应将公民基本权利列为本位。这也就是公民基本权利与行政裁量在宪法层面的共鸣点所在。

参考文献

[1]张勇. 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哲学基础[J],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7(7):106-110.
[2]戚建刚. 中国行政应急法律制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3]Cecil T. Carr, Crisis Legislation in Great Britain, Columbia Law Review, XI(1940): 1324-1345.
[4]拉德布鲁赫. 法哲学[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3.

①西方有一句著名的法谚，即“有疑问时，以肯定人民自由之方式为之。”

- [5][德]罗伯特·阿列克西. 法的安定性与正确性[J], 宋旭光译, 东方法学, 2017(03): 134-141.
- [6]史锴. 应急行政决策的合法性思考——紧急状态下权力扩张与公众权利的博弈[J], 长沙大学学报 2011(1): 62-64.
- [7][美]E·博登海默.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邓正来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 [8][奥]凯尔森.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9][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德]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0]韩震. 论人文科学就是历史科学[J], 青海社会科学, 1995(06): 47-51.
- [11]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2]休谟. 人性论(上)[M]. 关文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13]Andrei Marmor. On the Limits of Rights [J]. Law and Philosophy, 1997, (16), 1-18.
- [14]刘志刚. 限制抑或形成: 论关涉基本权利法律之功能的二元性[J]. 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6): 60-65.
- [15]陈慈阳. 基本权利核心理论之实证化及其难题[M], 北京: 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7.
- [16]陈新民. 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M], 台湾: 元照出版社, 2002.
- [17]郭道晖. 法的时代挑战[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 [18]戚建刚. 中国行政应急法学[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 [19]Matthew D. Adler & Eric A. Posner, *New Foundations of Cost-Benefit Analy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0][法]阿尔贝·索布尔. 法国大革命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21]唐忠民、王继春. 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基本原则[J], 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2): 104-108.
- [22]肖北庚. 法律保留实质是权利保留[J], 现代法学, 2008(2): 17-22.
- [23]张勇. 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与宪法解释[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7(1): 90-95.
- [24]周叶中. 宪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25]周乐君. 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视角论行政裁量控制机制[J], 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11(5): 48-52.

【责任编辑 刘绚兮】

以全产业链联动方式推动疫情冲击下的制造业复工复产

徐 可

(商丘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河南 商丘 476002)

[摘 要] 疫情造成了实体经济的停滞性危机, 这不同于需求不足的市场危机和信贷扩张的金融危机, 需要从全产业链的角度进行补救。中国率先复工复产为制造业争取到宝贵的时间窗口, 为此应抓紧调整、修补、加固产业链: 采取产业管制政策以配给资源并维持开工规模, 利用“新基建”的政策机遇培植新兴产业链, 以产城联动方式增强经济韧性与抗冲击能力, 以“产业小镇”补足产业链断点并构建产业生态, 以疫情防治国际合作推进与日韩和其他“关键小国”的产能合作, 多方统筹施策, 确保产业链和供应链恢复运转。

[关键词] 疫情冲击 产业链 复工复产 配给制 产城联动

[中图分类号] F2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20)03-0031-10

尽管国内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形势向好, 但疫情冲击所引发的全球反应正在深化, 不仅冲击了制造业的国际分工, 而且导致逆全球化趋势明显抬头。60多个国家采取“封锁”“隔离”“禁足”的措施, 种种外生冲击造成的社会经济停滞的全面危机和世界经济的萧条, 有别于总需求不足的市场危机和信贷扩张引发的金融危机。从理论上讲, 如果现在全世界疫情得到控制, 不需要采取任何调控政策宏观经济就会很快恢复原状。这次疫情直接抑制了人们的“社会性”消费, 有可能引发产业链收缩的“哈耶克”^①式经济危机。因此, 复工复产的政策着力点要从“大水漫灌”转向对

收稿日期: 2020—04—07

作者简介: 徐可, 商丘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民建河南省委经济委员会委员, 经济学博士, 博士后, 研究方向: 产业政策。

^①哈耶克在《物价与生产》中分析了生产能力与实际消费能力(而非有效需求)不匹配的危机类型, 类似于今天疫情导致的经济萧条。

产业链进行精准施策，在疫情传播加速时，还需要全球产业链协同联动加以应对。

一、以“保链稳产”引领世界经济复苏

我国是最早开始疫情防控的国家并已开始复工复产，而其他国家正处在疫情爆发期；这个时间差对我国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恢复十分关键。换言之，我国制造企业一定要“撑到”疫情得到控制的拐点和世界经济的复苏期，一旦大面积停产就会引发产业链的整体危机，将造成大量不可挽回的沉没成本和经济损失。

2020年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在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同时，统筹做好“六稳”工作，而“稳生产”应该前置于“六稳”之首。所谓的“产业链”是指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为维系再生产循环，原材料与零部件等中间产品的供应和加工订单构成了企业的供需两端。3月26日工信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产业链固链行动推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的通知》，明确要求“有序推动全产业链加快复工复产”“增强协同复工复产动能”。疫情冲击下地方政府为企业纾困解难，出台了大量的促进制造业复工复产政策。这些政策大多体现在对企业的资金扶助、费用减免、优惠信贷、简化审批等举措。宁波地方政府较早开始提出“推动产业链复产复工”^①，但是地方政府如果仅从地方经济的“块块”出发而不考虑到产业链的“条条”，就会形成复工复产中的“条块矛盾”：各地政府针对企业“点对点”倾力帮扶，如果缺失跨辖区对产业链进行更多的资源整合，也不会取得真正的实效。因此许多基层干部抱怨说“企业复工复产是一个全局性工程，一个环节缺失就会影响整体进度”^②。复工复产正在全社会有序推进，尤其是在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旅游餐饮和服务业，尽管第三产业的比重逐年上升，但制造业是物质产品的提供者，始终构成实体经济的主体，与“轻资产”的服务业不同，制造业产业链一旦受损就难以恢复，服务业受损是“伤筋”，而制造业产业链受损则是“动骨”，因此加固制造业产业链来“稳生产”才是当务之急。

因此，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促进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达产”，随即推出“六保”措施。而“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关乎“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在“六保”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从“稳产”到“保链”具有政策连贯性，疫情之前2019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提出“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而当前，我们要在抗疫“总体战”打好产业链的“保卫战”。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和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同时还拥有国家强力调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产业治理”体系，这是我国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有可能再一次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显著优势。

①参见央视网.浙江宁波：推动制造业全产业链复工复产[R/OL]. (2020-02-25)[2020-05-08].<https://finance.sina.com/2020-02-25/detail-iimxyqvz5607922.d.html>.

②人民网3月16日报道，参见http://paper.people.com.cn/zgcsb/html/202003/16/content_1976627.htm.

二、以“配给政策”减少停工和破产

在当前外部订单减少和零部件供应不足的硬约束下，仅仅采取纾困解难的措施是不够的，应果断加强产业规制甚至行业管制，集中调配资源以保证重点企业度过难关。产业管制的目的正是加固产业链的兜底能力，以防范“停工潮”和“破产潮”，为全面复苏争取时间创造条件。企业生产线一旦停顿再开工，就必须达到一定的原材料、劳动力和投资的初始规模，因此采取配给政策以“保本点”和“最小现金流”来“稳生产”就成为产业管制的核心内容。

一是发挥制造行业协会和商会的自组织功能和作用。当前应发挥这些社团法人包括产业联盟、中介机构等组织机构的调节功能，协调各会员单位（企业）的关系，采取固定合同、长期订单、协调价格、优先供应等方式，减少行业内的市场竞争，加强行业的自组织性以抱团取暖；尤其是按照“开工门槛”协调分配库存资源与零部件，为最大限度减少企业破产（而非企业亏损）为行业复苏争取时间。

目前，八百多家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商会大多和行政机关脱钩不久，因“身份的官民双重性”“资源体制内获取”等特征^①而具有“类行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它们了解市场、熟悉同行、知晓政策，因此能够“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市场主体行为”^②。但是外部冲击与压力将会激活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的应急反应，应以“自我拯救”为系统目标，从“自发”“自律”走向“自控”“自决”，由“会长单位”“理事单位”引领“会员单位”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③，协调行业库存与储备资源的余缺，以协同应对危机。

二是政府行业主管部门采取配给管制措施。行业协会商会发挥的是社会组织“自我协调”的作用，而政府则发挥了“强制调控”的主导性作用。换言之，政府需要对行业协会商会的“自我调节”加以引导并对调节失灵进行兜底。地方政府与工信部门可以牵头制定抗疫期间临时性的产业管制措施，例如生产定额、生产指标、能源供应、原材料配给、产品价格定价、政府采购等等，由政府强力干预市场以减少制造企业停产。

西方产业规制政策一般是限制行业垄断以增强市场公平竞争性，因此被视为是强化市场机制的手段。而当前的“超市场”应急措施是以“看得见的拳头”^④来代替“看不见的手”，最有效的“拳头”措施是需求端的“政府采购”与供给端的“配给制度”。“政府采购”缓解订单不足，而配给制度实质上是市场的“价格调整”转向计划的“数量调整”^⑤。我国物质紧缺时期长期执行票证制度，保障了稀缺资源的公平与均衡配置。近年来为化解过剩产能、治理大气污染、保障居民用电等等，也多次采用“限产压锭”“生产指标”、“用电配额”等配给措施，可谓经验丰富。目前国有企业都建有党组织，而中小企业也都普遍加强了党建工作，这为实施配给制度提供了政治保障。

因此，在供应链受阻和订单紧缺的刚性约束条件下，应调配全行业、全产业链的资源以维持大多数企业的最小“开工门槛”。当然也要相应设计退出机制，以尽快恢复市场经济的常态活力。面

①国务院政策解读，参见经济日报。要全面推开协会脱钩改革[R/OL](2019-06-20) [2020-05-08].http://www.gov.cn/zhengce/2019-06/20/content_5401719.htm。

②借用奥尔森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一语，用以说明“小集团”面对压力如何通过博弈产生一致行为。

③借用美国经济学家钱德勒的书名《看得见的手》，以比喻政府管制机制的力度和知晓度。

④法国的贝纳西探索了这一“非瓦尔拉斯”的数量调节机制从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对“疫情大考”，我们还应深入研究紧急状态下国家、行业、企业等不同层面的“物资配给”“物资征用”“企业管制”等如何建章立制，开展在特殊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调研^①，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应急治理”体系。

三、以“新基建”促进产业升级换代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直到现在许多经济学家还在争论“保六”还是“保五”，而在当前紧迫而多变的不确定形势下，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目标应从GDP增长率转向“稳生产”，为社会经济各种要素的应急反应和相互调适争取时间，进而“稳就业”“稳民生”“稳预期”。因此，当下的宏观调控应放弃“数量目标”，围绕产业链不同的特征“分类施策”。

一是围绕“抗疫产品”扩张产业链。目前美国纽约州已经订购我国2万台呼吸机，马萨诸塞州订购170万只KN95中国标准的口罩。因此应利用国内外集中性的巨量需求，扩张“抗疫产业链”，包括口罩、防护用品、测温枪、检测试剂、疫苗，抗疫药品等等。例如生产聚丙烯的燕山石化，半个月就形成了口罩生产线^②。因此，应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办公室统筹计划国内需求，由国家国际合作发展署统筹计划国外需求，根据防疫形势变化，按照预期订单生产，尽量避免产能过剩。

当前不仅要强化抗疫物资生产线，还要加强产业链的联动与辐射效应，尤其是围绕健康产业与医药研发与生产，补上我国医药健康产业体系的供给侧短板。2019年9月国务院在《促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纲要（2019-2022年）》中围绕健康产业提出“科技创新”“集聚发展”“人才提升”“营商环境”“综合监管”等多项重大工程，这实际上是对我国健康产业链的全景规划。2020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在疫情防控的紧急关头出台了《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完善公平适度的待遇保障机制、健全稳健可持续的筹资运行机制、协同推进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目标，为我国医药产业链从研发到生产、流通提供了政策激励。

为此，应利用当前凝聚的“全民共识”推进我国健康产业发展，发挥疫苗研发与中西医药生产的协同效应，汲取印度与以色列等医药仿制国家的药品专利规制与生产经验，尽快构建并提升我国医疗卫生和健康产业的全行业产业链。

二是围绕“关键企业”加固产业链。“关键企业”系指关乎国计民生、地方经济支柱、行业龙头带动，或拥有发展潜力、大量创汇、大量就业的企业，这也是各地政府推进复工复产的重点对象。当前应以“产业链思维”对其定点帮扶，进而“以大带小”维护“垂直”上下游中小企业供应链；同时还要以“共享经济”与“范围经济”思维，促进产业间“平行”联动。

2019年8月26日，习近平在“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讲话中强调“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本”“建立平台解决跨行业跨领域的关键共性问题”^③。地方政府应针对“招工难”“物流难”“经营难”等共性问题提供公共平台服务，发挥“共享经济”的规模效益和“范围经

^①我国目前只在《公司法》中笼统提及“企业社会责任”，尚缺乏可操作性的规章制度。

^②新浪财经新闻，参见中石化硬核转产燕山石化为了口罩半月建座厂[R/OL](2020-03-05)[2020-05-08].<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20-03-05/doc-iimxxstf6720513.shtml>.

^③参见新华社.习近平：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R/OL](2019-08-26)[2020-05-08]. https://www.sohu.com/a/336567269_120214231.

济”的推销效应。例如成都电商协会招聘“共享员工”的案例经验^①，就可以被政府部门推广复制。为此，应由政府采购或组建公共服务平台：一是提前招聘并利用职业院校对通用技术培训，做好人力资源蓄水池；二是促进闲置场地、通用设备与生产线的出借出租；三是做好仓储与物流企业的余缺调配，通过大数据与网络资源促进信息流通与供求配对等等。

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公共服务就是“免费服务”，其实这种思维鼓励了“等靠要”反而妨碍了公共产品的普惠使用。公共品与普通商品的区别不在于“收益性”，而在于消费过程的“排他性”，因此政府提供各项公共服务，也可以外包或设计利益分配机制，其目的不仅以规模效应摊薄成本，还在公共平台上加速信息汇集与交流，通过资源配对促进产业链协同联动。

三是围绕“新基建”培育新兴产业链。“新基建”是由三批建设项目构成，国家发改委2019年底集中批复了一批城际轨道交通、高铁与机场等领域的建设项目；2020年2月23日中央召开“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会议，提出“培育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2020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又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由此“新基建”的项目内容定型为“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其概念迅速传播并成为新一轮宏观调控的投资重点。

“新基建”可谓是继《中国制造2025》之后又一次产业振兴的重大政策，不少地方政府也围绕“新基建”发行地方债券，希冀搭乘“国家项目”的“便车”与“快车”。然而这次“新基建”的侧重点不是“强刺激”而在于“基础性”，其内容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②，因而具有社会公益性和公共平台性，其目标是为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制造为代表的产业升级提供基础设施、改善技术环境、降低公共成本。因此，地方政府的重点在于围绕“新基建”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以“源”带“流”形成新兴产业链。

当前逆势兴起的“宅家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为“新基建”提供了投资环境，也为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提供了机会。地方政府应以此为契机，加大对“新要素”的承接与配套工程，包括确定地方“新基建”名单与重点项目，相应调整高等院校专业设置与招生计划，由政府组织关键应用型技术的研发，由政府购买基础性技术专利并予以推广，为“新兴产业链”优先做好人力资本与应用技术的准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还应结合疫情防控措施加快对“智慧城市”的规划与建设，组建“数据中心”并加快对数字资源使用的立法建设，为“新基建”与新兴产业链提供用武之地和制度环境。

四、以产城联动增强“经济韧性”

从长期目标看，应以“产业集群”的模式培育我国实体经济的韧性，提升我国产业链自主可控的能力。工信部2015年《关于进一步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提升龙头骨干企业带动作用，强化专业化协作和配套能力”，其中的“带动”“协作”“配套”就是产业链之间联动效应

^①参见每日经济新闻.成都挂出“共享员工”招工令 新模式为何在这里[R/OL](2020-02-18) [2020-05-09].<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8856437666394177&wfr=spider&for=pc>.

^②4月20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参见http://news.china.com.cn/202004/20/content_75953771.htm.

的体现。

产业集群既是产业链的复合结构也是产业链联动的生成结果，成为区域经济实力与经济韧性的象征与标志。产业集群因相关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形成经济韧性从而抵御外部风险，还能够释放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利于企业“抱团取暖”。换言之，疫情冲击将导致龙头企业以“自主可控”的方式改变原来纵向产业分工过长，布局过于分散的状况，开始“集聚性收缩”。而“收缩”也是区域内经济要素集聚的体现，如果能与城市群形成联动，就能以“自给自足”的方式，增强经济韧性来抵御外部冲击。

对比发现：日韩和新加坡受疫情冲击较小，而印度在“21日隔离”政策下大量城市低收入者返乡导致了社会失序风险。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东亚发达经济体的产业集群与城市集群的集聚程度与联动程度较高，系统自组织性与应急能力较强^①，因而抵御风险能力也较强。有种观点认为城市群加剧了疫情传播的风险，对此应辩证分析：城市群一方面造成人群接触与社交频率增加，而另一面又造成了社会自组织性和集体秩序增强。以中国社区抗疫“网格化管理”为例，一旦防疫措施被社会所认可和接受达成社会共识，大量人口集聚就形成了“群防群控”的庞大社会力量，这也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防疫经验。

“长三角”就是产业集群与城市群“再集聚”的中国样板。上海市2020年3月31日集中签约152个重大产业项目构成由26个特色产业园区组成的60平方公里“产业新空间”^②，这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双轮驱动”以抵御风险的最新案例。在目前十个国家级城市群中“长三角”处于领先地位，但中西部和东北部城市群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定位还不明晰，产城要素的耦合还不充分。为此，应以“产城联动”的方式促进城市群与产业集群之间的正向反馈，结合“十四五规划”对现有产业集聚区、工业园区依据“产业深化”与“产业互补”的原则进行布局调整，促进产业集群与城市群的双向联动。

一是以土地要素供给改革措施促进“产城联动”。众所周知，土地供给成为当前城市化发展的瓶颈与硬约束，也由此成为“产城联动”的主要抓手。党中央、国务院3月30日颁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将土地置于各要素之首，其主要措施就是“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尤其是“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

为此，可以借鉴苏州、无锡等地激励土地资源集约化使用的差异政策，以“亩产值”为主要权重，综合考虑“就业人数”“研发投入”“污染排放”等其他指标，将企业分类并与工业水电费、地方税收等奖惩措施挂钩，提升产业质量并加速优胜劣汰。这种政策正在由江苏逐步推广，2019年8月河南省《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也提出“产业特色”“亩均产值”的政策导向，旨在以土地供给改革措施激励产业集群的竞争活力。

二是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大都市之所以拥有“总部经济”的优势，就是因为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信息、科技、人才要素高度集聚所产生的产业引领作用，因此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两业融合”也是“产城联动”的一种途径。国家发改委与工信部在2019年11月印发了《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为“两业融合”提供了

^①美国的集聚度与系统自组织性也很高，但社会统筹能力较弱，这不同于儒家思想浸润下的东亚社会。

^②凤凰财经2020年3月31日报道：参见经济日报。上海集中签约152个重大产业项目 发布60平方公里产业新空间和26个特色产业园区[R/OL] (2020-03-31)[2020-05-08]. <http://finance.ifeng.com/c/7vIVJBAGMeB>.

政策指引，而这次“新基建”也为之提供了“建设窗口期”。

因此，中西部和东北的地方政府应围绕“两业融合”为产业集群提供更多的“城市化”功能服务，除了上文提及的“智慧城市”以及科技人才与信息服务以外，还要重点提升现代城市的金融服务能力。“金融中心”向来是一线城市的高配标志，而“新基建”门槛高、收益大，前期投入与后期收益难以均衡匹配，因此迫切需要现代金融的参与。因此，应创新金融工具例如“融资租赁”“分期付款”降低高端设备的使用门槛，发展商业保理、产业链金融、担保与保险业务，完善地方股权交易市场，以城市功能聚合金融要素进而服务产业集群。

三是以新的消费习性和消费模式培育消费中心。近年来“提振消费”的政策密集出台，2019年10月商务部等部门《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提出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0年3月国家发改委与商务部《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提出“结合区域发展布局打造消费中心”等等。

当前不少地方政府采取发放“消费券”作为“反周期”调节措施，其实这次疫情冲击的是消费条件和消费环境，而非消费收入和有效需求，因此应尽快制定推广统一的“安全社交距离标准”并划定“安全消费区”，强化网络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并限制其业务收费抽成^①，鼓励大众形成新的消费习性与消费模式。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转变“模仿性”“排浪性”消费模式，提倡多元化、个性化的信息消费、文旅消费、绿色消费、租房消费、康养消费、环境消费等等。以“分餐制”为代表，疫情防控措施的长期化将迫使人们改变大规模整齐划一的集中消费习惯，而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消费模式最终也将倒逼服务业与制造业供给端的转型与创新。

产业集群的“集聚性”在于促进物质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本的大规模集约化的快速流动，而现代城市不仅通过人口集聚形成巨型消费市场，还通过功能集聚以“总部经济”的方式提供土地、金融和其他要素的支持。“产城联动”促进了生产要素与生活要素之间的流动与聚合，强化了“产城经济系统”的自组织功能，因而具有了抗风险的经济韧性。

五、以产城融合构建“产业生态”

产业集群是技术经济的产物，而城市群是社会经济的产物，两者之间互动生成更高层次、更量级的区域经济层次的生态系统。“产城联动”不仅促进各种要素的流动与聚合，还要促进各种要素之间相互调适，进而促进产业链上下游调适与产业之间调适，以及适应产业外部社会环境，最终以“产城融合”的方式构建新的“产业生态”。

2019年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进而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2]，为此，当前应围绕“城市群”布局构建多层次多结构的产业体系，尤其要重视“产业小镇”的特殊作用。

小城镇本来就是城市群的生态组成部分，2016年10月住建部印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公布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的通知》以来，大量“特色小镇”纷纷涌现，这种一拥而上造成了同质化的“千城一面”，以至于国家发改委2018年8月不得不发文要求“坚决淘汰一批缺失产业前景、变形走样异化的特色小镇和小城镇”。此事件从反面说明农村乡镇经济的发展要求远远未得到满足，同时

^①据河南省政协调研，当前网络平台对工商经营户的业务抽成比例高达10—20%，这相对于实体企业利润确实太高了。

也为“产业小镇”的发展预留了充分的空间。疫情冲击了大量中小企业的正常经营,有可能带来产业链的重新调整,因此应围绕产业集群中龙头企业的复工复产情况,查找产业链上的“卡顿”和“断点”,在当地就近培育“产业小镇”以修补产业链条。“产业小镇”是产业集群与城市群之间必不可少的中介与联系。长三角和江浙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广且周边乡镇企业和城镇经济发达,这种“产业集群—城市群”和“产业链—小城镇”的多层次网格化布局和互相嵌套的模式,不仅抵御了疫情冲击,而且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产业生态”。

“生态”是系统论和复杂性科学的隐喻,所谓的“产业生态”首先在于产业种类、模式和规模的多样性和层次性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和传导性。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返乡农民工逐渐增多,仅河南省2019年返乡创业人员高达130.23万人,带动就业813.57万人^①,而劳动力流向的背后就是产业变迁过程,因此为应对疫情应调整各类工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的空间布局与招商引资政策,对相互关联产业进行“整体招商”,在“产业小镇”之间进行整体规划;围绕当地龙头企业和支柱产业,为其零部件生产装配产业链提供人力资本服务,为其大宗材料的供应链提供物流信息平台服务。地方政府应利用整体招商引资、统筹产业规划和公共服务平台服务等举措,引导产业链联动与相互耦合,进而生成具有内在联系的“产业生态”。

“产业生态”还因具有产业生命周期中的生长性和代谢接续性,因此,应利用疫情压力促进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在发达地区“腾笼换鸟”的同时,以产业转移的方式延续其产业生态的正常代谢。2019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当前我国产业转移一是向国外转移,二是向国内中西部转移。而中西部要素资源丰富且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巨大,因此应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上继续优化“产业生态环境”。我国区域间产业的承接与转移促进了生产要素大规模的联动与耦合,进而构成了更高层级、更大规模的整体性“产业生态”,这也是系统自组织抵御外部风险而生成的“转阵类产业的新结构”^②。

最后,所有的“生态”都离不开各类物种的竞争性。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一是要“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二是要“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三是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其中蕴含了“产业生态”的系统论思想:以生产要素流动促进产业链的联动与重新聚合,借此提升企业活力与产业竞争力。要素市场不同于商品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强,为此地方政府应围绕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等核心要素构建公共性的市场交易平台,不仅促进各类要素的物理流通,还要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各种要素替代与聚合的“化学反应”。中西部地方政府还应围绕大宗原材料和大型部件的远距运输,推进铁路货运专线和多式联运,以大宗物流为主导,整合供应链金融和资金链。

总之,利用当前复工复产之机,各地应围绕龙头企业、支柱产业、产业集群,以产业链联动的方式共同构成“产业生态”。产业生态如同具有生命的有机体,如果某一产业链局部受损就能以较快速度和较小成本予以替补和置换。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东北与中西部地区传统制造业的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现象严重,因此在现有技术条件约束下,应以“要素流通”为抓手促进“产业替代”

^①据原河南省省长陈润儿调研报告,参见大河网.陈润儿调研报告:关于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情况的调查[R/OL](2019-04-15)[2020-05-08]. <https://www.henanrd.gov.cn/2019/04-15/9200.html>.

^②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区分了追赶型、领先型、转阵类、弯道超车、战略型五大产业。

和“产业互补”，以增强产业间的“弹性”与“韧性”，这对于“十四五”产业规划而言，具有重要的“防风险”意义^①。

六、以国际疫情防治合作促进产能合作

众所周知，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之中，全球200个经济体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商品占进口总额的21.7%^②，国际物流受阻对复工复产造成了极大困难。2020年1月30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公开声称“中国疫情有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对此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国际防疫合作，调整“一带一路”策略由“大推进”转向“保重点”，尽力维护国际产业链的“关节点”。为此还应发挥海外华人华侨和涉外商会、NGO组织的海外经济统战功能，将“国家意志”下沉到地方和民间，以“城市外交”“民间外交”“经济外交”保障国际产业链的畅通，尤其是围绕华为、富士康等重点外向型企业，确保海外订单与零部件供应。

一是利用疫情防治开展国际合作。与东亚、欧盟和其他国家开展疫情信息交流和联防联控的国际合作，在互助与合作基础上形成政治互信，在互信基础上保障正常的经贸秩序，进而维系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例如当前应重点推动中日韩三方合作、中东欧17+1合作，围绕中欧铁路协调国际联防联控措施等等。尤其是中日韩的多边合作意义重大而紧迫，因为当前我国电子产品国际供应链中相当一部分中间产品来自日韩。

二是以“周边外交”开辟国际产业通道。中美关系短时间内不可能逆转，因此应利用“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策略为我国沿边地区的开放与开发与产业培植提供保障。2016年初，国务院就制定了《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目前应升级并加快执行。沿边地区幅员辽阔可以承继东部产业转移与西部大开发，提高我国应对外部危机的经济韧性和开放的自主性。例如当前重庆围绕“陆海新通道”借助北部湾出海口^③，有望与东盟国家以新的物流链重构西南内陆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考虑到东盟尤其是越南将成为我国制造业产业链的主要竞争性替代者，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是利用境外直接投资补足产业短板。当前国际石油、黄金期货、股票市场均对疫情反应敏感而波动剧烈，西方尤其是美联储降息政策失灵意味着西方资本市场风险加大。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国内实体经济有可能成为国际资本的避风港，因此应利用《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生效、自贸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及国家发改委《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调整之机，继续扩大产业政策的开放力度，利用境外资本加快补足“中国制造”的产业链短板。

四是利用“关键小国”推进产能多边合作。国务院2015年5月颁布《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中制定了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2015年底，在上海合作组织郑州峰会上李克强提出要“搭建产能合作平台”。产能合作始终是“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内容，但在当前西方民粹势力抬头形势下，明显受到阻碍。为此应针对一些“关键小国”开展合作，例如瑞士、以色

^①中央电视台CCTV4于4月16日晚间报道。参见工信部提醒：境外疫情造成复产复工企业面临再次停产风险[R/OL] (2020-04-16)[2020-05-08]. <https://xw.qq.com/cmsid/20200416A0WDP300>.

^②转引自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数据库计算数据。

^③2019年8月国务院批复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

列、新西兰、卢森堡等国具有“不选边站队”的外交政策、工业技术发达、在国际事务中较为活跃并拥有国际组织成员身份等特点,因其体量小,我国与之合作中能够“自主可控”进而利用其特殊身份撬动区域性的产能多边合作的杠杆^①。

总之,当前疫情导致部分国际产业链的收缩、转移或重构,但不足以改变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相对优势的整体地位。为了应对疫情对地缘政治变化与贸易摩擦的长期影响,我国应利用工业规模和市场规模的“大国优势”开展“经贸外交”,通过区域性产能合作,释放我国潜在产能的“后发优势”,并逐渐替换生产成本的“相对优势”。

参考文献

[1]马长俊.解构与重构: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的政会关系变迁研究[J],行政管理改革,2020(2):78-87. qstheory.cn/dukan/qs/2014/2019-01/01/c_1123924172.htm.

[2]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J/OL],求是,2019(1).http://www.

【责任编辑 许鲁光】

(上接第12页)

[N].人民日报,2020-03-19(1).

[4]协同推进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科技支撑[N].人民日报,2020-03-03(3).

[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

[6]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17.

[7]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1-22(1).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1.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0]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2).

[11]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工作 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N].人民日报,2020-02-24(3).

[12]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

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N].人民日报,2020-01-21(1).

[1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研究加强防控工作[N].人民日报,2020-02-13(1).

[1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371-372.

[1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73-274.

[16]习近平同比利时国王菲利普普通电话[N].人民日报,2020-04-03(1).

[17]王承哲.制度与制度创新的整体性[J].中州学刊,2002,(3):141.

[18]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9-11-06(4).

[19]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N].人民日报,2020-03-01(1).

【责任编辑 刘婉华】

①具体案例参考徐可.新西兰在亚太多边经贸合作中的杠杆作用[J],经济界,2019(3):62-71.

基于遗传算法投影寻踪模型的智能制造能力评价

——以中国31个省市数据为例

陈 钢 薛 莉 张 彬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江苏 南京 210013)

[摘 要] 采用实码的加速遗传算法投影寻踪(RAGA-PP)模型,实现线性投影降维,构建了智能制造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选取2018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多指标截面数据,根据线性投影值进行层次聚类,在此基础上分区域对我国省域智能制造能力进行分析,提出了推动我国智能制造能力提升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智能制造 投影寻踪模型 遗传算法 聚类分析 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 F271; F424; F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20)03-0041-09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制造技术逐步从自动化升级为智能化。德国、美国、日本等制造业主要国家纷纷抓住新的发展机遇,提出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国家制造业战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工业4.0战略。2013年12月,德国工业4.0战略正式落地实施^[1],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

收稿日期: 2020—03—07

作者简介: 陈钢,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开放型经济研究;薛莉,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张彬,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协同创新研究。

命”^①浪潮。顺应此潮流，2015年5月，国务院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②，为我国迈向“制造强国”明确了发展路线。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内容和主攻方向^[2-5]，智能制造企业是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企业智能制造能力的高低关乎“中国制造2025”能否完美落地。

近年来，智能制造评价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包括智能制造的能力评价^[6]、发展水平评价^[7-8]、创新水平评价^[9]以及成熟度评价^[10]等，各类评价结果可以作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和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的指导依据，目前政府和学者对智能制造能力评价的研究，均有了一定的成果。

在政府层面，2015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5年版）》^[11]中提出立体智能制造系统架构，从生命周期、智能功能和系统层级3个维度构建了一个评价指标体系。2016年9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在《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白皮书（1.0版）》^[12]中总结出一套方法论，将智能制造展示为一维的形式，包括生产和设计等10个方面，并对相关领域进行了5个等级的分级。

在学界，有学者从微观的企业角度进行研究，如易伟明等人（2018）^[13]基于张量理论和《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5年版）》中提出的3维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实际数据对相关的智能制造企业进行了综合分析；龚炳铮（2015）^[14]构建出了以企业生态环境、企业效益和智能化发展水平三个方面为一级指标的智能制造企业通用指标体系，并详细地介绍了企业智能制造能力的综合评价方法。有学者以宏观的省级角度进行实证分析，如董志学等人（2016）^[6]以企业创新能力、产品流通能力和信息化服务水平为一级指标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23个主要省份智能制造的综合能力进行了测算。

同时，学者们也对提升智能制造能力的对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仲克元（2017）^[15]认为，推动中国智造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进智能制造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与产业化；加快智能制造相关标准体系建设；建立面向智能制造的多层次的人力资源开发体系等。工业4.0研究院院长胡权（2018）指出，提升智能制造能力应该充分发挥第四次工业革命智能化和网络化两大驱动力的价值，一方面，应该充分认识到AI 2.0对于智能制造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另一方面，中国制造2025的第二个主攻方向是工业互联网，在推动智能制造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工业互联网方式的资源集成，加快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快速发展。

以上研究固然有意义，但仍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虽然对宏观层面的智能制造能力和微观层面的企业智能制造能力的研究较多，但是对中观层面的区域智能制造能力的研究滞后，几乎空白；二是虽然存在一些智能制造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但现有文献主要是采用因子分析法等常规计量方法，不易处理高维数据。智能制造能力涉及多个学科领域，范围广，指标数据具有高维、非线性和非正态等特点。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采用非人为赋权的投影寻踪法和层次聚类分析法，对2018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智能制造能力进行了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做聚类分析，以揭示我国省域智能制造能力的区域差异特征。

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为绿色低碳、深度网络化、高度智能化和个性化定制。

②《中国制造2025》是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批，由国务院于2015年5月印发的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的战略文件，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二、智能制造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由智能制造能力的相关理论可知,智能制造的发展需要配套基础设施,进行信息共享和产品流通,提高智能制造能力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16],智能制造能力的最终目标是获得利润回报的增多,由此可认为,智能制造能力主要与企业的规模与绩效、研发的投入与产出、物流水平和信息化水平有关。在评价对象的选取上,考虑到智能制造具有高资本投入的特点,一般由中大型制造企业承担,故主要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①作为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本文依据SMART准则^②,坚持精准高效、客观公正的评价原则,选取制造规模与效益(A)、制造创新能力(B)、产品流通能力(C)和信息化发展能力(D)4个系统层,制造规模(AA)、经营效益(AB)、创新投入(BA)、创新产出(BB)、产品流通(CA)、基础设施(DA)和信息化能力(DB)7个子系统层,以及15个指标层(X_1 - X_{15}),构建智能制造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智能制造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子系统层	代码	指标层
A制造规模与效益	AA制造规模	X_1	工业增加值(亿元)
		X_2	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
		X_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亿元)
	AB经营绩效	X_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亿元)
B制造创新能力	BA创新投入	X_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亿元)
		X_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数(人)
	BB创新产出	X_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件)
		X_8	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
C产品流通能力	CA产品流通	X_9	拥有等级公路里程(万公里)
		X_{10}	货物周转量(亿吨公里)
D信息化发展能力	DA基础设施	X_{11}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个)
		X_{12}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个)
	DB信息化能力	X_{13}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比重(%)
		X_{14}	电子商务销售额(亿元)
		X_{15}	软件业务收入(亿元)

注: X_{15} 软件业务收入包括软件产品收入、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以及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

三、省域智能制造能力投影寻踪聚类分析

(一) 构建模型

1. 投影寻踪(PP)模型 投影寻踪具有较好的对多维数据进行降维的能力,模型得到的最佳投影方向,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出多维数据的某类结构特征,投影寻踪的具体建模过程如下:

步骤一:归一化处理样本评价指标集。

设各指标值的样本集为 $x^*(i, j) \{i=1, 2, \dots, n; j=1, 2, \dots, p\}$, n 、 p 分别为样本容量和指标的数目,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以消除各指标值的量纲(本文选取的指标均为正向型指标):

①2010年及以前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为500万元以上工业企业,从2011年开始衡量标准是:年产值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

②指具体性Specific、可量性Measurable、可实现性Attainable、相关性Relevant和时限性Time-bound。

$$x(i, j) = \frac{x^*(i, j) - x_{\min}(j)}{x_{\max}(j) - x_{\min}(j)} \quad (1.1)$$

其中, $x_{\max}(j)$ 和 $x_{\min}(j)$ 分别为第 j 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x(i, j)$ 为指标特征值归一化的序列。

步骤二: 构造投影指标函数 $Q(a)$ 。

投影寻踪模型就是把 p 维数据 $x(i, j)\{j=1, 2, \dots, p\}$ 综合成以 $a = \{a(1), a(2), \dots, a(p)\}$ 为投影方向的一维投影值 $z(i)$:

$$z(i) = \sum_{j=1}^p a(j)x(i, j), (i=1, 2, \dots, n) \quad (1.2)$$

其中 a 为单位长度向量。为了使局部投影点尽可能密集, 最好凝聚成若干个散开的点团, 因此投影指标函数可以表达成:

$$Q(a) = S_z D_z \quad (1.3)$$

$$S_z = \sqrt{\frac{\sum_{i=1}^n (z(i) - E(z))^2}{n-1}} \quad (1.4)$$

$$D_z = \sum_{i=1}^n \sum_{j=1}^n (R - r(i, j)) * u(R - r(i, j)) \quad (1.5)$$

其中, S_z 为投影值 $z(i)$ 的标准差, D_z 为投影值 $z(i)$ 的局部密度, $E(z)$ 为序列 $z(i)\{i=1, 2, \dots, n\}$ 的平均值, R 为局部密度的窗口半径, 根据试验来确定, $r(i, j)$ 表示样本之间的距离, $r(i, j) = |z(i) - z(j)|$, $u(t)$ 为一单位阶跃函数, 当 $t \geq 0$ 时, 其值为1, 当 $t < 0$ 时, 其值为0。

步骤三: 优化投影指标函数。

当样本集给定时, 投影指标函数 $Q(a)$ 只随着投影方向 a 的变化而变化, 可以通过求解投影指标函数最大化问题来估计最佳投影方向, 即:

$$\text{最大化目标函数: Max: } Q(a) = S_z D_z \quad (1.6)$$

$$\text{约束条件: s. t. } \sum_{j=1}^p a^2(j) = 1 \quad (1.7)$$

步骤四: 计算智能制造能力。

把由Step3求得的最佳投影方向 a^* 代入公式(1.3)后可得各样本投影值 $z^*(i)$, 采用以下换算方法对投影值 $z^*(i)$ 进行处理:

$$\tilde{z}(i) = z^*(i) - \min(z^*(i)) + 1 \quad (1.8)$$

$$\bar{z}(i) = \frac{\tilde{z}(i)}{\max(\tilde{z}(i))} * 100 \quad (1.9)$$

$\bar{z}(i)$ 为处理后的最终得分数据, 有 $\bar{z}(i) \in (0, 100]$ 。

2. 基于实码的加速遗传算法(RAGA) 投影寻踪模型中的公式(1.6)和公式(1.7)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优化问题, 本文采用基于实数编码的加速遗传算法(Real coding based Accelerating Genetic Algorithm, 简称RAGA)进行求解。传统的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 简称GA)由美国密歇根大学Holland教授于1962年提出, 通过模拟生物的自然选择和群体遗传机制, 形成的一种自

适应全局优化概率搜索算法,可以有效地解决较复杂的非线性组合问题以及多目标函数优化问题, RAGA在GA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其主要步骤如下:

- 步骤一: 挑选一定数量的个体形成初始种群, 并设置优秀个体数量;
- 步骤二: 计算种群内各个体的目标函数值, 设置迭代次数, 开始循环;
- 步骤三: 计算选择函数的值, 通过概率的形式从种群中选择若干个体;
- 步骤四: 通过染色体个体基因复制、交叉、变异等创造新个体, 形成新种群;
- 步骤五: 进行循环, 若终止条件不满足, 则转到Step3继续进化;
- 步骤六: 加速寻优。

(二) 基于投影寻踪的智能制造能力的测算

本文以上述评价指标体系为依据, 依据201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区统计年鉴, 整理得到2018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15个指标的基础数据, 共计465个, 部分指标根据基础数据进行了相关计算。根据投影寻踪模型, 运用Matlab R2017b软件编程对数据进行分析, 得出15个指标的最佳投影方向, 如表2所示。将表2中最佳投影方向值代入公式(1.2), 可计算得出2018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智能制造能力投影值。根据前述公式(1.8)和公式(1.9), 计算整理得出2018年我国省域智能制造能力的综合得分及排名, 如表3所示。

表2 智能制造能力的最佳投影方向

指标	最佳投影方向
X ₁	0.2744
X ₂	0.2937
X ₃	0.2371
X ₄	0.3593
X ₅	0.3136
X ₆	0.2807
X ₇	0.2505
X ₈	0.1130
X ₉	0.0854
X ₁₀	0.1805
X ₁₁	0.1981
X ₁₂	0.3709
X ₁₃	0.1640
X ₁₄	0.2415
X ₁₅	0.3139

表3 省域智能制造能力的投影值和得分

地区	投影值	分数	排名
北京	1.45	53.96	5
天津	0.58	41.63	19
河北	1.05	44.92	12
山西	0.55	34.02	21
内蒙古	0.57	35.74	20
辽宁	0.77	45.51	15
吉林	0.42	31.26	23
黑龙江	0.38	31.55	27
上海	1.46	57.69	6
江苏	2.76	93.23	2
浙江	1.96	74.74	4
安徽	1.26	45.41	8
福建	1.10	45.49	11
江西	0.75	36.39	17
山东	2.37	75.56	3
河南	1.24	50.21	10
湖北	1.26	45.13	7
湖南	1.02	42.86	13
广东	3.46	100.00	1
广西	0.39	32.82	24
海南	0.39	31.70	25
重庆	0.76	34.02	16
四川	1.25	45.31	9

续表

地区	投影值	分数	排名
贵州	0.52	28.34	22
云南	0.58	32.27	18
西藏	0.35	24.65	28
陕西	0.90	38.70	14
甘肃	0.39	29.23	26
青海	0.30	26.66	30
宁夏	0.29	28.41	31
新疆	0.32	28.40	29
全国均值		44.06	

综合得分的大小反映了省域间智能制造能力的相对高低,得分越高,说明智能制造能力越强。依据表3的综合得分和排名,可以对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智能制造能力做如下判断:从全国得分的均值来看,我国智能制造能力总体较弱。从整体来看,全国省域智能制造能力平均得分为44.06分,在31个省级行政区中,智能制造能力得分大于44.06的只有13个,其中综合得分大于80分的仅有广东和江苏,大部分省域的得分较低。从综合得分的高低来看,智能制造能力水平存在明显地域差异。投影寻踪的结果客观地反映出了各省域智能制造能力的水平,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排在前五位的省域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北京,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这与现实中东部地区制造业转型发展较快的现实相符。从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智能制造能力水平占有绝对优势地位,中部地区居中,东北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则处于弱势地位,总体呈现出智能制造能力东强西弱的格局。这种情况与当地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制造企业的规模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有关。

(三) 智能制造系统聚类结果与分析

依据各省域智能制造能力综合得分及其系统层得分,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法,分四个等级对各省域进行归类,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中可进一步分析各省域智能制造能力差异的来源及其改进方向。

表4 各省域智能制造能力的聚类分析

等级	制造规模与效益评价	制造创新能力评价	产品流通能力评价	信息化发展能力评价	智能制造综合能力评价
I	山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II	江苏、广东	浙江	北京、江苏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	江苏、浙江、山东
III	河北、上海、浙江、福建、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陕西、	江苏、山东	河北、上海、天津、浙江、福建	福建、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陕西、重庆	北京、河北、上海、福建、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陕西
IV	北京、天津、山西、江西、海南、广西、重庆、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东北全部省份	北京、天津、河北、上海、福建、海南、中部、西部、东北全部省份	山东、海南、中部、西部、东北全部省份	天津、河北、山西、江西、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海南、内蒙古、东北全部省份	天津、山西、江西、广西、重庆、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海南、内蒙古、东北全部省份

如图1所示,以广东和江苏为例,这两个省份的智能制造综合能力都很强,在我国智能制造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其中,广东智能制造能力主要来源于制造创新能力、产品流通能力和信息化发

展能力,这与广东省优越的地理位置、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强劲的创新活力有关。工业大数据是智能制造的核心,近年来广东提出了“数据换人”的发展战略,围绕工业大数据不断探索实践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目前广东的“大数据发展指数”位居全国所有省市区市首位^①。相对来看,江苏的智能制造创新能力较为薄弱,一是有关智能制造的许多基础技术仍停留在仿制层面,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比如江苏的工业机器人产业就存在着低端化的现象;二是省内掌握核心技术的本土龙头企业较少,导致关键技术难以突破,江苏智能制造企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亟待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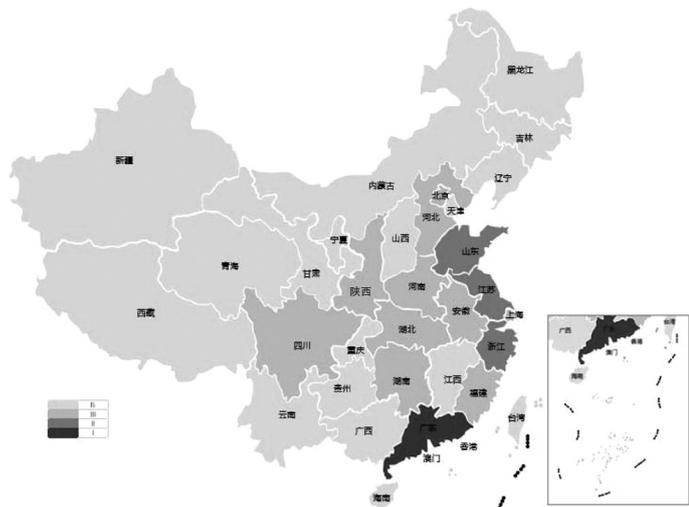


图1 各省域智能制造综合能力空间分异格局

北京、浙江、山东、上海等省域在四个系统层的发展能力较为均衡。近年来,随着上海土地资源的价格和用工成本的快速上涨,挤压了制造企业的发展空间,导致部分制造业产业向长三角其他城市以及全国范围内进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土智能制造水平的提升,因而综合智能制造能力相对广东、江苏等省份较弱。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又承接了自上海转移的部分制造业,因此省内制造业的平均规模较大,资本密集度较高,从而形成了技术竞争力强的比较优势,因此制造创新能力和信息化发展能力都比较强。而北京作为首都,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且基础型数字经济在全国相对领先,因此产品流通能力和信息化发展能力都比较突出。

其他地区智能制造的综合能力相对较弱,像新疆、重庆、陕西和宁夏等一些中西部省域,尽管处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点上,接收了部分制造业的转入,但根据实证结果来看,承接效果还不明显,这些地区的智能制造能力还未得到有效提升。作为传统制造业强省的东北地区,近年来以“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和重大技术装备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②为发展目标,进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但目前来看,东北地区的制造业仍处于新旧产业交替的阶段,先进制造业产业的集聚程度较低,专业现代化水平不高,导致了智能制造的综合能力较弱。

综上,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瓶颈如下:一是共性技术供给缺失问题突出。长期以来我国重硬件制造、轻软件开发的思维十分普遍,导致智能控制技术、智能化嵌入式软件等支撑高端智能装备发展的核心技术对外依赖度高,智能制造共性技术供给缺失问题突出。其次,我国大部分省域中缺乏龙头企业的标杆引领,在生产、服务、技术研发和业务模式的成熟度等方面仍有不足,严重制约了智能制造的发展。未来,我国需转变智能制造核心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口的惯性思维,更注重智能制造基础软件系统的开发,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再次是智能制造人才较为缺乏。智能制造产品设计、生产、管理和服务都需要优秀的人才,企业家们普遍认为创新人才的短缺是阻碍

①资料来源:《大数据蓝皮书: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No.1》。

②资料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东北振兴“十三五”规划》。

企业创新的最主要因素^[17]，目前导致智能制造人才匮乏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高校的专业设置与智能制造产业需求相脱节。目前，我国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智能制造、我国高技术行业十大领域^①的需求不一致，造成我国技能型人才匮乏。二是基础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存在差距。部分高校毕业生动手能力略显不足，导致高校智能化基础研究在与实践工作的融合出现困难，基础研究的产业化能力严重不足。三是承接产业转移导致人才匮乏。智能化趋势为东部以及沿海地区的服务业带来新一轮的就业机会，扩大了地域之间智能制造水平的差距，这也是导致我国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一线工人匮乏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提升我国智能制造能力的对策建议

发达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智能制造的战略规划，尤其是从2011年以来，各国纷纷制定先进制造战略，来促进制造业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和应用，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的“工业4.0”战略、日本的“新机器人战略”等。通过借鉴学习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在智能制造发展过程的经验启示，推动我国智能制造创新发展取得实效。

（一）统筹构建智能化生产系统

德国“工业4.0”战略旨在以智能制造构建智能生产系统，通过智能工厂生产出智能产品，智能产品生成智能数据，形成“智能工厂——智能产品——智能数据”闭环，驱动生产系统走向智能化，形成智能生产系统。对标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借鉴德国构建智能生产系统的先进经验，构筑以智能经济为主线的产业结构，对制造业企业实施制造执行系统（MES）、资源规划管理系统（ERP）、生产计划排成系统（APS）等信息系统应用项目，深化信息技术在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等各环节的集成应用。推动制造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全面构建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智能化生产系统，进一步提高智能制造产品附加值。

（二）着力培养智能制造专业人才

截止到2018年，仅美国的大数据人才短缺率就达50-60%，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也告急，未来三年人才缺口将达到750万人^[18]。围绕智能制造产业需求，要以产业项目集聚促人才集群，开展“产业+人才”的选才模式。一是通过招才引智活动，吸引更多优质的人才进入智能制造领域创新创业，持续不断地和地方高校在智能化培养上开展合作，注重人才本土化培养，创新“外部引进+本土培养”的引智模式。二是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智能制造培训，主动联系国内、外智能制造先进地区、企业参观学习，加快培育一批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和现代化生产管理知识的复合型实用人才。

（三）加强智能制造的顶层设计

要加强总体部署，进一步规划各部门的职能分工，为智能制造发展理顺行政归属，如调整优化相应机构和职能，建立健全重大工作的领导机制等。政府在其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一是发展规划者，需根据智能制造的发展计划和需求，选择确定关键技术领域，鼓励大学、科研机构 and 制造企业承担基础性研究。二是政策制定者，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税收政策和人才激励机制等，进一

①十大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10个重点领域。

步激发智能制造相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三是资源整合者,联合智能制造装备制造企业、IT企业、用户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相关单位,成立“智能制造产业创新联盟”,通过资源整合,为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四) 推进四大板块协同发展

智能制造的发展应该重视培育“一带一路”沿线省域的产业梯次,促进协同发展。一是推进各板块形成产业梯次,中部、东北各省域集群发展能源、化工等传统优势制造业,东部各省域集群发展电子信息、数字制造等先进制造业,找准实施智能制造的关键环节,培育掌握核心技术的龙头企业,西部边境各省域重点布局与欧、美、非等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二是鼓励特色发展,根据“一带一路”现实实践,鼓励支持中小制造企业在产业分工上进一步细化,让产品的种类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各类需求,全面提升制造企业的智能制造能力和产品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杨帅. 工业4.0与工业互联网:比较、启示与应对策略[J]. 当代财经, 2015(08): 99-107.
- [2]杜人淮. 从“制造”到“智造”:变革、困境和举措[J]. 现代经济探讨, 2015(11): 5-9.
- [3]周济. 智能制造——“中国制造2025”的主攻方向[J]. 中国机械工程, 2015, 26(17): 2273-2284.
- [4]黄群慧,贺俊. 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兼评《中国制造2025》[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06): 5-17.
- [5]潘健生,王婧,顾剑锋. 我国高性能化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研究[J]. 金属热处理, 2015, 40(01): 1-6.
- [6]董志学,刘英骥. 我国主要省市智能制造能力综合评价与研究——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实证分析[J]. 现代制造工程, 2016(01): 151-158.
- [7]王媛媛,宗伟. 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推进我国智能制造业发展问题研究[J]. 亚太经济, 2016(05): 120-126.
- [8]李涛. 开放创新视角下我国智能制造发展路径与机制[J]. 企业经济, 2018, 37(03): 23-28.
- [9]张明明,李霞,孟凡生. 我国新能源装备企业智能化发展创新能力评价[J]. 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报, 2019, 40(11): 1936-1942.
- [10]肖吉军,郑颖琦,徐洁萍. 基于AHP与DHNN的智能制造成熟度评估模型研究[J/OL]. 系统科学学报, 2020(02): 105-110[2020-02-06].
-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4.1333.N.20191115.1127.042.html.
- [11]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委员会. 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5年版)[R]. 2015-12-29.
- [12]智能制造能力评价标准发布[J]. 工具技术, 2016, 50(11): 44.
- [13]易伟明,董沛武,王晶. 基于高阶张量分析的企业智能制造能力评价模型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18, 37(01): 11-16.
- [14]龚炳铮. 智能制造企业评价指标及评估方法的探讨[J]. 电子技术应用, 2015, 41(11): 6-8.
- [15]仲克元. 以智能制造驱动全球价值链攀升[J]. 智慧中国, 2017(05): 34-36.
- [16]孟凡生,赵刚. 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发展影响因素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8, 35(01): 66-72.
- [17]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新常态下的企业创新:现状、问题与对策——2015·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J]. 管理世界, 2015(06): 22-33.
- [18]戴春晨. 促新经济发展 广东多所高校发力新工科[N].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7-07-14(007).

【责任编辑 许鲁光】

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竞争力影响的误差修正模型分析*

俞裕兰 杨靛青

(1.福建商学院国际经贸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2;

2.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要想实现数字贸易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思考技术创新带动数字贸易竞争力提升的新模式。本文在分析中国数字贸易概况的基础上,使用2005—2017年的中国的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考察技术创新水平、开放程度、货物贸易水平、对外投资水平等变量对中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国际技术创新相关因素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针对以上结论,提出了提升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 技术创新 数字贸易 竞争力 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 F713.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20)03-0050-09

2019年7月,UNCTAD-Terms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发布最新的世界贸易与发展报告,特别突出描述了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趋势,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超过31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4.8%,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数字经济是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是世界各国企业和相关产业盈利的关键要素,是许多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利器。数字经济

收稿日期: 2019—11—12

***基金项目:** 本文系福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博弈视角的企业技术创新合作利益分配及激励机制研究”(FJ2019B139);福建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物流服务供应链联盟结构直觉模糊合作博弈理论方法”(2018J018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考虑利益相关行为的协同创新绩效研究”(7140305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俞裕兰,福建商学院国际经贸学院讲师;杨靛青,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赢者通吃的重要法则，在未来的经济中会在国家和国家直接带来巨大的分配后果，将对各国的经济发展差距造成重大影响。因此，中国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发展浪潮中必须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乘着数字经济的东风提升我国数字贸易以及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数字贸易的发展依托互联网技术，数字贸易的发展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的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从技术创新视角思考提升我国的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一、文献综述

近些年来，有关数字贸易方面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数字贸易发展前景、数字贸易规则以及数字贸易特性研究，对于数字贸易竞争力的研究较少。唐曙南(2001)^[1]较早通过数字鸿沟的角度提出我国应发展数字经济的建议。马述忠等(2018)^[2]分析了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的异同，突出了数字贸易特有的内外部属性，认为数字贸易具有贸易成本递减，中间环节大幅减少等不同于传统国际贸易的趋势。郭鹏(2018)^[3]针对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数字贸易交易的全球性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希望中国借鉴美国经验，以实现数字化规则的全球、双边、区域、多边贸易协议的逐步推进。王玉柱(2018)^[4]认为应借鉴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经验，通过利用信息产业领域的资源禀赋，以获得数字经济竞争优势。蓝庆新(2019)^[5]基于熵值法构建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体系，进一步基于迈克尔·波特的钻石理论模型，选取相关因素构建中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计量评价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相关文献都没有涉及技术创新视角下对中国数字贸易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实证分析，柏力翔(2019)^[6]选取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中国出口贸易额、中国科研创新能力以及中国传统制造业创新能力等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我国数字贸易与传统制造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认为数字贸易企业的科研投入对传统制造业创新具有明显地促进作用。

本文将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单位根检验、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并且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定量分析技术创新对中国数字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同时探讨我国的贸易开发程度、货物贸易发展水平和实际利用外资水平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二、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竞争力影响分析

(一) 中国数字贸易竞争力的现状

1. 中国数字贸易的市场占有率分析 数字市场占有率是指数字贸易中的出口额占世界数字贸易出口额的比重，公式表示为： $\text{中国数字贸易出口额} / \text{世界数字贸易出口总额}$ ，数字市场占有率数值越大说明中国数字贸易在世界数字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越大。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可以算出中国数字贸易的市场占有率，具体数值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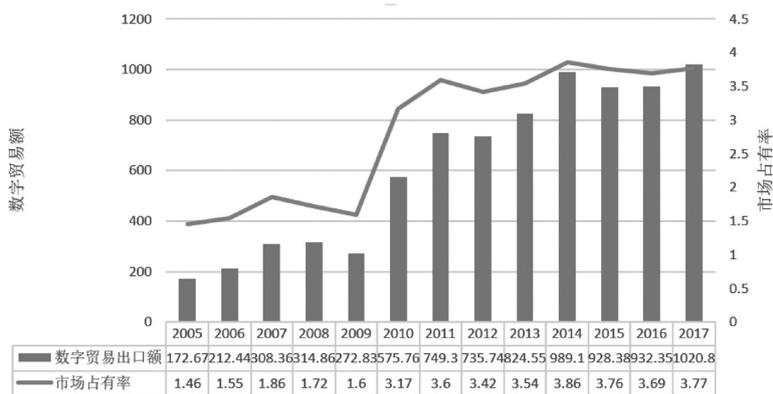


图1 2005年-2017年中国数字贸易市场占有率

数据来源: 中国商务部

从图中数据我们可以得出, 2005年至2017年间, 中国数字贸易出口额及市场占有率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其中, 2005年的数字贸易出口总额约为172.67亿美元, 到2010年增长到575.76亿美元, 2017年已达到1021.8亿美元。在数字贸易的市场占有率方面2005年为1.46%, 2010年突破3%达3.17%, 2017年达到3.77%。

2017年, 中国数字贸易出口额

及市场占有率都大幅度上升, 这反映了在全球掀起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 我国高度重视数字化和数字经济的战略以及采取的相应措施, 效果正显现出来。

2. 中国数字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 贸易竞争指数是指一国某种产品的净出口值与该产品进口值和出口值合计的比值, 其公式表示为: $TC指数 = (出口 - 进口) / (出口 + 进口)$ 。TC指数如果为正值表明是净出口国, 若该比值越接近1, 说明国际竞争力越强, 等于1时表示该产业只出口不进口。TC指数如果是负值表明该国是净进口国, 指数越接近于-1时竞争力越弱, 等于-1时表示该产业只进口不出口。TC指数等于0时表示该产业竞争力处于中间水平。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 可以算出中国数字贸易的市场占有率, 具体数值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数字贸易竞争力指数

年份	净出口额	进出口总额	TC指数
2005	-141.51	486.87	-0.29
2006	-101.74	526.63	-0.19
2007	-213.51	830.24	-0.26
2008	-329.58	959.31	-0.34
2009	-214.82	760.48	-0.28
2010	-111.68	1263.20	-0.09
2011	-146.73	1645.34	-0.09
2012	-147.90	1619.38	-0.09
2013	-196.14	1845.24	-0.11
2014	-29.13	2007.34	-0.01
2015	78.77	1778.00	0.04
2016	-24.78	1889.49	-0.01
2017	-15.77	2057.35	-0.01

数据来源: 国家商务部

从表1中数据可以发现, 2005年, 中国数字贸易的竞争力指数为-0.29, 2017年为-0.0077, 其中仅有2015年为正值0.044, 我国的数字贸易竞争力在2005年到2017年间总体呈上升水平, 期间略有波动, 但大部分处依然是负值。TC指数表明, 依靠互联网基础建设的完善与科学技术的创新, 我国的数字贸易竞争力水平在2005年至2017年间逐步提高, 但总体依然处于世界偏弱水平。我国的数字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发展迅速, 但是, 相关指标显示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在当今我国大力发展高质量外贸的经济背景下, 如何提升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 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竞争力影响

1. 技术创新是数字贸易兴起和发展的动力 数字贸易是一场由数字技术不断创新主导的经济革命, 是以知识为基础, 在数字技术催化作用下, 制造领域、管理领域和流动领域以数字化形式表

现的一种新经济业态。从定义上,就能得知技术创新与数字贸易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数字贸易的兴起就是数字技术创新主导的经济革命,从本质上来说,技术创新促使数字贸易的产生,未来数字贸易的发展仍离不开技术创新在相关制造领域、管理领域和流通领域通过数字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发展数字经济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在自贸区建设、一路一带建设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外贸信息化,外贸数字化的发展大大改善了数字贸易环境。围绕推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供给质量水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新型显示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产品不断呈现,展现了技术创新理念在推动数字贸易产业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2. 技术创新构建数字贸易产品竞争力 技术创新通过减少商品生产成本,降低国际贸易商品相关费用,使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低于国际市场竞争者的价格,以低价的方式获得竞争力。随着我国低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下降,贸易产品的出口,尤其是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更要通过产品的技术创新含量和品牌优势的途径来实现。首先,技术创新的直接成果转化体现高新技术产品上,数字贸易的技术支撑的信息产业正属于高新技术产品,技术创新直接降低数字贸易产品的成本,例如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行业、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的技术创新,会增强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技术创新运用于物流和信息平台产业方面,可以降低产品的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其次,品牌是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进行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需要大力发展的数字贸易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拥有产品品牌效应的领先优势更应依靠技术创新,例如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如果能通过技术创新使企业的出口产品拥有品牌,就可以能够占有和保持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获得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所以,数字贸易企业在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更应大力进行技术创新,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更具竞争力。总之,技术创新通过直接作用于产品成本和品牌效应以及间接作用于物流和平台渠道,构建数字贸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技术创新对中国数字贸易竞争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基于对文献综述部分若干学者研究成果的总结,探讨建立针对技术创新与数字贸易竞争力的关系模型,开展实证研究,以期能够得出有效的结论和政策指导。

(一) 变量的选择及模型建立

本研究借鉴经典的C-D生产函数的基本原理,引入研发经费支出(RD)、研发人员总数(PRD)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总额(HTI)三个主要解释变量来衡量技术创新对中国数字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同时借鉴基于扩展的Jelassi-Yakita贸易竞争优势理论模型(Jelassi,2006;Yakita,2012),引入其他三个数字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贸易开放度水平(OPN)、货物贸易发展水平(EXG)和实际利用对外直接投资(FDI)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实证分析模型^[7]。

1. 国际技术创新水平 包括研发经费支出(RD)、研发人员总数(PRD)、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总额(HTI)三大因素。研发经费支出状况可以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技术创新情况;研发人才的规模是构成一个地区技术创新环境状况的重要因素,只有在拥有了足够技术人才的情况下,才能够进行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是国际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途径,也是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衡量因素。技术创新可以通过降低产品生产成本、物流成本、信息成本等途径提升产品竞争力,还

可以通过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构建品牌效应,提升产品的竞争优势,最后技术创新还可以在宏观微观层次上提升数字贸易的贸易环境,提升中国数字贸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 贸易开放度水平(OPN) 指的是贸易进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小。一个国家贸易开放度水平体现了这个国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程度。贸易开放水平的较高,意味着该国的贸易水平较高,贸易环境较好,有利于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3. 货物贸易发展水平(EXG) 传统的货物贸易与数字贸易整体上存在着资源互相挤占的关系。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数字贸易的增长,意味着将挤占传统货物贸易的份额,因此,货物贸易发展水平与数字贸易竞争力负相关。

4. 实际利用外资水平(FDI) 在竞争优势理论中,国际投资作为竞争力相关的环境因素,实际对外投资是国际技术创新扩散的主要途径之一,国家间技术创新扩散很多都是通过对外投资渠道进行。在开放经济下,实际利用外资是一国吸收先进技术的重要来源之一。随着利用外资中技术创新通过溢出渠道的效应减少,利用外资中投资我国技术创新产业比重不大,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向不再带来正的效应,而是负的挤占效应,因此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起到了负作用。

具体指标和含义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名称和含义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DTC1	数字贸易竞争力指数	LN DTC1	取对数后数字贸易竞争力指数
RD	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额(万元)	LN RD	取对数后的技术创新水平
PRD	科技活动人员数(人)	LN PRD	取对数后科技活动人力资源水平
HTI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万元)	LN HTI	取对数后技术创新溢出水平
OPN	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	LN OPN	取对数后贸易开放程度
EXG	出口贸易额(万元)	LN EXG	取对数后出口贸易发展水平
FDI	实际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万元)	LN FDI	取对数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几个变量数据都呈现出较强增长趋势,如果直接对变量作协整分析,可能存在伪回归现象。将相关变量数据分别取自然对数可以消除异方差现象。根据贸易竞争优势理论模型,重点考虑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引入研发经费(RD)、研发人员总数(PDR)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总额(HTI)三个解释变量,建立数字贸易竞争力实证分析模型。实证分析的数据为2005年到2017年间,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和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根据Engle和Granger,将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结合起来建立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构建数字贸易竞争力理论模型,引入技术创新的变量,结合表中其他控制变量指标的选取,实证检验最终将采用如下模型:

$$LN DTC1_t = C_t + \alpha_1 LN RD_t + \alpha_2 LN PRD_t + \alpha_3 LN HTI_t + \alpha_4 LN OPN_t + \alpha_5 LN EXG_t + \alpha_6 LN FDI_t + \varepsilon_t \quad \text{式(1)}$$

公式(1)中LN DTC1_t代表中国数字贸易竞争力水平, LN RD_t、LN PRD_t、LN HTI_t代表了技术创新因素,为主要考察因素; LN OPN_t、LN EXG_t、LN FDI_t分别为对中国数字贸易竞争力水平有影响的三个控制变量——贸易开放度水平、货物贸易发展水平和实际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其中,C 为是常数项,α₁、α₂、α₃、α₄、α₅、α₆分别为研发经费支出、研发人员总数、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服务贸易开放度水平、货物贸易发展水平和实际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弹性系数。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对序列进行协整检验,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以这种关系建立误差修正项,然后将误差修正项作为一个解释变量,连同其它反映短期波动的解

释变量一起,建立短期模型,也即是误差修正模型。因此,第一步要对相关序列进行协整检验^[9]。

(二) 协整检验模型

要研究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竞争力的影响,需使用数字贸易竞争力、研发经费、研发人员数、高新技术产品进口等时间序列,时间序列数据如果直接使用相关数据建模会产生伪回归现象,需要检验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因此,第一步是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平稳性检验,以排除变量的伪回归,使用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后期的协整分析。

1. 单位根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本文先采用单位根平稳性检验(ADF)检验方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上述各时间序列变量的稳定性。将变量取对数可以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因此,将所有的变量都进行取对数处理。利用EViews软件对取对数后的变量以及变量对数的一阶差分数和二阶差分据进行平稳性检验,ADF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的ADF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5%临界值	ADF值	P值	是否平稳
LN DTC1	-3.212696	-0.489684	0.855	否
LN RD	-2.998064	2.050209	0.9997	否
LN PRD	-0.245293	-3.040391	0.9157	否
LN HTI	-2.95711	0.550578	0.9859	否
LN OPN	0.213082	-2.971853	0.9686	否
LN EXG	-0.965589	-2.945842	0.755	否
LN FDI	2.667978	2.667978	1	否
LN DTC1'	-2.960411	-4.648951	0.0008	是
LN RD'	-3.052169	-5.030555	0.0011	是
LN PRD'	-3.052169	-4.454816	0.0033	是
LN HTI'	-2.960411	-4.648951	0.0008	是
LN OPN	-3.689194	-8.200064	0	是
LN EXG	-2.948404	-5.609517	0	是
LN FDI	-3.212696	-5.08607	0.0034	是

数据来源: EViews7.2计算得出

表3中的检验结果可知,虽然模型中的LN DTC1、LN RD、LN PRD、LN HTI、LN OPN、LN EXG、LN FDI七个变量的水平值是非平稳的,但是每个变量在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满足了ECM模型的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2. 协整检验 在本实证模型中,由于需要考察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采用基于残差检验的增广的恩格尔—格兰杰检验,即AEG(Augmented Engle-Granger test)检验,检验模型中一组变量(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就等价于检验回归方程所得的残差序列是否平稳。

根据上文的分析,将变量取对数可以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因此,将所有的变量都进行取对数处理。最终, LN DTC1作为被解释变量,将LN RD、LN PRD、LN HTI、LN OPN、LN EXG、LN FDI作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首先建立表示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的基础模型,得出我国数字贸易竞争力与技术创新水平以及其他各控制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模型,通过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得出以下具体结果:

$$\text{LNDC1}_t = 10.55939 + 1.377122\text{LNRD}_t + 0.889798\text{LNPRD}_t + 1.222770\text{LNHTI}_t + 0.210366\text{LNOPN}_t - 0.6398\text{LNEXG}_t - 0.779414\text{LNFDI}_t + \varepsilon_t \quad \text{式(2)}$$

拟合值 R^2 为 0.810782 F -statistic = 2.723286 Durbin-Watson stat = 1.913594

在式2长期模型中,我国技术创新因素(LNRD、LNPRD、LNHTI)与数字贸易竞争力(LNDC1)之间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解释变量技术创新投入(LNRD、LNPRD、LNHTI)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其他三个控制变量服务贸易开放度水平(LNOPN)、货物贸易发展水平(LNEXG)和实际利用对外直接投资(LNFDI)都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可以发现, R-square (拟合优度) 为 0.810782, 拟合优度较高, 意味着所选取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较高。

接下来,对残差序列进行 ADF 检验,取一阶差分,利用 EIEWS7.2 软件,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残差序列的 ADF 检验结果

变量	5%临界值	ADF值	P 值	平稳性
RESID01	-3.212696	-4.738040	0.0054	平稳

从表4可以看出,残差序列P值为0.0054,拒绝了原假设,说明残差通过了单位根检验。也可以认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平稳的长期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即我国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有着长期平稳的影响。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进行并以这种关系构成误差修正项,构建误差修正模型。

(三) 误差修正模型

若协整性存在,则以第一步求到的残差作为非均衡误差项加入到误差修正模型中,并用OLS法估计相应参数。因此,根据误差修正模型结合前述的恩格尔—格兰杰两步法,分两步建立ECM误差修正模型,并对其进行检验,建立表示变量间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计量模型。首先,前文已经建立表示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的基础模型,通过对水平变量进行OLS估计,得出我国数字贸易竞争力与技术创新水平以及其他各控制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模型。由前述协整检验已知该基础模型的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令 $\text{ECM}_{t-1} = \text{ut}_{t-1}$, 将残差序列作为ECM误差修正项,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text{LNDC1}_t = 0.109631 + 3.363422\Delta\text{LNRD}_t + 2.979720\Delta\text{LNPRD}_t + 2.476098\Delta\text{LNHTI}_t + 2.716326\Delta\text{LNOPN}_t - 3.017851\Delta\text{LNEXG}_t - 0.044414\Delta\text{LNFDI}_t - 1.943680\text{ECM}_{t-1} + \varepsilon_t \quad \text{式(3)}$$

$R^2 = 0.953185$ F -statistic = 3.570756 Durbin-Watson stat = 2.363684

公式3中 ECM_{t-1} 为误差修正项,系数为 -1.943680,同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 ($P = 0.0072$)。 ECM_{t-1} 系数为负,符合方向修正机制,说明技术创新研发经费投入、研发人力资本投入、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技术溢出效应和数字贸易竞争力之间的均衡关系对当年非均衡误差调整的修正能力较强。误差修正模型既能显示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又能体现变量短期变化的影响,所有作为解释变量的差分项的系数,反映各变量的短期波动对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短期变化的影响。

(四) 结果分析

修正后的模型显示,技术创新因素对我国数字贸易竞争力的变动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主要变量之外的其他控制变量如人力资本、贸易业开放度以及货物贸易发展水平等变量对我国数字贸易竞争力的变动有较大的影响,且与前文的预期相符。而作为本文最重要的解释变量,中国技术创新的三个变量因素与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长期均衡方程中研发投入的

系数为1.377122、科研人员数的系数为0.889798,代表国际技术创新溢出的高新技术进口系数为1.22277,表明技术创新已经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起到正面地促进作用,与研究预期基本相符。解释变量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系数为正,同时系数也较高,意味着高新技术产品进口的增加对出口贸易的提升有很大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技术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对数字贸易竞争力的提升所发挥的作用,已经大大超过了技术扩散带来的创新效应,因此,在模型中实际利用外资(FDI)变量系数为负,说明FDI投资中的技术创新值不高,技术扩散作用较弱,已对数字贸易的提升起到不了拉动作用。从侧面反映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加强,应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力度。但是,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带来的国际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对我国的数字贸易产品竞争力的提升,还具有正的拉动效应,原因在于高新技术产品中含有更高的技术创新程度,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技术创新对提升数字贸易竞争的重要作用。同时,在享受技术溢出的短期效应的同时,应加强技术创新,尤其注重自主创新在提升产业竞争力的过程中的长期效应,并进一步由自主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变^[10]。

贸易开放度水平的系数为正,意味着国际市场开放程度的提升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货物贸易发展水平和实际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是负相关的,也与预期相符合。

四、提升中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一) 加大技术创新投入

首先,政府应引导加大自主创新投入力度。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相关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对技术创新程度的提高,促使数字贸易产品出口竞争力实现质和量的飞跃。在政府的资金投入方面,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加大相关投入,同时更应引导研发经费、研发人员投入和技术交易市场向自主创新方向投入。其次,数字贸易相关企业更应加大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创新人才力度,可以从引进技术创新人才和培养高素质人才等多渠道,加大技术创新人才投入^[11]。总之,需要通过加大技术创新的研发经费投入和提高技术创新人才的质量,提升数字贸易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二) 加大数字贸易产品的技术创新投入

数字贸易正处于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时期,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的产品供给品质,提升数字贸易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品质,提升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在生产环节,应促进企业生产装备的数字化,逐步实现工业大数据、工业物联网、数字化工厂等新的智能制造技术的升级。另外,随着海外知识产权要求和税务成本升高,消费者对产品的体验要求也提升,国际市场上需要更多高品质产品,因此,数字贸易企业应加大贸易产品的技术投入,做高品质且有专利技术的高新技术产品,构建数字贸易产品的品牌竞争力,从而提升数字贸易产品国际竞争力。

(三) 利用技术创新,提升贸易环境

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运用于贸易环境提升。首先,应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贸易数字化发展方向,在国际交流合作层面、口岸经济发展方面、海峡两岸交流方面促进带动我国贸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口岸信息互通、实现贸易结构的升级转型,从而带动我国外贸竞争力的提升。其次,建立相应机制,对于前瞻性创新技术、引领产业创新趋势

的项目、有创新发展潜力的贸易企业进行大力扶持^[12]。最后,在一带一路和自贸区政策下,进一步利用技术创新推进贸易便利化、构建贸易信用机制,通过进一步深化落实单一窗口、无纸化操作、智能化监管快放模式等措施,优化贸易环境。借助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共享多部门多环节的信息,提供完善的信用评价制度。大力推进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最新技术创新投入融合到贸易环境提升中,提升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唐曙南. 跨越数字鸿沟 发展数字经济[J]. 情报杂志, 2001(12): 11-12.
- [2]马述忠, 房超, 梁银锋. 数字贸易及其时代价值与研究展望[J]. 国际贸易问题, 2018, (10): 16-30.
- [3]郭鹏. 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自由化策略——基于美国的视角[J]. 河南社会科学, 2018, 26(01): 74-79.
- [4]王玉柱. 数字经济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政策竞赛和规模经济驱动下的分化与整合[J]. 国际展望, 2018, 10(04): 60-79+154-155.
- [5]蓝庆新, 窦凯. 基于“钻石模型”的中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实证研究[J]. 社会科学, 2019, (03): 44-54.
- [6]柏力翔. 我国数字经济企业“走出去”对传统制造业创新的影响研究[D]. 北京邮电大学, 2019.
- [7]西桂权, 付宏, 王冠宇. 创新主体投入与创新绩效的长短期关系研究——基于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分析[J]. 科技与经济, 2019, 32(03): 21-25.
- [8]梁双陆, 张利军.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基于我国西部地区的分析[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6(11): 29-34.
- [9]王丽燕. 人口老龄化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基于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分析[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9(05): 22-28.
- [10]陈寰琦, 周念利. 从USMCA看美国数字贸易规则核心诉求及与中国的分歧[J]. 国际经贸探索, 2019, 35(06): 104-114.
- [11]张丽哲.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评价的差异分析[J]. 改革与开放, 2018(24): 37-39.
- [12]蔡耀君. 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广西实践与发展方略[J]. 中国信息化, 2018(10): 87-89.

【责任编辑 许鲁光】

农民工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未来收入 关系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张楠楠 陈山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文化消费可以作为文化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 并能够转化为经济回报收入。文章追踪调查中国家庭2014、2016年数据, 分析2014~2016年中国农民工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未来收入关系。研究首先发现, 农民工在非教育型文化上的投入可以显著地预测其未来收入, 具体而言, 农民工在非教育型文化上每多投入1元, 可以预测其能带来10.8元打工收入的增长。同时, 这种预测能力与是否为新生代农民工无关, 也在不同性别、不同婚姻状况、不同受教育年限、以及不同的家庭人口规模上无显著差异。透过农民工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未来收入的正相关关系, 针对当前我国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诉求, 我们认为合理的文化消费政策将不失为一条增加收入、改善贫困的创新路径。

[关键词] 农民工 非教育型文化消费 未来收入 可能路径 消除贫困

[中图分类号] F01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20)03-0059-09

一、问题提出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为社会分层提供了解释: 对文化形式的象征性掌握形成了文化消

收稿日期: 2020—03—13

*基金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英国剑桥大学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201806360248)

作者简介: 张楠楠,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陈山泉, 英国剑桥大学临床医学院博士后。

费,文化消费反过来能带来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回报,从而影响社会分层。这一理论形成了一个文化消费与经济资源的可兑换关系,且这一兑换关系又包含两个层次的关系:其一,不同阶层的文化消费不同,阶层的变化可能伴随着文化消费的变化;其二,文化消费反作用于经济收入,也就是文化消费的变化会影响未来经济收入的升降。对于第一层次关系而言,大量实证研究业已表明:受教育程度高,收入较高,从事有名望的工作的人,比处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更热衷于文化消费(Chan, 2013)^[1]。然而对于第二层次关系Aaron Reeves等人发表于2019年的研究认为“由于可用的研究很少,而纵向数据的研究更少,现有的关于文化消费反作用于经济收入的定量证据仍然脆弱”。^[2]这一项研究之所以困难,有两点原因:原因一:虽然阶层的变化通常带来文化消费的变化,但是阶层具有固化性,研究文化消费反作用于经济收入关系,研究对象最好是正在变化的阶层以及正在变化的文化消费,而发达国家很难找到这一研究对象。原因二:文化消费是一个正在生成中的概念,其范围非常广阔,包括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观光,小到零经济投入的听收音机,大到付费千万的课堂都算是文化消费(Tallykatz-Gerro,2004)^[3],目前有关第二层次兑换关系的研究几乎集中在教育型文化消费,但显然仅仅关注教育型文化消费的投入并不能扩展我们对于文化消费反作用于经济收入的全面理解。

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研究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经济资源兑换关系的理想研究对象。首先,农民工群体是一个正在实现社会阶层变化的群体。农民工是指户籍在乡村,进入城区从事非农产业劳动6个月及以上,常住在城区,以非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者,随着社会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的变迁,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不断得到改善,逐步实现从农村到城镇、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及认同变化。其次,农民工文化消费也相应发生变化。有研究表明:原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缺失及真空状态得到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观念上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汪一辰,黄平,2016)^[4],总体来说,农民工文化消费支出持续上升,文化消费类型也日益多元化(毛哲山,刘珍玉,2017)^[5]。再次,由于农民工普遍文化水平低,文化消费主要集中在娱乐型文化消费,轻教育型文化消费(占绍文、杜晓芬,2014)^[6],因此农民工非教育型文化消费比较容易把握。基于此,本研究的首要目的是借助农民工这一群体,聚焦非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其未来收入的影响。

对于文化消费如何影响未来经济收入的问题,现有学者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观点一:收入和职业地位是围绕招聘和晋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文化消费可以转化为更高的未来收入,那么它应该在招聘和晋升相关的流程中可见,此类的相关验证所选择的群体主要是精英或精英公司(Koppman,2016)^[7]。观点二:文化消费对于改善阶级品味,加强阶级认同,对实现文化融合具有促进作用,并进而影响人们的经济收入。一方面,文化品位、文化融合会改变消费模式,从而反作用于经济收入(Friedman, 2012)^[8];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相似性有助于建立关系及信任,弱关系对于就业机会的直接增加影响也是改变收入(Vaisey and Lizardo,2010)^[9],本研究的第二目的将以这两点理论为基础,探究针对农民工群体非教育型文化消费发挥其对未来收入的影响,是否遵循同样的路径。

二、样本选择及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一项全国追踪型调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CFPS采用

多阶段概率策略,覆盖中国29个省份的1800多个村庄或地区,该调查内容涉及人口学情况以及家庭详细的收入支出情况,因此被广泛应用于中国经济学与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在2014年招募了37,147名调查对象,2016年招募了36,892名调查对象。本研究的样本仅限于2014年和2016年皆被调查的农民工。农民工的筛选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定义为标准:指户籍在乡村,进入城区从事非农产业劳动6个月及以上,常住在城区,以非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者。最终本研究包含1,221个样本。

(二) 变量描述

本研究的结果变量是:2016年因打工所得的年收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记录了受访者每年自报的因外出劳动所得的年收入:“加上所有实物方面的福利或补贴,过去12个月,因外出打工总共挣了多少钱?如果有实物方面的福利或补贴,也请折算成现金”。

待探索的变量是: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询问受访者:“过去12个月,包括购买书报杂志、看电影、看戏等,您家用于文化娱乐的支出是多少?”该问题所体现的非教育型文化内涵与Aaron Reeves等人发表于2019年的研究所使用的文化内涵类似,因此由该问题所得的非教育型文化消费支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可比性。

控制变量或协变量包括:社会人口变量,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是否是新一代农民工以及2016年家庭规模。此外,我们还包括了家庭背景变量,并以父亲的教育和母亲的教育来衡量。最后,我们还控制了工作相关的变量,包括2014年因打工所得的年收入以及2016年平均每周工作的小时数。表1给出了相关变量的具体描述。

中介变量或代理变量,根据前言所阐述的文化消费影响未来经济收入的可能路径,本研究选择是否签订合同为招聘和晋升相关流程的代理变量。以往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劳务关系经常建立于口头叙述,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相关的法律文件很难发挥其应有的约束能力,因此签订书面的劳务合同可以体现为农民工与雇佣者在招聘和晋升相关流程中相互博弈的产物。对于另一种可能路径,农民工的文化融入主要表现为城市融入,但是城市融入的内涵较为复杂,目前仍未有统一标准,有的研究以行为和情感方面进行分析(李树茁,2008)^[10],有的以文化、社会、经济、心理来研究(李培林、田丰,2012)^[11],本研究选择自评精神状态为城市融入度的代理变量,因以往研究表明两者具有较高相关性(聂伟、风笑天,2013;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2012)^[12-13]。

(三) 数据分析

对于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本文采用的是滞后因变量模型:

$$2016\text{年因打工收入}_i = \beta_0 + \beta_1 2014\text{年文化支出}_i + \beta_2 2014\text{年因打工收入}_i + \beta X + \varepsilon_i$$

其中, i 代表个体,代表其他协变量。该模型估计了2014年文化消费与2016年收入之间的直接关系。具体的模型的拟合采用的是层次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的方法。

对于本研究的第二目的,本文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中介变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估计2014年文化消费与2016年收入的间接关系。

本研究所有的统计处理都在R 3.6.1中进行。统计显著性判断标准为 $p < 0.05$ 。

三、结果

(一) 数据描述

如表1所示, 在被调查的1,221农民工中52%为男性, 平均年龄为43岁, 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有31%; 处于同居或有配偶状态占86%;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年, 相当于初中水平; 54%的被调查者其父亲受过教育, 34%的被调查者其母亲受过教育; 被调查的农民工, 自评健康状况平均得分为3 (最大5), 大概处于中等水平; 自评精神状况平均得分为47 (最大60), 大概处于中等偏上水平。2014年被调查农民工, 签有合同的占到29%, 平均文化支出为72元, 平均因打工年收入为32,468元; 到2016年, 同批农民工, 合同签有率上升到36%, 平均因打工年收入上升到37,424元。

表1 变量数据描述

变量	度量方法	均值	标准差	定义
性别	虚拟变量	0.52	0.5	1 = 男, 0 = 女
年龄	连续变量	42.607	13.58	2014年的年龄。单位为年
新生代农民工	虚拟变量	0.31	0.46	1 = 是, 0 = 否。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在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 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6个月及以上的, 常住地在城市, 户籍地在乡村的受访者。
受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	7.004	4.23	2016年受访者完成的教育年限, 单位为年
父亲是否接受过教育	虚拟变量	0.54	0.5	1 = 是, 0 = 否。文盲被定义为否, 其他为是
母亲是否接受过教育	虚拟变量	0.34	0.47	
婚姻状况	虚拟变量	0.86	0.35	1 = 有配偶或同居, 0 = 其他
2016年家庭人口数	连续变量	4.619	1.89	2016年在一起同灶吃饭的人口数
2016年自评健康状况	连续变量	3.029	1.21	根据5刻度李克特量表测量。原始值最小值1, 最大值5, 值越大代表健康状态越差。本研究为便于解释, 进行了方向转换: 6-原始值
2016年自评精神状态	连续变量	47.32	8.22	根据CESD量表测量。原始值最小值20, 最大值80, 值越大代表精神状态越差。本研究为便于解释, 进行了方向转换: 80-原始值
2014年文化支出	连续变量	71.99	271.97	单位元。不包括教育支出。CFPS原问题: “过去12个月, 包括购买书报杂志, 看电影看戏等, 您家用于文化娱乐的支出是多少?”
2014年打工是否签订合同	虚拟变量	0.29	0.45	1 = 是, 0 = 否
2016年打工是否签订合同	虚拟变量	0.36	0.48	
2016年平均每周工作时长	连续变量	46.773	23.2	不包括午休时间, 但包括加班时间, 不管是否有报酬。一般每周工作多少个小时。
2014年因打工收入	连续变量	32,467.61	23,923.25	单位元。CFPS原问题: “加上所有实物方面的福利或补贴, 过去12个月, 因外出打工总共挣了多少钱? 如果有实物方面的福利或补贴, 也请折算成现金。”
2016年因打工收入	连续变量	37,423.96	29,344.27	

(二) 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未来收入增长关系的探究

表2展示了农民工2014年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其2016年因打工收入关系的层次回归结果。在不考虑其他协变量的情况下(模型1), 农民工2014年在非教育型文化上每多投入1元, 可以预测其2016年16.7元的打工收入的增长, 且这种预测关系具有显著性的统计学意义。在陆续控制了自身的社会人口学信息(模型2)、家庭背景信息(模型3), 以及工作相关的信息后(模型4), 这种预测

关系仍具有显著性的统计学意义。最后的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2014年在非教育型文化上每多投入1元,可以预测其2016年10.8元的打工收入的增长。

表2 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未来收入的层次回归结果

	2016年因打工收入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2014年文化支出	16.7*** (2.88)	21.8*** (3.91)	17.7*** (4.01)	10.8** (3.95)
年龄		90.7 (117.79)	-66.9 (134.8)	-71.8 (143.33)
性别		-1981.1 (1840.2)	-1136.6 (2071.55)	-2139.6 (2138.27)
新生代农民工		-281 (3430.69)	-4961.1 (3815.82)	-5206.1 (3896.88)
受教育年限		975*** (254.04)	983*** (291.18)	986.9** (298.54)
婚姻状况		-620.8 (2769.24)	-2817.3 (3003.65)	-981.6 (3056.24)
2016年家庭人口数		3919.3*** (492.81)	3963.8*** (555.61)	3074.1*** (564.74)
2016年自评健康状况		-806.1 (781.61)	-763.1 (881.65)	-877.6 (903.43)
父亲是否接受过教育			-2847.5 (2354.39)	-3982.7 (2375.01)
母亲是否接受过教育			1549.5 (2559.67)	1042 (2554.56)
2014年因打工收入				0.4*** (0.04)
2016年平均每周工作时长				-1.5 (45.19)
Adjusted R-squared	0.023	0.100	0.096	0.197
F-statistic (p value)	28.16 (<0.001)	14.74 (<0.001)	8.96 (<0.001)	14.08 (<0.001)

表中所展示数据为, 回归系数 (标准误)

. p<0.1; * p<0.5; ** p<0.01; *** p<0.001

通过引入交互作用, 表3展示了农民工非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其未来收入预测能力的亚组人群分析, 包括是否为新生代农民工 (模型5)、不同性别 (模型6)、不同婚姻状况 (模型7)、不同受教育年限 (模型8)、以及不同的家庭人口规模 (模型9)。然而回归结果显示, 上述预测能力的差异, 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表3 非教育型文化消费对未来收入预测能力的亚组人群分析

	2016年因打工收入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2014年文化支出: 新生代农民工	-11.5 (8.83)				
2014年文化支出: 性别		-2.2 (7.83)			
2014年文化支出: 婚姻状况			7 (8.61)		
2014年文化支出: 受教育年限				1.2 (0.98)	
2014年文化支出: 2016年家庭人口数					3.1 (2.05)
Adjusted R-squared	0.198	0.196	0.197	0.198	1.999
F-statistic (p value)	13.14 (<0.001)	12.98 (<0.001)	13.04 (<0.001)	13.12 (<0.001)	13.2 (<0.001)

表中所展示数据为, 回归系数 (标准误)。在模型5-9中, 亚组人群的分析通过引入交互作用实现, 其他被控制的协变量与表2中模型4所控制的协变量一致。

. p<0.1; * p<0.5; ** p<0.01; *** p<0.001

(三) 非教育型文化消费预测未来收入增长的可能路径探究

现有农民工依旧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签订书面的劳务合同可以体现为农民工与雇佣者在招聘和晋升相关流程中相互博弈的产物, 因此本研究选择是否签订合同为招聘和晋升相关流程的代理变量, 进一步探究这一路径的可能性。表4展示了农民工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其未来合同状态的层次logistic回归结果。模型1虽然显示农民工2014年的文化支出对其2016年的合同状态仍有统计显著的预测能力, 但是在陆续控制了社会人口学信息(模型2)、家庭背景信息(模型3), 以及工作相关的信息后(模型4), 这种预测能力始终没有显著性。因此可以认为非教育型文化消费预测未来收入增长的能力很可能不是通过此路径发挥作用的。

表4 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未来合同状态的层次回归结果

	2016年打工是否签订合同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2014年文化支出	1.001* (1.000, 1.002)	1.001 (1.000, 1.002)	1.000 (1.000, 1.001)	1.000 (0.999, 1.001)
年龄		0.991 (0.959, 1.024)	1.003 (0.967, 1.039)	0.976 (0.925, 1.027)
性别		0.802 (0.537, 1.197)	0.872 (0.56, 1.359)	0.997 (0.531, 1.885)
新生代农民工		0.777 (0.356, 1.692)	0.648 (0.277, 1.505)	0.534 (0.16, 1.755)
受教育年限		1.145*** (1.077, 1.221)	1.139*** (1.065, 1.222)	1.115* (1.015, 1.229)
婚姻状况		0.853 (0.489, 1.504)	0.694 (0.38, 1.275)	0.54 (0.231, 1.253)
2016年家庭人口数		0.995 (0.89, 1.11)	0.998 (0.88, 1.13)	0.994 (0.831, 1.188)
2016年自评健康状况		1.223* (1.024, 1.465)	1.205 (0.991, 1.468)	0.934 (0.7, 1.242)
父亲是否接受过教育			1.209 (0.725, 2.022)	1.255 (0.6, 2.663)
母亲是否接受过教育			1.247 (0.754, 2.067)	1.076 (0.527, 2.203)
2014年打工是否签订合同				17.507*** (9.002, 36.049)
2016年平均每周工作时长				1.008 (0.991, 1.026)
AIC	752.5	614.4	515.0	296.7

表中所展示数据为, 优势比(95%置信区间), 通过Logistic回归得到。

. p<0.1; * p<0.5; **p<0.01; ***p<0.001

通过将自评精神状态作为城市融入度的代理变量, 本研究探究了另一种路径的可能。表5展示了农民工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其未来自评精神状态的层次回归结果。虽然模型1显示农民工2014年的文化支出对其2016年的自评精神状态没有统计学显著性的预测能力, 但是在陆续控制社会人口学信息(模型2)、家庭背景信息(模型3), 以及工作相关的信息(模型4)的过程中, 这种预测能力始终有显著性。

表5 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未来自评精神状态的层次回归结果

	2016年自评精神状态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2014年文化支出	0.001(0.0009)	0.003*(0.001)	0.002*(0.001)	0.002*(0.001)
年龄		-0.013(0.03)	0.009(0.04)	-0.008(0.04)
性别		1.2*(0.5)	1.4*(0.56)	1.5*(0.61)
新生代农民工		-1.7.(0.92)	-2.3*(1.03)	-2.7*(1.11)
受教育年限		0.2*(0.07)	0.2*(0.08)	0.3**(0.09)
婚姻状况		2.2*(0.75)	1.6.(0.81)	1.7*(0.87)
2016年家庭人口数		-0.02(0.13)	0.1(0.15)	0.02(0.16)
2016年自评健康状况		-2.6*** (0.21)	-2.7*** (0.24)	-2.6*** (0.26)
父亲是否接受过教育			0.2(0.64)	0.6(0.68)
母亲是否接受过教育			1.0(0.69)	0.6(0.73)
2016年平均每周工作时长				-0.02(0.01)
Adjusted R-squared	0.001	0.164	0.171	0.182
F-statistic (p value)	2.287(0.131)	25.23(<0.001)	16.46(<0.001)	13.88(<0.001)

表中所展示数据为, 回归系数(标准误)

. p<0.1; * p<0.5; ** p<0.01; *** p<0.001

图1展示了将自评健康状况作为中介变量的最终结构方程回归结果。a路径控制的协变量为表5模型4中统计显著的变量, 包括性别、是否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以及自评健康状况。b和c路径控制的协变量为表2模型4中统计显著的变量, 包括受教育年限、2016年家庭人口数、以及2014年因打工收入。最终结果显示非教育型文化消费通过自评精神状态发挥间接预测能力的大小为0.2, 但是该结果无统计显著性意义。因此该路径的可能性也被排除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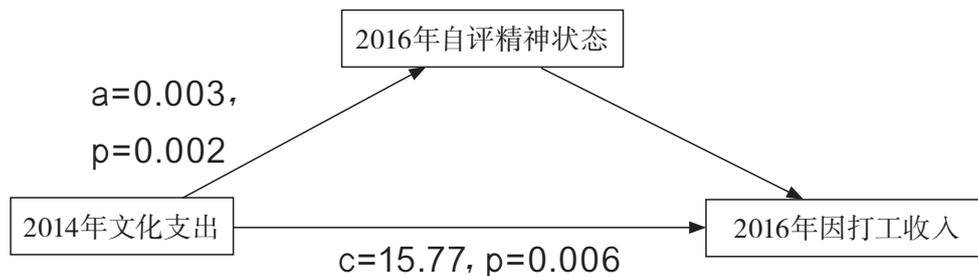


图1 非教育型文化支出通过自评健康状况, 发挥预测作用的路径分析

a路径控制的协变量为表5模型4中统计显著的变量, 包括性别、是否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以及自评健康状况。B和c路径控制的协变量为表2模型4中统计显著的变量, 包括受教育年限、2016年家庭人口数、以及2014年因打工收入。间接作用为 $a*b=0.2$, $p=0.452$ 。直接作用为 $c=15.77$, $p=0.006$ 。

四、结论与启示

收入与文化消费关系研究大都停留在收入影响文化消费的单向逻辑上,本文旨在填补文化消费与收入关系研究的空缺,尤其是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收入关系的空缺。依托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研究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通过滞后回归模型发现,农民工在非教育型文化上的投入可以显著地预测其未来的收入。具体而言,农民工在非教育型文化上每多投入1元,可以预测其能带来10.8元打工收入的增长。然而这种预测能力与是否为新生代农民工无关,也在不同性别、不同婚姻状况、不同受教育年限、以及不同的家庭人口规模上无显著差异。这一研究结果与2019年Aaron Reeves在《文化消费能否增加未来收入?探索文化资本的经济回报》一文中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这一研究结果具有两层意义:首先:非教育型文化消费显然可以充当文化资本的角色,反过来带动经济资本的回报。这与布迪厄在《再生产》中提出文化消费可以作为文化资本,实现了社会再生产功能及“合法化”功能,进而影响人们经济收入的观点不谋而合。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以文化消费带动经济发展是一条可行的道路,这也与当前我国文化消费已经成为拉动文化产业增长的主要引擎现状一致;从社会学意义上讲,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作为文化资本可以置换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是产生社会不平等的机制之一,那么相应地在促进社会平等、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应该将非教育型文化消费纳入考虑范围,换言之,如果推广素质教育、义务教育、劳动就业教育等等的目的是从教育型文化消费角度改善民生,那么非教育型文化消费投入也应该普及到社会各个层面;从哲学意义上讲,人不仅是物质存在物,还是精神存在物,文化消费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必要因素,发展非教育型文化消费,在本质上讲,是人走向自由解放的内在要求。其次:关于改善农民工就业策略。过去农民工文化消费与收入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强调通过提高收入来带动文化消费(甘宇等,2015)^[14],或者是通过强调加大教育型消费来拉动未来收入(高武,2019)^[15],由此产生的相关就业策略会集中在建议加大教育投入、职业培训投入上等。这就忽略了互联网时代,非教育型文化消费的作用,当文化符号可以成本极低地在网络空间中实现快速的跨阶层传递,意味着文化消费的便捷与多样化,我们就必须注意到这种非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农民工生活的反作用,比如: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新媒体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信息、培训信息、创业信息等等(郑欣,2014)^[16],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很多的淘宝村,农民工利用各种互联网平台,线上出售农作物或展示独特手艺,因此引导农民工非教育型文化消费比如多样化使用新媒体平台、拓宽多渠道就业思路等等应该被予以考虑。

第二,本研究显示非教育型文化支出对未来收入预测的可能性路径,并不是通过招聘和晋升相关流程实现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通过招聘和晋升相关流程改变的理论主要是针对教育型文化投入与企业招聘。其次,农民工群体就业具有特殊性,其就业并非完全依照市场的招聘晋升路径,而是通过朋友、熟人、亲戚介绍等“强关系”这种同质社会资本获得(朱明宝、杨云彦,2017;钱芳、陈东,2014)^[17-18]。这种“强关系”在目前农民工的求职过程中依然占有决定性作用,强化了口头承诺的同时,弱化了合劳务同应有的作用。最后,该理论在非教育型文化领域的应用主要针对的是“高身份或高耗时休闲活动”,比如:在一些精英专业服务公司,他们选择“高级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强的人”,同时也关注是否参与“高身份或高耗时休闲活动”。研究证明此类活动可以作为为社会和道德品质的证书,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货币转换的价值,包括晋升(Rivera,L.A,2011)^[19]。显然

该理论在对象选择上具有局限性,目前大部分农民工从事的是底层的体力型劳动,因此本文验证第一条路径没有明显作用。

第三,本研究认为农民工的收入提升也不是通过增加城市融入度实现的。尽管本研究显示这一路径不通,但是可能和本文选择的代理变量有关。如前文所述,“强关系”在目前农民工的求职过程依然占决定性的作用,非教育型文化消费可能会强化或拓展农民工的这种“强关系”,比如微信群相约锻炼、吃饭,广泛人脉的获得充当了社会资本,通过获得信息、权力和团结的优势可以增加他们获取较高收入工作信息的机会,如果将类似的社会支持变量也纳入进来,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这一点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佐证。此外,还有一种非主流假设留待研究,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作用于文化多样性,可促进其与同事或雇主的相处,进而促进收入的提升。以往研究表明(Erickson,1996)^[20],文化多样性可以被视为智力的指标,也可以理解为与他人的协调能力。雇主所青睐的应聘者不仅在休闲追求、经验和自我风格展示方面有能力,而且在文化上要与自己有相似性,雇主对共享文化的关注会胜过对绝对生产力的关注。同时,多样化的文化消费也是经理或者主管人员的重要特征,这使他能够与众多的同事建立起信任关系,并意味着有更好的协调能力。

众所周知,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题中要义。当前基于生产与消费关系改善贫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除绝对贫困,即从经济学意义上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也就是注重生产对消费的正向作用。鲜少有学者研究消费对改善贫困的反作用,更鲜少有学者涉及文化消费对增加收入、改善贫困的意义。本文通过农民工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未来收入的正相关关系以及其实现路径,旨在说明布迪厄社会理论的现代价值,既然文化资本不仅可以与经济资源兑换,也意味着文化资本是产生社会不平等的机制之一,那么由此大到文化产业、文化消费政策,小到非教育型文化消费等的相关合理的文化政策,就会具有改善民生生活、改善社会不平等的作用,尤其科技的快速发展使互联网信息爆炸,带来了碎片化、娱乐化、分享化的全民学习现状,几乎每一个互联网公民都浸泡在非教育型文化中,研究非教育型文化消费政策如何引导推动民生发展、社会发展必然是新一轮的时代课题。

参考文献

- [1]Chan, T.W.. Understanding Cultural Omnivores: Social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Oxford Sociology Working Papers,2013.
- [2]Reeves A, de Vries R. Can cultural consumption increase future earnings? Exploring the economic returns to cultural capital[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9 Jan;70(1):214-40.
- [3]Tally katz-Gerro.Cultural Consumption Research: Review of Methodology, Theory, and Consequenc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ical,2004,14(1):12-20.
- [4]汪一辰,黄平.农民工文化消费的时代差异与文化表征[J].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21(02):14-18.
- [5]毛哲山,刘珍玉.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北京青年研究,2017,26(03):18-23.
- [6]占绍文,杜晓芬.农民工文化消费现状调查[J].城市问题. 2014,(5):68-73.
- [7]Koppman, S. Different Like Me: Why Cultural Omnivores Get Creative Job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16,61(2):291-331.
- [8]Friedman, S. Cultural Omnivores or Culturally Homeless? Exploring the Shifting Cultural Identities of the Upwardly Mobile[J]. Poetics,2012,40(5):467-489.
- [9]Vaisey, S. and Lizardo, O. Can Cultural Worldviews Influence Network Composition? [J]. Social Forces 2010,88(4):1595-1618.

(下转第74页)

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当代价值

——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

和东红 刘青青

(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海 西宁 810016)

[摘要]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深刻论述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其他非经济因素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正是在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人类社会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历史合力论”仍未过时,仍然具有科学性。本文主要从新发展理念视角出发,分析了“历史合力论”的提出背景、基本内涵及和逻辑演进,进而揭示了新发展理念中体现的“合力论”思想。

[关键词] 新发展理念 恩格斯 历史合力论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20)03-0068-07

一、“历史合力论”提出的历史语境

外部因素——唯物史观面临巨大挑战和理论斗争的需要。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欧洲各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在工人运动中已占有一定地位,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产生了一系列误解和歪曲,资产阶级学者中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资产阶级民主党内以“青年派”为典型代表。资产阶级学者错误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机械论和宿命论,将唯物史观归结为只关注经济的经济唯物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党中的“青年派”眼中,毫无疑问,唯物主义只是被简化和庸俗化了的东西。他们不懂辩证法,将唯物主义恶意篡改,不仅对上层建筑的反作

收稿日期: 2020—04—04

作者简介: 和东红(1966-),女,汉族,陕西渭南人,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研究;刘青青(1994-),女,汉族,甘肃嘉峪关人,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研究。

用持否定态度,甚至否定社会历史进程中每个个体的能动性作用,将个人与社会历史发展完全割裂,认为社会历史没必要存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个人对社会历史进程不起作用,这些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形成了极大冲击,出现了一系列抨击唯物主义的思潮,质疑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权威性。针对这样的形势,革命导师恩格斯晚年在与各个学者书信往来的过程中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对抨击唯物史观的各种思潮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正是这些书信中包含了“历史合力论”的思想。

自身因素——唯物史观理论自身发展完善的需要。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进行唯物史观的创建工作,由于时代条件的不成熟,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存在一定的弊端,随着社会发展,唯物史观理论本身也亟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指出,早期他与马克思在创建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对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和它能动的反作用强调不够,随着理论认识的深入,恩格斯认识到有必要对唯物史观进行完善和丰富,进一步分析影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动力因素,在“历史合力论”中对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进行了合理的解答。

二、“历史合力论”的经典表述

恩格斯晚年通过与其他学者的书信往来,分析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因素,提出经济关系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揭示了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作用,论述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尊重历史客观规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进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对推动社会历史进程的动力进行了系统阐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历史合力论”思想。

(一) 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诸因素相互作用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但经济因素仍然是其中的最终决定因素。恩格斯全面阐述了经济因素不仅在整个国家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在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等意识形态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始终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1](P477)}这里所说的“生产和再生产”特指对人类社会的变化起着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具有引领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指导性作用,对一个国家制度的生成和变迁具有决定性作用,是导致一个国家的政治斗争、阶级矛盾的根本原因,经济利益是一切冲突的根源。此外,恩格斯对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还延伸到了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面,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进一步强调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无疑同样是由本国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二) 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作用

除了阐述经济因素对促进社会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作用外,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独立的反作用也进行了分析。1890年,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书信中,对于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恩格斯加以分析,由于意识形态具有自身独立的发展领域对历史积累的延续性,有着前辈赋予它的确定的思想材料。所以,意识形态并不是一直十分准确地反映经济态势,经济形势的优劣和意识形态并不总是一致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能动地反映经济发展状况。在1894年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书信中,恩格斯同样强调不能忽视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然而它们又是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2](P506)}

此外,恩格斯还对社会历史进程中体现的规律进行了探究,他指出:“有无数个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便产生出一个历史合力,即历史结果。”^{[2](P478)}这表明经济因素并不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唯一因素,诸因素相互作用产生的“合力”是社会历史进程的内在驱动力。虽然意识形态相关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不起“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但绝不能否认它们对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作用。

(三) 个人意志的主观能动性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社会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历史,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恩格斯对个人社会实践在历史中所起的影响作出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个人所从事的社会活动都具有计划性、目的性和主动创造性,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从事一切认识世界并进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神圣家族》中所说的:“‘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到达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P118-119)}人类社会的进步与自然社会的发展不同,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没有人的实践活动,人类社会历史就无法前进和发展。现实的个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尽管个人意志不尽相同,有时甚至会发生冲突,相互矛盾,但是,这并不妨碍每个人的意志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历史结果正是无数单个人的意志的合力。因此,在总的合力中,每个个体意志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并对尊重历史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强调,他指出:“我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4](P604)}人们改造客观世界、推动历史进程的实践活动总是在确定的历史前提和特定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的,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对人们改造世界也有重要的影响,人们并不能随意地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人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循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规律,历史是在众人意志的合力中产生的。因此,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尊重历史的客观规律为基础。

(四) 社会历史进程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有其必然性,同样也具有偶然性因素。经济因素并不是历史进程唯一的决定因素,偶然性时刻扮演着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恩格斯肯定社会发展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依托,建立在一定经济条件基础之上的。但是他也说到社会发展的结果并不会按照个人在头脑中想象的那样呈现出来,因为个人的意志会受到其他人的妨碍,这种妨碍就表现为偶然性因素。人类历史进程既表现为经济因素运动的必然性,也表现为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等非经济因素的偶然性,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来表现。恩格斯借用历史进程中英雄人物的出现为例来论证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相互关系,充分阐述了两者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历史进程是偶然出现的英雄人物背后隐藏着的必然性;经济因素是各个时代出现的英雄人物背后隐藏着的根本动因,事物的产生都是夹杂着必然性和偶然性。“恰巧某个英雄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个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1](P733)}任何英雄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的时代背景造就了这些人的出现,这就体现为历史的必然。

三、“历史合力论”的逻辑演进

经过综合分析,“历史合力论”的形成过程大概可以被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3年到1886年,“历史合力论”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产生,《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

结》和《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这一期间“历史合力论”得到了发展成熟,1890至1894年,在这一阶段恩格斯着重梳理了“历史合力论”的主要脉络,并将其充分运用到唯物史观相应理论中,完善丰富了“历史合力论”思想。

(一) 萌芽形成期

1843到1886年,《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发表标志着“历史合力论”的萌芽和形成。这一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成为“历史合力论”研究的主要任务,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问题,有人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世界,世间一切都由上帝的意志命令和驱使;也有人认为“绝对精神”的外化形成了世界,整个人类世界都受“绝对精神”的支配。在此背景下,恩格斯也开始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背后的动力,得出了各“分力”相融合形成了一个“合力”的结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阐述中就已经出现了“历史合力论”的雏形。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史的发展不同于自然界的形成和发展,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促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2](P243-244)}不同个体的意志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力”造就了人类社会的历史。

(二) 成熟发展期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是“历史合力论”的成熟发展期。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就涉及过有关“历史合力论”的相关论述,只是当时还没有正式使用“合力”一词,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回信中,进一步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合力主张,认为创造历史的各种活动总是人们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不同个体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中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归根到底”是经济因素,其他非经济因素虽然没有主导性作用,但不可否认它们的重要影响力。同时,恩格斯对个人意志在“合力”中的重要作用也进行了强调,个人意志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在个人发挥其功能的过程中,由于个人所处环境的不同,会产生各异的思想动机,彼此之间会产生不同的矛盾和冲击。在这一时期,“历史合力论”思想更加系统,更加成熟。

(三) 丰富完善期

1890年至1894年,在这一时期“历史合力论”思想得到了完善与补充,恩格斯着重梳理了“历史合力论”的主要脉络,并将其充分运用到唯物史观相应理论中。早期在创立唯物史观理论时,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唯心主义错误思想进行了明确批判,但没有充分阐述“合力”的系统功能,对经济基础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着重强调,但没有全面系统阐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对上层建筑能动的反作用论述比较零散,论述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和完整性。1894年,恩格斯对上层建筑对社会历史的反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明确地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呈现出来,恩格斯在信中阐述到社会历史的创造要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既定的经济条件和特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创造自己的历史,不是建立在个人主观意志上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人的意识和思想进行碰撞,相互影响,形成了历史必然性,必然性决定着偶然性,并借助偶然性来表现,正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形成了社会历史。在恩格斯致弗·梅林的信中也涉及相关的讨论,批判了意识形态独立于物质和社会经济关系而存在的错误观念,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历史合力论”思想。

四、新发展理念视角下“历史合力论”的当代价值

恩格斯对“历史合力论”相关论述,对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辩证地认识了促进社会历史进程的动力因素,对于现阶段我国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有重要借鉴作用,运用“合力”思维,充分发挥社会各因素的综合力量,更好地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一)新发展理念提出的背景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并不是无源之水,它是在总结我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正确把握现阶段国际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提出的,它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结果。首先,新发展理念是为解决全球经济处于低谷的窘境,适应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现状而提出的新的发展理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结束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期,进入了深度调整期。在国际领域,经济发展十分低迷,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开始盛行,在国内,我国传统粗放式发展模式在现阶段已经行不通。因此,为实现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度发展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新局势提供正确的价值遵循。其次,当前我国发展中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发展动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为了解决民生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更好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发展理念。

(二)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

新发展理念内涵主要涉及五个方面内容。创新发展理念是引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旨在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突破了我们将“创新发展”等同于“技术创新”的传统观念,强调我国经济发展必须全面推进理论、制度、科技和文化四个维度的创新。协调发展理念是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主要是为了解决我国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树立协调发展理念就是要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同进步,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社会各方面发展整体性协调。绿色发展理念是维持社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主要是针对我国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提出的。我国长期的粗放式发展使得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资源逐渐匮乏,环境承载力也逐年下降,经济发展与人口、环境承载力出现不适应状况。因此,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局面,更好地促进美丽中国建设。开放发展理念是促进我国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型经济实现了新飞跃,但开放程度和开放水平比较低,仍需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促进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相融合,提高发展的内外联动性,提升我国在国际环境中的话语权和综合实力。共享发展理念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也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共享发展理念要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三)新发展理念对“历史合力论”的继承与超越

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合力论”主要阐述了诸多个人意志相互作用、相互碰撞的最终结果就构成了历史,在这无数个意志中,每个个体的意志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意志的特征,根据平行四边形法则,这无数相互作用的力可以算作合力,这样就会最终产生一个历史结果。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我国经济发展要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要

综合各种力量共同努力,在这五个方面协同推进,形成一种合力。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滞后,因此尤其注重经济的发展,“金山银山”的理念确立逐步扩大了对“绿水青山”的破坏。因此,习近平同志提出发展要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倡导一种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新发展理念不仅继承了“历史合力论”的相关理论,更是对“历史合力论”的超越和发展。

第一,新发展理念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观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等重大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唯物史观“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5]新发展理念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社会历史进程是多种力量相互冲突、相互影响的结果。其中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都不能单个发挥作用,应将诸多单一因素进行系统整合,进而形成一个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动力系统,这也是“历史合力论”思想的重要体现,新发展理念同样强调发展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是以一定的发展理念为指导的。发展理念的正确与否,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的成败。”^{[6](P744-745)}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面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人为应对现实的需要,解决人民日益渴求的发展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并将其作为“十三五”甚至更长时期内指导我国经济健康运行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我国的政治体制、文化氛围、生活环境等因素,然而,经济发展对社会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前经济发展仍然是社会繁荣中不可缺少的问题。当然,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时刻把握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发展状况,新发展理念各要素之间必须相互衔接、相互贯通,实现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统一实施,不能忽略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作用。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为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行动指南。

第二,新发展理念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新认识。思想引领行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在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不断升华有关发展的理念,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巨大转变,我国经济发展状态的复杂性、有规律性呈现出新特点,影响社会发展的各方力量不断发生对比,出现各种可能性,要正确认识和利用这些可能性,正确把握当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准确把握“合力”所指的方向。现阶段为应对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集中一切力量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升到国家发展的重要位置。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更自信的表达,为我国完成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转变提供理论支撑。理念是行动的指南,发展理念引领并指导着发展实践的方向,新发展理念是保持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科学指引,深刻引领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变革。

第三,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原则。创新发展要求以科学为指引,协调发展体现了政治经济学中坚持协调平衡的原则,绿色发展体现了发展要遵循适度的原则,开放发展体现了国家的主体性原则,共享发展体现了合理分配的原则,从新发展

理念全局来看,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原则,新发展理念体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整体合力,突出表现了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融合,是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调整,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提升了我们党发展理论新境界;在坚持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性的前提下,将以“人民为中心”放在发展的核心位置,使得我国经济建设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指向,科学回答了应该怎样发展的问题,以现实发展状况为出发点,坚持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兼顾公平和效益,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理论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关于发展的理念我国领导人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出发,将创新作为促进发展的内在动力;为解决社会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将协调作为应对之策;为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将绿色发展作为必要条件;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大势,将开放发展作为必由之路;为解决社会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将共享发展作为根本目的。利用五个方面最大优势,发挥五个方面的“合力”,为实现我国经济永续发展指引方向。

参考文献

- [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王仕国.五大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发展新观的发展[J].求实,2016(11):12-20.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刘婉华】

(上接第67页)

- [10]李树茁,任义科,靳小怡,费尔德曼.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8,167(2):61-70.
- [11]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J].社会,2012,32(5):1-24.
- [12]聂伟,风笑天.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精神健康——基于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实证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3,13(5):32-40.
- [13]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维权工作处课题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实证研究(上)[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2(08):74-85.
- [14]甘宇,赵驹,宋海雨.农民工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来自1046个样本的证据[J].消费经济,2015,31(01):52-55.
- [15]高武,吴庆国.新生代农民工及其职业教育的诠释:文献综述与研究展望[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7(08):102-105.
- [16]郑欣.人生规划与媒介驱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02):66-72.
- [17]朱明宝,杨云彦.近年来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及其变化趋势[J].人口与经济,2017,41(5):89-100.
- [18]钱芳,陈东有.强关系型和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J].甘肃社会学,2014,36(1):56-59.
- [19]Rivera, L.A. Hiring as Cultural Matching: The Case of Elite Professional Service Firm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2,77(6):999-1022.
- [20]Erickson, B.H. Culture, Class, and Connection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6, 102(1):217-251.

【责任编辑 许鲁光】

自私、合作与美德的本质*

郭 晓

(浙江大学科技与法律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08)

[摘 要] 美德并非“彻底的无私性”，而是具有利他性的亲社会行为。对自私目标的追求也可以成为形成美德的动力。人类的合作、亲社会行为（美德）很可能只是基于“自私”目标互惠互利的结果。人类自私地期待他人的无私，这构成了“自私的悖论”。条件性互惠的利他合作突破了“囚徒困境”的逻辑，是“条件性互惠”的“以牙还牙”而非“始终背叛”的“撒旦”或“无条件施惠”的“圣母”促进了人类美德的形成和稳定；“撒旦”和“圣母”无法提供一种具有稳定性的“善”。“以牙还牙”的惩罚与报复是人类合作形成的关键约束条件。互利合作的人类群体扩大了竞争规模、提高了竞争力。采取进化生物学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在哲学上更加深刻地理解“美德”“自私”与“利他行为”，有助于为道德哲学寻求一个更加真实和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自私 合作 美德 条件性互惠 实验哲学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20)03-0075-07

包括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 亦作“美德伦理学”)在内的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发展出了一整套富有启发性的关于美德的理论,美德在伦理学的讨论中地位特殊、不容回避。面对这一重要论题,我们似乎应该先搞清楚,“美德”究竟是什么?

收稿日期: 2020—03—06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道德判断的实验哲学研究”(15CZX017)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了“浙江大学争创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201502)。本文系作者“责任归因”系列研究之一。

作者简介: 郭晓(1986—),男,湖北郧阳人,科学哲学博士,浙江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道德哲学与实验科学研究。

一、美德就是亲社会行为

事实上,纽卡斯尔英国国际生命中心主席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指出,“我们几乎专门将美德定义为亲社会的行为,而将邪恶定义为反社会的行为……美德几乎从定义上来说就是为了实现集体的更广大利益。……而那些明显体现出美德并让我们都赞赏有加的事情——如合作精神、利他主义、慷慨、同情、善良和无私等——这些事情都清清楚楚地与他人的幸福有关。”^{[1](PXII, P27)}这并非“空前的创见”,因为大卫·休谟(David Hume)早已在《人性论》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当任何性质或性格有促进人类福利的倾向时,我们就对它表示高兴,加以赞许”^{[2](P623)}——这种“亲社会的性质或者性格”就是“美德”。

美德具有“利他”属性,常常表现为“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r)。所谓“利他”,是指“出于对他人福利的关心而愿意牺牲自身的福利,是一个与利己或自利相对的概念。”^{[3](P73)}利他行为主要有五种类型:(1)助人于困境:意外、捕食和种内攻击(introspect aggression,亦作“introspect competition”即“种内竞争”);(2)分享食物^①;(3)救死扶伤,尊老爱幼;(4)分享器具;(5)分享知识。利他行为还经常具有这一特征:对施助者(giver)而言代价较小,对受助者(taker)而言,效益很大。^[4]此标准意味着这些利他行为经常(但并非“总是”)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一)“自私”与“美德”

在“自私”问题上,尼采认为“生命意志”是利己力量的冲动:“生命的本质是赤裸的利己主义本能力量的冲动,它是生命意志的根本。”^{[5](P231)}休谟清晰地指出“自私”乃是一种人性:“自私是和人性不可分离的,并且是我们的组织和结构中所固有的。”^{[2](P625)}哲学家朋霍费尔甚至认为,“有一种比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更糟的心理上毫无自我的尺度。”^{[6](P138)}他们并没有把“自私”视为一种非常糟糕的个性品质,而是认为“自私”乃是人性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美德”经常被误认为是“彻底的无私性”,这恐怕是个不小的误解。进化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的证据,可能会使我们改变某些传统观念。

迈克尔·盖斯林(Michael Ghiselin)指出,“被误认为是美德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马特·里德利甚至不客气地随后(迈克尔·盖斯林这句话——笔者注)指出,“那些基督徒在感觉自己高人一等之前应该停下来想一想:他们教导别人说你应该践行美德死后才能上天堂——这其实就是个天大的贿赂,正是诉诸人们的自私行为。”^{[1](P111)}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显然已经关注到了这些问题,他在《道德哲学体系》结尾声称,“由于我们注意到地上的万国万城都摇摇欲坠,很快就会变成废墟,所以,就让我们去寻求一个由上帝建立和缔造的有永固基础的天堂国家吧。”^{[7](P217-218)}我相信这种来自宗教“天堂永恒”的神性贿赂

①巴斯指出,“分享食物是人类的一项主要的社会活动。”,以至于有的文化中发展出了特定的词汇来表示各种不同的饥饿,如Botswana的!Kung San人就有专门表示“很想吃肉的饥饿”的词汇。参见D·M·巴斯:《进化心理学》,熊宏哲,张勇,晏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在当代中国,一些传统节日则几乎主要化身成了对应的代表性食物节,如“元宵——汤圆节”“端午——粽子节”“中秋——月饼节”“冬至——饺子节”等,可见食物与节庆活动的深刻渊源,以及分享食物的社会意义之重大。

②当然这一过程并不一定是痛苦的,朋霍费尔在其《追随基督》一书中称,“基督徒要作基督的真正门徒,不仅要相信基督,并且要甘心顺服他的意愿,顺服地踏上十字架的道路。然而十字架的道路不是全然的痛苦,它的终点是喜乐和平安;人在舍弃中必得到真正的生命。”见朋霍费尔著《伦理学》(第8页)曹伟彤之“中译本导言”。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我就曾在2014年的春夏被吸引了很久很久。不过，不止基督，难道有哪一种宗教不是这样的吗？道教许下了在此岸就可以“白日飞升”的“大饼”，而佛教则更强调“度己度人”，在“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和大慈悲之余，也同时诉诸了“因果报应”这样的“利诱+恐吓”。“恐吓”是一个难听的词，然而人们在面对从第一层“拔舌地狱”到第十八层“刀锯地狱”栩栩如生的描述——和图像时，有谁能不害怕；况且还有最底层更可怖的“阿鼻地狱”（Avicinar Aka）或称“无间地狱”在等着。佛教通过“避一趋效应”把信众往行善积德的道路上引领。^①行善修行，你将获得“神性的贿赂”，令人难以抗拒。

这样看来，对于自私目标的追求似乎也可以成为美德的动力之一。

（二）进化上稳定的道德策略

事实上，人类的合作、亲社会行为（美德）很可能只是基于“自私”目标互惠互利的结果。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指出，“到底是什么促成了人类社会的形成呢？最可能的假设就是互惠互利。”^{[1]（P38）}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章获得者马修·乔尔·拉宾（Matthew Joel Rabin）也指出，互惠才是“公平的”，他甚至把公平性（Fairness）直接定义为“当别人对你友善时你也对别人友善，当别人对你不善时你也对别人不善”^{[3]（P62）}。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进一步指出，多数情况下的“利他行为”都是“很经济的”，“往往包含着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收益”。^[4]如果反之，那显然很不划算了。至此，似乎可以说：互惠互利就是美德！

20世纪50年代梅里尔·弗勒德（Merril Flood）和梅尔文·雷德希尔（Melvin Dresher）率先提出了“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遵照囚徒困境的逻辑——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即“非合作博弈均衡”：当每个博弈者的均衡策略都是为了达到自己期望收益的最大值，同时其他所有博弈者也遵循这样的策略。）——每个人自己的最优解远非“两个人”的最优解。然而即便如此，在人类700万年的进化进程中，合作、利他与美德最终还是涌现了。这与人格信任的建立非常相似，这之中“熟悉感”是信任产生的必要前提——这个有关信任的游戏要玩不止一次。为什么人类社会可以形成如此高水平的合作呢？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预测，“一对个体之间互动的时间越长，合作的机会就越大”，你在许多火车站附近餐厅挨宰的糟糕体验很可能与此有关——你们很少能再次碰头；实际上“人际信任”也是通过反复接触的“熟悉感”才得以建立和增强的。对于长达700万年的进化历史而言，人类祖先选择“合作”几乎是“别无他法”的。

1979年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发起了一场比赛，让政治科学家阿纳托尔·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那个友好、与人为善但同时又“睚眦必报”（——这里的双引号可能是一种误用，因为它真的睚眦必报）的“以牙还牙”（Tit for Tat）程序脱颖而出：

“一开始，那些卑鄙无耻的策略不惜牺牲天真友善的策略而得以迅猛发展，只有像‘以牙还牙’这样的复仇者能和它们并驾齐驱。但随后，慢慢地，那些卑鄙无耻的策略将容易攻击的对手一一清理干净后，遭遇到的全是和自己一样的对手，它们的数目也开始急剧萎缩，这时候‘以牙还牙’开始步入前列，最后它又一次傲视群雄，在战场上独领风骚。”^{[1]（P48）}

^①实际上肉身的“白日飞升”只是早期道教的修行目的，宋代以后道教的修行目的也开始“抽象化”为“亘古不变之法身、与天同寿之大道”。此外“自度度人”佛道两家都在倡导，而“因果报应”更是儒释道三家都在讲：儒家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道家讲“天道承负”，佛家讲“六道轮回”，都在讲“因果报应”，只是具体方式不尽相同。此处感谢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左攀博士指教。

特里弗斯指出,该策略是一种“条件性互惠”(Contingent Reciprocity)——这有别于“圣母”的“无条件互惠”。实践表明,“以牙还牙”(Tit for Tat)才是进化上具有生存竞争力、进化上稳定的道德策略——而不是“撒旦”(“始终背叛”的竞争者)或者“圣母”(无条件宽恕、始终合作的竞争者)^①。以牙还牙是一种稳定的进化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SS),“因为它打败了其他各式各样的策略,最终能够在群体中扩散开来。而它一旦在群体中发展起来,就不可能再被其他策略所取代。”^{[8](P290)}此类策略的特征在于,“如果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都采取这种策略,那就不可能有比它更好的策略。”^{②[8](P290)}

(三)真正的善具有稳健性

我们认为,美德和善应当可以“自持”(self-sustaining)。换言之,美德一方面应当具有对受众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应具有面对其他类型的“美德”冲击或“恶德”排挤的竞争力;作为具体策略则应是稳定的进化策略。真正的善应当具有稳健性(Robustness)。

简言之,“互利合作”的利他性构成了我们人类“美德”的核心要素——平等个体之间的互惠互利促成了美德。

不过,某些道德家可能会辩称,“无私地”利他才是一种美德。较之“以牙还牙”的策略,他们更赞赏的是“以德报怨”的圣母;然而中国的先贤孔子(Confucius)早就对此提出了质疑:“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孔子开出的正是以牙还牙的著名药方:^③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不能不说这是贤者的远见。中国著名文学家鲁迅也是这一美德版本的拥护者,他把人生经验的凝聚在遗嘱中传递给子女:“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④孔子和鲁迅都反对不分是非、不辨善恶的“乡愿”——在物联网元年2017,我们有一个无涉性别的名词来恰如其分地描述这类人——“圣母婊”。那些主张无条件“宽容”的人都将(或已经)是被自然选择淘汰的群体——无条件宽容(unconditional tolerance)的鼓吹者就是人类的毒害者。^⑤因为人类的合作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而其中,惩罚与报复则是合作形成的关键约束条件——无条件宽容将取消这些惩罚与报复。正如丹·艾瑞里所指出的,“报复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本能。……报复的威胁——即使人们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能够成为维护和支撑社会秩序有效的强机制。”^{[9](P97)}没有惩罚与报复,就没有合作与美德。

①在这里,“撒旦”和“圣母”的含义是笔者赋予的。当然还有“傻瓜”式“巴甫洛夫”策略,可视为一种“智能版的以牙还牙策略”。该策略“带有一丝邪恶倾向”——它乐于合作,但是如果遇到傻瓜(“圣母”)也会乐于“主动背叛”以谋求“超额利润”,在惩罚对方不合作之后又愿意转向新的合作。这一策略由卡尔·西格蒙德(Karl Sigmund)和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提出,该策略“在充满各种可能和学习机会的更现实的世界里”最终成为了“进化过程中真正稳定不变的策略”。参见:[英]马特·里德利著:《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化》,吴礼敬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62-63页。

②具体观点为道金斯1989年于《自私的基因》中提出。

③《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54页。

④原刊于1936年10月20日天津《大公报》,为鲁迅先生“七条遗嘱”的最后一条。

⑤Kristen Mae持有类似观点:“To start with, absolute and unconditional tolerance is not a thing that can exist in reality. It is logically unsustainable—it’s a paradox. An unconditionally tolerant society would eventually destroy itself.”参见I Refuse To Tolerate Your Intolerance, <https://www.scarymommy.com/no-tolerance-for-your-intolerance/>

事实上，“报复”和与之直接相关的“利他惩罚”有着深厚的生物学和社会学基础。(1)生物学基础：“在游戏参与者决定实施惩罚时，他们的大脑处于正电子放射断层造影探测系统(PET)的扫描之中。……结果表明大脑纹状体活动加强，而大脑的这一部分活动与人们体验奖励相关联。实验证明那些大脑纹状体激活程度越高的人，对对方实施的惩罚就越重。”^{[9](P99)}换言之，实行“这种(报复的——笔者注)欲望是有生物学基础的，而且这种惩罚行为事实上能获得快感(或者起码引发类似快感的反应)。”^{[9](P99-100)}(2)社会学基础：“要解释人类社会的高水平合作，利他性惩罚可能是一个关键性因素。……最新的人类合作演化模型也显示，利他惩罚行为在演化上有悠久的历史，这暗示人们承担惩罚他人的成本的机制是自然选择的结果。”^{[3](P181)}我们在以报复、惩罚等方式努力维系合作的结构，维持“美德”的基础。^①

人类是合作的动物，美德是互惠合作的结果。

二、自私的悖论

启蒙时期的不少道德哲学家认为，人类并不自私。如弗兰西斯·哈奇森认为，人类是关心他人的仁慈的物种：人类“意志的行为”可区分为“自私”(selfish)和“仁慈”(benevolent)两种类型，“所有严谨的争论都已证明，意志的所有动机出自于同一个源头，没有人能够否认我们经常具有真正发自内心的、未加掩饰的希望他人幸福的愿望，只是在这些愿望的程度上非常不同而已。”^{[7](P9-10)}

然而，即便哈奇森“人类无私”的判断准确，关于美德我们还是会面临一个“自私的悖论”：

“人们通常会反对自私，他们鄙视贪婪并且相互告诫要提防那些以一心追求自身目标而闻名的人。同样，他们敬仰那些公正无私的利他主义者；这些人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故事成了传说。”

在东方有我们家喻户晓的雷锋(Lei Feng)，西方有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 或称 Saint Teresa of Calcutta)，他们是被持续传颂和敬仰的道德模范。“所以在道德层面，大家都同意利他主义值得提倡，而自私自利则必须谴责，这是明白无误的。”然而，悖论在于，多数人似乎只是赞赏他人的“无私”，自己却并没有成为一个利他主义者。例如，在当代自媒体舆论场中流行“用圣人的标准要求他人，用贱人的标准约束自己。”——人类自私地期待他人的无私，这构成了“自私的悖论”。

另一方面，“互利者”的相互合作对美德的存在至关重要。弗兰克的道德情操论解决了这个悖论：“通过强调囚徒困境这场博弈里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吸引正确的伙伴，他展示了互惠者怎样一头栽倒在社会之外，而让自私的理性主义者自生自灭。……一旦合作者将自己和社会其余人员隔离开来，一种全新的进化力量就会起作用：这种力量让集体和集体对抗，而不是和个体对抗。”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是“互利合作的集体”去对抗一个个“理性自利的个体”^{[1](P125)}——这是一种“降维攻击”，道理似乎极其简单，却蕴藏着人类社会赖以合作、美德赖以形成的秘密。

^①马丁·诺瓦克(Martin A. Nowak)等提出，基于奖励的机制对于合作同样意义重大。实际上，惩罚与奖励构成了美德赖以形成的外在约束和内在激励条件。

三、美德及其边界：一种进化心理学的视角

事实上，“人类（特别是男性）通常会形成同盟，去强行夺取其他人的资源。比如Yanomamö男性就会形成雄性同盟，向邻近的部落发起进攻，夺取他们的食物和育龄妇女。”^{[8](P320)}这种“互利合作”的好处在于能让愿意合作的人发现同伴、结成同盟、同仇敌忾。他们扩大了竞争的规模、提升了竞争的實力——从个体层面上升到“互利群体”或者“互利群落”层面。

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灵长目动物的体型大小并不是等级高低的决定性因素。相反，灵长目动物的等级次序更多地取决于个体的社会技能，最重要的就是能否赢得朋友和同盟者的合作和支持。”^{[8](P391)}合作能提高我们的生存概率，而肉体生命——这个经常被哲学家们嘲讽的存在有着特殊的意义：“由于所有的权利随着死亡而失效，所以，维持肉体|生命是所有的自然权利的基础并因此而具有特殊重要性。”^{[6](P73)}

至于如何对付紧随合作而来的“欺骗”（defection）和“搭便车”（free-riding）的麻烦，人类进化出了高水平的“惩罚性情感（punitive sentiment）”来解决问题：（1）它增加了那些不情愿履行分内职责的人为群体做出应有贡献的可能性；（2）它破坏那些搭便车的人通过逃避责任而获得的适应性收益，即“消除了不利的适应性差异”。^{①[8](P314)}

采取一种进化生物学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在哲学上更加深刻地理解“美德”“自私”与“利他”行为。“利他”在陌生人、熟悉的人和亲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血浓于水”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遗传相关度”（Genetic Correlation）。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10](P22)}至少“天下”之前的半句他是对的，因为这符合进化规律。根据汉密尔顿规则（Hamilton's rule）的正式公式：

$$c < rb$$

c 为利他者所付出的代价， r 是利他者和受惠者之间的“遗传相关度”， b 是指受惠者所获得的收益，这样的利他基因就能得以进化。“如果一种特质（基因）通过突变进入群体当中，而它又违反了Hamilton规则的话，那自然选择会将它无情地淘汰掉。只有当特质的基因编码满足Hamilton规则时，这些基因才能扩散到整个群体中去，进化成物种所特有的本领中的一部分。”^{[8](P248-249)}原本“无私的美德”经过这样一轮转换变成了“自私的基因”，情感上令人难以接受。然而，学会接受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接受那些“残酷的真相”或许是我们认知升级所必需的。我们绝非宣扬“赤裸裸的自私”，而是在试图为美德、利他行为和道德哲学寻求一个更加真实也更加坚实的基础：规则在人类和其他动物当中同样适用。

马特·里德利警示我们，在从自然学习的过程中要注意斯库拉（Scylla）这个魅惑的海妖——就是她吞掉了《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回家路上的六名船员——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这个盘踞在意大利墨西拿海峡的海怪；他提醒我们注意避免过度关注“动物中和人类相似的直接证据”以及过度关注“人类的唯一性”^{[1](P131-132)}；在从自然界寻求“合作”这种美德的证据时，我们需要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中道”（Mesotetes）的指引。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同样警示：“看起来，我们需要一种可以避免这两个极端（一端偏向动物性/非理性，另一端偏向彻底的理性）的看法。”^{[11](P122)}——而这是我们在伦理学的问题上最容易出现的一种偏差。

①观点为Price et al (2002) 提出。

例如,我们的“道德感”、我们的许多认知模式和经验范式,它们的诸多特征都与人类群体的规模密切相关。这正是著名的“邓巴数字”^①。另一方面,历史上人类群体生活的下限是“7人”,考古发现的古文明的聚落点中没有“7人以下”的文明遗存,这意味着“7人”可能是维持人类群落的最小数值。^②强调人类美德的生物学基础并不是要把人类拉低到“动物界”去,而是遵照实验哲学的传统,先搞清楚——是什么。在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构建起更多有意义的哲学命题,和有价值的伦理理论。

弗兰西斯·哈奇森指出,道德真理是这样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人们所追求的道德真理仅仅是这些命题,那些表明什么行为是仁慈(good)的命题,我们有义务做(obligated to do)什么的命题,以及什么事情应该做(ought to done)的命题。”我们有必要意识到:美德是并且只是——人类的美德;同样需要认识到,合作是并且只是——人类的合作。因此,最好意识到,我们的“美德”也有其边界,“生物特征”极大地决定了道德界限——下限;而我们的人性,则将决定其——上限。

参考文献

- [1][英]马特·里德利. 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化[M]. 吴礼敬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 [2][英]休谟. 人性论·下[M]. 关文运译, 郑之骥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 [3]叶航、陈叶烽、贾拥民,等. 超越经济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 [4]Trivers R L.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J].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1971 (1): 35-57.
- [5]万俊人. 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6][德]朋霍费尔. 伦理学[M]. 胡其鼎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7][英]弗兰西斯·哈奇森. 道德哲学体系·上[M]. 江畅、舒红跃、宋伟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 [8][美]D·M·巴斯. 进化心理学[M]. 熊哲宏、张勇、晏倩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9][美]丹·艾瑞里. 怪诞行为学2:非理性的积极力量[M]. 赵德亮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0.
- [10][东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 2009.
- [11][新西兰]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 美德伦理学[M]. 李义天译. 北京:译林出版社, 2016.
- [12]郭晓. 责任归因的实验哲学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 2017.

【责任编辑 刘婉华】

^①牛津大学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发现,由于脑容量特别是新皮层大小的限制,人类智力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48,约为150人,即邓巴数字(Dunbar's number,或Rule of 150)。

^②事实上“7人”的群落还是太小了,“7人”能够留下文明遗存并不意味着7人的小群落可以相对稳定地维持群落的延续。

治理理论的中国场景：复合治理的勃兴

许珂 周伟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2)

[摘要] 源自西方语境的治理理论, 因其对于中国历史传统的忽视和对中国公共管理客观实践条件的回避, 致使其在中国场景中出现了“空转”和失败, 理论和实践效力大打折扣。复合治理是本着对中国历史场景和现实场景的尊重而提出的, 是适应中国场景的“中国化”治理理论: 通过对政府主导地位的确证和对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认可来架构权威体系, 通过多种有效治理机制的融合来延展自身的治理触角, 以公民个人作为问题解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既彰显了以人为本, 又坚持了标本兼治。

[关键词] 治理理论 中国场景 复合治理 社会治理 政社关系

[中图分类号] D035;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20)03-0082-06

我国当前公共管理实践所面临的重大国情就是我国仍处于转型社会时期, 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上层建筑还未完全建立起来, 新旧体制和观念之间的摩擦依旧存在, 社会利益持续分化, 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在互联网时代急剧发酵, 成为公共危机的引爆点, 这些都给公共管理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治理理论作为“舶来品”, 必须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相结合, 实现治理理论的中国化, 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中面临的各类问题。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不论是思想层面还是行为层面, 都打着厚重的历史烙印, 如强政府传统、公共精神的匮乏、缺乏结社传统等, 而治理理论自引进之后, 一直试图以其在西方场景下取得的成功经验在中国加以复制, 这是一种对于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忽视。中国场景即我国的历史场景和现实场景, 治理理论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忽视, 必然导致其在中国场景之下出现治理失败和治理“空转”。且以往的研究没有处理

收稿日期: 2020—03—12

作者简介: 许珂, 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硕士, 主要从事政府改革与治理研究; 周伟, 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政府改革与治理研究。

好治理理论“破”与“立”的关系，多倾向于“破”，即治理失败或者治理空转问题的研究，殊不知“破”的目的在于“立”，在于找出适应中国场景的治理理论形态，实现治理理论的中国化，让治理理论在中国场景下发挥其效用。复合治理正是在总结中国场景下治理理论的空转和失败教训后，提出治理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其本身包含着对中国历史场景和现实场景的尊重，对于“标”和“本”的深刻认识和系统把握，因此它更加适应中国场景，研究复合治理不仅对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深刻启示，还对于治理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治理理论与中国场景的“脱轨”

复合治理就是针对在中国场景（转型期社会）下治理理论出现“失败”和“空转”而提出的。^[1]治理理论的“失败”和“空转”所造成的结果相似，即都是治理失效，但是其诱因却不同，治理理论失败的诱因属于内生性，它是治理理论自身的结构设计缺陷导致的。杰索普将治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治理没有满足资本主义对市场化组织形式与非市场化组织形式二者平衡的本质诉求；治理机制与现有政府机制之间的匹配性与协调性不足；治理理论的先天缺陷，比如治理的条件设定过于简单化，对于影响治理目标实现因素的认识不足等”^[2]。而治理理论的“空转”属于外发性诱因，它是治理理论实现条件的缺乏所造成的治理体系的自我繁忙和无效运转，无法实现预期的治理目标和产生相应的治理效果，是治理体系所作出的无用功。治理理论在中国场景下实现条件不足即治理“空转”，其产生原因主要为：社会仍处于转型期，社会组织发展迟缓，还未形成多中心治理和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社会组织的绝对数量与我国的人口基数还不匹配、社会组织吸纳群众参与政治生活及影响公共决策的能力还很有限，这些都证明社会组织在我国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仍未确立，治理理论倡导的多中心治理还不具备实现的条件。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信息传播被横向拉伸，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得到了拓展，加之政务公开的持续推进，公民获得的信息量也更为丰富，公民之间也在通过网络社交媒体的不断沟通中，找到了自身的政治身份感，于是公民通过电子参与的热情高涨，对于各种公共事件不断发声，形成了巨大的公共舆论压力，使得网络舆情成为公共管理的热点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依然停留在基础层面，许多时候更像是情感的宣泄，导致了谣言和虚假信息的传播，并且公民个人参与感的提升并没有带来公民集体政治参与的局面，目前我国公民的电子参与多是个体的、偶发的情绪行为，还没有上升为群体的、有组织的、常态的参与行为，因此治理理论在中国场景下出现了“空转”和失败。即便如此，治理理论的提出还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应当结合中国场景，对于治理理论进行中国化，找出适合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治理形态，充分发挥治理理论的积极效用，而复合治理就是在对治理失败和治理“空转”的反思中形成的治理理论的中国化成果。

二、复合治理理论的兴起

复合治理的引入最初是为了应对风险的全球化扩散，复合治理最早是在2004年由我国学者杨雪冬提出的，他指出“复合治理的背景在于公共的扩展使得任何单个的治理机制都无法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因此需要新的治理机制”，这个治理机制就是复合治理，但是杨雪冬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明确地给出复合治理的定义，仅给出了复合治理的五大特征^[3]：复合治理是由多个治理主体组

成,这与“复合行政”和网络治理也是基本相符合的,体现了治理理论的主体特征;“复合治理是多维度的,它不仅体现在地理意义上的纵向多层次,还表现在应用领域的横向普遍性上。”;“复合治理是一种合作互补关系,它是国家、市场、公民社会这三大治理机制的相互补充和协调。”这点同“复合行政”有许多相似,同样强调各个主体的运行机制的交叠嵌套^[4],互相补充和协调;“个人是复合治理的基本单位”,复合治理强调解决问题的根本是个人,要从个人出发寻找解决路径。

“复合治理的目标就是及时解决问题”,因为复合治理最初针对的是风险的全球化扩散,因此作为解决路径,复合治理必须具有时效性,迅速解决问题,以防止风险的蔓延扩散。

复合治理理论体系的不健全制约着其更大发挥,因此许多学者致力于重构和完善复合治理的理论体系,范巧和郭爱君认为“复合治理是指在小政府的善政和大市场的自由化基础上,将政府公共服务等职能通过转包、招标等形式让渡给公民社会组织,通过公民社会的良好运行,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从而达到政府、公民社会和市场的和谐发展”。^[5]范巧和郭爱君对于复合治理的定义参考了善治的基本概念,强调复合治理的最终目标是追求政府与公民对于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6],给复合治理的概念注入了价值追求。姚伟和吴莎则从复合治理应用的实际出发,认为“复合治理虽然具有主体多元参与、资源配置多元合力、价值目标多元兼顾的潜在优势,但只有多元主体之间形成复合性,并建立相应的权责体系和运行机制,其功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7]他们同样以善治作为复合治理的价值追求,范巧等实现善治的方式主要是借助合同外包等政策工具,而姚伟等是通过权责体系和运行机制的构建,可以说这是复合治理实现方式的两个不同角度。学者姜士伟从转型中国社会治理的复合性出发,丰富了复合治理的内涵:“社会治理思维的多维性;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社会治理空间的拓展性;社会治理过程的合作性”^[1]。发展了复合治理的相关内容。复合治理概念经由学界不断廓清后,在食品安全、公共危机、城市突发公共事件、国家风险、政府政策执行等领域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复合治理的定义应当是在转型期社会的背景之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等社会主体组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多中心复合主体,在复合思维的指引下,充分发挥各种有效治理理论和治理机制的积极作用,以解决所面临的日益具有复杂性和复合性的公共治理问题的一种协作治理模式。复合治理的定义重在“复合”这是它与其他治理理念的本质区别,落脚在治理,说明它又具有治理理念的一般特征,复合治理对于治理理论的突破在于,复合治理的结构更加具备灵活性和开放性,复合治理的复合不仅仅是公共管理主体的复合,更是多种有效治理手段的融合,它可以根据公共管理实践的不断变化而调整自身结构,通过吸收多种有效治理机制的积极成分,扩展了治理的范围和治理触角,因而更加适应日益复杂且迅速变化的公共管理实践。并且,复合治理强调的是政府主导下的多中心主体权威结构,追求的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种治理机制的有效互动和良性发展,复合治理通过公共服务外包和管理职权下放等手段给予社会组织足够的锻炼机会,又通过积极引导,对社会组织及时纠偏,防止社会组织为个人所利用或者失去其公益属性,引导不是控制社会组织,而是政府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宏观把握,具体运行细节政府不必干预过多,但是要循序渐进使社会组织逐渐成长起来,成为具备独立行为能力的治理主体。复合治理可以总结为三大特色:1、政府主导的多中心主体,这体现了复合治理对于我国历史场景和现实场景的尊重;2、多种有效治理手段的融合,这是复合治理实现空间延展性和结构灵活性、开放性的重要条件;3、以公民个人作为问题解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管理思想,即治理问题解决的根源在公民个人,治理所要服务的终极对象也是公民个人,复合治理是一种“民

主再生产”，通过培育公民精神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又通过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得公民的参政渠道得到拓展、公民的利益诉求得到伸张，权利得到实在性保障。

三、复合治理与中国场景何以契合：分析框架与理论内涵

(一) 政府主导下的多中心主体的权威结构设计：复合治理的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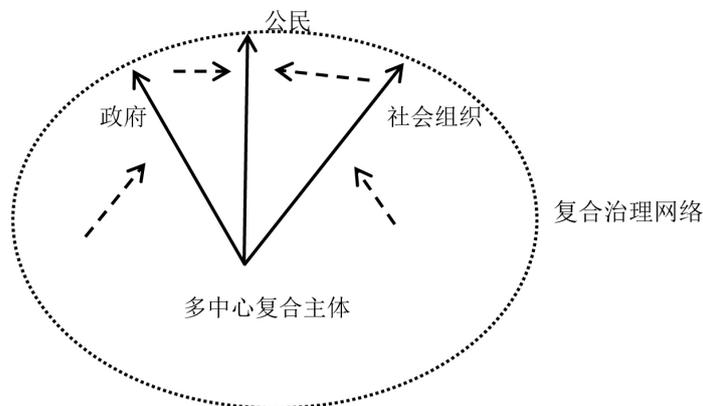


图1 政府主导下的多中心主体的权威关系图

在复合治理球面网络下，假定公民保持中立且以公民轴作为参照系，即公民作为固定轴其相对位置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三轴共同以交汇点（多中心复合主体）为圆心，因为三者的交汇体现了多中心的特征，政府与公民两轴所间距的弧长较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弧长较短并且有逐渐缩短的趋势，其代表的含义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公民与社会组织间距的弧长也呈现逐渐缩小的态势，同样体现了公民对于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热情逐渐高涨，社会组织与公民的关系日趋紧密，而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弧长较长并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这体现了社会组织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逐渐增强，并且政府与公民两轴包含的面积也逐渐缩小即政府对于公民的直接统治范围逐渐缩小，昭示着传统的政府对于公民的直接统治的治理样态不断消弭，政府与社会两轴所夹面积不断增加，政府与社会组织两者之间所夹面积在复合治理球面网络中所占的比重也逐渐增大，这体现了复合治理所追求政府与社会组织对公共事物合作管理的局面逐渐形成，复合治理强调共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促使这些转变的产生，需要一系列的“催化剂的”加入，在复合治理中的催化剂就是政府通过宏观指导和公共服务外包与管理权限下放，将社会组织“抚养长大”使其成为独立的行动主体。

复合治理条件下的权威结构设计本质上就是对政社关系的认知，以往的研究有从国家-政府与社会二元对立角度着手，否定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干预，认为社会组织应保持其绝对的独立性，也有从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关系入手，认为“在我国国情下，市民社会尚在起步之中，根本就无社会组织发展的合适生态环境，且就具体情况而言，我国的社会组织组织又面临着资金缺乏、内部管理混乱等众多现实问题，于是走上了一条简单的依附于政府的合作主义道路，即在政府的强权控制下，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8]这两种关于政社关系的论断都具有一定的偏颇，“二元对立论”没有看到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也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边界具有动态性和模糊性，简单的肯定一个否定一个，无益于社会整体治理结构的均衡。而“合作主义”则对社会组织

在我国的发展持悲观态度,消极地依附政府,导致社会组织丧失其独立性和自主性,成为政府的附庸,而不是独立的治理主体。复合治理的权威主体结构是政府主导下的多中心,其合理性有着历史维度的考量,任何一种试图适应一国实际的理论成果,都不能忽视传统对于一国当前实践的深远影响。首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和国外环境,加之强政府传统的影响,我国采取了“先国家,后社会”的国家建构模式,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条条对应,地方政府间则是块块分割,彼时我国治国策略乃是自上而下的统治型,而社会组织作为自下而上的治理型治国策略的重要主体,在当时是不具备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而这种重视国家建构的惯性,使得我们无法回避政府在我国治理格局中的强势地位,复合治理确认了这一现实,以政府主导为首要原则,以多中心治理为长远目标,是一种应对转型社会的渐进策略。其次,政府具备社会组织所欠缺的合法性资源,只有在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下,社会组织才会逐渐为公民所接受,而社会组织又具备政府所欠缺的“软控制”能力和强大的政治动员力,它因实现方式的柔和更易被公民接受,社会组织因其与公民的紧密联系和其活动方式的非强制性,使得其博得了公民的信任,使得公民愿意接受社会组织的领导,而且“政治动员很少是自发的,在任何众多人口参与到政治活动之前,肯定要形成各种组织,培训各种宣传者”^[9]。政治动员往往需要借助社会组织的组织力和吸纳力,社会组织在政治动员中的积极作用,也使得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多中心协作成为必要。政府主导的多中心是以政府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宏观引导,社会组织的自主活动为基础的,二者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和依附关系,而是内在运行机理的耦合,通过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紧密联系,以及社会组织与公民的紧密联系,密织一张囊括几乎所有治理主体与客体的治理网络,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

(二) 多种有效治理手段融合: 复合治理的实现路径

复合治理所强调的治理手段的融合,不仅是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治理机制的有效互动和相互配合,还是各种治理理念比如自治、法治,德治的融合,也是各种有效治理理论,如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等的去粗取精。复合治理之所以采取这种混合结构,首先源于治理对象即公共管理事务的复杂性。“公共管理事务是技术、形式和价值的复合体。就技术层面而言,公共管理事务及其实践是一般行政的通用性、部门行政的专业性和政府管理的综合性的复杂结合体,必然对公共管理者提出复杂的技术和能力要求。同时,区别于一般管理,公共管理还涉及制度和价值复杂性。公共管理依靠单纯技术性逻辑和科层制自生性的发展,无力促使新制度体系的生成、实现治理方式和组织体系的变革,解决基本价值的协调和妥协,促进社会共识达成,必须依靠治理方式的多元和政治方式的协同才能达成。”^[10]公共管理事务的复杂性导致了单一治理方式效用的发挥,难以使相关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必须依赖多种治理方式作用的发挥,比如在区域公共管理中,协同治理所强调的合作协同,针对集体行动中的责任分散,希望以群体协作致力于区域共同目标的完成,强调的是集体行动的行为层面。

此外,复合治理追求自治、法治、德治的融合,自治是法治原则之下的自治,而不是任性而为,无所拘束的自治,自治的范围和内容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而在我们国家基层治理中还存在着法治的缺位,基层村官任性而为,以人治代替法治,藐视法律,侵害老百姓的合法权益,须知基层群众自治必须以法治为引领,基层自治不是法外之地,必须坚持法治精神在基层中的渗透和贯彻,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在做好自治和法治的基础上,德治是决定治理效果的高线,德治的程度决定了治理的高度,在贯彻法治精神的基础之上还要重视教化,我国素有教化民的思想,通过倡导真善美,发掘人民群众内心的道德本真,使他们受到道德的无形约束和规范,从而促进整体治

理高度的提升。

最后复合治理强调政府、市场、社会三大治理机制的协调配合,单一依靠这三者中的任何一种,是不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的,因为这三种治理机制都存在自身的优点和不足,只有三者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治理的最大效用。政府具有市场和社会所不具备的合法性资源,但其自身存在着政府失灵问题即公共政策的失误与失效、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率、寻租与腐败^{[11](P148-149)}问题。公共决策的失误和低效主要是受到决策主体自利性、决策信息不完全、决策者的“近视效应”和沉没成本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率则是因为政府内部缺乏竞争机制和公共产品的不可度量;传统的统治型政府就是依靠单一的政府治理机制,因此出现了严重的官僚制弊病,而单一的市场机制也存在着市场失灵问题,即市场机制解决不了社会公平问题,不能主动地完成产业布局的调整,以及存在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那么市场机制与政府治理相结合就能趋利避害,发挥二者所长了吗?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将这两种机制进行了结合,提倡引入企业家精神改造政府,但是其对效率的偏执导致公平原则的缺失,其将公民等同于顾客实际也是矮化了民主的内容,因此市场与政府的结合还不能有效解决公共管理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作为对政府和市场两种机制的补充,社会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学界开始提倡政府向社会放权,利用社会组织和公民自治的力量来解决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这三种治理机制各有其优缺点,只有三者的紧密联系和协调配合才能更好地适应中国场景下的公共管理实践。

(三)以人民为中心:复合治理的终极价值诉求

复合治理相比于其他治理理论一个突出的特色便是其对公民个体的关注,复合治理发现导致出现治理失败和治理空转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公民结社精神的缺乏和公民政治参与感的低下,制度设计得再精良再完备、理论再完善和天衣无缝都需要具体的人来执行,公共政策需要落地到每一位公民头上,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而公共政策的起点和落脚点是人民。由此可见,治理的起点和对象是人民,治理的终点和目标也是使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在这个基础上对于治理方式的选择和政府内部结构的调整才是有效和有益的,脱离了人民这个考量标准,一切都是空洞的。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必须顾及到人民的利益和情感。复合治理强调公民个体在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希冀通过发挥社会组织的吸纳力,使得更多的公民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来,而且通过公民政治素养的提升、公共精神的培育和公共管理学科的本土化、平民化让公民上手更多政治参与技能,从掌握政治相关知识的观念上的“政治人”转变为具备一定政治技能和参政能力的现实的“政治人”,使得公民积极向社会组织靠拢,学会用合法手段使自己的利益诉求得到满足,这也是一种“民主再生产”,即在合法有序的前提下民主内容和范围的扩大,并且避免个人矛盾上升为群体事件和公共危机的情况出现。政府也要学会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借助社会组织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来完成政府的既定政策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密切合作、协调配合,共同致力于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从根本上加以预防,标本兼治地解决各种潜在的或已经产生的公共管理问题。

四、结语

复合治理不仅是治理理论与中国情境相适应的产物,它还是对传统治理模式的反思与突破。时代在变化,理论需要与时俱进,也需要结合具体国情,否则就是自缚象牙塔,在纯粹理论的环境
(下转第141页)

农村政治精英的形成机制： 政治忠诚、市场能力与社会资本*

庄玉乙 胡 蓉

(1.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2.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杨浦 200433)

[摘 要] 什么人会成为农村的政治精英? 沿循政治精英形成的三维路径, 本文分析了政治忠诚、市场能力和社会资本与农村政治精英形成之间的逻辑关系, 并利用对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地1047位村民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发现, 政治忠诚方面, 党员身份和较高的政府信任度有助于个人成为农村政治精英。市场能力方面, 良好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所赋予的劳动潜能、家庭经济情况对成为村干部有显著性影响。社会资本方面, 父辈不同职业类型对子女能否成为村干部影响显著, 亲朋等社交资本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结果表明, 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社会精英可以有效地转变成或被吸纳成政治精英, 标志着中国农村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政治生态体系。

[关键词] 农村政治精英 政治忠诚 市场能力 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 D6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20)03-0088-13

一、问题提出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从集体经济到家庭联产承包责

收稿日期: 2020—03—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编号17CZZ020)

作者简介: 庄玉乙,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 政治与行政学博士。研究方向: 地方治理、政府间关系、环保政策。胡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任制,从人民公社到村民自治,农村的社会结构和治理体系经历了数次重组过程,乡村社会的成员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发展有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建设与治理能力的提高。作为村庄治理的领导者,村干部是国家与村民互动关系中的主要联结点,他们在农村公共权力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村干部由谁出任?其标准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事关农村的经济发展、农民的自我管理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现有对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中,有一些已经探讨了乡镇如何选拔和推荐村干部,以及乡镇、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在推举村干部过程中的角色互动^[1-2]。但这些研究多数将现有的村干部视作研究中给定的参与者,而对成为村干部需要什么条件、谁会成为村干部这些问题上,花费笔墨甚少。个别研究虽有所涉及,却主要局限在对一些地方个案进行深入观察^[3]。为了从更普遍意义上研究村干部的个人特征和成长历程,我们在2014年7月与2015年1月,对5个省份(湖南、湖北、江苏、浙江、江西)113个行政村的1047位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以期回答:一、什么样的人会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相比于普通村民,村干部团体更具备什么特质?二、对于不同层级的村干部(如村支书、村主任和一般村干部),他们的特质有何不同要求,各自侧重点分别是什么?

二、文献综述:农村政治精英及其形成机制

对地方精英的探讨一直是中国乡村研究关注的重点。学界对中国古代时期农村政治精英的相关研究存有三种观点:皇权政治、乡绅政治和宗族政治。大多数史学家们认为中国传统农村处在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官僚体系和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4]。而以黄宗智为代表的乡绅政治论则认为,中国传统农村存在于国家、士绅和村庄的三角结构中,各村庄由士绅形成的乡村领袖管理,乡绅、族长、村长之类的人物是真正的操纵者^[5]。以韦伯为代表的宗族政治论则认为,中国的农村是一个没有朝廷官员的自治居民点,传统的农村社区主要在宗族统治控制下,国家只不过是个放大的宗族组织^{[6](P84-91, 118-125)}。这些理论虽然观点不同,但在关注农村政治如何在国家体系内运作时,均着眼于农村政治精英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上,足见农村政治精英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

讨论政治精英的形成与流动,不仅是政治社会学和阶层流动研究的重要话题,更有助于回答在基层如何实现政治稳定和有效治理。当代学者对中国政治精英的形成与流动的研究中,较早期的有“技术官僚论(Technocracy)”和“二元精英论(Elite Dualism)”两种解释。“技术官僚论”主张将自然科学原理运用到社会管理上来,提倡从工程师、财经专家、经理人等相关职业者选拔政府官员^[7]。“二元精英论”相比“技术官僚论”,不仅强调个人技术能力,还强调政治忠诚(political loyalty)对中国政治精英形成的重要性。具体而言,此论者认为,精英形成有两条区分明显的路径。第一条,对进入具有高声望、一定特权和明显物质优势管理岗位的精英,不仅要求教育等个人能力,而且要求政治忠诚;第二条路径,对于进入高声望却只有细微特权、更少物质优势的专业岗位,则只强调个人能力,而不强调政治忠诚^[8]。学者如魏昂德^[9]、边燕杰^[10]、臧小伟^[11-12]等都从不同侧面证明了在分析中国政治精英的选拔过程中,“二元精英论”比“技术官僚论”更具解释力。

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中国的乡村体制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村民自治制度开始推行并逐渐成为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基础。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村基层自治制度的运行,中国农村的政治精英吸纳也相应发生了一些变化^[13]。一些学者认为,在新时期发展下,中国

共产党在农村选拔基层政治精英也逐渐趋向功利和实用主义,即强调被选拔的基层政治精英的办事能力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能力,而不再特别强调基层政治精英在意识形态的忠诚^[14-15]。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二元精英论”仍具备生命力。例如,陈志柔发现那些具有党员身份、接受良好教育并出身于大家族的村民更容易成为村干部;而当选择成为企业家职业时,政治、社会和宗族资本则让位于个人的专业水准^[16]。此外,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新生阶层和群体,其迅速崛起并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导致了村民自治的形变,形成了一种私营企业主主政的独特村庄治理模式^[3]。

除上述个人能力与政治忠诚外,社会资本的影响不容忽视。费孝通^[17]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着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可能通过标签各种亲友关系,如亲戚、同宗、同学、上级、老同事、熟人等,拉近与他人的距离,以形成利益共同体、获得社会认同或者谋取利益。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对于获得社会地位有重要影响,它包含信息、影响力、社会身份和力量增援等^[18]。这种差序格局的非正式关系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张力持续存于中国古代并延续至今^[19],在多元权力结构下,一些村庄形成了“宗教力量、宗族权威和村委会”三种力量相互影响的农村基本政治格局^[14, 20]。

通过梳理上述不同时期的乡村社会政治结构和治理方式,可以归纳出相关研究对村庄治理者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对政党是否忠诚、个人的素质与能力(包括受教育的年限、专业素养的培养、人生经历)以及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关于政治精英的这些研究在理论层面已经相当丰富,但也存在一些缺憾,有待进一步推进:一是原本铁板一块的“农民阶层”已经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性质,新兴的农村阶层出现并形成了新的分层方式^[16, 21]。但对这些变化的研究,在数量上还不足,远少于对城市变迁的研究。二是虽然相关研究已对农村中的精英分层有所关注,但对政治精英具体如何产生以及具备何种特征还关注甚少。例如倪志伟提出市场改革让社会分层秩序依赖于个人能力而非等级或政治权威,但他们未多关注改革后的政治精英如何产生^[21-22]。只有陈志柔利用数据对农村精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其更多的是将村干部与企业家做横向对比,对于精英的纵向成长历程以及精英间的转化机制还缺乏相应探讨^[23]。三是现有不少研究只搭建了概念框架和进行个案研究,但利用调查数据方式对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探究的还不足。

有鉴于此,本文将采取综合的视角对农村居民展开大样本问卷调查,以期获得更为丰富的认识。具体而言,本文在研究取向上综合了解释政治精英形成的三个重要模式:政治忠诚、市场能力和社会资本。数据方面,作者在2014年7月与2015年1月,对五个省市(湖南、湖北、江苏、浙江、江西)113个行政村的1047位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通过统计结果来呈现本文的结论。

三、研究设计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讨论及对农村现状的调研了解,我们在既有二元政治精英路径模式即政治忠诚和市场能力基础上,增加社会资本的相关因素,形成三元模式,以此揭示在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中,受到政治青睐的成员身具备何种素养及特点。

(一) 研究假设

政治忠诚如何影响职业升迁的机会?通常而言,党员身份是反映政治忠诚度的一个明确指标。在早期的研究中,学者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党员在职位升迁和资源分配

中享有优势,党员身份是分层秩序的重要影响因素。执政党强调政治忠诚原则,发展政治精英优先考虑具备党员身份的候选人^[8, 24]。泽林尼和康拉德^[25]吸收了以往的洞见,提出了二元路径模型论断:“专业技术岗位更多地强调教育和知识水平,而管理岗位则更多地强调政治忠诚。”魏昂德在泽林尼和康拉德的基础上,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得出党员比非党员成为干部的可能性要高^[8]。政治忠诚的另外一个指标是政府信任程度。那些有着更高政府信任水平的公众,往往更认同政府作为,也更有可能是主动参与公共事务,成为地方政治精英。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 相比非中共党员,中共党员更有可能成为农村政治精英。

假设1b: 政府信任度越高,越有可能成为农村政治精英。

拥有良好的市场能力可以促进个人向上进行社会流动^[26]。市场能力是指个人特征在市场上可能成为交换物的程度,它是由竞争者所提供的资产或服务决定的^[27]。吉登斯认为市场能力是以个人所持有的财产、获得的教育、技术和劳动力为基础的资本,是个人在市场讨价还价交涉中的竞争力。他认为市场能力有3种类型: 1.拥有生产资料; 2.拥有教育与技术文凭 3.拥有体力。在中国具体的环境下,个人市场能力被认为是“人们在市场竞争中将自己所控制的资产产权,包括经济资本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付诸实际交易的能力。”^[28]从学者们的讨论可见,市场能力强调的是个人以获得的教育、劳动技术和持有的财产为基础的获取资源的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学历是个人获取资源的一个重要凭证^[29-30]。职业经历是职工的“知识能力”与“劳动经验”的累积^[31]。经济收入是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的回报体现,亦可成为未来投资的基础。因此,研究市场能力的重要性,可以通过研究村干部在任职之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经历和年收入水平进行。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 受教育程度越高,村民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2b: 不同的职业经历对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偏好不同。

假设2c: 家庭年收入越高,村民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可能性越大。

格兰诺维特借鉴嵌入性理论,对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重新定义,即“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社会结构和网络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32]在中国的农村,社会资本集中表现在“熟人社会”和人际关系中的“差序格局”里^[17]。“差序格局”通过区别远近不同的血缘和亲友关系,可以形成共同规范、结成利益共同体或获得社会认同。边燕杰等提出“关系网”观点,认为中国社会中的“强关系”对于职业生涯的发展机会有巨大推动作用,拥有庞大的血缘关系网络或大宗族姓氏有利于个人建立互信网络,增强彼此认同感,树立政治权威^[10, 33-34]。实际生活中,农村居民中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包含有父母、亲戚和朋友。作为子女直接教育者的长辈,父母是子女最直接的社会资本^[17]。此外,亲属和朋友也构成了农村社会成员日常的人际交往网络。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 父亲担任过村或乡镇干部的村民,更有可能成为农村政治精英。

假设3b: 有亲戚就职于乡镇及以上政府机关的村民,更有可能成为农村政治精英。

假设3c: 朋友数量越多者,越有可能成为农村政治精英。

(二) 变量测量

因变量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农村政治精英界定为拥有正式政治权力并执行国家政策任务的村干部。具体来说,我们以现在“是否担任村干部”和“担任何种层级的村干部”作为两个核心因变量进行测量。其中,因变量一“是否担任村干部”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因变量二“担任何种层级的村干部”是一个多类别变量,分为村民、村支书、村主任和其他村干部(如村会计、妇联主任等)。

自变量自变量分为政治忠诚、市场能力、社会资本三个类别。政治忠诚的操作化,一是个人是否拥有党员身份,二是个人的政府信任程度。在考察村干部是否拥有党员身份上,为了更真实准确呈现二者关系,本文以村干部任职之前的政治面貌为准判定其是否为中共党员^①。为测量个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询问了村民对中央、省、地级市、县区、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六个层级的信任程度,采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将“非常不信任”赋值为1,“比较不信任”赋值为2,“一般”为3,“比较信任”为4,“非常信任”为5。由于许多村民将村委会视作类似于中央到地方的一级政府,因此将村民对中央一直到村委会六个政治信任程度相加,获得一个总的政府信任程度,其取值范围为6-30。

市场能力操作化为受教育年限、任村干部之前的工作经历和家庭年收入三个指标。本文将受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或同等教育、大专教育、本科教育、硕士或以上转化为相应的受教育年数,依次是6年、9年、12年、15年、16年及18年。职业方面,分为务农、村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打工者等类型。家庭总收入测量的是一个家庭的经济收入状况。

社会资本从父亲的职业、在政府机关是否有亲戚、要好朋友的数量三个指标进行测量。除了这些核心自变量外,本文还设定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1为男性,0为女性)和婚姻状况(1为在婚,0为非在婚)等。

(三) 模型设计

因变量一“是否担任村干部”是二分类变量,为分析其决定因素,我们采用了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该模型的表达式为:

$$\text{Logit}(P) = \log\left(\frac{P}{1-P}\right) = \beta_0 + \sum_{k=1}^k \beta_k X_k + \varepsilon_i \quad (1)$$

式(1)中,P表示“担任村干部”发生的概率; X_k 表示第k个解释变量, β_k 表示第k个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因变量二“担任不同层级的村干部”是一个多项类别变量(具体分为村支书、村主任、其他村干部和不担任村干部等四个类别),为具体考察村民担任不同层级的村干部的决定因素,我们采用了多分类逻辑斯蒂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其表达式为:

$$\text{ML}_j = \log\left(\frac{P(y=j)}{P(y=1)}\right) = \sum_{k=0}^k \beta_{jk} X_{ik} + \varepsilon_i, \quad j = 2, \wedge, J \quad (2)$$

式(2)中,J表示因变量的类别个数, $P(y=j)$ 表示村民担任第j类村干部的概率, $p(y=1)$ 表示其不担任村干部的概率,i表示第i个村民, X_{ik} 表示第i个村民在第k个解释变量上的取值, β_{jk} 表示第k个解释变量对因变量(即村民担任第j类村干部的概率与不担任村干部的概率之比的对数)的影响。

(四) 资料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2014年7月-8月和2015年1月-2月湖南、湖北和江苏、浙江、江西五省的问卷调查及访谈。调查对象为当地农村居民,包括普通村民和村干部。我们通过分层方式选择了

^①为方便研究政治面貌与政治精英形成的因果关系,我们规定如果村干部入党的时间晚于担任村干部的时间,我们将其视为普通群众;反之,如果村干部入党的时间早于担任村干部的时间,则将其视为中共党员。

14个地级市,再依据各乡镇离县城的路程和经济发展水平,挑选不同的乡镇进行实地调研,进行上门访问和发放问卷,在113个村庄共发放并收集有效样本量1047份,其中填写问卷的村干部为169个。样本分布情况详见表1。

表1 有效样本分布情况

变量	频数	百分比(%)	变量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受教育程度		
男	609	58.30%	小学	170	16.30%
女	436	41.70%	初中	385	36.90%
合计	1045	100%	高中或同等	336	32.20%
年龄			大专及以上学历	153	14.60%
18-25	91	8.81%	合计	1044	100.00%
26-35	206	19.94%	父亲的职业		
36-45	264	25.56%	务农	717	70.80%
46-55	266	25.75%	村干部	51	5.00%
55岁以上	206	19.94%	乡镇及以上机关	29	2.90%
合计	1033	100%	专业技术人员	56	5.50%
政治面貌			企业管理人员	11	1.10%
中共党员	215	20.70%	个体工商户	61	6.00%
非中共党员	822	79.30%	私营企业主	19	1.90%
合计	1037	100%	其他	68	6.70%
婚姻状况			合计	1012	100%
在婚	868	83.10%	是否担任村干部		
不在婚	177	16.90%	没有担任	874	83.80%
合计	1045	100%	担任村支书	46	4.40%
您在乡镇及以上党政机关是否有亲戚			担任村主任	49	4.70%
有	133	13.10%	担任其他村干部	74	7.10%
没有	886	86.90%	合计	1043	100%
合计	1019	100%	家庭年收入(万)		
朋友数量			<1	64	6.40%
<10	598	62.60%	1-10	752	75.10%
10-20	197	20.60%	10-20	142	14.20%
21-30	74	7.70%	20-30	24	2.40%
31-40	20	2.10%	>30	19	1.90%
41-50	20	2.10%	合计	1001	100%
50-60	11	1.10%	政府信任度		
60以上	36	3.80%	6-11	19	1.8%
合计	956	100%	12-17	142	13.7%
			18-23	464	44.7%
			24-30	413	39.8%
			合计	1038	100%

从调查者年龄分布来看,年轻劳动力所占比例较低,反映出当下农村年轻人外出生活比例较高。从政治面貌来看,非中共党员有822人,占79.3%,中共党员有215人,占20.7%。在教育方面,村

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仅有14.6%的人受教育水平在大专或本科以上。受访者的社会资本方面,只有13.1%的人在乡镇级以上党政机关有亲戚,说明拥有干部亲戚资源的人还是少数群体。从父亲的职业来看,有5%的人父亲现在或者曾经担任过村干部。在家庭年总收入数据中,6.4%的人家庭年收入在1万以下,75.1%的人在1万-10万之间,16.6%的人家庭年收入在10万-30万之间,1.9%的人家庭年收入在30万以上,从具体统计数据来看,一方面,现在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另一方面,在地区之间、地区内部的农民个体之间贫富差距依旧较大。

四、统计结果及讨论

表2报告的是以“是否为村干部”为因变量的二分类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结果,表3报告的是以“具体为村支书、村主任还是其他村干部”为因变量的多类别逻辑回归模型结果。为更好地讨论政治忠诚、市场能力和社会资本三者与农村政治精英形成的关系,我们依次加入不同变量,形成表2中四个模型。控制变量方面,随着年龄的相对增加,其成为村干部的几率也越大。相对于不在婚的人士,在婚人士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概率更高。事实上,年龄大小与婚否之间存在一定逻辑联系。一般而言,已婚人士较于未婚人士平均年龄更大;另一方面,在中国现有的官僚体制下,仕途发展与干部的生活作风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婚与否也是生活作风评判的重要指标。表2模型2、3、4表明,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容易进入村政,表3表明,女性在成为一般村干部(如妇联主任等)更具优势,但是在村支书和村主任这种“一把手”的职位竞争上,女性明显处于弱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政治结构的性别特征。

表2 农村政治精英形成的二分类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男性 ^a	.054 (.179)	-.480** (.222)	-.722*** (.247)	-.656** (.264)
年龄	.023*** (.007)	.014* (.008)	.058*** (.013)	.027* (.015)
在婚 ^b	1.074*** (.328)	1.274*** (.367)	1.176*** (.441)	.967** (.486)
政治忠诚				
中共党员 ^c		2.551*** (.227)	2.483*** (.273)	2.780*** (.321)
政府信任度		.161*** (.024)	.174*** (.027)	.184*** (.029)
市场能力				
受教育年限			.188*** (.055)	.163*** (.060)
职业 ^d : 乡镇及以上职员			-21.436 (10296.309)	-22.694 (10107.336)
职业: 企业管理人员			1.107* (.605)	1.146* (.649)

续表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职业: 专业技术人员			-.602 (.439)	-1.132** (.510)
职业: 个体/私营主			.059 (.329)	-.420 (.369)
职业: 当地打工者			.132 (.383)	-.144 (.412)
职业: 外地打工者			-.255 (.485)	-.624 (.520)
职业: 其他			-3.022*** (.726)	-3.318*** (.743)
家庭年收入 (取对数)			.284** (.131)	.259* (.146)
社会资本				
父亲职业e: 村/乡镇干部				.747** (.374)
父亲职业: 技术管理人员				-.227 (.545)
父亲职业: 个体/私营主				-2.187*** (.691)
父亲的职业: 其他人员				-.503 (.611)
干部亲戚f				.251 (.337)
朋友数量				.011** (.004)
常数项	-3.694*** (.444)	-7.555*** (.726)	-14.560*** (1.899)	-12.592*** (2.042)
观察值(N)	1029	1017	969	867
-2Loglikelihood	876.120	634.045	532.653	460.234
Pseudo R ²	.049	.384	.483	.513

注: 表中报告的是系数, 括号内报告的是标准误。1. a.以女性为参照, b.以不在婚为参照, c.以非中共党员为参照, d.以务农人员为参照, e.以无干部亲戚为参照; 2. * p<0.1, **p<0.05, *** p<0.01。

表3 农村政治精英形成的多类别逻辑回归模型

变量	(5) 担任村支书/ 非村干部	(6) 担任村主任/ 非村干部	(7) 担任其他村干部/ 非村干部
男性a	.648 (.570)	.184 (.444)	-1.585*** (.349)
年龄	.038 (.028)	.044* (.024)	.013 (.018)
在婚b	1.342 (1.179)	1.544 (1.075)	.758 (.547)
政治忠诚			

续表

变量	(5) 担任村支书/ 非村干部	(6) 担任村主任/ 非村干部	(7) 担任其他村干部/ 非村干部
中共党员c	3.292*** (.494)	2.427*** (.443)	2.711*** (.413)
政府信任度	.174*** (.049)	.233*** (.046)	.169*** (.036)
市场能力			
教育年限	.196** (.102)	.136 (.092)	.183** (.080)
职业d: 乡镇及以上职员	-22.187 (9300.554)	-21.038 (.000)	-21.827 (.000)
职业d: 企业管理人员	.382 (1.044)	1.493* (.914)	1.276* (.766)
职业d: 专业技术人员	-1.413* (.802)	-1.013 (.857)	-1.069* (.603)
职业d: 个体/私营主	-.607 (.621)	.412 (.556)	-1.019** (.508)
职业d: 当地打工者	-.623 (.863)	.666 (.620)	-.429 (.524)
职业d: 外地打工者	-1.574 (1.187)	.134 (.770)	-.653 (.641)
职业d: 其他	-3.826*** (1.288)	-20.263 (5574.431)	-2.700*** (.841)
家庭年收入(取对数)	.714*** (.249)	.219 (.226)	.083 (.202)
社会资本			
父亲职业e: 村/乡镇干部	.677 (.628)	.798 (.559)	.872* (.470)
父亲职业: 技术/管理人员	-17.960 (5451.244)	-.189 (.843)	.201 (.654)
父亲职业: 个体工商户/ 私营企业主	-2.881** (1.245)	-1.513* (.969)	-2.254** (.947)
父亲职业: 其他人员	-.537 (.975)	-.403 (.925)	-.563 (.737)
干部亲戚f	.913* (.505)	-.346 (.610)	-.028 (.460)
朋友数量	.018** (.007)	.015** (.006)	-.002 (.008)
常数项	-21.400*** (3.925)	-16.633*** (3.420)	-9.675*** (2.700)
观察值(N)		868	
-2 Log likelihood		691.852	
Pseudo R2		0.506	

注: 表中报告的是系数, 括号内报告的是标准误。1. a.以女性为参照, b.以不在婚为参照, c.以非中共党员为参照, d.以务农人员为参照, e.以务农为参照, f.以无干部亲戚为参照; 2. * p<0.1, **p<0.05, *** p<0.01。

(一) 政治忠诚与农村政治精英的形成

表2中的模型2考察了政治忠诚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的村民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发生比(odds ratio)是普通村民的12.8倍($e^{2.551}=12.821$)。在选拔政治精英的过程中,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村民确实更容易获得青睐。政府信任度方面,其对因变量影响显著为正,表明对政府有更高信任度的村民,其成为村干部的几率也更大。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较高者,本身更愿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在受到上级赏识和经过忠诚标准考察之后,政党对这种“忠诚”进行反馈,吸纳这些怀有忠诚信仰的积极分子到相应岗位上^[35]。并且,这些村民在成为村干部后,可能因为日常的工作原因产生更强的政治效能感,反过来也会推高他们的政府信任度。在此基础上,我们深入探究政治忠诚对于成为不同层级的农村政治精英的影响(见表3),结果表明政治面貌对村支书、村主任和一般村干部效果均呈显著影响但是存在一定差异。同等条件下,相对非中共党员,中共党员担任村支书的发生比是26.9倍($e^{3.292}$);担任村主任的发生比是11.33倍($e^{2.427}$),担任一般村干部的发生比是15.04倍($e^{2.711}$)。当选村支书对政治忠诚度要求最高,要成为一名村支书,党员的政治身份是项基本条件,其必须时刻保持党政思想方面的正确性和前瞻性。比较而言,村主任和一般村干部的政治面貌要求并没有这样严苛,村主任为党员的发生比倍数甚至竟低于一般村干部为党员的倍数。这似乎不符合一般逻辑,然而在时下经济发展为首要导向的农村中,这并不难理解。村主任通常由上级和地方上联合进行提名工作,再经民众投票产生。许多致富能手由于个人能力突出,被组织上和村民寄予带动大家一起致富的厚望,因而被提名,而这些致富能手许多过去是个体经营者、商人和企业家,许多人在当选村主任前尚未入党。

(二) 市场能力与农村政治精英的形成

表2中的模型3显示,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将提高一个普通村民成为村干部的可能性,表明学历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为受教育更多者获取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提供了便利。表3模型5和7显示,受教育年限对成为村支书、一般村干部均呈显著性影响,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个标准单位,成为村支书的发生比将提高21.7%($e^{0.196-1}$),成为一般村干部的发生比将提高20.1%($e^{0.183-1}$)。

考虑到村民担任村干部之前可从事其他行业的现实情况,本文结合村干部任职之前的工作经历以及非村干部人员的工作情况来反映其潜在的市场技能。表2模型4表明,相对于普通务农人员,乡镇及以上的政府职员几乎不可能成为村干部,因为村干部通常由村里村民产生而非从乡镇调职。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管理人员成为村干部的发生比是务农人员的3.15倍($e^{1.146}$)。与此对比,专业技术人员成为村干部的发生比要比务农人员低68%($e^{-1.132-1}=-0.68$)。个体/私营主相较于务农人员,其与成为村干部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但未呈现显著性。细分到表3中不同级别的村干部,医生、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在成为村支书和一般类型村干部的胜算比相较于高务农人员更低,表明专业技术类别工作者更少转换职业类型。与此同时,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这类经济精英分子相较于专业技术人员而言,更易融入村主任类的政治精英流。而在成为村支书方面,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的作用发挥得不明显。由此表明,对于由村民选举出来的村主任一职,更加强调的是其为村庄创造财富带领村民奔小康的实干能力,受教育的年限及党政思想引领的作用退居其次。

收入方面,在表2模型4中,家庭年总收入对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家庭收入每增加一个标准单位,成为村干部的发生比将提高29.6%($e^{0.259-1}$)。细分村支书、村主任和一般村干部,表3表明家庭年总收入对于成为村支书的作用十分显著,村主任和一般村干部则不然。

表4 村干部任职前后的职业变化

职业	任村干部之前所从事职业	任村干部之后兼职职业
务农	53 (32.7%)	83 (50.9%)
乡镇及以上党政公职人员	1 (0.6%)	/
企业管理人员	11 (6.8%)	4 (2.5%)
专业技术人员(医生、教师)	20 (12.3%)	10 (6.1%)
个体工商户	26 (16.0%)	32 (19.6%)
私营企业主	13 (8.0%)	18 (11.1%)
在本地打工	18 (11.1%)	5 (3.1%)
在外地打工	11 (6.8%)	/
企业入股	/	11 (6.7%)
其他	9 (5.6%)	/
有效样本总量	162 (100%)	163 (100%)

担任村干部是否反过来为增加家庭收入提供了更多机会呢?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还询问了村干部在担任村干部之前从事的职业以及担任之后兼职的职业。对比担任村干部前后的职位变化表(见表4),许多原本从事企业管理、专业技术和打工的,放弃了之前的全职工作,更加专注地投入到村干部事业中。在开始担任村干部后,业余时间从事农业的有所增加,从事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的人数多了11个人,此外,还有11人担任村干部后,进行了“企业入股”。可以推测,政治精英利用职权带来的声誉、信息和便利等,确实可以为获取经济收益提供更多机会。

(三) 社会资本与农村政治精英的形成

表2模型4中,当父亲的职业为村/乡镇干部时,其子女成为村干部的胜算比是务农人员的子女的2.11倍($e^{0.747}$)。此外,当父亲为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时,其子女成为村干部的发生比要比务农人员的子女成为村干部低88.8%($e^{-2.187-1}=-0.888$),两者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在表3进一步考察中,父亲的职业主要是对成为一般性干部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子女成为村支书、村主任的影响不显著。一方面,这反映了在农村地区,父亲职业生涯形成的关系网络发挥的作用被弱化,单从父亲任职村干部的角度并不能让子女获得更高级别的农村政治精英地位;另一方面,父亲对子女的职业规划影响力也在逐渐减弱,“子承父业”的模式不再常见。

此外,对于整个村干部团体来说,“在乡镇及以上党政机关是否有干部亲戚”对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但是具体细分至各类村干部时,研究发现在乡镇及以上党政机关有干部亲戚的村民相比于无干部亲戚的村民,其成为村支书的发生比更高,但该变量对成为村主任和一般村干部则无显著影响。与此同时,在对受访者朋友数量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朋友数量越多,其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可能性越高,由表2可知,朋友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其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发生比上升1.1%($e^{0.011-1}$)。在表3模型5和6中,对于村支书和村主任来说,广泛的人际交往网络对其具有显著性的正相关影响^[10, 36]。根据调研中所了解,可能同时存在着两种情况:成为村干部之前就拥有很多朋友和成为村干部之后新增加许多朋友,其中一些受访者表示朋友数量在任职村干部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结论

基于对湖南、湖北、江苏、浙江、江西等地1047位村民的问卷调查,本文探究了政治忠诚、市场能力和社会资本与农村政治精英形成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表明,党员身份、良好的教育背景、家庭经济情况、父母背景、朋友亲戚网络关系等对农村政治精英的形成有显著影响,且这些影响因素对于不同类别的农村政治精英的侧重点不同。政治忠诚方面,中共党员成为村干部的概率更高,对政府有更高信任度的人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概率更高。个人的市场能力方面,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年总收入越高,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概率也越高。职业类型中,有管理背景的企业人员是政治吸纳的青睐对象,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医生等)较少因担任政治精英而转换职业轨道。私营企业主等获得一定成就的经济精英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现象,较多发生在担任村主任的类别中。这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农村治理和农民的认识随着时代发展发生了变化,乡镇和村民们对农村经济发展与自身利益的一种期待与要求,推动了经济能人走上村政的前台。社会资本方面,父亲的职业背景对子女的职业选择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相较于村主任和一般村干部,村支书对是否有干部亲戚及朋友数量等人际网络交往的要求更高。从本文的发现来看,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社会精英可以有效地转变成或被吸纳成政治精英,这标志着中国农村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政治生态体系。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在收集样本量的过程中,多集中于在东、中部地区的南方农村省份,对北方省份的抽样少有涉及。问卷样本量的扩充和地区间样本平衡是未来研究需要改进的方向。此外,农村地区的阶层流动情况以及政治精英的生成机制等问题在区域之间具有差异性,随着时代推进也会有新现象的出现,这些都值得未来持续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欧阳静. 策略主义[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 [2] 吴毅. 小镇喧嚣: 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 [3] Yan, Xiaojun. “To Get Rich is Not Only Glorious: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New Entrepreneurial Party Secreta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2012, 210, 335–354.
- [4] 秦晖. 传统十论: 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 [5] 黄宗智. 略论华北近数百年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兼及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6(2): 1–8.
- [6] Weber, Max.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ns H. Gerth, London: The Free Press Publication, 1951.
- [7] Li, Cheng and Lynn White. “The Thi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Mobilizers to Managers”. *Asian Survey*, 1988, 28(4): 371–399.
- [8] Walder, Andrew.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5, 60(3): 309–328.
- [9] Walder, Andrew, Li, Bobai, & Treiman, Donald.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 to 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0, 65(2): 191–209.
- [10] Bian, Yanjie.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62(3): 366–385.
- [11] Zang, Xiaowei. “Educational Credentials, Elite Dualism, and Elite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2001, 44(2): 189–205.

- [12] Zang, Xiaowei. *Elite Dualism and Leadership Selection in Chin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13] 颜德如, 加芬芬. 农村权威: 演变、危机及重构[J], 学习与实践, 2016(8):97-105.
- [14] 杨善华. 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替换——一个分析框架[J], 社会学研究, 2000(3),101-108.
- [15] 卢福营. 经济能人治村: 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M], 学术月刊, 2011, 43(10): 23-29.
- [16] Chen, Chih-Jou Jay. "Elite Mobility in Post-reform Rural China". *Issues and Studies*, 2006, 42(2): 53-83.
- [17]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 [18] Lin, Na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9] Tsou, Tang. "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s in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1976, 65, 98-117.
- [20] 吕蕾莉, 刘书明. 西北民族地区村庄权力结构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能力研究[J], 政治学研究, 2017(3): 104-113.
- [21] Nee, Victor.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 54(5): 663-681.
- [22] Nee, Victor.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6, 101(4): 908-949.
- [23] Chen, Chih-Jou Jay. "Elite Mobility in Post-reform Rural China". *Issues and Studies*, 2006, 42(2): 53-83.
- [24] Walder, Andrew.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Mobility in Communist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1985, 1, 101-117.
- [25] Konrad, George and Ivan Szelenyi.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
- [26] Giddens, Antony.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y*. London: Hutchinson. 1973.
- [27] We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28] 刘欣.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一种权力衍生论的解释[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4): 101-114.
- [29] 张海东, 姚焯琳. 市场化与市场能力: 中国中产阶层的生成机制——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6(6): 105-115.
- [30] Zang, Xiaowei. "Educational Credentials, Elite Dualism, and Elite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2001, 44(2): 189-205.
- [31] Goldstein, Avery. "Tren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PRC". *The China Quarterly*, 1994, 139, 714-730.
- [32] Granovetter, Mark.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 [33] 罗家德, 李智超. 乡村社区自组织治理的信任机制初探[J], 管理世界, 2012(10):83-106.
- [34] 刘金海, 宗族对乡村权威及其格局影响的实证研究[J], 东南学术, 2016(1), 80-87.
- [35] Moore, Barringt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1928-1944: A Study in Elite Formation and Fun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4, 9(3): 267-278.
- [36] Lin, Na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责任编辑 刘绚兮】

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何以可能、何以可为

付 钊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3)

[摘 要] 从社会管理迈向社会治理,是党和国家为适应新时期社会结构、人民生活方式及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而对社会建设做出的重要决策。制度性道德助人实践活动的社会工作以其价值性在推动服务型社会治理格局构建中独树一帜。明晰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天然优势和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推动社会工作有效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从健全社会工作制度保障、强化社会工作专业本性、培育专业社会治理力量、增强公益服务品牌意识和深化社区治理服务实践等方面入手来提升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推动社会工作有序有力有效参与社会治理。

[关键词] 社会工作 基层社会治理 社会组织 社会服务

[中图分类号] C91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20)03-0101-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进创新社会治理揭开新序幕,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从统筹全局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方向对推进创新社会治理作了全面论述,明晰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由社会管理迈向社会治理绝非字眼的转变,而是由国家自上而下粗放式管理向政府与诸多社会主体共同精细化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转变,是党和国家执政理念和思维的进步与更新。社会治理的本质是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难题,是缓和社会矛盾、构建社会资本、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主

收稿日期: 2020—02—18

作者简介: 付钊,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硕士,甘肃北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一线社工,研究方向: 社会工作、社会政策。

体参与、增进社会和谐因素的载体^[1]，是符合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迎合当前社会结构、人民生活方式及社会基本矛盾转变的必然结果。源自于应对转型期社会问题的制度性道德助人实践活动的社会工作以其丰富的价值基础、专业理念、专业技能和方法在推动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发挥重要功能。一方面为社会治理由理念向操作化转变提供实践依据，另一方面更好地嵌入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和专业化要求。由此而言，大力发展社会工作和研究提升社会工作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新时期社会变革视域下的社会治理

（一）从管理到治理：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社会管理强调以政府为主导，全方位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突出政府的权威性和责任性的统一。在社会建设的初期，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产生了巨大效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问题的产生繁衍与经济发展和信息进步紧密相关，为适应新时期社会结构、人民生活方式及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由国家自上而下粗放式社会管理向政府与诸多社会主体共同精细化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转变势在必得，社会建设理念也实现从公共行政走向社会管理进而迈向社会治理的升华^[2]。社会治理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治理模式，是西方治理理论的重要构成元素，是由一系列价值、政策、制度构成的社会管理其经济、政治的社会进程。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既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又强调处理好改善和保障民生与创新社会治理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创新社会治理，要以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广大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进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使人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并非单纯字眼的转变，而是深刻的治理方式、治理主体、治理理念的转变。首先，治理方式由“微观管控”向“宏观主导”的转变，即简政放权，将政府的管理职能下放基层，减少政府对地方微观事务的直接管控；其次，治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转变，即在党和政府统筹全局引导下，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居民等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局面；再次，治理理念由“行政化”向“法治化”转变，即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将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政府职权法定、公民懂法守法，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最后，由“事后整治”向“事前预防”的转变，即治标治本，着重治本，强化社会矛盾预防的机制建设，着重从源头处理^[3]。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格局的转变，既是社会建设理论成果的发展，又是党和国家治国理念的重大转变。

（二）从治理到服务：社会治理理念的创新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首要前提是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创新社会治理方式，要以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广大利益为出发点，最大限度提升社会和谐因素，推进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4]，必须处理好改善和保障民生与创新社会治理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具体而言：

首先，社会治理核心理念强调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社会治理本质是有关人的管理和服 务，关乎人民群众矛盾机制的化解和协调，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方方面面，应当确保贯彻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维护、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时刻将人民群

众的满意度视为创新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处理社会治理问题。

其次,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是共建共享。共建即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在医疗卫生、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众多社会服务领域内由政府协调统一主导,社会力量共同发挥治理作用;共享即共同享有社会治理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倡导的发展是促进人民福祉的发展,追求的富裕是所有人民的富裕,社会治理发展成功与否,最终判断标准应是人民是否享受到了社会治理的成果。因此,以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以强化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为基点,更好的回应人民群众的呼声和利益取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要求治理主体充分地参与,充分地协商,达到尽可能大的共识,进而采取相互配合的治理行动^[5],促使社会治理各项工作愿景与效益的统一。

再次,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是树立法治观念。奉法者强则国强,现代文明的标志是法治,解决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手段是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把手是法治,运用法治思维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始终坚持依法治国,要合情合理合法,以法治思维解决社会疑难杂症,逐步实现依法履职、依法决策、依法办事、遇事信法、办事寻法的法治社会治理格局。

最后,社会治理的着力点是提高“四化”水平。提高“四化”水平即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智能化、法治化和专业化,提高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风险问题能力,提高“四化”水平既是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又是创新社会治理途径的基本方式,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充分发掘和利用好智能信息技术,加强互联网管理能力、提高网络风险防御水平和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二、社会工作嵌入社会治理的何以可能

从社会管理迈向社会治理,是党和国家为适应新时期社会结构、人民生活方式及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而对社会建设做出的重要决策。具体而言,社会治理尤为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视增加人民群众福祉水平为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治理方式由行政管控向建立服务型社会转变,参与主体由一元政府主导向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转变,治理方式由政府自上而下单项管控向政府与公民双向互动协商的转变。治理范围在明晰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职责范围的基础上面向全社会^[6]。而源自于应对转型期社会问题的制度性道德助人实践活动的社会工作能否与以社会化为本质的社会治理有效融合?能否实现社会工作进行有序的社会治理?

(一) 活力四射的社会治理与大有可为的社会组织

为适应社会结构的变革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僵化、单一、强制的社会管理体制已逐渐不能进行有效社会治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议题应景而生。社会治理是在党和政府的全局引导下,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区和个人等社会主体的活力,通过协商、沟通等由上而下再由下向上的双向互动方式共同对社会公共事务依法进行管理的规范性活动的过程,其主要目标就是依据法律程序和法治思维调节社会矛盾问题和各方社会成员的社会关系,通过引导、动员多方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矛盾化解和社会问题治理。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保障社会资源的平均分配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全面提升社会应对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保障社会和谐平稳发展^{[7] (P258)}。

社会组织能够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深入贯彻推动社会有效机制协同,提升社会的自我治理

和自我管理能力水平。长期以来,受传统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管控的社会管理体制影响,社会组织 and 第三方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性、主体性和独立性被严重忽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首先要激活社会组织和社会主体的活力^[8],这一论断明确表明有序有效的社会治理需要依靠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社会组织顺应社会问题而生,伴随当前社会结构变化,社会问题交织繁多,人民物质文化需求多样,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发展机遇,而作为社会组织之一的社会工作机构只有顺应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需求,以其专业性在新时期社会治理中将大有可为。

(二) 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与社会治理的“社会化”

社会性可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联系性,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即为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即可理解为社会工作擅长于从社会中的人与人的交往和联系为纽带,并能够促进这种联系和交往的能力并达到增能效果。专业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理念中关乎敬业、尊重、接纳、自决、价值、能力等价值观都反映了其社会性,而正是社会工作的社会性而贯注于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联系的视角,并以此为专业目标和解决问题的手段,都是为了积极的促进人际交往,为了带来更好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联系,保障与人相关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和人的价值在社会层面的实现^[9]。

2017年9月“社会治理社会化”写入党章,社会治理社会化是指改变传统的行政化管控的社会管理模式,重视社会的重要性,突出强调引入社会力量,以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源为基础,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活力,共同参与社会事务治理的过程。社会治理社会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厘清部门职责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既突破了社会治理主体的范围,又超越了治理技术层面的简单逻辑^[10]。

社会治理强调政府和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协商和合作以及政府部门以外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积极性。社会工作以其综融多学科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的实务手法在化解社会矛盾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层面发挥重要作用。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为社会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社会工作为社会治理操作化提供了现实模式,二者有机融合,互为补充,更好实现社会公平、促进资源合理分配,进而化解社会矛盾、预防社会风险和维护社会稳定^[11]。

(三) 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势性分析

作为回应社会问题而出现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工作,以其综融的价值取向和专业的实务技巧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式。伴随社会问题的扩大和社会的进步发展,专业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也逐渐拓宽,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时又是其优势所致。具体而言,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优势可以概括为专业属性优势、人才力量优势和组织平台优势。

其一,专业属性优势。为解决社会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工作以社会个体需求为导向,坚持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的基本需求和主体地位,综融多学科知识,以科学的技术和方法帮助受助者满足需求、摆脱困境的助人活动和过程^{[12](P11-12)},是一种将社会工作者、案主、社会问题、社会资源、社会环境等具体因素链接起来进行合理配置并解决社会问题的复杂的社会过程,从而促进社会功能完善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实现个人和社会和谐一致。由此,其一,社会工作是创造性的链接资源、运用各种知识与方法去解决问题并发现和认识新的问题,通过提供专业服务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和发挥人的价值功能,从而帮助面临困难的和存在需求的人和社区解决复杂问题;其二,社会工作实务中遵循动态持续的过程模式,由接案—预估—策划—介入—评估—结案中形成持续发现问题—评估问题—解决问题—预防问题的发展

性、持续性的有效预防社会问题的治理模式；其三，社会工作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社会工作过程中参与互动的每个人都对问题的解决和专业的发展产生影响，作为社会行动者的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之间的互动并非机械的，而是在充分考虑现实情境的前提下采取合适的行动对社会问题做出能动的反应，两者双向持续的互动从而有效解决社会问题，而这个过程也是被人们赋予意义的行动建构起来的^{[13](P5-8)}。因此，社会工作以其专业性、独立性、公正性、预防性能弥补和完善社会管理领域的问题，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价值观和过程观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能力都有现实意义。

其二，人才力量优势。根据2018年民政事业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报告，截至2018年，我国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突破100万，广泛分布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社会组织等，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一方面社会工作者直接参与基层社会服务，遵循助人自助专业价值理念以专业的介入技巧和丰富的社会服务实践经验将社会治理理念贯穿到处理人的基本问题和协调基本社会矛盾中去，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提升服务对象的自我能力和有效规避社会风险的科学方法；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在以其丰富的知识背景和敏锐的观察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社会治理体制的弊端和不足，并通过对问题的评估和实施来为政府制定合理的社会治理政策法规提供建议。社会工作者在具体实务中以其专业素养对社会治理理念的理解、执行、改进都产生重要影响。

其三，组织平台优势。民政部《全国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中指出，到2020年国内城市和农村社区分别平均拥有不少于10个和5个社区社会组织。截至2018年底，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工组织已达9793家。社工组织是专业社会工作发挥作用的主要依托，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整合社会资源、满足公共需求、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平台。社会工作者通过组织平台有效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功能，通过承接政府项目参与社会公共服务，在推动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社会进步方面效果显著。社会工作者依托社会工作组织满足居民现实需求，解决社会问题，孵化社区社会组织，提高社区居民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四）专业社会工作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可行性分析

其一，专业要求的独立性与合理性。产生于西方的社会工作在其适应社会发展过程中符合社会价值观的要求并受到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西方社会工作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可以独立运行而超越国家体制和主流文化的影响。而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社会和政府的全力支持，受政府体制影响，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实现依赖于一定的政府命令和资源。在政府的引导下实现社会稳定和谐，保证基本需求满足。而在此所讲的独立性特指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技巧和手段的独立性。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是其独立性的基础，富有价值感的知识体系、服务理念、助人目标、专业技能等是社会工作独立性的重要体现。社会工作的专业手法和理念独立于社会治理的主客体之外，运用个案、小组、社区、社会政策等技巧在解决基层社会问题上的针对性、价值性、专业性更匹配社会治理的精细化要求。

其二，理念目标的契合性和一致性。以利他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工作作为一项处理人的基本问题的道德实践，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和以人为本的服务目标，充分考虑服务对象价值的独特和人格的平等，帮助有需要的人摆脱困苦，维持基本生活能力，在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基础上实现人的增能，进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社会治理以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为落脚点，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在平等互助、协商合作和共治共享中促进社会和谐

有序、良性互动的发展^[14]，其基本理念可概括为：以人为本、倡导公平正义、改善基本民生、增进社会和谐。由此而言，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理念和目标与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具有高度一致性。

其三，手段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社会科学的目的在于完整、客观、准确的把握人类社会思维及其本质，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社会工作拥有一套科学、系统的助人技巧方法，在助人实践过程中，一套科学体系的助人方法是社会工作实现专业目标的基础，否则社会工作者会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社会工作者通过系统职业化教育培训掌握一套特有的社会工作助人理念和方法。社会工作经过百年来的长期实践发展，逐步形成了以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为主的一整套科学合理的实务工作方法，实践表明这一套体系科学的社会工作助人方法在帮助服务对象审视和评估其问题和需要，评估服务对象和社会环境交互的状况，深层次勾勒服务对象的问题，并制定行之有效的行动策略。社会工作者在此过程中综融多学科知识运用社会工作通用实务模式深入实地去发现寄生问题并科学、灵活地选择针对性的服务方法和技巧，充分链接资源，引导社会支持，鼓励服务对象参与，共同解决服务对象问题，达到增能和预防的功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目标要求提高社会整体治理水平，社会治理方式的科学性是基础。社会工作以成熟的科学技术专业提高科学的社会治理方式提供了可能。科学的社会工作方法技巧是促进社会治理的有效方法之一。

综上所述，社会工作能有效地和社会治理目标、理念相融合，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社会化、专业化要求，因此，社会工作嵌入社会治理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五）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实践效益

近年来，“三社联动”试点工作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在多地政府的基层治理实践中得到推广。2004年发端于上海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实践的“三社联动”以其价值效益在其他省市逐步推广实践，“三社联动”是通过社区建设、组织培育、社会工作机制现代化建立的“三社”机制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协同推动的和谐局面^[15]。

笔者有幸参与了2018年甘肃省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三社联动”项目——兰州市沙井驿社区“三社联动”试点项目工作。沙井驿社区试点项目工作开展一年以来，各方面取得巨大收益。其中，在社区组织方面培育和扶持社区社会组织15支，发掘培育社区领袖20余人，在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中发挥显著作用；在志愿者管理和培训方面新纳入社区志愿者36人，吸纳高校志愿者50余名，组建当地小学“小小志愿者”队伍1支，通过定期培训、组织管理在社区建设、社会服务中缓解了社区服务人员不足的困境；在社区老年服务方面通过社区互助模式，鼓励引导社区居民照顾社区高龄老年人，开展特色社区娱乐文化活动，提升社区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建立社区互助组织，调动社区居民互助积极性；在司法社会工作拓展方面加强与当地司法部门的联络，进行社区居民普法宣传，开展社区矫正宣传和辅导等服务，推动了社区法制建设，完善了社区法制；在社区公益微创投项目方面通过公益宣传，引导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公益微创投项目，已有9支社区社会组织承担体育运动、兴趣爱好、娱乐休闲等公益服务项目，满足居民基本精神文化需求，丰富社区居民精神娱乐生活，激发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参与基层社区建设的活力，创新了社区治理实践理念和方式。除此之外，针对社区居民方面，开展青少年儿童活动23次，包括冬夏令营、环保意识提升、亲子交流、校园欺凌说“不”、绿植领养、五防课程、4点半课程、新生入学适应培训、社区小小志愿者培养等活动；针对妇女群体开展舞蹈大赛、丝化网手工制作、育儿保健讲座等活动10次；针对老年人群体开展老年长者生日会、老年人健康知识讲座等活动10次；针对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残疾人互助关怀小组等5次，针对社区普通居民开展七夕节爱的传承、传统文化知识竞赛、安全生

产竞赛、中秋送月饼互助小组、舞蹈歌唱比赛等活动11次等。通过党建引领,社工宣传、志愿者管理、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工职业能力培训构建了一套体系化的社会工作服务组织服务体系。在整个2018年中,社工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尝试运用平等、尊重、同理心、个别化、反移情、自决的专业技巧和方法累计开展活动50余次等,累计服务沙井驿街道居民500余人次。

甘肃北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2018年兰州市“三社联动”沙井驿试点工作中产生了诸多社会效益。第一、承担社区服务,激发了社区活力,并引导社区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通过与社区居委会及其他职能部门的合作深入发掘社区资源,评估社区和居民问题,解决和预防社区问题,有效缓解了社区职能部门的工作压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以公益微创投项目实现基层群准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引导了更多的居民参与到社区服务中去;第二、社区志愿者服务能力提升。通过吸纳高校和社区志愿者,进行志愿者能力培训,提高志愿者的知识技能水平,更好地在实践中缓解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压力,打造一支高效合理、技能完备、管理科学的社区志愿者队伍;第三、增强社会治理能力,转变公共服务方式。社会工作通过引领倡导,培育大批社区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活力,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机制建设、社会工作者介入机制建设,社区居民参与建设机制的微观治理机制,深刻的发现治理难题,并倡导源头治理;第四、发展了社会工作队伍,创新了社会治理模式。社会工作者通过整合和链接资源,构建资源共享平台,有效地促进社会政策资源、社会资源、社区资源的相互整合,创新了社会治理新机制,协助社区治理的有效发展^①。

社会工作的发展已有百年历史,自我国引入社会工作以来,其在满足弱势群体基本需求、处理社会风险问题、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发掘培养社区骨干领袖、推动社会稳定和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加整体社会和谐因素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已有一定的人才基础和理论基础,并积攒了一套成熟的社会服务经验,同时借鉴了国外社会工作在介入社会治理中的理念和模式,势必对我国的社会治理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社会工作嵌入社会治理的何以可为

(一)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角色定位

其一,资源链接者。社会系统中隐藏着诸多资源,涉及文化、政策、经济等诸多方面,社会问题的和谐整治依赖于一定的资源支持,社会工作者整合和链接资源对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风险、满足居民需要、赋权并实现增能都有重要影响。社会工作者为了实现助人目标,通常需要多部门向服务对象筹集有效资源,作为资源链接者,动员和整合社会环境中的有益资源可以更有效的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以促使案主问题的高效化解。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通过与多部门沟通协商为困难群体链接各方资源,保证提供有序的社会服务是社会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其二,政策倡导者。社会治理过程中,某些社会问题的产生与现行社会政策和制度的缺失和不完善有天然联系,因此,对现行制度和政策的改变和完善就十分必要。社会工作者在具体实务过程发现某些社会问题具有普遍性时,通过实地调研,分析社会环境状况和利益群体的需求,积极向政府提出政策制度建议以谋求现行社会政策的改变和改善,积极倡导政策现行,有效处理社会

^①本部分资料来源于《2018年甘肃省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三社联动”试点项目结项报告——兰州市安宁区沙井驿社区“三社联动”项目》,任文启、梁惠,甘肃北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2019年5月。

问题, 预防同类问题再生。

其三, 关系协调者。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处理社会问题, 而社会问题的产生与身处于社会中的人关系密切, 许多情况下, 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社会成员与其他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及社会组织之间未能有效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从而导致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失调, 引发一系列与人相关的矛盾冲突问题。社会工作者在化解社会矛盾过程中须深入剖析矛盾和冲突的根源, 合理选择工作方法、有序应对问题的过程中主动承担起协调相互关系和处理社会矛盾的任务, 逐渐缓和、解决社会矛盾, 建立和谐关系,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其四, 实践增能者。社会工作直接参与社会服务, 为社会弱势群体解决其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充分运用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和专业的实务技巧为社会有需求的群体提供专业人性化、柔性化的服务, 协助社会弱势群体正确明晰其处境, 合理评估其问题及需求, 通过优势视角链接社会优势资源, 协助弱势群体参与到自我能力提升的过程中, 从而满足弱势群体的需要, 推动问题有效解决和促进弱势群体增能。在此过程中充分肯定个体对于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并鼓励个体参与其中, 增加了个体解决自我问题的能力和选择最佳生活方式的机会, 从而达到预防功能和激发个体参与社会服务的热情。

其五, 善后预防者。解决社会问题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善后和预防。创新社会治理格局中突出强调解决社会问题要由“事后整治”向“事前预防”的转变, 即治标治本, 着重治本, 强化社会矛盾预防的机制建设, 着重从源头处理。社会工作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的优势不在于社会工作专业, 而在于它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工作在解决问题过程中, 充分考虑个体特征和现实需求, 所运用的理念和方法都是围绕解决和预防问题而展开, 在善后阶段社工处理各种遗留问题, 从人本主义视角出发, 链接优势资源, 协调人际关系, 实现个体赋权并增能, 做好善后工作并防止问题再生。

(二) 提升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现实路径

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是关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成功与否的影响因素, 因此在推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以深刻的本土治理经验为基础, 发掘本土实践经验, 避免陷入唯西方社会治理论、缺乏本土治理自信, 同时又不能陷入唯本土治理论, 过分夸大本土治理经验, 理性的反思和检视中西方治理经验, 在深刻分析本土社会发展现状和社会问题矛盾机制的基础上, 继承创新本土社会治理的先进理念和模式。社会工作作为新生的社会治理主体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过程中本土实践经验不足, 社会治理本土化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因此, 要以本土实践为本, 借鉴国外先进治理理念和治理经验, 以开放、包容、合作、协商、学习、借鉴的态度去坚持政府引导、遵循治理理念、发挥专业优势、协同社会参与、践行社会服务、匡扶社会正义、保障基本民生、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工作要积极回应社会治理目标现实要求, 通过政策支持、专业立基、平台依托和服务为本的方式探索出一套顺应社会治理理念目标的现实路径^[16]。

1. 政策导向: 落实国家治理政策机制, 健全社会工作制度保障 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理, 社会治理强调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管理与服务、法治与德治、维稳与维权、活力与秩序之间的基本关系, 正确处理五对关系建立制度性社会治理的前提则是建设和完善法律制度。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实现善治和法治是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最高境界, 而达到这一目标则需要依赖于政府的法律制度保障和社会工者等治理主体同政府协商决策的过程, 广泛实现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因此, 为更好地实现社会工作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提升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

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工作领域立法建设和完善是重点^{[17](P143)}。

其一,建立和完善社会工作法律法规。完善的法律法规是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首要保障。社会工作业务层面的立法涉及社会救助、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特殊人群权益保护、人民调解、基层居民自治等行业法律法规。在实现基本的社会工作业务层面的法律保障后,依据我国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要加快社会工作立法的速度和力度,尤其在社会组织,社会保障、特殊人群权益保障、社区矫正、社会救助等领域的立法取得新突破,以立法强制规范明晰政府、市场、社会工作之间的职责范围,并依法规范各参与主体的行为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严格公正执法;以立法形式维护社会工作者在社会服务中的基本权益,将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实践纳入法制轨道,确保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治理的专业性、积极性和合法性。

其二,制定相关保障社会工作在有关社会治理的政府决策过程中具备参与相关政策审议和决策的资格,确保社会工作组织的协商决策权。社会工作者在社会治理服务中,通过深度评估能够及时发现社区和居民面临的困境和需求,在具体实务中能够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和技巧将与社区和居民利益相关的问题和需求转化成切实可行的满足大多数社会成员需要的社会政策方针,并通过与政府协商沟通或者组织游行,倡导政府制定和完善更切合人民群众的社会政策法规。确保社会工作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审议和决策权,由社会工作组织传达基层群众的呼声和利益要求并通过决策提出政策制定和修改建议,实现引领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让决策更符合社会需要,让社会治理更加制度化与规范化。

其三,完善社会工作行业规范和行为准则。社会工作有效参与社会治理既要促进本土社会工作发展,又要强调规范管理和发挥作用,切实加强社会工作组织的党组织建设、健全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社会工作行业自律机制,从发扬社会工作行业效应文化、团结社会工作组织从业者、承担政府职能转移、依法执行社会政策等领域推进社会工作行业规范化;规范社会工作者的行为,从关系建立、社工介入、结案评估等过程明晰规定社会工作者的可为和不可为。

2. 专业立基: 强化社会工作专业本性, 发展社会治理专业力量 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是社会工作的灵魂,具体来说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分为专业伦理价值、专业哲学基础和专业理论体系。而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正是围绕社会工作目标而展开,即社工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综融多学科的专业价值知识理论方法,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直接方法和社会行政、社会政策等间接方法为弱势群体提供专业助人服务,解决其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以致社会更加公平正义、更加持续稳定。为有效发挥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的优势,强化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培育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是重点。第一,通过社会工作博硕本专教育改革,改变固有的纯理论经验教育方法,注重高级实务培养模式,在重视社会工作学生基础理念知识掌握的同时,将学生下放到社区,注重理论与实务的结合,增强社会工作学生的社会服务本性,提升社会工作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第二,增加社会工作者职业岗位,提升社工福利待遇。通过政府购买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团体扩充社会工作者岗位数量,完善社工人才培养、遴选、激励、评估机制,培育、选拔、吸收高素质的社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第三,重视行业交流,加强内部学习。加强社会工作行业之间的交流,传播学习先进的服务理念和方法,重视社会工作组织内部培训,强化社会工作者实务水平。

通过职业教育、专业选拔、督导培训等逐步培育社会工作高素质的专业队伍,社会工作组织不断培育和吸纳大量的高素质社会工作人才,不断树立品牌意识,积极推动社会工作专业理念、

方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运用,不断提升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显示度”,提升服务的供给能力和质量,获得社会的认同。

3. 平台依托:完善社工组织监察机制,增强公益服务品牌意识 当前社会工作组织数量发展庞大,但其内部规章制度建设较为滞后,配套管理的评估、监察、督导机制及相关细则少之又少,大量社会工作组织法人治理机制尚未建立,权力机构、组织机构、督导机构、决策机构、项目执行机构之间职责混乱,很难形成统一的项目制度化管理。组织内部管理混乱直接造成社会工作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资源使用率低、社会服务能力弱、资金账目不明等腐朽状况,造成社会公信力缺失,造成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减少了社区居民加入社会组织的积极性,降低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号召力。

提高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完善社会工作组织的内部治理能力是首要抓手。首先,建立和落实完善的社会工作行业规章制度机制,设立配套的社会工作组织机构内部规范机制和社会工作者督导评估机制,设立理事会制度、内部检查制度、组织成员代表大会制度、行业述职制度、激励及惩罚制度等。理事会和组织成员大会负责行使决策权、监督权、执行权负责职能人员分工、项目执行评估、组织成员晋升、财务账目管理等,定期举行大会对项目开展情况、经费使用情况、会员工作效果情况进行评估,内部检查制度通过对项目开展、组织管理、财务使用等情况进行内部监督,对存在问题的部门和个人进行奖励或惩罚,决策、执行、监督部门的负责人不能相互兼任,账务部门要实现独立等^[18]。其次,建立合理的外部监察机制,重点加强建设政府、居民、社会对社会工作组织的第三方监督机制平台,成立专门的第三方监察机制,规定社会工作组织定期通过宣传栏、报刊、网络、媒体进行基本信息公开,确保社会工作组织的机构管理、财务账目、项目执行、人员流动、人事安排、社会服务效益、社会服务对象的满意度等信息的透明公开。

通过建立完备的社会工作组织内部规范机制和外部监察机制,不断提升社会工作组织的行业规范和行为规范,逐步建设行业知名度和社会公信力,更有效的号召和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骨干领袖,加快建设公益服务品牌项目,更有效的执行社会治理服务项目,减少社会工作组织的负面影响,吸纳更多的专业人才和志愿者,更好地承担社区服务项目,激发社区活力,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基层社区治理。

4. 服务为本:深化社区治理服务实践,助力社会服务事业发展 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落脚点是社会实践服务,深化社会服务实践,立足本土情境,提供专业化、精细化、个性化、人性化的社会服务。

其一,直接参与:立足于本土化情境,提供专业人性化服务。社会工作者转变以往粗犷的社会服务提供方式,推动社会治理向人心治理、情感治理、关系治理、社区治理转变。首先是人心治理。个体心智的平衡性决定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反之,则会出现偏差或越轨行为。在社会服务实践中,社会工作者遵循平等、接纳的实务技巧,深刻剖析居民的现实所需,对症下药,促进个体心理健康发展,用一个生命影响另一个生命;其次是情感治理。个体的问题与社会排斥和特定标签密切相关,由此而来的自卑、压抑、失落是影响个体情绪的主要缘由,社会工作者要及时识别个体的不良情绪,及时介入引导正确其宣泄;再次是关系治理。社会问题的产生与个体社会交往失衡也有明显关系,社会交往能力的缺失导致个体在社会资源的获取上处于不利地位。社会工作介入则要强化生命的平等,重在维护和修复个体与个体、群体、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消除三者之间的偏见和隔阂;最后是社区治理。由共同价值观和生活生产方式形成命运共同体的社区是社会成员进行社

会互动的主要场所。现代社会发展的弊端导致这种命运共同体功能趋向弱化,社会工作者则要立足本土实践情境,多途径提供专业社会服务,重塑和发展社区的共同体意识,倡导建立整合式和参与式的社区发展模式,推动社区发展,促进社区居民的主体参与性地位。

其二,引导参与:落实三社联动机制,激活社会主体活力。三社联动旨在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和社会工作者之间高效联动。在政府引领下实现三社联动试点工作逐步推广的前提下要力求三社联动的工作理念和形态走向现实,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问题发掘、居民需要满足、社区问题解决、社区服务提供中的载体作用。首先,要不断创新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建立社会组织人才激励保障措施,大力扶植社会组织发展^[9];其次,要积极承担社区服务,激发社区活力,引导居民自我参与社区建设;再次,发展和培育高校社区志愿者队伍,加强社区志愿者的知识技能培训,更好地在实践中缓解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压力,打造一支高效合理、技能完备、管理科学的社区志愿者队伍;最后,社会组织要转变公共服务方式。通过引领倡导,培育大批社区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活力,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机制建设、社会工作者介入机制建设,社区居民参与建设机制的微观治理机制,深刻的发现治理难题,并倡导源头治理,以社会组织为载体实现“三社”有机融合,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加快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其三,协同参与:整合社会组织力量,构建协同治理模式。协同式治理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市场主体之间通过优势互补、协商合作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高效配置。近年来,政府购买作为重要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对加强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协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组织参与承接政府公共服务项目持续发展壮大,拓宽了社会公共服务提供新模式。它一方面提供了更符合社会需求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减轻了政府提供公共事务的压力。与此同时,单一的社会工作组织无法提供多元化治理的服务,社会工作组织更要与其他社会组织、企业、社会主体建立良好的协同关系,社会问题的解决依赖多样化多专业的社会组织、企业和社会主体协同发力^[8]。社会工作组织要积极构建社区网络化治理机制,广泛整合社会资源,鼓励协同其他社会组织和企业共同参与社区公益性社会服务,在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公共卫生、网络通信、文化娱乐、设施维修、慈善救助、法律援助、托儿养老、就业咨询等方面提供针对性特色服务。在面对公共事务时,社会工作组织要与其他社会组织和企业相互信任协作,满足社会需求,提供社会服务。

四、总结与反思

作为回应社会问题而发源的社会工作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为社会困难群体提供社会服务的同时,更重视激发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自我管理、自我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整合各方面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实现社会治理。社会工作在社会层面体现其治理意境,并能有效地对社会治理进行操作化演绎。依托社会工作组织提供社会服务的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有其天然优势,并且,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创新在内容维度、过程维度、增能维度三个方面具有天然契合性。社会工作有创新社会治理的优势,但具体可以占据多少份额仍需要时间考量,同时我们也理应明确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都要做到法律制度先行;其次是要形成各方联动合力,社会治理并非单纯依靠某一支力量或者行业单打独斗,而是充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最后要让合适的群体完成适合的工作,发挥各个群体的优势。只有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社会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建设和改善人民福祉。

参考文献

- [1]卫小将. 社会工作创新社会治理路径研究[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8(06): 81-85.
- [2]黄红. 专业社会工作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契合与互动[J]. 成人教育, 2015, 35(11): 83-85.
- [3]李卓琦. 加快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转变的思考[N]. 湖南日报, 2016-12-22(15).
- [4]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C]. 2013.11.12.
- [5]王思斌. 社会工作在构建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作用[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6(01): 43-47.
- [6]程萍. 社会治理为什么要社会化[OL]. 半月谈网 [2018-01-18]. <http://www.banyuetan.org/chcontent/sz/wzsz/szft/2018118/244116.shtml>.
- [7]Jeffrey Pfeffer and Gerald R. Salancik.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8.
- [8]宋宜钊. 专业社会工作与中国社会治理相结合的探讨[D]. 沈阳师范大学, 2014.
- [9]陈锋, 陈涛. 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探讨[J]. 社会工作, 2017(03): 3.
- [10]Greenwood, E., Attributes of A Profession, Social Work, 1957, 57(2), 45-55.
- [11]吴晓林.“社会治理社会化”论纲——超越技术逻辑的政治发展战略[J]. 行政论坛, 2018, 25(06): 38-45.
- [12]王思斌. 社会工作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13]王思斌. 社会工作导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 [14]纪德尚. 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问题研究[J]. 社会建设, 2015, 2(01), 60-67.
- [15]叶南客, 陈金诚. 我国“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与策略研究[J]. 南京社会科学, 2010(12): 81-86+93.
- [16]冯元. 新时期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理论依据、动力来源与路径选择[J]. 社会建设, 2017, 4(06): 29-38.
- [17]安东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 发展型社会政策[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18]周学荣.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思考与提升治理能力的路径研究[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5(06): 109-115.
- [19]高红, 杨秀勇. 社会组织融入社区治理:理论、实践与路径[J]. 新视野, 2018(1): 79-85.

【责任编辑 刘绚兮】

近代早期华工出国史若干问题研究

李中跃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近代早期华工出国史中存在3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经过比较研究可知, 协助东印度公司诱招华工的“梯官”或“铁官”, 英文名实则“Tikoo”=“Tiquo”=“Terqua”, 中文名为胡始明, 乃槟榔屿粤籍华人领袖; 林则徐查办的拐案, 实则另有别情; 最早的苦力贸易基地, 应该是澳门, 要早于厦门。

[关键词] 华工 出国 姓名 拐案 中心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20)03-0113-08

华工出国历史研究虽已多年, 成果众多, 但是内外问题依旧不少。从外而讲, 以往研究华工出国史的观念和路径存在问题, 以致不少问题被过度矮化或忽视, 导致论述偏颇。对内而言, 论从史出, 一分材料说一句话, 故以往的研究结论由于史料不足或者解读偏差, 难免会出现疏漏。历史学者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发掘新史料, 根据确凿的史料考证, 还原华工出国史中的环环真相, 展现古今移民的内在联系。笔者根据近年所见新旧文献, 发现近代早期华工出国史中存在3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其一, 协助东印度公司诱招华工的“梯官”或“铁官”到底是谁? 其二, 林则徐处理的鬼子栏杆诱拐案来龙去脉到底如何? 其三, 最早的苦力贸易基地是厦门, 还是澳门? 故根据相关史料考证, 力图将其弄清楚。

一、槟榔屿甲必丹铁官考

1786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槟榔屿(或称庇能, Penang)以来, 实行“华人甲必丹”(Captain

收稿日期: 2019—08—18

作者简介: 李中跃,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

China, 或者 the Kapitan of China) 制度, 对华人进行管控。在开发槟榔屿的过程中, 第一任英人总督莱特对于勤劳吃苦、“从事各种不同行业”的华人很感兴趣, 决定从中国招引技术华工开发槟榔屿, 开启英国主导下东南亚——中国苦力贸易的序幕。但是一来近代早期槟榔屿的自然社会环境较差。二来当时槟城还存在着奴隶制, 有不少华工沦为奴隶。^{[1](P2)[2](P44-46)}被诱招的华工并不一定发家致富。英国殖民者招引华工开发槟榔屿, 成为之后英属槟榔屿的重要政策。^{[3](P124)}

为了方便诱招苦力, 英属槟榔屿当局便通过在广东活动多年、走私经验丰富的老牌殖民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的档案书信资料来看, 自1785年以来, 英属槟榔屿“每年都要收到公司驻广州商馆经手招雇, 并用公司船只装运的中国工匠和工人”。至1800年, 槟榔屿就已出现公开拍卖华工的市场, 一名一年的苦力价格约为30元西班牙银元, 刺激了苦力贸易的增长。^{[4](P22)}当时东印度公司私招华工, 是触犯清朝法律的。为了避免清政府警觉, 英国殖民者特意挑选葡萄牙殖民者控制的澳门作为苦力买卖基地。1804年, 槟城副总督法哈库奇(R.T.Farquhar)策划利用华人甲必丹“Tiqua”或“Tiquo”回乡广东省亲之际, “希望他能刺激同乡前往槟榔屿”, 协助东印度公司到广州诱招苦力, 扩大广州一带向槟榔屿的苦力移民。此举获得了成功。^[5]1805年, 英国当局在槟榔屿和澳门马上设立招工机构, 专门输送华工, 1805—1815年, 平均每年有500—1000名苦力从澳门被贩卖至槟城。^{[6](P62)}这些华工是以契约华工的身份被贩卖到槟城做苦力的, 而法哈库奇的信件则证明了这一点。^{[7](P15-17)[8-9]}“Tiqua”回国考察和招引华工的经验, 推动了英属槟榔屿的苦力贸易。^{[10](P14)}

“Tiqua”或“Tiquo”的汉名到底叫什么? 他又做过什么事情? “Tiqua”一词是《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作者马士使用的词, 而与“Tiqua”同时生活共事的法哈库奇在信中则称他为“Tiquo”。^[5]二者虽字母组成不一样, 但发音听起来基本相同, 指的都是同一个人。现今相关学者在研究此人之时, 所据引的材料都出自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后来该书被引进中国, 成为中外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1981年版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之编委陈泽宪先生, 在对该书的摘译过程中, 保留了马士的叫法“Tiqua”, 省略了当事人法哈库奇的称呼, 并将该词语音译成“梯官”。^{[11](P501-502)}1991年区宗华先生的翻译本, 完整地呈现了马士和法哈库奇的叫法, 但也不清楚其人的准确汉名, 只是将其音译成“铁官”。^{[12](P733)}^①百年之后的中外关系学者, 也对“铁官”的真实汉名不清楚。^②

1808年前, 英属槟榔屿只有两个被英人认可的华人甲必丹, 一是福建籍的辜礼欢, 另外一个 是胡始明。^{[2](P65)[13](P22, 81)}所以“铁官”应当不是辜礼欢, 便是胡始明。辜礼欢是槟榔屿闽籍华侨华人的甲必丹, 已无疑义。^{[6](P25)}但是辜礼欢普遍被中英人称之为“Captain Chewan”(甲必丹仄万)或者Koh Lay Huan, 不曾被英人称之为“Tiqua”或“Tiquo”。^{[14](P12-13)}其孙子辜鸿铭的英文名 字亦可佐证。辜鸿铭对外写文章所用英文姓氏, 将“辜”按照闽南语发音译成“Ku”, 或者“Kaw”、“Koh”, 而非以“T”字母开头的英文词语。^{[15](P2-5)[16][17]}^③胡始明有哪些背景? 1802年(嘉庆六年)

①本文采纳区宗华先生对“Tiqua”的音译称呼。

②如林远辉、张应龙著:《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1年, 第102页。后来的相关著作基本上 引用英人马士, 或者国内陈泽宪的称呼。

③辜鸿铭正式英文名如Koh Hong-Beng、Ku Hung-Ming。辜在给法国华侨弗兰西斯·波里的签名也曾用过 “Hung Tung Kwan”。另外据媒体报道, 2011年辜氏家族的百年墓地被毁, 受到舆论的关注。从新闻曝光辜氏的墓碑图片来看, “辜”被译为“Kaw”或“Koh”。故辜鸿铭的英姓也有家族背景。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11-01/10/c_12963317.htm。

石碑《广东义冢墓道志》显示领头捐款且捐额最大的是“胡始明”。该墓碑文如：“我粤东东南距海，民之航海以为营生，层帆巨舰以捆载而归者，大率于洋货者居多，然利之所在，众则共趋，一遇死亡，若不相识，尚何赖乎乡亲乎？”该墓碑乃是广东华侨华人专门为同乡人修建义冢的标志，也是粤籍民众团结互助的重要纽带。^{[18](P685)[19]}1803年，胡始明向槟城广福宫（又称观音庙）赠送“钦崇福泽”匾额时，下款明确标明“槟榔屿甲必丹偕男臻麒、臻麟勋沐叩”。^{[20](P26)}以上证明胡始明最起码是广东人，且是槟城粤籍华侨华人的甲必丹。而据陈剑虹的研究，胡始明乃广东香山人，亦有人认为胡始明乃香山客家人。此说可供参考。^{[20](P27)[21]}

从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来看，自1795年以来，英国是在广州一带招工输往槟榔屿的，并非从福建。^{[12](P733)}在从法哈库奇的叙述来看，既然让铁官“鼓动同乡”，那么证明此人应是广东人，不是福建人。何也？闽粤的语言习俗等差异甚大。深入当地帮助英人诱招华工的招工商，须熟悉当地的语言风俗，方能招工有所成，否则让福建人去广州澳门附近诱招广东人，可能性太小。对比英译姓名区别，联合档案记载和研究，再考虑招工的可行性，我们基本可以将闽籍甲必丹辜礼欢排除，那“铁官”的可能性就落在槟榔屿粤籍华人甲必丹胡始明身上。

后来笔者又发现槟榔屿中山会馆藏有一份《1801年槟城副总督乔治·李斯为表彰甲必丹胡始明特批一地》英文地契。该地契原为胡始明子孙所有。这份原始资料上明确将胡始明称之为“Terqua”和“Captian”。陈剑虹据此也认为胡始明(Hu Shiming)即是“Terqua”。^{[22](P24)}而据英人档案记载，“Tikoo”又拼作“Tiquo”，且乔治·李斯至迟在1803年就已任命“Tikoo”为粤籍华人甲必丹，至1804年没有再任命别的粤籍甲必丹。甲必丹铁官来华招工的年份是1804年，与乔治·李斯和法哈库奇处于同一时期。^{[14](P11-12)}所以，1803年英人任命的槟城华人甲必丹与1804年赴华招工的华人甲必丹乃是同一个人，当属无疑。而1803年的广福宫匾额，则已经证明当时的华人甲必丹就是胡始明。

故综合联系英人称呼变化可发现，马士所说的“Tiqua”和法哈库奇所说的“Tiquo”，以及乔治·李斯所说的“Terqua”，均以“T”字母开头，基本的构成字母差别不大，且发音基本相同，指的都是同一个人即胡始明。即“Tikoo”=“Tiquo”=“Terqua”=胡始明。

胡始明在致信乔治·李斯时，常用“Tikoo”一词自称。^{[23](P52)}该词发音与之前几个基本相同，与粤语“大哥”很相近，亦有人称它是华人私会党对领袖头目的尊称。^{[14](P12-13)[24](P424-427)}据最早以粤方言发音为基的《华英字典》，“大”对应“Ta”，“哥”对应“Ko”。“大哥”即“Tako”，与“Tikoo”发音相仿。^{[25](P388-389、573)[26](P62、94-96)[27]}所以笔者认为该词是粤语的音译是合理的。但是现在还不能确认胡始明与秘密会社的关系。以往认为胡始明乃是槟榔屿义兴公司的开会盟主，经陈剑虹考证义兴公司首位盟主其实不是胡始明，应当是梁显正。^[28]胡始明与秘密会社的关系当另考。综合前后论证，笔者认为1804年赴华招工，推动苦力贸易的“铁官”或“梯官”就是粤籍富侨、槟城甲必丹胡始明。

英人对胡始明同音杂字的诸多称呼，暗示胡始明和辜礼欢其实在英人权力结构中并没有一个专门严格的英文称呼，说明近代早期华人甲必丹，其实在殖民地并未受到殖民者的特别尊重，处于殖民权力体系的中下游，地位并不高。不过胡始明在槟榔屿势力庞大，关系复杂，其中就与英属槟榔屿当局的关系十分密切。时任副总督的乔治·李斯批给胡始明一块永久属地，可见其较得当局赏识。李斯离任后，胡始明还带领相关侨领，致信慰问。^{[23](P52)}另外，胡始明在当地的华人社会中威望较大，还曾一度赞助过相关慈善事业。他也是后来的太平绅士胡兴泰的祖父。胡氏家族是槟城的

老华族，一直繁衍到现在。^{[21](P46、65)}

1802年，《广东义冢墓道志》由广东帮董事王义德等人主持修建。在捐款人之中，胡始明捐款“工金50元”，位列第一，其他人大部分捐1—2元。^{[23](P51)}1804年副总督法哈库奇直接在信里说胡始明“是个很富的人，在当地（槟榔屿）有很多产业。”^{[51](P427)}这从中可见其富有。除了捐修广东义冢，1803年胡始明与自己的两个儿子胡臻麒、胡臻麟，向广福宫赠送“钦崇福泽”牌匾，供奉观音。广福宫是闽帮的集体标志。身为粤人的甲必丹，向闽人庙宇赠送牌匾，一则显示了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二则也是向闽人示好，希望闽粤继续和好。^{[21](P65)[21][24]①}

耐人寻味的是，胡始明后来竟与法哈库奇联合招工，成为殖民者的工具。当然目前有关被招华工的具体情况尚不清楚，学人不能就此断定他是在“卖猪仔”还是替老乡找工作“做善事”，还需继续研究方能清楚。

如槟榔屿之类的早期华工出国，带有明显的隐秘性。但随着华工出国的增加，相关案件也开始浮出水面，受到官民的关注。其中林则徐处理广州鬼子栏杆诱拐案便是其中的典型，可从中了解当时官民对华工出国现象的认识特点和局限。

二、林则徐处理鬼子栏杆诱拐案考实

此案发生于1839年，闽粤地区的人口拐卖被清廷侦知。华南地区的人口拐卖开始进入清廷视野。道光皇帝听闻“闽广两省海口停泊夷船，往往收买内地年未及岁之幼孩。少者数十、数百不等，多者竟至千余，其中男少女多……致以左道戕其生命，尤堪悯恻”，于五月下令林则徐等闽粤督抚“实力查禁，以卫民生。”^{[29](P215-216)}林则徐接到圣旨后，不敢怠慢，经南海知县刘师陆的协助，在两个月内侦破“鬼子栏杆作坊”大案，抓获张亚盛等五名“拐贩”，继而侦测澳门“卖猪崽”情况，写成《查明英船有骗带华民出国并无戕害幼孩情事折》，成为时人后世研究近代早期华工出国的重要材料^[30]。学界一般多重视该奏折的后半部分，对于鬼子栏杆诱拐案未作深究，似乎该案没有问题，也无人深究林则徐在其间的作为，亦有少数学人研究华工史顺带提及此问题。其实该奏折并没有把案子说完。故仍有必要加以澄清，以示拐案和“卖猪崽”情事之内在关系，也可侧面研究林则徐的言行虚实。

能把这个案子大体说清楚的乃是林则徐另一封奏折《略拐幼孩凌虐致死罪犯潘义德申明定拟折》^{[31](P1470-1473)}。原来该案另有内情。据官府反复审问，鬼子栏杆内部的童工多是自愿投送学艺的，只有六名是被诱拐，并非如之前所讲全部是被诱拐的，且参与诱拐的也并非全部5名。潘义德在诱拐过程，并没有使用抢劫或迷药，只是言语哄诱。另外所讲潘义德等人“勒逼”殴打压榨童工，严重致死者只有周亚豪，其余基本完好，而压榨确属实。林则徐等人鉴于民情汹涌以及“粤东栏杆线带销售渐广，因而略诱幼孩，逼织图利，近已渐相效尤”，倾向从重治罪，将潘义德即行正法，杀一儆百，另将林结发配新疆充奴。林则徐等人特别强调要用“略人略卖人”律例，将其判为“拐犯”，从中惩治。^{[31](P1470-1473)}有何利害？

“拐犯”或“拐贩”为拐卖人口罪名，属于清代“略人略卖人”的律例范畴。《大清律例》规定：

① 檳城华人宗教的兴起，与南洋苦力贸易有密切关系。一些备受苦楚、求助无门的华工，只能祷告观音等佛道神仙，祈求神灵庇护。

“凡设方略而诱取良人为奴婢，及略卖良人为奴婢者，不分首从未卖，杖一百徙三年；因诱卖不从而伤被略人者绞监候，杀人者斩。”^{[32](P352-355)}清政府对于拐卖人口采取的是严刑峻法。一旦张亚盛五人被定为“拐贩”，下场是很惨的。但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强略孩童，或将被略人当做自己的奴婢，成为自己的私有物，或者卖给别人为奴婢。现实不过是过度剥削而已。除打人致死的潘义德外，其余按照一般的量刑标准，可罚钱鞭笞或杖刑，若是将其流放烟瘴地区三年，甚至施以绞刑或斩刑，则未免有些过重，不过对慑刹人口拐卖却有积极作用。

另外细查此案，所谓的“鬼子栏干”，听起来很吓人，实际上是清代服装镶滚刺绣技巧。清季满族小说家文康，在其代表作《儿女英雄传》的第三十回，曾偶然提及过这种服装技艺。文康于第三十回描述安龙媒娶了张金凤和十三妹何玉凤之后，春风得意，心浮气躁，有一日趁老爹安学海不在的时候，“带一顶片金边儿沿鬼子栏干的宝蓝满平金的帽头儿，脑袋后头搭拉着大长的红穗子。凡是这些过于华靡的服饰，都是安老爷平日不准穿戴的。”^{[33](P361)}^①从中可以看出，“鬼子栏干”技艺，一般用之于帽子等奢华服饰之上，销售对象主要是官宦人家和富家大户。粤人之所以大行“鬼子栏干”，乃是因为这类的高档服饰，流行于官商大户洋人，价格高，利润厚。这跟“卖猪仔”相差太远。

林则徐奏折中讲到，“夷人有一种衣洗绦，合金银线织之，虽名为鬼子栏杆，今日各省盛行，故广东省城仿其织法。”林则徐此处所讲的服饰信息，来自南海知县刘师陆。实则二人对明清服装演变均不清楚。所谓“金银线织之”的“鬼子栏干”，特指明清时期广州一带较为出名的金银线刺绣产品，出自“金银线刺绣”技术之下。该刺绣技艺，又被民间称之为“钉金”，是一种奢华的镶滚刺绣技艺。其内部手法复杂，常用的针法就有平绣、织锦、编绣等十多种，而绣品则富丽堂皇，光彩夺目，深受达官富豪及洋人喜爱。这种金银线刺绣技术，也并非由外国传入，早在明代就已存在，后来考古界于广州东山发掘出的明代戴缙夫妇的墓葬中，就曾出土过多件金银线刺绣衣裙。^{[34](P497)}

值得注意的是，林则徐在调查中看到了澳门同华工出国的微妙关系。林则徐认识到“澳门为众夷聚集之区”，将怀疑视角转到澳门地区。经过澳门同知蒋立昂调查，林发现澳门拐卖华工的嫌疑最大，“一二夷船惯搭穷民出洋谋生，不要船饭钱文，待带到各夷埠，有人雇佣……其在船之时，皆以木盆盛饭，呼此等搭船华民一同就食，其呼声与内地呼猪相似，故人目此船为卖猪崽。”^{[31](P1314-1315)}可见，早在鸦片战争前澳门地区就兴起了契约华工制度。葡萄牙人和部分拐匪为了牟取暴利，以免费船饭和外国高工资为诱惑，用花言巧语诱招华工远赴海外殖民地，以做苦工加倍偿还川资。但是以上所言，基本上只是澳门同知的观察，毕竟没有抓到在澳拐匪加以审问，以探究竟。具体内幕仍然如同迷雾。

从档案来看，林则徐对广东儿童拐卖案件的追查，一则推动了对粤港澳“卖猪崽”情事的侦测，对早期华工出国有所知晓；二则林则徐对近代广州拐卖案从严治罪的标准，开启了近代清廷重典治理苦力拐卖的序幕。此可做清廷治理华工出国佐证。但另一方面需要知道，此案过后，林则徐转移注意力，着重处理中外鸦片问题，基本不再过问华工问题。因此林则徐在治拐方面的功绩，远不如禁烟。华工出国再次以比较隐秘的形式进行。那么早期主要在何处进行？澳门也。

^①第三十回《开菊宴双美激新郎，聆兰言一心攻旧业》

三、近代最早苦力贸易中心的流变

以上两个问题，反映了澳门在近代早期华工出国史中的重要地位。目前一些学人尚认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第一个苦力贸易中心是厦门。^{[35] (P42-59)}而根据史实，此论点需要重新审视。其实无论从贩卖华工的时间、设置机构和持续性，澳门才应该是近代早期第一个苦力贸易中心。葡萄牙殖民者自明代窃据澳门后，就从内地进行买卖劳工，向外输出。据黄启臣的研究，葡萄牙殖民者早于明代强占澳门后，就不断有拐卖人口之事。不少华工，包括儿童，还曾一度被卖到印度当奴隶，做苦工，而当时的民众甚至以“吃人的强盗”视之。^{[36] (P192-194)}故澳门买卖苦力由来已久。进入19世纪，随着世界殖民开发兴起，澳门成为近代拐卖人口的急先锋。港澳史学者莫世祥先生等人亦多次鲜明指出苦力贸易最初源自澳门。^[37]

澳门之所以成为最早苦力贸易基地，有其特殊的地缘和政治经济优势。其一，澳门控扼珠江出海口，是其东方贸易的重要商道，航运便利，同东南亚联系密切；其二葡萄牙窃据澳门长达三百余年，熟悉闽粤官场与社会风土人情，同闽粤腐败官吏以及黑恶帮会关系密切，维持澳门“不中不西”的地位，利用贿赂以及暴力手段，打通关节，谋求暴利，而中国政府则难以稽查和管辖，以致相关中外奸徒逍遥法外；其三，澳门同欧美社会及拉丁美洲，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秘鲁关系密切。再者澳门吏治腐败，更为中外奸徒图财害命提供了重要的中转站以及保护所。种种因素的相互交织，使澳门成为近代早期最重要的拐匪基地。

可有实证案例？1805年，英国殖民者法哈库奇以澳门为中转站，策划诱招华工前往特立尼达，向印度总督威尔斯利写信介绍详细的方案，其中提到“现在出洋前往南洋各地的中国人一般以他们自己的身体作为抵押，换取出洋船票和沿途伙食。这笔钱有西班牙银圆20元，由种植园主现行支付，后来再从出洋的人每个月所得到工资中扣还……其他条款是关于移民运输、接待，在特立尼达的福利，以及往返中国的办法等等”^{[7] (P15-17)}。此信当是契约华工制度最早的证据。华工未偿还种植园主船票伙食费用前，“以身抵押”，实为债奴，基本上没有人身自由。特立尼达地处赤道附近，气候湿热，使人容易得病^{[38]①}。所谓“福利以及返回中国的办法”，不过是句空话。法哈库奇为了减少诱招阻力，掩人耳目，特意取道澳门，利用澳门的便利将华工偷运出洋。这一过程中，澳门的葡萄牙人德贡布斯为其中间人。由此可看出澳门诱招契约华工之早。

此后一直到1834年东印度公司解散时，该公司伙同澳门代理人，以及买办、内地拐匪，陆续诱招华工出洋。^{[11] (P504-507)}这些华工被贩往南美洲的特立尼达、新加坡、邦加、圣海伦娜岛。当时东印度公司贩运华工的船只均系帆船，贩运华工的同时也在贩运鸦片。其帆船贩运主要在冬季风季节。船长装载华工均在澳门，每贩运一名华工，可得到大约30元招工费，利润相当可观。^{[7] (P15-17)}

嘉道时期的澳门，不仅是拐卖华工的基地，也是贩卖妇女的中心。近代来华的美国商人亨特，曾经亲耳听说有关澳门贩卖妇女至英国的内幕，印象深刻，事后将其记录于《广州番鬼录》一书中。1824年，亨特抵达澳门不久后，“听说史密斯医生在那里（澳门）物色了两个女人带到英格兰搞投机生意。随后我们获悉他是和C船长合伙做这笔生意，后者也曾服务于可敬的东印度公司。他曾在该公司船上当医生。到了英伦时，这两位金莲被荣幸地奉献给乔治四世国王陛下。不过这笔生

①在英国殖民时期，特立尼达盛行钩虫病和疟疾，导致居民普遍体质羸弱，经济落后。这也是英国殖民者掠夺、诱拐他国劳动力，替代白人开发殖民地的重要原因。

意最终没有成功。由于遭到某些方面的大力反对,结果只好把这两位年轻的汉家姐妹送回他们的国家。”^{[39](P16-17)}

鸦片战争后,澳葡当局于1845年宣布实行自由港政策,为后期外国拐匪的云集提供了条件。^{[40](P1609-1612)}此后,澳门不仅加快了诱招华工的步伐,拐卖妇女的活动也十分猖獗。被拐卖的妇女大多数被迫沦为娼妓。据时人观察,澳门实行公娼制度,是澳门娼妓业发达和拐匪猖獗的重要原因。当时澳门娼妓的活动频繁,足迹遍及澳门各个角落。为此澳葡当局还专门出台禁令。柯尼特在《中国丛报》中曾认为澳门是拐匪贩卖华人、日本人及东南亚奴婢的中心,将澳门视之为“欧洲冒险家、鸦片贩子和拐匪,及赌徒和娼妓的乐园。”^[41]在拐卖华工上,澳门内部已经出现了代理人或代理商等较为成熟的机构或程序,比如1847年轰动一时的拐卖香山华工的阳成行^{[42](P124-126)}。阳成行是第一个明确的华人开办的猪仔馆,承办外国诱招华工业务。以此推演,指挥阳成行拐卖华工的外国洋行在澳门策划当更早。不过受英国开发东南亚殖民地推动,厦门苦力代理商的强有力牵引,香港的制约和竞争,以及广东反帝爱国运动,澳门的苦力贸易速度和规模受到影响,而厦门的苦力贸易则迅速发展,取代澳门成为苦力贸易中心地。1847—1852年,澳门的苦力贸易规模和速度虽不及厦门,依旧是广东拐卖华工的核心基地,甚至在个别年份和地区的诱招量反超厦门,后来受厦门打拐反英风潮的影响,澳门则成为名副其实的头号苦力贸易中心。^{[43](P28-60、89-91)[44][45]}

因此,澳门变成近代早期第一个苦力贸易中心后,后来在短时间内又把中心位置转让给厦门,而厦门受局势的影响又把中心向南转移,重新转归澳门。中间的这种往复转换值得注意。

以上三题探讨,可知虽然华工出国研究已近百年,但是单单早期历史中就有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等着我们去继续探索,以更务实地态度尽可能地澄清华工出国前后历史过程中的是是非非。

参考文献

- [1]姚枬、张千礼. 槟榔屿志略[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3.
- [2]黄尧. 星马华人志[M]. 香港: 明鉴出版社, 1966.
- [3]Bookworm. 槟榔屿开辟史[M]. 顾因明、王旦华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0.
- [4]温雄飞. 南洋华侨通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9.
- [5]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M]. London: Global Oriental LTD, 2007.
- [6]谢诗坚. 槟城华人两百年[M]. 槟榔屿: 韩江学院韩江华人文化馆, 2012.
- [7][英]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第3卷[M]. 区宗华译.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1.
- [8]吴风斌. 契约华工演变浅析[J]. 南洋问题, 1986(4): 119-128.
- [9]王启民. 契约华工制的历史分期问题[J]. 福建师大学报, 1982(1): 95-101.
- [10]黄露夏. 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编年史[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 [11]陈翰笙.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四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2][英]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第2卷[M]. 区宗华译.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1.
- [13]阮湧仰. 吉大客籍甲必丹与华人方言群社会的互动[D].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硕士论文, 2013.
- [14]C.S.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M].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4.
- [15]高令印、高秀华. 辜鸿铭与中西文化[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
- [16]黄兴涛. 文化怪杰辜鸿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17]程巍. 辜鸿铭的“祖籍”及其槟榔屿祖先考[N]. 中华读书报, 2017-07-05(13).
- [18]槟榔屿嘉庆年间广东义冢墓志铭[M]//傅康武、陈铁凡编. 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 吉隆坡: 马来西亚大学出版社, 1986.
- [19]黎志刚. 近代广东香山商人的商业网络[M]//王

- 远明主编. 香山文化: 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109-122.
- [20]张少宽. 槟榔屿华人史话续编[M]. 槟城: 南洋田野研究室, 2003.
- [21]王琛发. 从发现道北佛事壁画看吉兰丹佛教历史[J]. 马来西亚: 无尽灯, 1999(27).
- [22]George Leith Issued a Perpetual Land Title in Favour of Captian China Terqua[M]//陈剑虹主编. 槟榔屿华人史图录. 槟榔屿: 槟州华人大会堂, 2007. 第24页之影印档案附件.
- [23]陈剑虹. 槟榔屿华人史图录[M]. 槟榔屿: 槟州华人大会堂, 2007.
- [24]骆静山. 槟榔屿华人宗教的今昔[M]//林水椽, 骆静山合编. 马来西亚华人史.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1984.
- [25]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Vol1[M]. Macao: The East India Company Press, 1815.
- [26]谭树林. 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M].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4.
- [27]陈小明、刘继红. 《广东省土话字汇》称谓词选收特点对确定称谓教学内容的启示[J]. 人文学刊, 2009(4): 115—129.
- [28]陈剑虹. 19世纪前半期槟榔屿义兴公司的发展[J]. 华侨华人文献学刊, 2015(1): 128-129.
- [29]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 第四十册[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30]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查明英船有骗带华民出国并无戕害幼孩情事折[M]//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
- [31]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M].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
- [32]略人略卖人[M]//故宫博物院. 钦定大清律例: 卷二十五下.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0. 352-355.
- [33][清]文康. 儿女英雄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点校本.
- [34]吴山. 中国历代服装、染织、刺绣辞典[M].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1.
- [35]吴凤斌. 契约华工史[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8.
- [36]黄启臣. 澳门通史[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 [37]莫世祥. 澳港苦力贸易与英葡论争[J]. 广东社会科学, 2016(2): 80-89.
- [38][特]威廉斯. 吉林师范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民史: 上册[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74: 前言.
- [39][美]亨特. 广州番鬼录[M]. 冯铁树、沈正邦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 [40]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 澳门编年史: 第四卷[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 [41]Isabel Nunes. 舞女和歌女: 澳门妓女面面观[J]. 澳门: 文化杂志, 1993(15)(16): 35-56.
- [42]刘芳. 葡萄牙东波塔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M]. 澳门: 澳门基金会, 1999.
- [43]陈瀚笙.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二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44]陈泽宪. 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J]. 历史研究, 1963(1): 161-179.
- [45]吴凤斌. 厦门的苦力掳掠[J]. 南洋问题, 1986(2): 51-62.

【责任编辑 刘婉华】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广东妇女运动*

赵佳佳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 全面抗战期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妇女运动方兴未艾、经久不衰。当地妇女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与抗战宣传、物资供应、战勤保障、情报工作甚至武装斗争, 为华南地区乃至全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过程中, 也积累了丰富的妇运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类妇女组织的成立、推进妇女解放以及发展统一战线等共同促进了广东妇女运动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 广东妇女运动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 妇女组织 妇女解放 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20)03-0121-10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的发生标志着全面抗战的兴起。此时到1938年10月, 广东地区(指广东、海南、香港和澳门, 抗战期间海南归广东省管辖)并未直接卷入战火。然而, 南北相隔抑制不住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 广东军民积极投身全面抗战, 支援前线, 并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抗战, 激发民众抗战热情, 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妇女界的救亡活动也随之蓬勃发展。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 广东军民更是开始了武装抗日, 妇女同胞的抗战力量得到更大程度的整合,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收稿日期: 2020—02—22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重大贡献研究”(项目编号: 15BDJ042)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赵佳佳, 男,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华南抗战史。

一、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妇女运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东地区的军政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广东地方当局对民众运动的态度转变，中国共产党抓住有利时机，加强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妇女运动随之高涨。

（一）重建广东省委，制定妇女运动正确方针

全面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组织就积极开展妇女工作。1937年7、8月间，中共广州市妇女支部安排一批党员到市妇女会工作，通过妇女会这个合法组织开展妇女群众工作。8月13日，在中共汕头工委的领导下，成立了汕头市青年救亡同志会（后改为“青抗会”），会员有200多人，妇女占1/3，“青救会”组织了几个随军工作队、服务团，到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参加的女同志有90余人。^{[1](P59)}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重建，设立妇女工作部和妇女工作委员会，张月霞担任妇女部长和妇委书记。各地党组织根据省委做法，也分别设立妇女部或妇委，有条件的基层还成立了妇女支部。党通过各级妇女组织，充分发挥女党员和进步妇女的骨干作用，利用各妇女团体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8、9月间，中共广东省委妇女部在广州召开妇女干部会议，提出：“要动员各阶层妇女参加抗日活动，范围从城市扩大到乡村。”^{[2](P3)}同时广东党组织也比较注意同国民党的合作策略：

“一开始便为未有对立的团体独立的运动，多以合法地进行工作和尊重他们领导，避免摩擦，他们也就比较的放心前进。”^{[3](P29)}制定正确的妇女运动方针，同时注重和国民党广东当局的合作，是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妇女群众中扩大政治影响，推动妇女工作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二）推动妇女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

抗战初期，广东妇女团体很多，但各自分散活动，力量不集中，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开展，各妇女团体纷纷要求成立一个统一的妇女组织领导机构。中共广东省、市领导研究认为当时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妇女组织的条件还不成熟，于是决定先建立一个“妇女团体联席会议”，共同协商解决妇女抗日救亡活动各项事宜。根据党的指示，经共产党员黄梅棣、梁薇娟等人串连发动，由省、市妇女抗敌后援会、市妇女会等团体发起组织“广东妇女团体联席会议”（下称“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女界联合会、市妇女会、女权运动大同盟、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后陆续参加的有省、市妇女抗敌同志舍、车衣女工会、中大女同学会等。“联席会议”的成立，对统一广东妇女运动起了很大作用，改变了过去各自为政的局面。但“联席会议”并非权力机关，无法有效动员所有妇女团体参与救亡运动。在我党推动下，由宋庆龄领导，于1938年9月19日成立“广东妇女团体抗敌工作协进会”（又称“救国工作协进会”），同时废去“广东妇女团体联席会议”，10月3日，发表了成立宣言。宣言指出：“广东妇女团体，在抗战一年来的过程中，各个团体自觉地做了不少的抗战工作……但在抗战已到第二阶段的时候，保卫武汉与保卫广东是刻不容缓的，我们还[要]动员大多数尚未觉醒的妇女，充实战时工作……所以需要有一个统一组织产生”。^{[4](P279-280)}广东妇女团体抗敌工作协进会是推动和联络全广东妇女团体的中心组织。由此，广东妇女团体从分散走向统一，形成了一致抗战的员面，充分发挥了妇女团结抗战的总体力量。

二、全面抗战中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妇女运动

1938年广州沦陷后，广东省党组织的主要力量开始向农村转移。1939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第4次执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精神：“确定党的基本方针是长期积蓄力量，积极在战争过程中培

植自己的力量,准备将来抗战的最后阶段上能起决定作用”,并指出当前的四大任务是: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打击敌人;扩大动员组织群众;建立统一战线精诚团结的例子;建立强大的党的基础。^{[5](P111)}在广大党员的艰苦努力下,游击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组织中的妇女工作迅速展开。

(一) 抗战宣传

妇女是支持抗战的重要力量,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参与抗战是党的宣传工作重要目标,为此广东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抗战宣传。

1. 开办识字班和夜校,提高妇女思想文化水平 如中山县五挂山区针对农村妇女文化低,普遍用识字班、夜校为阵地,提高文化水平、启发觉悟,继而以“妇女会”和“妇抗会”的组织形式,把妇女组织起来,^{[2](P37)}潮汕地区到1939年3月共计开办识字班百余个,参加识字班的妇女最低限度有数万人,^{[6](P112)}有些妇女如普宁县农妇黄清华通过夜校学习,思想觉悟提高很快,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妇运骨干。^{[7](P164)}组织妇女参加夜校和识字班不是简单的学文化,更重要的是使她们冲出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向社会,关心国家大事,因此,夜校和识字班也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

2. 充分发挥文艺团队喜闻乐见的优点,宣传抗日救国 利用各类在民众中有广泛影响和观众基础的通俗文艺形式进行宣传,更容易使民众接受。如普宁县妇抗会创作了许多针对性强、通俗易懂,妇女乐于接受的歌曲(《姿娘歌》《坐船等水歌》等),控诉日本的侵略和封建压迫的罪恶,唤起广大妇女投身自身解放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7](P164)}琼崖独立总队政治部歌剧团经常翻山越岭深入乡村为群众表演节目,宣传抗日救国的新人新事和党、政有关抗日救国的指示等,其节目短小精悍,内容丰富多彩,很受欢迎。^{[8](P114)}

3. 以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为突破口,调动妇女参加抗日活动积极性 由于各类原因,许多妇女的各类合法权益经常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女党员和女战士常以此为突破口打开工作局面,琼崖独立总队随军服务团(后改为随军政治工作队)的女战士吴玲在中税乡以一个经常虐待妻子的人为典型,建议乡政府公开处理,先让他在大庭广众前认错,并保证不再殴打妻子,然后劝他不要阻拦妻子参加抗日活动,经过艰苦工作,这个乡的局面很快打开,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抗日活动。^{[8](P89)}

4. 针对少数民族妇女,采取编演和教唱山歌以及认干姐妹等方式调动她们的抗日积极性 中共陵崖保乐办事处妇女抗日救国会“以认姐妹的名义,与少数民族妇女交朋友……消除她们对汉族同胞的偏见,以调动她们抗日的革命积极性”。^{[8](P152)}经过宣传发动,全有100多名妇女参军参战,许多黎族妇女参加了运输队(其中有些是女渔民)或为部队收集、购买和运输粮食、枪支、弹药和各种日用物资。^{[8](P153)}

(二) 物资供应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长久有力的物资供应是保障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根据地广大妇女同胞面对前方战士药品、食品等物资的匮乏,积极捐款捐物和生产支前等,为前方将士提供了强大物质保障。

1. 征募捐献 征募捐献既是根据地广大妇女响应党的号召参与抗战的重要行动,也体现了觉醒了的根据地妇女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感。一般而言,征募捐献主要是通过“妇女会”“妇抗会”等妇女组织发起,既有临时性的捐献,也有长期化的征募。如琼崖广大妇女积极响应琼崖特委募捐劳军的号召,连续掀起“一发弹、一斤米”捐献活动,仅崖县梅山乡反角头村就一次捐献2100元和大批鱼虾。^{[9](P144)}1943年,琼崖抗日部队攻打新街“日本三并行”战斗胜利大会。昌江三区妇救会动员全

区妇女捐献衣服、鞋帽、毛巾、牙膏、牙刷、医药用品等一大批慰劳品运往大会，送给部队。^{[8](P154)}而在许多乡村，每逢部队行军作战，妇女都会为部队送水、送粮、送柴、接运和护理伤员，部队需要什么，送什么；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送到；哪里需要就送到哪里。不少妇女献出了珍藏的嫁妆、金银首饰，其中泥沟村女党员张韵琴，大陇村女党员江碧宜，浮江寮村孙巧容等，想办法偷偷拿出结婚时的嫁妆衣服布料来捐献。张惠贞、张之如、杨洛英、赖克鸿等还偷偷地拿出了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等，送到了县妇抗会。

2. 生产支前 日军侵占广东后，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关系长期抗战的大问题，但因为男丁开赴前线或外出谋生，“琼崖的女子不仅在人口上占绝对的优势，就是在生产上也占着重要的地位”^{[10](P60)}，因此抗日根据地号召和发动妇女参与根据地建设，参与劳动生产，如《东江纵队政治部对于建设惠东宝路东区的施政纲领》就提出，“鼓励妇女增加生产，发挥妇女在经济建设上的积极性”。^{[11](P49)}在各级党委和妇救会等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华南各根据地掀起了大规模生产支前的热潮。当时各根据地采取有组织的集体开荒，即组织妇女和其他青年垦荒种地，再将收获的产品上市出售，得到的款项交给里、保长并由他们转交给部队，^{[12](P110)}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至1942年，琼文根据地群众支援我军的粮食有1000万担。^{[13](P191)}东江抗日根据地群众1944年缴纳公粮5万担，1945年达25万担。^{[14](P87)}除此之外，不少妇女在“妇抗会”带领下组织“帮耕队”“变工队”“耕田组”“生产互助组”，无偿帮助烈属耕田收割。妇女的生产支前为抗战将士提供了宝贵的物资支持，也保障了根据地和困难群众的生活需求。

(三) 战勤保障

战勤工作主要包括战时卫生救护、粮食给养等，是保存和维护军队有生力量，巩固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支撑。广东地区各根据地和部队中活跃着一支女战斗员队伍，她们承担着中国共产党广东地区各武装队伍后勤保障的重任。

1. 粮食筹集和管理 在五桂山根据地，部队的粮食给养和管理工作卓有成效，广大妇女在党的领导下，做出了大量贡献。从粮食来源看，最初是由在部队活动的地方同志的家和革命堡垒户提供，到1944年由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粮食来源增多，一是没收土豪劣绅，二是征收农民公粮，三是向开明人士和统战对象借粮。为管理好粮食，部队设立粮站，由总站、重点站和分站组成，各站管理人员主要动员妇女参加，共有30人左右。^{[15](P47-50)}另外在某些突发紧急时刻如灾害发生时，党还动员大批妇女参与粮食抢收，1942年5月至9月间，珠江三角洲大雨泛滥，西海党支部动员200多青年男女抢割稻田，并设法把谷脱粒，磨成白米做军粮。^{[16](P9)}

2. 炊事工作 战场上战士的伙食是保障胜利完成战斗任务的重要条件，在许多队伍的炊事员中，妇女占了很大比例，以琼崖纵队为例，据1943年统计，琼崖纵队共有炊事班120多个，炊事人员和运输员共计800多人，炊事员全部为女同志。^{[9](P147)}炊事工作的第一要求是快，部队一驻扎，短时间内就必须迅速保证部队伙食供应，抗日战争时期，琼崖抗日纵队没有固定的粮食供应，全部依靠女炊事员筹集。而在敌军“扫荡”期间，野果野菜也常是部队的食粮，为避免食物中毒，女炊事员经常以身试毒，而面对日伪军严密封锁，女炊事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关卡，有女炊事员因此而牺牲。1943年，第一支队女炊事员符月娥深入敌占区筹集粮食被日寇发觉追捕，为保障粮食安全，她布置送粮群众安全转移后与敌人同归于尽。可以说炊事工作是琼崖纵队最为艰苦的工作之一，没有崇高的理想和不屈的意志，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

3. 卫生救护 开展卫生和救护工作，是保存我军有生力量，巩固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问

题,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都非常重视。早在抗战初期,琼崖人民武装仅有300余人时,就在部队中设立医疗卫生所,每个中队配备1至2名女卫生员,此后,随着队伍壮大和战事需要,纵队和各支队均建立了后方医院和流动野战医院。至1944年,琼崖抗日纵队已建立一支以女同志为主体,约920多人的医疗卫生工作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在琼崖7年抗战中,我后方医院共留治的伤病员580多人,治愈归队率达80%以上,为巩固我军战斗力做出了重大贡献。^{[17](P194-196)}在五桂山根据地,1944年2月,为保障负伤同志及时得到治疗,部队成立卫生室,下设政治、卫生行政和业务3部分,卫生室成立前后,举办2期卫生员训练班,成为珠江纵队、粤中纵队的医疗卫生骨干。^{[15](P37)}到1944年,珠江纵队基本建立了有卫生室、医站、连卫生队员3级层次的卫生系统,有卫生队员百余人,主要为女性,卫生室是部队医疗系统的领导机构。为了做好卫生和救护工作,女卫生队员克服重重苦难,在缺医少药、技术落后的环境中,通过办短期培训班、带徒弟和向民间学习中医中草药等方式努力提高医疗卫生水平和治愈率,表现了高度负责的作风。^{[18](P265-272)}还有许多人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卫生队长张漪芝、政治服务员陈笑影、医务人员王丽(泰国华侨)等。^{[19](P268)}在反“蚕食”反“扫荡”的3年中,琼崖牺牲的妇女工作同志达1000多人,^{[20](P369)}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四) 情报工作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掌握敌方情报,是部署行军路线、制定战斗部署、克敌制胜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非常注重情报搜集工作。

当时,广东各人民武装充分发挥妇女群众和女战斗队员的作用,在实践中创造了多种关系形式的情报搜集途径,主要有:(1)利用敌营工作人员的亲戚关系了解敌人内部情况和动向;(2)布置妇女运送征粮或充当民工,进入敌人据点,摸清敌军火力和兵力部署;(3)利用当小学教员,开小杂货店,做货郎担,当家庭妇女带小孩,假作夫妻、叔嫂、兄妹关系、做长工、短工、扒经济艇(代运货、搭客)等形式来掩护等。以上做法是行之有效的,通过妇女开展情报工作也使得我军的情报工作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情报网。据1943年统计,琼山、文昌、乐会、万宁等地参加情报工作的妇女共计580多人。^{[21](P58-59)}1943年中山抗日部队成立交通总站,90%以上是女同志,她们是广东人民武装取得胜利的不可多得的力量。

许多地方还建立了秘密交通线。在香港,港九大队市区中队建立了一条由交通总站、交通站和交通员组成的秘密交通线。市区内的交通工作主要有女队员负责,中队负责从郊区到市区边缘的交通员,多是当地的农村妇女。她们与群众一选跳着柴草到街上去卖,又买回农村需要的东西就在买卖过程中和市内交通员接头互相交换情报,然后,各自分散回去。^{[22](P76)}除递送情报外,交通员也负责掩护游击队员来往,如帮助东江纵队支队长卢伟良赴法国就医等。^{[23](P123-126)}在情报交通工作中涌现出了大批的妇女老革命、老交通、老堡垒户等妇女先进人物,她们十年如一日,为党的革命把自己的家庭作党的交通联络站、后勤供应站、卫生医疗站、伤病员疗养院、党训班地点、党的机关办公地点、情报站等。大多数还成为临时交通情报员,有力地支持了党的情报工作。如袁鉴文父母的家,既是东莞地下党的联络站(东莞和香港)也是游击队、东纵,甚至广东省委、江南特委的联络站、后勤供应站。莞城葵衣街尹七嫂,是华侨家属,她的家也是东莞地下党的交通联络站,活动很广泛。^{[24](P192)}除此之外,广州地下党的工作也非常突出。香港沦陷后,各系统派到广州从事地下工作人员共计60人左右,^{[25](P12)}其中女地下党员有18人。^{[26](P157)}

(五) 武装斗争

在广东地区的抗日战争中,许多女同胞直接参与抗日武装斗争,她们冒着枪林弹雨英勇奋战,

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广州沦陷后，中共南（海）顺（德）工委委员林锵云等于1939年2月成立顺德游击队，当时全体队员17人，有女队员7人，编为女队员小组，组长方群英，副组长容海云。^{[16]（P2）}女队员主要负责敌情侦察。1939年5月至7月间，顺德游击队曾先后三次袭击大良日军，袭击前夕，为了摸清敌情，里应外合，部队多次派出女队员化妆成农妇搜集情报。1940年容海云在西海组织妇女姐妹会。1941年5月，“姐妹会”和“利农会”青年男女100多人夜袭沙湾伪军，歼灭一连大部和一个伪警察所，其后西海姐妹会由30多人发展到60多人。^{[16]（P6）}东莞县抗日模范壮丁队是由我党领导的一支武装，队员150余人，其中女队员约占三分之一，她们随军作战，堵截打击日寇。^{[27]（P34）}在琼崖，各界妇女积极参加抗日武装，加强了琼崖抗日纵队力量，促进了琼崖抗日战争的胜利，当时琼崖仅有300万人口，由于出洋逃亡，女性占绝大多数，她们纷纷参加抗日武装。1942年5月到9月，仅琼山、文昌就有青年男女2000多名参军。到1944年，琼总扩展到7000多人，女同志约占15%。^{[9]（P146-147）}在反“蚕食”斗争中，琼崖妇女积极参加破坏敌人交通桥梁、电讯设备等破击活动，有力地配合部队粉碎敌人的“扫荡”，同时还开展除奸、肃奸活动，摧毁敌人汉奸情报站。^{[20]（P370）}为此，琼崖妇女付出了巨大牺牲，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琼崖牺牲的女烈士共计1058名，仅文昌就有女烈士500多人。^{[9]（P149）}

（六）干部训练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为了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必须培养造就一支妇运工作骨干队伍。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妇女工作大纲》，指出：“培养大批党的与群众的女干部，来迎接抗战新阶段工作的开展，是我们妇女工作的中心一环，<甲>党要吸收大批女党员到各级党校与训练班学习；<乙>开办短期妇女训练班……”，^{[28]（P6-7）}《妇女工作大纲》的颁布为各根据地 and 党组织开展妇女干部培训和教训提供了基本依据和方向。随后，各根据地开展了大范围、多形式的妇女干部培训。从干部来源讲，除了平时不断地调整和补充外，举办各类学校和培训班，或分批或集中地进行训练以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也是培养干部的重要方法。为此，各地各级党组织通过开办训练班和举办学校等形式把在各项妇女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认真培养和进行锻炼考验，分别吸收入党或参加党的外围组织。

在海南，1939年6月，在琼山县下田村举办的第1期军政训练班，刘秋菊、苏觉醒等同志亲临指导。第2期由苏觉醒留下带班，培训了各县和部队的30多名妇女骨干。^{[29]（P445）}1940年1月，中央书记处在对琼崖工作指示中专门强调，要“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30]（P255）}。同年7月，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部在美合根据地创办“琼崖抗日公学”（简称琼公），主要培养军事、政治和民运干部。“妇女人数不少，编一个妇女班”，^{[30]（P36）}陈志英任班主任，“课程以学习文化课为主，兼学人民战争和群众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军事课则进行站岗、放哨、情报传递、救护和支前工作的训练。”^{[30]（P38）}经过学习和训练，培养了大批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的妇女干部，如黄若媛经过学习成长为战斗英雄。^{[30]（P60）}1945年为迎接抗战胜利，琼公第3期开办，设有民运班，除2名男学员外全部为女学员，她们成为领导琼崖妇女运动的中坚力量，为解放战争甚至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妇女干部资源。此外，有些县区也开办了干部培训班，如万宁县的“民运干部骨干短期训练班”，据陈冰萍回忆，女学员至少有12人，培训结束后分配至乐会、万宁建立和加强各级民救会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30]（P195-203）}

在广东，1939年初，“中山县战时妇女协会”（简称妇协）成立后，立即举办妇女骨干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学员由各区支会选派。先后办了2期，每期30人，时间共3个月。除由县委负责同志讲

课外,也聘请一些党外进步人士来讲课。课程内容有《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妇女运动史、国共合作宣言、救护知识、军事训练和教唱抗日歌曲。学习结束后,各学员回到各区分会工作,向广大妇女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动员她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31](P194)}揭阳县委非常重视妇女干部的培养,先后送郑玲、杨昭玲等到闽西南党校学习。同时,在举办党员训练班时,注意吸收女党员参加。而且,县委还多次专门举办女党员训练班,其中最有影响的有两次。1938年11月,揭阳县委为提高新参加妇干班党员训练女壮丁的工作能力,决定举办一期女党员训练班,主持人是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作形势报告,传达上级精神,指明了下乡训练女壮丁的工作方向和任务,妇女委员郑玲特别分析各乡的具体情况,授给党员的工作方法。通过这次学习,提高了妇女党员的信心,为女壮丁训练奠定了良好基础。1939年广东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为坚定党员抗战信心,揭阳县委举办女党员训练班,此次训练班办理10多天,是一场规模较大的训练班,有30多名妇女骨干参加学习,培训内同主要包括,青年问题、统一战线问题。此外,还针对女党员的特点进行了婚姻和爱情问题的分析。^{[32](P313-314)}另外中国共产党还利用一些统一战线组织进行教育培训,如通过普宁妇抗会中的女党员的培养教育,一大批妇女提高了思想觉悟和社会活动能力,参加了党的组织。1938年至1939年,全县共吸收女党员150多人。^{[7](P164)}

三、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妇女运动主要经验

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地区领导的妇女运动如火如荼,为华南地区的民族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地区的妇女解放运动向纵深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面抗战期间广东妇女运动方兴未艾的根本原因

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妇女工作大纲》,强调“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任务”,“经过统一战线的活动与组织,团结各阶层广大妇女群众在党的周围,并特别注意发动与组织劳动妇女,为我党的妇女工作的路线”,“争取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平等,改善与提高妇女地位,反对一切封建束缚于压迫。”^{[28](P1)}并规定了具体的工作方法和策略。

《妇女工作大纲》的颁布为各根据地和地方妇女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提供了行动指针。国民党虽然在1938年6月也颁发了《妇女运动方案》,提出了妇女运动的原则、组织及训练问题,却“既希望妇女为抗战出力,又不敢放手发动妇女,不给妇女爱国参展的民主自由权利”。^{[26](P10)}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得到了大批妇女工作的认可和支持。1938年4月广东省委成立后,为加强对妇女运动的领导,成立了妇女工作部和妇女工作委员会,同时,广州市委和香港市委也设立了妇女工作部。同年8月,广东省委妇女部在广州召开第1次妇女工作会议,强调“要积极动员各阶层妇女参加抗日活动,范围从城市扩大到乡村,要做好支前工作,要求各地组织医疗队,救护队积极参战;同时要募捐慰劳前方,努力生产支援前线。”^{[2](P3-4)}与此同时,邓颖超陪同宋庆龄到广州专门对广东妇女运动,特别是妇女统战工作做了重要指示。上述会议和讲话为抗战初期广东地区的妇女运动指明了方向。

为了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提高工作成效,广东省委和琼崖特委特别重视充实妇运骨干。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北迁至韶关,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夫人吴菊芳组织“广东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我党派出区白霜(区梦觉)担任该会总务组组长,

主管该会日常工作。由于该会的筹备和成立后的全面工作都是在区白霜的具体领导下完成的,使得我党的妇女政策和主张在广东妇女群众中有广泛、深刻的影响。1940年1月,琼崖特委恢复妇女部,由刘秋菊、苏觉醒和陈坚3位同志担任主要领导,同时广东省委还派余珍来琼,充实妇女运动的领导骨干。此外,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培训妇女干部,提高妇女干部的素质,如“一九四〇年春至一九四五年秋,根据当时形势和妇女工作的需要,琼崖公学先后举办了多期妇女培训班,每期数十人,培训了一批批妇女骨干”。^{[9](P152)}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干部不仅在妇女民族统一战线中宣传党的政策,也是妇女统一战线组织中的核心力量,有效推动了妇女统一战线组织的发展,而且妇女党员在各条战线中能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成为妇女运动发展的领导力量。

(二) 组织起来是全面抗战期间广东妇女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保障

早在抗战爆发之初,中共中央就指出要“特别注意发动与组织劳动妇女”^{[28](P1)}在整个华南抗战过程中,妇救会等妇女组织是动员妇女参与抗战的重要力量,如1939年12月,中共琼崖特委第8次扩大会议提出,要“加紧沦陷区民运工作,把沦陷区民众组织起来”^{[33](P75)}后,各级党组织大力开展民运工作,组织起妇女抗日救国会等各种抗日爱国团体。此后,琼文的树德、咸来、道崇、云龙、三江、大坡、金堆、新马、茄荷、塔市等地的妇女陆续参加到妇女抗日救国会中去。当时,村村都选出妇女干部领导妇女抗日。^{[8](P95)}普宁县妇抗会创作了许多针对性强、通俗易懂,妇女乐于接受的歌曲,如《娑娘歌》《坐船等水歌》等,控诉日本的侵略和封建压迫的罪恶,唤起广大妇女投身自身解放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7](P164)}可以说组织起来,争取妇女参与救国会等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妇女的秘诀所在,仅以文昌县为例^{[34](P89-90)},抗战期间就组织6个区的妇女抗日救国会。(表1)正是通过妇女组织,妇女的力量才得到最大的发挥,不论是在抗战宣传、后方生产,还是在募集物款、帮助军烈属及其他活动中,妇女组织是发动妇女的最好方式。

表1 抗战期间文昌县妇女组织一览表

组织	时间	会长	副会长
文昌县妇女救国会	1941年夏—1943年初	黄守英	何秀英
第一区妇女抗日救国会	1941年夏—1943年初	黄韵谐	
第二区妇女抗日救国会	1941年夏—1943年初	符荣英	
第三区妇女抗日救国会	1941年夏—1942年	许德英(后牺牲)	
第四区妇女抗日救国会	1941年夏—1943年	韩翠英(1941)许得萍(1943)	
第五区妇女抗日救国会		符根后凌敏、祝娟、钟明姬、傅云英等继任	
第六区妇女抗日救国会		韩凤荣牺牲后云爱云接任	

(三) 推动妇女解放是全面抗战期间广东妇女运动深入发展的重要方法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注重将民族救亡解放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结合,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的《妇女工作大纲》中提出,“从争取抗战民主自由中争取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平等,改善与提高妇女地位,反对一切封建束缚与压迫”。^{[28](P1)}并且针对不同阶层的妇女提出不同的斗争策略,如针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妇女主要是满足参政民主要求等,针对女工主要是与男工同工同酬、提高待遇等,对于农村妇女,要求改善农村妇女生活,实行减租、减税、减息,改良女雇工待遇等,对于城市贫民妇女而言,主要是争取抗战民主自主权,实施国难教育等。

具体到广东地区,有人曾痛心地说道,妇女“所贡献给社会的劳力,虽比男人的牺牲大,可是她

们的地位,反而比任何一省的妇女受压迫更深。究其原因,也许这种风气,还是封建时代传下的农奴制度遗毒,女人既是男人的财产,更是他们指挥如意的奴隶”。^{[35](P394)}因此,动员妇女参与抗战救亡运动必须把妇女从各种压迫和枷锁中解放。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妇女运动的过程中,不仅重视妇女解放和抗日战争的同步性和一致性,而且注重维护广大妇女同胞的特殊权益,为此,共产党在各根据地纷纷颁布婚姻条例和各种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权的法律和政策,如《琼崖东北区政府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之地位,实行自愿婚姻与一夫一妻制,限制买卖婚姻与童养媳。”^{[33](P148)}《琼崖东北区政府暂行婚姻条例》规定,婚姻自主,一夫一妻,禁止纳妾、双挑蓄婢等,有效促进男女婚姻权利平等。除此之外,文化教育也是中国共产党促进妇女觉醒,推动妇女参加抗战的重要方式,“在华南,妇女夜校和识字班是共产党秘密宣传抗战形式,宣传党的政策、路线,鼓舞群众斗志,组织妇女与敌人开展各种斗争的场所,夜校、妇女班的妇女为游击队做鞋,通过各种渠道送到游击队战士手中,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抗日战争中,识字班对妇女起到了文化和革命双重启蒙的作用。”^{[36](P59)}总之,“动员妇女参战和保护妇女切身利益,是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的基本任务,是密切关联而不可偏废的两大任务”。^[37]

(四)统一战线是全面抗战期间推动广东妇女运动取得重大进步的良好形式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妇女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强调要“经过统一战线的活动与组织,团结各阶层广大妇女群众在党的周围”^{[28](P1)},各地党组织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积极推动妇女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党组织积极发挥各类既有妇女团体的作用,通过各种渠道选派党员和进步妇女进入各妇女团体工作,使这些团体成为团结广东妇女对敌斗争的统一战线组织。在我党推动下,国民党广州妇女会摆脱了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群众基础薄弱的局面,成为面向城市贫民妇女的组织,也成为广州市妇女开展妇女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除了改造原有组织,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党组织还注意同国民党合作成立新的组织。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湛小岑发起“救亡呼声社”,我党派多名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其中有近30名妇女组成妇女组。在共产党员的动员和支持下,开明人士李峙山组建“广东妇女抗敌同志会”,使得省“妇抗会”在抗战初期成为团结广大妇女群众特别是工农妇女群众的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团体。为改变全面抗战初期广东地区妇女团体各自为战的局面,在我党的推动下,由宋庆龄领导的“广东妇女团体抗敌工作协进会”成为推动和联络广东妇女团体的中心。广州沦陷后,吴菊芳在韶关组建“广东省新生活运动妇女委员会”,我党派出区白霜参与筹划,其后又陆续派出100多名青年和知识分子参加。可以说,广东“省新运妇委会”从筹备成立到后来的工作,都是在女党员和进步女青年的努力下进行的。^{[2](P25)}在各类妇女统一战线组织的领导推动下,广东妇女群众积极参与抗战宣传、物资筹募、妇女组训、后方生产、征募劳军、难民救济等各项活动,实现了劳动妇女群众和其他各阶级、各阶层妇女的大联合。

综上所述,妇女解放历来是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期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广东妇女运动也同全国抗日斗争一样蓬勃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各阶层妇女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广东领导的妇女运动范围广,程度深,不论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还是妇女解放过程中都成效显著,不仅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省妇运史工作室.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妇女运动大事记[A]. 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汇编(1937-1945)[G]. 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编印, 1988.
- [2]省妇运史工作室.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妇女运动概况[A]. 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汇编(1937-1945)[G]. 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编印, 1988.
- [3]候霭云. 抗战期中广东国统区的妇女组织及其活动[A]. 广东文史资料第50辑[G].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7.
- [4]广东妇女团体抗敌工作协进会成立宣言[A]. 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汇编(1937-1945)[G]. 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编印, 1988.
- [5]张文彬. 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4月23日)[A]. 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汇编(1937-1945)[G]. 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编印, 1988.
- [6]普宁市妇运史组编. 普宁妇运史(1919.5-1949.9)[M]. 普宁市妇女联合会印, 1994.
- [7]中共普宁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普宁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
- [8]琼崖妇运史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编. 琼崖妇女革命斗争记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 琼崖妇运史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编印, 1985年.
- [9]黄玉梅. 抗日战争时期琼崖妇女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经验[A]. 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编. 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妇女运动[C].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 [10]李吉明关于琼崖抗战情况的报告——琼崖的一般情况和党的组织、宣传教育、青年及妇女工作概况[A]. 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编.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37-1945[G].
- [11]东江纵队政治部对于建设惠、东、宝路东区的施政纲领[A]. 中共惠阳县党史研究小组办公室编. 惠阳县党史资料汇编(第一集)[G]. 中共惠阳县党史研究小组办公室, 1983.
- [12]张一平, 程晓华. 海南抗日战争史稿[M]. 海口: 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2008.
- [13]云昌瑛. 妇女同样是抗战的主力军——琼文抗日根据地妇女的作用[A]. 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编. 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妇女运动[C].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 [14]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广东省志妇女工作志[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 [15]珠江纵队妇运史征集小组, 中山市妇联, 中山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五桂飘香: 中山妇女革命运动史[M]. 珠江纵队妇运史征集小组, 中山市妇联, 中山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 1984年.
- [16]佛山市妇女联合会, 中共佛山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 珠江纵队妇运史征集小组编. 珠江英姿: 珠江地区妇女革命斗争史[M]. 内部发行, 1987年.
- [17]海口市中共党史学会编. 琼崖女杰[M]. 海口市中共党史学会, 2010.
- [18]陈钢. 抗日战争时期珠江纵队、粤中纵队的医疗卫生工作[A]. 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编. 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妇女运动[C].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 [19]《东江纵队志》编辑委员会. 东江纵队志[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3.
- [20]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琼崖抗日英雄谱[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5.
- [21]吴基林. 琼崖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特色作用[A]. 广东省妇联会海南行政区办事处编. 琼崖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史文集[C]. 1985.
- [22]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党史资料第7辑[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
- [23]江敏锐. 特殊环境下的特殊斗争——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女队员对抗战的贡献[A]. 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编. 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妇女运动[C].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 [24]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东莞抗日实录[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 [25]中共广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M].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1985.
- [26]丁卫平. 中国妇女抗日战争史研究1937-1945[M]. 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
- [27]陈小明.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妇女运动的特点[A]. 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编. 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妇女运动[C].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 [28]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编.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M].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 [29]杜汉文编. 海南文史第20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60周年专辑[M]. 海南出版社, 2005.
- [30]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琼岛星火第22期琼崖党员干部教育专辑[M]. 琼岛星火编辑部, 1997.
- [31]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党史资料第8辑[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
- [32]孙锐卿. 抗战时期揭阳县妇女党支部的建立与

(下转第150页)

眼动追踪技术与翻译过程研究： 基于知网数据的计量分析*

刘永杰¹ 许悦萌² 牛一琳³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北京 100029;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眼动追踪技术这种数据收集方式缘起于19世纪, 因其生态效度高、数据丰富精确等优点, 广泛应用于各学科研究。本文基于对眼动追踪技术应用研究的梳理, 发现该项技术目前主要应用于心理学科, 集中在阅读研究方面, 而在国内翻译过程研究中应用很少, 主要是针对该技术在海外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以及对国内翻译研究的启示。本文指出眼动追踪技术的应用将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崭新的视角, 同时提出该技术与击键记录法等研究方法相结合形成多元互证模式将成为翻译过程研究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 眼动与心理研究 眼动追踪技术应用研究 翻译过程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20)03-0131-11

引言

翻译过程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因为过程研究涉及译者心理活动且译者大脑这个“黑匣子”的活动可以说是最为复杂的问题, 同时, 囿于研究方法有限, 无

收稿日期: 2020—02—01

***基金项目:** 本论文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基于多元互证模式的文学复译作品读者接受度研究(项目编号: 19YB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永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许悦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辑, 硕士; 牛一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法直接获取译者翻译过程的思维数据,翻译过程研究一直集中于文本分析,以构建翻译过程模型的方式来推测译者的翻译过程。但是,译作不能充分反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双语转换机制以及决策过程,因此翻译过程研究从理论假设向通过实验手段研究反映认知过程称为必然趋势。随着20世纪80年代有声思维法(Think-aloud protocol)等实证研究方式引入,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模型,也为翻译过程实证研究提供了更为可靠和更具可操作性的数据收集方法。

眼动追踪技术是近年来随着科技不断发展进步而产生的一种新兴研究手段,最初运用于心理学,随着其实验数据的生态效度不断被研究者认可,也逐渐应用到语言学、体育、新闻传媒、药学、教育学等领域。本文采用计量分析,1992年至2018年7月间在中国知网上发表的核心期刊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在梳理眼动实验总体应用及发展基础上,着重分析了近年来眼动实验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指出在当前翻译研究中以综述类文献为主,多为介绍眼动追踪技术在外国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及相关成果,少量研究涉及翻译过程中的认知负荷、英语翻译教学等,但总体来看针对翻译过程的研究较少,应着重通过眼动追踪技术加强翻译过程认知研究,构建理论模型研究。

一、眼动追踪技术总体情况分析

西方的眼动实验研究始于19世纪末,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阅读领域。随着科技的发展,研究者由最初借助肉眼或简单仪器关注被试者的眼动情况转变为借助光学眼动仪记录被试者眼动活动。中国学者最早进行的眼动实验研究在1925年,沈有乾在斯坦福大学进行。20世纪80年代,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家沈德立带领团队采用眼动研究方法在阅读研究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使我国眼动研究迈上新台阶。

眼动实验法作为一种有效的实验数据收集方法,可以用于推测认知努力(cognitive effort)或通过注视确定注意焦点。眼动追踪数据可以将眼睛在一段时间内注视某一事物的顺序,这些数据在信息处理、辅助技术、阅读、心理语言学、情感研究、语言学习、眼动模型构建、消费、运动、工程等领域的应用已卓有成效。

(一)眼动追踪技术应用的总体发文趋势

以“眼动”和“实验”为核心搜索词,自1992年起发表在北大中文核心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上的论文共计2746篇。由图1可以看出,从1992年至2003年,有关眼动研究的相关发表呈现平稳趋势;自2002年起,眼动实验相关论文的发表呈快速上升趋势。20世纪90年代,国内的眼动实验“刚刚起步,缺少仪器设备,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1](P235)}。随着先进眼动追踪仪器的引进,如SMI 500Hz高速双眼眼动仪、Eyelink II、Eyelink 2000和TX 300眼动仪等,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高校成立眼动实验室,都促进了我国眼动追踪技术的发展。

认知技能^{[12] (P351)}，而眼动追踪技术可以清晰呈现阅读过程中的眼动轨迹，眼动属性（如注视与眼跳）与大脑内相关认知过程之间的关系可通过“眼—脑假说”（the eye-mind hypothesis）解释。该假说认为“读者对一个词的加工一直持续到对它的心理加工完成为止”^{[13] (P330)}。换句话说，读者看一个词或物体时，从认知层面处理词语或物体的时间约等于其的注视时间^{[14] (P11)}。

眼动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法论，眼动指标是实验的重要因素。但如何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选取适当而有效的眼动指标，是许多初次采用眼动追踪技术学者面临的问题。因此，许多采用眼动追踪技术的论文在阐述实验设计部分都会简要介绍该论文在实验过程中采用何种眼动指标，同时也有部分专门讨论实验中应如何根据自身实验采用相应的眼动指标。闫国利等^[10]对阅读研究中的两类眼动指标进行了详细地阐释，指出与眼睛何时移动有关的时间维度的眼动指标、与眼睛移动位置有关的空间维度的眼动指标。闫志明等^[15]阐释了多媒体学习过程中的注视、眼跳和瞳孔直径三类指标并指出其优缺点以及改进建议。

从脑电、脑电信号、用户体验、多媒体学习、睡眠、情绪、抑制、运动员和用户体验等关键词来看，由于眼动与认知之间的关联，眼动追踪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诸多相关学科。Bruneau^[16]采用眼动追踪技术对英国四个最大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网站首页的用户体验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设计简洁的、实用性高的网站拥有良好的用户体验。段朝辉等^[17]动画呈现速度在多媒体学习中的影响并指出材料呈现速度的影响不大。Bergstrom 和 Schall^[18]详述了眼动追踪技术在社交媒体、电子商务等网站的用户体验实验的设计、校准、记录、分析和解读。此外，国外一些学者还在酒店管理、营销、广告和工业工程等领域应用眼动追踪技术进行研究，而从关键词来看，目前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应加强此方面的相关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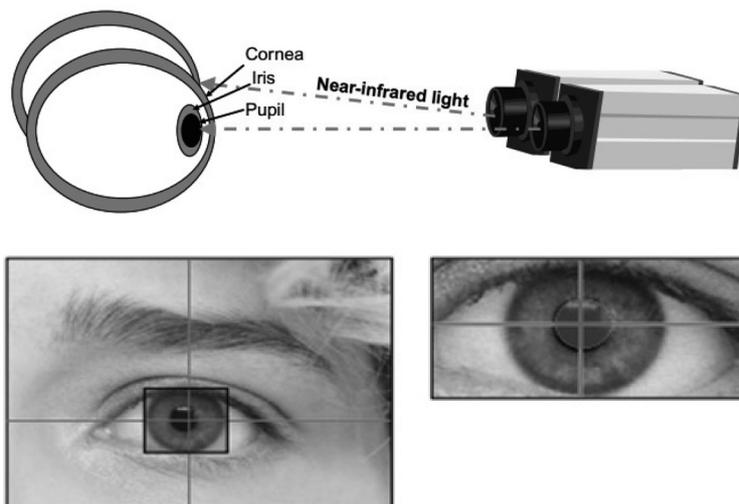


图3 角膜反射法探测和追踪眼动轨迹

（三）学科和期刊分布

从学科和期刊分布情况来看（图4、图5），心理学学科发表的论文1007篇，占全部发文量的35.21%，是排名第2位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学科的3倍多；而发文排名前5的期刊全部是心理学期刊——《心理科学》（275篇，19.67%）、《心理科学进展》（197篇，14.14%）、《心理学报》（173篇，12.42%）、《心理行为与研究》（86篇，6.17%）和《心理学探析》（67篇，4.81%）。由此可见，心理学目前仍是眼动追踪技术应用的主要领域。认知研究是心理学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19] (P365)}。一般来说，

少学者指出“有声思维法并非提供了探索翻译内在过程的直接途径”^{[33](P45)}，而且在口述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活动会相互干扰”^{[34](P235)}。随着技术手段的革新，键盘记录法、眼动追踪法等研究方法逐渐引入翻译过程研究，增加了实验的信度与效度。

(一) 眼动追踪技术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现状

McDonald & Carpenter^[35]最早将眼动追踪技术应用于翻译研究，建立口译过程中解读、语法分析和纠错模型并考察译者如何发现并纠正误译。尽管翻译过程研究也缘起于同一时期，但是直到2006年眼动追踪技术才被引入到翻译过程研究中^[36]。

我国眼动实验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起步较晚，从知网获取的数据来看，以“眼动”和“翻译”为核心搜索词共有78篇论文，剔除与翻译无直接相关性论文后为20篇，其中最早涉及翻译和眼动追踪技术的论文为邓志辉于2012年发表的《认知科学视域下西方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发展述评》一文，该文主要梳理了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发展的3个阶段，并简要提及眼动技术在翻译认知研究中的应用。第一篇正式采用眼动追踪技术进行翻译研究的论文是冯佳于2016年发表的《眼动追踪和键盘记录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以提高策略能力为中心的MTI教学实验》，该论文实验数据表明在翻译教学过程中，用眼动追踪技术记录学生的眼动活动并让学生回看自己翻译过程的眼动记录，可以“增强学生的自我反思意识和对自身翻译行为的监控意识”^{[37](P67)}。

整体来看，在20篇有关眼动追踪技术在翻译研究应用的论文中以综述类文献居多，共10篇，5篇为新书评介^[40-44]、1篇介绍眼动技术数据收集和实验设计的论文；真正采用眼动技术进行研究的论文为4篇。可以看出，目前眼动追踪技术在翻译研究，尤其是笔译研究中的应用较少。已有的9篇综述类文献主要介绍了眼动追踪技术的缘起、数据收集、常用眼动指标、眼动数据分析模式等；同时这9篇综述中，4篇文章集中在眼动研究自身的综述；而另外5篇文章则是以认知翻译或实证翻译研究为核心，阐述眼动追踪技术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书介是引入国外研究新思想及研究方法的途径之一。5篇书介分别涉及了眼动追踪技术在计算机辅助翻译译后编辑中译者所耗精力的影响分析、译者培养、翻译过程中译者阅读模式等。4篇翻译研究中1篇探讨眼动追踪技术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1篇以视译为主题的文章考察了认知压力和单词熟悉度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视觉词汇语义通达模式的影响，另外2篇主要考察了英汉双向翻译过程中译入、译出的认知负荷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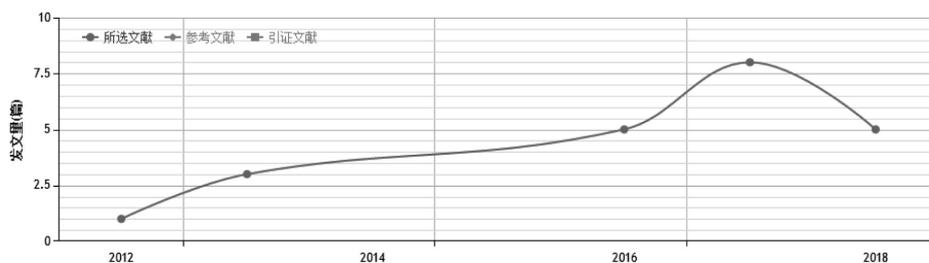


图7 眼动追踪技术应用于翻译过程研究的发文年份

(二) 眼动追踪技术在翻译过程研究中应用的展望

Holmes在“翻译的名与实”一文中指出描述性翻译学包含以成品为导向、以功能为导向以及以过程为导向的翻译研究^{[43](P176-177)}，而这一翻译研究的“奠基之作”^{[44](P93)}也为翻译过程研究指明方向。但不可否认的是，翻译过程十分复杂、其研究也翻译的难点，正如I. A. Richard所说，“翻译

过程研究或许是宇宙进化过程中最为复杂的事件”^{[45](P248)}。而人类大脑作为最精密的“仪器”，其复杂程度使得研究者无法直接译者翻译过程的思维数据，但随着新的研究方法的提出以及科技进步，翻译过程研究已取得一系列喜人成果。

翻译过程可分为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宏观层面主要涉及翻译过程研究方法论及教学应用，微观层面主要涉及翻译单位、翻译策略、翻译述要、语义改变、文化因素、预警作用、耗时等基本变量和非基本变量。在基本变量问题上，翻译策略仍是研究热点^{[46](P37)}。有声思维法作为最初应用于翻译过程研究的数据收集方式，主要包括翻译策略、翻译单位、翻译述要和翻译方式四个主要方面^{[47](P30)}，而随着击键记录法、眼动追踪技术等数据采集方式的引入，翻译过程研究转向口笔译中译者认知负荷方面的研究；同时，翻译过程研究也逐渐涉及翻译方向（即由外语译为母语或母语译为外语）、文本难度、时间压力、语义变化等方面的考察^{[48](P61-62)}。

翻译过程作为一个复杂的认知行为，主要包括理解原文、语言转换和生成译文3个阶段^{[28](P406)}。从理解层面而言，翻译的第一步就是阅读原文，因此眼动追踪技术的运用可以借助阅读过程中的眼动指标分析译者如何理解原文、译者实际选取的翻译单位。翻译过程始于译者对源语文本的解译直至译文完成，这其中包括翻译策略的选取，译者在词、短语、句子和篇章等翻译单位之间的选择，译者能力对于翻译质量的影响等。翻译过程研究中的主要眼动指标主要包括注视时间（fixation duration）、凝视时间（gaze duration）、总注视时间（total fixation duration）、注视次数（fixation count）、眼跳和回视（regression）^{[48](P63-64)}。翻译过程中译者在理解原文时的注视时间和凝视时间可以反映译者对于原文的理解过程、将原文分解并重组的过程以及原文的重点、难点；注视次数能有效反应“阅读材料的认知负荷”^{[10](P597)}。通过眼动仪记录下的这些数据信息是理想的译者翻译认知过程分析工具，能够明确指出有经验译者与初学者之间的差异并指导译者培养。

眼动追踪技术对翻译教学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采用眼动追踪技术可以呈现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如译者翻译过程中的注视时间长短、注视次数、回视内容、这些数据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观测译者大脑在翻译时理解与产出的变化过程翻译过程^[48]，同时，眼动追踪研究表明在进行一项任务时注意力的分布受其个人专业知识储备的影响^[49]。因此，通过对比经验丰富与经验不足者在阅读理解过程中的眼动轨迹，我们可以获知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不同策略，这些数据可以提供重要的见解，如有经验的译者的注意过程，并可以用于改进教学策略以提高经验不足者的翻译能力及对原文的理解能力，提出新的教材、教案与课堂设计。

此外，眼动追踪技术与语料库语言学相结合能更好地为翻译过程认知提供新的研究视角。生成语法将语言视为心理现象，因此它也是“认知”的，它不仅表明语言是心理上真实的现象以及语言学是认知科学的一部分，还表明信息加工和存储是语言学的区别性特征^{[50](P3)}。尽管语料库翻译学是以翻译成品分析核心，并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结合，力图阐明翻译本质、翻译过程属性及规律”^{[51](P39)}，但其本质上也是翻译的认知研究，同时其研究领域也与翻译认知研究相重合，即译者心理活动、译者进行双语转换时的认知心理过程及翻译认知加工规律等。而且，语料库翻译学提供了大量真实双语语料和翻译语料，可与通过眼动追踪技术获得的译者翻译过程数据进行互证。

眼动追踪技术具有“生态效度高、数据更为丰富和精确等优点”^{[48](P64)}，在实验设计过程中，研究者通常对译者在某个特定的句子、词组或者单词上的注意时间感兴趣，但是眼动追踪仪不能百分之百准确定位译者关注的词语。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数据的生态效度、更好地理解译者的翻

译过程,研究者应将眼动追踪技术与击键记录法、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等研究方法相结合、形成多元互证模式(triangulation),即“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实验收集数据,并进行交互验证”^{[52](P853)},这一方式可以“创新对现象的解读方式,质疑或整合已有理论,更加清晰地理解研究问题”^{[53](P253)}。多元互证模式已成为翻译过程研究的重要理念与方法并且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有助于更好地研究译者的认知思维过程,对于揭示翻译过程规律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三、结语

通过对1992年至2018年10月发表于知网核心期刊的文章进行梳理,本文指出眼动追踪技术目前在心理学科、尤其是阅读研究方面有着广泛应用并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眼动追踪技术在语言研究,尤其是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实际应用较少,而现有研究多集中在眼动追踪技术在国外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现状及其对国内研究的启示。作为一种创新性的数据采集方式,眼动追踪技术具有很高的生态效度与信度,从而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崭新的视角并帮助研究者更加清晰地理解翻译认知规律;同时,为了充分获取研究数据,研究者应将眼动追踪技术与击键记录法、屏幕录制法、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方式结合。可以看出,通过实证方式对翻译过程进行研究已成为翻译过程研究的必然趋势并将为该研究提供崭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 蒋波、章菁华. 1980-2009年国内眼动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 心理科学, 2011, 34(1): 235-239.
- [2] Sereno, S. C., & Rayner, K. Measuring Word Recognition in Reading: Eye Movements and Event-related Potentials[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3(7): 489-493.
- [3] 韩玉昌. 眼动仪和眼动实验法的发展历程[J]. 心理科学, 2000(04): 454-457.
- [4] 闫国利、田宏杰. 眼动记录技术与方法综述[J]. 应用心理学, 2004(02): 55-58.
- [5] 冯佳, 王克非. 探悉翻译过程的新视窗: 键盘记录和眼动追踪[J]. 中国翻译, 2016(1): 12-18.
- [6] 马星城, 2017. 眼动跟踪技术在视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成果、问题与展望[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 40(02): 81-89.
- [7] 张之同, 彭聃龄, 张必隐. 阅读时的注视和跳动(Saccades)[J]. 心理科学, 1993(05): 54-56.
- [8] 阎国利, 白学军. 快速阅读的眼动研究[J]. 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04): 27-30+35.
- [9] 白学军, 李馨, 闫国利. 英语专业大学生阅读汉语和英语材料的眼动研究[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08(01): 6-10+49.
- [10] 闫国利等. 阅读研究中的主要眼动指标述评[J]. 心理科学进展, 2013, 21(4): 589-605.
- [11] 王珏, 等. 文章难度与呈现方式对多媒体阅读的影响——基于H学院的眼动实验分析[J]. 现代教育技术, 2018, 28(05): 26-32.
- [12] 闫国利等. 国外儿童词汇识别发展眼动研究的新进展[J]. 心理科学, 2018, 41(2): 351-356.
- [13] Just, M. A., & Carpenter, P. A. A Theory of Reading: From Eye Fixations to Comprehension [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0(4): 329-354.
- [14] Mishra, A., & Bhattacharyya, P. Cognitively Inspire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Eye-tracking[M].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 2018.
- [15] 闫志明, 郭喜莲, 王睿. 多媒体学习研究中眼动指标述评[J]. 现代教育技术, 2018, 28(05): 33-39.
- [16] Bruneau, D., Angela Sasse, M., & McCarthy, J. The Eyes Never Lie: The Use of Eye Tracking Data in HCI Research[C]//Proceedings of the CHI 2002: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ACM: Minneapolis, Minnesota, USA, 2002.

- [17]段朝辉等,动画呈现速度对多媒体学习效果影响的眼动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3,29(01):46-53.
- [18]Bergstrom, J. R., & Schall A. J. Eye Tracking in User Experience Design [M]. Amsterdam: Morgan Kaufmann, 2014.
- [19]Payne, D. G., & Westerman D. L. Research Methods in Cognition[M]// Stephen F. Davis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United Kingdom: Blackwell Publishing: 365-388.
- [20]Anderson, J. R.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M]. New York: W.H. Freeman, 1985.
- [21]Simonsen, H. User Consultation Behavior in Internet Dictionaries: An Eye-tracking Study[J]. Hermes, 2011(46): 75-101.
- [22]程时伟,孙志强.用于移动设备人机交互的眼动跟踪方法[J].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2014,26(08):1354-1361.
- [23]李运,郭钢.基于多项眼动数据的产品造型方案评选模型[J].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16,22(03):658-665.
- [24]卢万谔,梁玮,贾云得.用户推荐对网络搜索行为影响的眼动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6,36(05):514-519.
- [25]张运亮等.篮球后卫运动员专项认知眼动特征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5(05):39-41.
- [26]王明辉,李建民,闫苍松.篮球运动员运动决策准确性和速度差异性的眼动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06):774-776.
- [27]张学民,廖彦罡,葛春林.排球运动员在运动情境任务中眼动特征的研究[J].体育科学,2008(06):57-61+72.
- [28]EnglundDimitrova,B.Translation Process.[M]// Y.Gambier&L.Doorslaer (eds),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Volume1,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Benjamins Publishing, 2010: 406-411.
- [29]Alves, F. (Ed.).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C].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 [30]Ericsson, K. A. & Simon, H. A. Protocol Analysis: Verbal reports as Data. US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84/1993.
- [31]Börsch, S. Introspective Methods in Research on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C]//J. House & S. Blum-Kulka (Eds.),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6: 195-209.
- [32]Krigs, H. P. The Use of Introspective Data in Translation[C]//C. Færch & G. Kasper (Eds.), Introspection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87: 158-176.
- [33]苗菊.有声思维——翻译内在过程探索[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6):43-46.
- [34]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1995.
- [35]McDonald, J. L., & Carpenter P. A.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 Idioms Interpretation and Parsing Heuristics [J].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ur, 1981(20): 213-247.
- [36]O'Brien, S. Methodologies for Measuring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Post-editing Effort and Machine Text Translatability [J]. Machine Translation, 2005, 19(1): 37-58.
- [37]冯佳.眼动追踪和键盘记录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以提高策略能力为中心的MTI教学实验[J].中国大学教学,2016(12):65-71.
- [38]王艳滨.《翻译的认知探索》评介[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45(03):469-473.
- [39]曹佩升.翻译学研究需要的理论思考和方法论指导——《翻译学研究方法论》述评[J].上海翻译,2016(05):84-88.
- [40]侯林平,何元建.翻译过程研究的认知模式与社会模式——《描写翻译认知过程:行为与事件》评介[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40(05):61-70.
- [41]刘勇.翻译与认知的跨界作业——《笔译、口译的心理语言学和认知探究》述评[J].外国语文,2017,33(04):155-157.
- [42]张静.译学研究的科学化:人机互动与认知——《翻译过程实证研究新方向:探索CRITT TPR-DB》评介[J].中国翻译,2017,38(03):51-55.
- [43]James S. Holme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172-185.

[44]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y [M]. Toronto & Sydney: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1.

[45]Richards, I.A. "Toward a Theory of Translating" [M]//Arthur F. Wright (ed.),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247-262.

[46]郑冰寒. 英译汉过程中选择行为的实证研究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47]李德超. TAPs翻译过程研究二十年: 回顾与展望[J]. 中国翻译, 2005 (1): 29-34.

[48]刘艳梅、冉诗洋、李德凤. 眼动法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与展望[J]. 外国语, 2013, 36 (5): 59-66.

[49]Charness, N., Reingold, E., Pomplun, M., & Stampe, D. The Perceptual Aspect of Skilled

Performance in Chess: 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s[J]. Memory and Cognition, 2001 (29): 1146-1152.

[50]邵军航、杨波译. 认知语言学基础[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51]胡开宝、李晓倩. 语料库翻译学与翻译认知研究: 共性与融合[J]. 山东社会科学, 2016 (10): 39-44.

[52]刘永杰、许悦萌. 翻译的认知研究: 回顾与展望[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6): 851-855.

[53]Thurmond, V. A. (2001). The Point of Triangulation. Nursing Scholarship, 33 (3), 253-258.

【责任编辑 刘绚兮】

(上接第87页)

中自我进化,而这必然导致该理论的失败。复合治理对于中国的历史场景和现实场景充分尊重,以此为基础进行治理主体架构、以更具灵活性与结构韧性的形态更加适应复杂多变的转型社会,通过对个体的地位和作用的尊重,探寻个体在解决治理疑难中的价值本真、并以此出发,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姜士伟. 论转型中国社会治理的复合性及复合治理[J].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16 (5): 36-40.

[2][英]鲍勃·杰索普. 治理与元治理: 必要的反思性、必要的多样性和必要的反讽性[J]. 程浩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14 (5): 14-22.

[3]杨雪冬. 全球化、治理失效与社会安全[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4 (2): 17-24.

[4]王健, 鲍静, 王佃利等. 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J]. 中国行政管理, 2004 (3): 44-48.

[5]范巧, 郭爱君. 从“复合行政”到“复合治理”—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经济矛盾解决的新视角[J]. 南方经济, 2009 (6): 61-69.

[6]俞可平. 治理和善治: 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 南京社会科学, 2001 (9): 40-44.

[7]姚伟, 吴莎. 复合治理: 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初步应用[J]. 理论界, 2017 (6): 108-115.

[8]沈承诚, 左兵团. 西方治理理论引入的社会条件分析[J]. 行政论坛, 2005 (5): 91-93.

[9]Jack.L.Walker. Mobilizing Interest Groups in America: Patrons, Profess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M].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 80-90.

[10]罗梁波, 颜昌武. 从单一性到复合化: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现实与未来[J]. 政治学研究, 2018 (5): 79-90.

[11]张思锋. 公共经济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48-149.

【责任编辑 许鲁光】

物质、转义、述行：意识形态的认知结构与语言机制

——论保罗·德曼的美学意识形态理论

孙云霏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241)

[摘要] 德曼将意识形态与美学在认识论范畴上进行关联,认为二者均是“意义和理解过程的一种现象论”。美学意识形态的实质是语言认识模式的“转义”结构,既与物本身无关,又无法闭合自身,因此具有不确定性。述行模式要抹除其由之而来的认知模式,以此终止认知的不确定,并转向自身的力量和效用。但德曼认为这一抹除无法完成,物质已铭写入“转义”的图示,与述行模式始终并置,且以将来到场的方式对后者进行打断。德曼的美学意识形态理论从语言机制的内在理路揭示了政治话语和政治行动间的自毁关系,指涉出当今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某种趋向,并提出“物质的事件”的历史观。

[关键词] 保罗·德曼 美学意识形态理论 物质 转义 述行 语言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20)03-0142-09

“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内涵具有复杂性。从词源上看,“意识形态”由希腊语“理念”(eidos)和“逻各斯”(logos)合成,被定义为“观念的科学”,既包括个人也包括政党所具有的观念,既意味着观念的政治化内涵也意味着对知识的解释性关注。麦克里兰概括其演变大致遵循英法和德国两条路径,前者从特拉西经迪尔凯姆至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认为人运用理性能够获得与现实对应的真理,后者从黑格尔和马克思经曼海姆至哈贝马斯,强调社会的真实矛盾及意识形态的局部利益属性^{[1](P12)},二者的共同主题是“‘真理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对比”^{[2](P18)}。

收稿日期: 2020—03—11

作者简介: 孙云霏,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西方解构主义文论。

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保罗·德曼的意识形态理论收录于文集《美学意识形态》(Aesthetic Ideology)^①中,其返回“意识形态”概念的“观念”内涵,将意识形态与美学在认识论基础上进行关联,认为美学意识形态的实质是语言修辞的“转义”结构,既与物本身无关,又无法闭合自身,因此具有不确定性。述行模式要抹除其由之而来的认知模式,以此终止认知的不确定,并转向自身的力量和效用。但德曼认为这一抹除无法完成,物质已铭写入“转义”的图示,与述行模式始终并置,且以将来到场的方式对后者进行打断。德曼的美学意识形态理论从认知结构和语言机制的内在理路揭示了政治权力和政治行动间的自毁关系,“政治总是无法成为政治(历史无法成为历史)”^{[3](P99)},在英法和德国的意识形态/真理二元对立外另辟蹊径,指涉出当今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某种趋向,并提出“物质的事件”的历史观。

一、美学意识形态:认知模式的“转义”结构

德曼将意识形态与美学在认识论范畴上进行关联,认为二者均是“意义和理解过程的一种现象论”^{[4](P98)}。他从康德对“先验的”原则和“形而上学的”原则的区分入手,认为意识形态属于形而上学的原则。康德提出,物体作为实体和变化的实体,它们的认识原则如果只通过纯粹知性概念以便先天地认识,那就是先验的;如果物体的经验性概念(作为一个在空间中运动的东西)成为认识的基础、物体的变化需要依靠外部原因,那就是形而上学的^{[5](P16)}。德曼认为,“意识形态因其必要地包含经验时刻以及被直接指向纯粹经验的领域之外”^{[6](P72)},因此是形而上学的,这里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在一般认识中的位置和作用,第一,它与感觉经验直接相关,是外在和内在、感性和知性间的中介;第二,它与内在的、先天立法的理性不同,并不可逆地由理性决定。这与康德认为美学处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中间环节,黑格尔认为美学的中心课题是寻求“思维与存在、普遍性与特殊性、自由与必然、客观与主观、理性与感性”^{[7](P337)}等矛盾的和解相一致。意识形态在经验和观念间进行沟通,使得现象被纳入认知体系,这一“现象化”的过程也就是“美学”,作为认知方式的美学意识形态不关涉真实/虚假的二元对立。

德曼选取康德《判断力批判》中“数学的崇高”部分进行阐释,进一步说明人的认知(即美学意识形态)不是由人的认知能力所产生的本质性观念,而是一种形式上的“统一”。换言之,人们通常认为思维能够真实地把握客观事物,德曼指出,那是因为人已经在心理上限制了认知的范围而产生的虚假的“统一”,“数学的崇高”则成为揭示这一虚假性的崩溃点,以此说明人的认知只能在形式上对现象世界进行“现象化”。在康德美学中,“数学的崇高”是想象力与认识能力的关联,因而对应量与质的契机。“数学的崇高”发生于对大的领会达至极限(绝对的大)、人的想象力已经不能将对象统摄为一个整体(现象的无限性)的时刻,这时,想象力表现出它的局限和不适合性,并且是一种不愉快,“却同时表现出它的使命是实现与这个作为整体的理念的适合性”^{[5](P97)},

①关于“Aesthetic Ideology”的中译有两种,一种译为“审美意识形态”,另一种译为“美学意识形态”,笔者认为二种译法体现出对德曼理论的不同理解和侧重。“审美”侧重于德曼对传统审美的批判;“美学”侧重于德曼对传统审美进行解构后、重新揭示其认识论内涵。依据德曼在 Phenomenality and Materiality in Kant 一文中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收录在 Aesthetic Ideology 一书中的相关文章、并结合解构主义文论的特点,笔者认为,德曼对传统意义上的“审美”确实持批判态度,但也由此将“审美”放置在更大的哲学体系中进行重新解读,因此采取“美学意识形态”这一译法。

激起超感官的使命感的情感,因而又是合目的性的、愉快的。德曼从崇高的“量”的范畴开始,认为“大”或“有限”能够被心灵的统摄(comprehension)能力总体化、成为一个整体,“被数接受和表达的量,总是参考回度量的惯例统一的相关观念”^{[61](P75)};但随着领会(apprehension)无限地进行,统摄被推进得越远而变得越难,“感官直观的那些最初领会到的部分表象在想象力中已经开始淡化了”^{[51](P90)},有限的数转变为数的延伸,因此,统摄只能以一种“直觉”(intuition)的方式进行。“直觉”就是将数的延伸总体化为一个“轮廓”或者“图示”,但这只是形式上的而非先验意义的“总体化”,它与作为知觉或认知的能力无关,不属于哲学上的知性范畴,“不能够作为哲学原则被奠基,其仅是一个语言原则”^{[61](P78)}。

德曼绕道黑格尔的“象征”概念来说明,人的这种对外在事物在形式上予以“统一”的认知方式,实质上是语言的认知模式,并表现为“转义”的结构。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象征指任意的意象被接受进普遍的表象之中、又为着特殊性获得一种形象的定在,德曼认为,这既是精神不断提升自己的过程,也是语言的必然要求,因为“思维把被感知世界的无限特殊性和个体化过程纳入到自诩为普遍性的秩序原则之下,而这种占用过程的动因则是语言”^{[41](P251)}。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语言通常被看作普遍性的尺度,用以衡量特殊性的东西;当以词语指称某物时,“任何一个实词(有具体含义的词)本身已是普遍的概念”^{[81](P23)},因而完成了从感性事物向普遍原则的“反转”。德曼认为,这一特殊—普遍的连结就是语言的认知模式,人总是要将杂多的表象和感觉提升至抽象的统一,才能对世界予以把握。因此,人的认知方式实质是语言的认知模式,德曼以修辞中的“转义”(trope)来定义这种模式的结构,即一种形式上的总体化及随之产生的效果。将原属于古典语言学的“转义”修辞提升至认识论的层面,可以看出德曼受到维科把转义的4种修辞学特点和人类发展阶段的特点相结合、从而将语言修辞应用至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论领域的影响^{[91](P885)}。

德曼将“转义”视为认知模式的结构,并在两方面批判了这种结构可能引起的幻象。幻象之一是将“转义”的效果误认为物本身。德曼指出,意识形态仅是一种意指方式和指称效果,与“任何事物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41](P101)},却总是将自己神秘化,“包含心灵和世界、符号和事物、认知和感知的混淆”^{[101](P9)},使对存在的表征与存在具有同一性。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认为意识形态结构呈现为一个二级三度的符号意指模式,一级符号系统整体作为能指进入二级符号系统,所结合的新的所指即为意识形态,其结果是一种意指方式和一种不断将特殊物转化为固定形式的修辞,借助大众文化的手段,将人为的、特殊的事物变成自然的、普遍的理念^[11]。德曼认为,符号学的理论贡献之一即是指出意识形态将符号运作的指称效果强加于真实事物,“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的问题恰恰是混淆了语言现实和自然现实,或混淆了指涉物和现象性[物体自身]”^{[121](P11)}。幻象之二是认为美学意识形态是自足的、具有认知上的可靠性。德曼以认知的“双轴”结构来说明“转义”始终不能闭合(close off)自身,因而不能获得确定的知识。在句段中,语词可以在组合轴上连续不断地出现,人的领会能力随着视线的移动成功地发挥作用、不受任何阻碍;同时,心灵通过统摄能力对部分语词进行整合,纵向地获取聚集性的理解。认知在两个轴向上同时进行,意味着在整合语词、获取意义后,总会有其他语词外在于该意义,因此已获得的意义不得不重新转化为语词并再次进入整合的过程,这一从部分(part)到整体(whole)的转化使得整体(wholes)转而成为部分(parts)并不断地进行下去,“转义”结构无法保证知识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而成为一种伪认知。

既然人的认知仅是语言认知模式的“转义”结构、一种对外在事物进行形式上的“统一”及其效果,其既与物本身无关,又无法闭合自身,因此具有不确定性,换言之,人的认知具有根本上的

不确定性。因而,要获得可靠性和确定性,就不能在认知的范畴内对“转义”进行限制,只能转向非认知的述行模式。

二、断裂:从认知模式到述行模式

作为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德曼的理论构境始终没有离开语言,但如伊格尔顿指出,德曼的美学意识形态经历了从语言学到感性经验的现象学还原^{[13](P9)},即人不仅以语言建构世界,更加是以“语言的模式”建构世界。德曼认为,语言分为认知模式和述行模式,通过“转义”获得的认知具有不确定性,而非认知的述行则是稳定和终止转义的方式,因此从前者转向后者,从“本体论同一性和认识论同一性转向决心、行动和许诺,转向法定权力和履行式功能”^{[14](P35)}。英国哲学家J·L·奥斯汀提出,传统哲学认为记述话语是对事实作出的描述,但存在另一类话语,它不仅被认为是说些什么,而是表明话语的说出就是实施某种行为,即施事话语,二者分别以“真假与否”和“恰当与否”作为评判标准,却又无法截然区分,且“陈述的真理性或虚假性不只是依赖于语词的意义,而是依赖于你在何种情况情况下做何种行为”^{[15](P129)},即记述话语本质上也是施事话语。德曼挪用奥斯汀的记述话语与施事话语的区别,说明述行模式具有三个特征,一是与认知模式的独立性不同,二是与认知模式产生断裂、并对其予以抹除,三是具有非认知性的力量和效用。

第一,如前所述,人的认知连结主—客、心—物,将现象纳入认知体系,并在形式上予以总体化,因而,语言的认知模式始终保有与自然现象和感觉经验的原初联系。德曼认为,语言的述行模式恰与此毫无关联。他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中主观精神的“象征”和“符号”的区分,来说明语言结构的两个系统或两种模式在独立性上的不同。在《精神哲学》中,黑格尔将想象力的展开分为1)再生的想象力,只是促使意象进入定在,但这种想象力使得被唤起的意象彼此联系、进而提升至普遍的表象,因而是2)联想的想象力,但这种联想给予意象的只是主观的联系、具有外在性,理智的内在性却是具体的、自内确定的,因而理智在自由联结中明确地向自己内在化,把在直观中存在的总重建为一个证实了的实体,这就是3)创造性的想象力,是普遍和特殊、主观和客观、内在和外在的统一,包含“象征的幻想”和“符号的幻想”。具体来看二者的区别:普遍表象是模糊的和主观的东西,它要求具体和个别,因而在意象中给予自己以客观性,但其本质仍是主观的,所以理智在普遍表象形象化的时候依然遵循意象最初被给予的内容,即“象征”仍需要依赖外在的感性材料、仍需要选择感性材料与普遍化的确定内容相称的一方面进行表达,是“逻各斯和自然相连接的美学等同物”^{[16](P364)},因而还是有条件的、仅仅相对自由的;“符号”则“为了自己的证实不再需要意象的内容,而是自在自为地证实自己本身,因而是直接有效的”^{[17](P265)},即符号彻底脱离外在自然和感性经验,自己只与自己本身相结合。德曼也指出,符号“强调了在一切意指过程中必然涉及到的感觉成分,同想传达的意义之间那种关系的武断性”^{[4](P249)}。“象征”和“符号”间的区分与认知模式和述行模式间的区分具有同构性,语言的述行模式与现象和感觉无关,它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和自足性。

第二,述行模式独立、自足,却并非凭空而来,它产生于同认知模式的断裂,如德曼认为康德的第三批判在由“数学的崇高”辩证至“力学的崇高”的过程时产生了根本的否定和断裂、从“象征”到“符号”的运动是“理智必然从在象征中存在的主观的、由意象所中介的证实前进到普遍表象的客观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证实”^{[17](P265)},但断裂完成后,述行模式必须将认知模式抹除

(erase)。仍以黑格尔的“象征”和“符号”为例,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符号只有通过“清除掉直观的直接的和特有的内容,而给予它一个另外的内容充当意义和灵魂”^{[171](P265)}才能确立自己,即符号对原有的象征进行否定,使其作为“被扬弃的而存在”^{[171](P267)};此时,符号成为“一个时间中的定在”,“即声音,也就是正在表明自己的内心的充分说出来”^{[171](P267)}。德曼则从语言的普遍性的特征入手,认为语言只能言说普遍事物,因而唯独不能言说特殊的东西,由此在“我是什么”(特殊)和“我说什么”(普遍)之间始终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个“我”(个别)要想解决矛盾、重新认识自身,必须取消(undoing)“我”(特殊)、必须将外在的自然物质与感觉元素一并抹除,使其成为“一个已经不再是现在的‘过去’”^{[18](P21)}。但作为“过去”的象征正是作为“在场”的符号由之而来的源头,将“过去”抹除也就意味着“世界的不在场”^{[19](P18)}、意味着真实和真理的缺失。概言之,述行模式要抹除掉其由之而来的认知模式,以此终止认知的不确定,并转向自身的力量和效用。

第三,德曼认为,语言的认知模式与人的认知相关,语言的述行模式则与认知无关,因此具有非认知的特性,他通过康德“力学的崇高”来说明述行模式的“力量”(power),并直接关联到“效用”(affect)。在康德的美学体系中,“力学的崇高”是想象力与欲求能力的关联,对应关系和模态的契机,因而不同于“数学的崇高”,后者是想象力与认知能力的关联。“自然界当它在审美判断中被看作强力,而又对我们没有强制力时,就是力学的崇高”^{[51](P99)},即自然界首先被看作是一个恐惧的对象(因而具有强力),但因为这个对象激发了心灵的力量,揭示出人的理性能力具有胜过自然界的优越性。崇高的判断将想象力与理性的理念相联系,因而与人的道德情感相关,具有普遍性。德曼认为,人直接面对外在自然的“无限”时,用想象力进行统摄的失败“强迫我们在它的总体性中主观地认为自然本身作为超感性事物的再现”^{[20](P67)},即自然对人产生强力,但这也促使心灵发现自己独立且超越于自然,“真正的崇高”“通过这种可以在感性上表现出来的不适合而被激发起来、并召唤到内心中来的”^{[51](P83)}。因此,这种对抗自然强力的力量源于人的理性,它将依于自然经验的不充分性提升至理性观念的充分性、将自然的自由提升至批判性的自由,使得“作用于我们的决定性的命令,一个突然出现的全部特权,能够立刻宣泄从一个本体领域源初获得的理性的命令”^{[6](P150)}。可见,述行模式就是源于主体内心并作用于主体的“命令”或“律令”,能够产生行动力量和真实效果。

可以比照伊格尔顿和齐泽克关于康德的道德原则的论述,对述行模式的力量和效用所可能产生的误用进行考察。误用之一即述行与认知分离而走向无所凭依的“空”,伊格尔顿认为,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主体被排斥于“物自体”外、无法与客观自然产生本质联系,只能作为一种观察现实的形式。这样,本来是能动的主体反过来成为被决定的客体;因此,“要想获得自由和理性——简言之,成为主体——意味着要完全地自我决定,只服从于我自己所立之法,把我自己和我的行动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13](P65)},即人作为自由的主体与客体无关,主体是外在世界无法证实的本质存在,但也因之成为“一尊原始偶像”。误用之二则是将“律令”极端化至“绝对律令”,齐泽克同样指出康德的道德是独立于经验的先验原则,因而它排空内容、成为纯粹形式,对此形式的无条件服从即是绝对律令。绝对律令从现实原则来看是不可能的、无法执行的,但作为淫荡的超我指令则强制主体、“你能够,因为你必须”^{[21](P95)},由此,齐泽克继续拉康的观点将康德与萨德的联系起来,将道德义务和激情欲望联系起来。将认知抹除的述行容易滑入空无一物,却要求着主体的绝对服从。

三、解构：物质的铭写与“物质的事件”

由上可见，认知模式产生可能的幻象、述行模式产生可能的误用，且后者对前者予以抹除。问题在此转向：能否及如何对述行模式的力量和效用进行限制？德曼给出三条可能的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将述行降至一种审美实践或艺术装置，如席勒在面对外在自然的真实的危险和由此而来的惊惧时，将其转化为足以引起自我保存意识的想象的危险，并因人的理性和能力能够克服它而感到自由和游戏，但德曼认为席勒的审美思想不再是康德的科学的认识论和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问题，而成为一个经验的、心理学层面的问题；第二条路径是将述行降至自身的辩证法，即降至其所由而来的认知模式，述行建立在转义结构的效果上，但它退回至转义系统时，却会发生失真现象，致使全部转义系统都会成为述行产生的原因，且事后进行的释义本质上不再是“发生”；第三条、也是德曼最为看重的路径，是将述行模式吸收进历史的辩证法中。述行要将认知抹除以确立自身，但在根本上，这一抹除不可能完成，“物质的铭写”的认知图示与述行始终并置并对后者进行解构，使得“物质的事件”插入(insert)至述行的事件中，实现历史的辩证。具体来看第三条路径：

美学意识形态与现象和感觉直接相关，将其结构成为形式上的“一”，德曼认为，这实质上是一次“物质的铭写”。首先来看“物质”(material)，借助现象学有助于说明这个概念，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区分了“存在”(Being)和“存在者”(beings)，但仍遗忘了“在场”(presencing)和“在场者”(what is present)间的区别，“在场者”是在澄明敞开的无蔽中进入存在之物，“在场”则处于存在“之前”(prior)，通过抹除并铭写自身于“在场者”中^{[18](P24)}。德曼的“物质”并非已对此在揭示意义的“在场者”，而是居先于存在、因而居先于认识的东西，具有：1)无深度性，排除了任何语义学上的深度，排除了任何反映或知性的完成，“在表象之下并没有其他东西”^{[22](P168)}；2)无实质性，没有质上的差别，仅是一种“量的差异”^{[23](P65)}；3)空间性，“是些彼此相外的个别东西”“是彼此并列和彼此相续的”^{[24](P72)}，不具有意义发生的时间性结构。人在与物质照面时，未曾向心灵显现(no mind)的“物质”突然地、随机地、也是过度地“进入心灵”(comes to mind)^{[25](P4)}。

其次来看“铭写”(inscribe)，“前认知”的物质进入认知模式的“转义”结构，将自身“铭写”入一个抽象的“图示”，从而摆脱在自然界中的直接性，“感性直觉的内容成为一个图示，将它自己从直接和单一中解放出来，为了概念化进程的进行”^{[18](P77)}。这一物质—图示的“铭写”过程关涉时间问题，可借由德里达的“文字”理论进行说明。非能指、音素或字素^{[26](P119-120)}的物质是纯粹感性的东西，没有差别、完全同质，因而缺乏代替自身的能力，不会产生任何代替或补充的活动。换言之，如果没有人将之纳入表象，它们就是完全自在的，在空间中分散并保持静止。但物质要在人的原始的协同性和原始的联觉中将自己纳入一个“内心”印象、将自己“铭写”入一个形象，一方面作为精神的替补补充自然的东西，使得充替运动发生^{[27](P258)}，充替运动发生在超越性运动之前、发生在“现在”之前；另一方面则作为“在场的起源”的前夜，将要关联所指、达至“现在”。因此，从物质到图示的“铭写”过程，就是“最初的在场和它的在最终在场中循环的再次挪用”^{[18](P71)}。纯粹感性的外在现象以丧失自身的感性内容为代价，将自己“铭写”入一个抽象的图示，这个图示也因此保有过去的“记忆”，“记忆”“被保存为一个无意识的存在，不被感知地保存”^{[18](P77)}。

但语言的述行模式为了自身的力量和效用，必须将认知模式予以抹除。德曼认为，这种抹除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德曼对黑格尔“象征”和“符号”的解读受德里达《深洞与金字塔：黑格尔符号

学介绍》一文的影响,在此文中,德里达论述了抹除无法完成的原因。德里达认为,符号通过否定直观的感性空间性,将自身转变成时间化的要素,作为时间存在的就是声音、在场、精神的自我关联和显现;但是,没有不依赖于物质的纯粹声音,“这一我们刚刚说过的事实不仅是一个经验的事实,它是一个本质的律法的例证,这一律法不可缩减地限制目的论理想的实现”^{[18](P95)},能指的物质性始终阻止精神的完全在场,铭写入能指的原始文字及“自身无目的无限生成过程”^{[27](P65)}以“记忆”的方式让精神徘徊在“多义”之中。德曼同样认为,述行模式对认知模式。履行对转义进行取消的时候,只能取消转义产生的效果部分,却无法取消转义作为一种图示的存在。抽象的图示始终与述行并存,且这一图示能够“召唤一个缺席的、死去的或没有声音的实体,并设定该实体作出回答的可能性,赋予它说话的能力”^[14],即语言的述行模式抵制通过转义而来的“现象化”。但是建立在转义系统底部的是作为它们可能性的物质的质料,作为“记忆”的物质仍以抽象的形式显现自身、以不在场的方式在场,且总要以将来到场的方式复活自己,对述行模式进行打断。概言之,述行的力量和效用无法完全施行,它不可避免地被保留于认知图示中的“前认知”的、无意义的物质所阻止。

德曼的理论含括人认知和建构世界的各方面,如希利斯·米勒指出,德曼是对“整个人类生活的活动场所和基础”^{[28](P48)}进行思考。且各领域间存在同构性,原因在于德曼的各概念并非实体性的,而是关系性的。语言的认知模式即连结现象和认知的转义结构及效果,语言的述行模式即从认知而来又对其进行抹除的力量和效用,物质则既参与认知、又使认知具有不可靠性,既被述行压抑,又作为潜在的可能性颠覆它。安杰伊·沃明斯基将其概括为“三个‘语言的模式’:转义的、述行的、铭写的”^{[25](P15)}。因此,整个关系场域中存在着三种力量,一种是认知的形式效果强行加于事物的力量,一种是述行的“履行式”的力量,第三种是物质的“原始的力量”。德曼的理论从始至终围绕“批评性的语言分析方法”^{[12](P121)},分析三种关系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解构,既包括主体观、也包括历史观,既包括对文学文本的分析、也包括对政治性问题的批判。

以德曼前期对卢梭的《忏悔录》所进行的解构主义批评为例,他认为,“忏悔是以真理的名义克服罪孽和羞耻;是对语言的认识论的运用”^{[4](P264)}。“忏悔”在文本中是一个“占有欲望”的转义过程,偷窃丝带(对丝带的欲望)意味着卢梭对玛丽永的欲望、卢梭的偷窃又必须由玛丽永代替实施(幻想中玛丽永对他的欲望),却表现自己为“自为”存在的绝对真理;同时,“辩解就是他称之为敷衍性(performative)言说”^{[4](P267)},“辩解”在文本中是以隐瞒的方式重述暴露自我的欲望,并对占有欲望进行压抑;但还存在第三种类型,在卢梭被盘问时不假思索地说出玛丽永的名字,“不假思索”使得欲望、兴趣和名字选择间的因果关系彻底断裂,“玛丽永”因而成为一个“自由能指”、与其他能指无异。这个自由能指先于认知和述行,既可以参与到转义链中,也可以凭借自身的无动机性打断所有辩解。因此,在文本中,认知与述行、创建与消解同时存在。德里达在谈及文学时也指出,“文学作为历史性建制有自己的惯例、规则等等,但这种虚构的建制还给予原则上讲述一切的权利”^{[29](P4)},他认为,一方面,文学的叙述性虚构是一种创始的发生,它既是述行的、也是述事的,“为了成功,该行为必须通过指涉某些事态来使人信服,但为了成功,它也必须创造出它指涉的事态”^{[30](P131)},另一方面,创始言语同时讲述并不在场的“记忆”、讲述未能发生的事,使它们从当下被抑制的状态中释放出来,这就让讲述无法结束或建制无法完成。

政治性问题同样在德曼的关注之内,他对康德、黑格尔、席勒、浪漫派等的美学考察具有政治维度。德曼提及选择美学作为分析政治性问题、揭示政治运作的场域,是因为“美学并不将它的

身份和它所描述的行动混淆起来,它因此更加意识到话语和行动之间的差距”^{[3](P100)},美学和意识形态作为根本上的认识论问题,能够揭示出政治话语和政治行动间吊诡的自毁关系。从美学意识形态作为形式上总体化了的“一”来看,“这种普遍的政治—转义运作被称为‘霸权’”^{[25](P230)},它将不可化约的差异性强行统一到单一的社会结构和观念体系中,将异质转化为同质,并强迫他者接受普遍意志。但美学意识形态与原初的“物质”关联,与前认知的、纯粹差异的感性个体关联,这使得它在面对非认知的行动暴力时能够释放潜在的抵抗力量。当代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同样对个体和构序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认为“治安”是一种社会性的象征结构、共识下进行监控管理的整套秩序,目的是实现社会的有序性;而“政治”是对“治安”的社会构序的打破,使得原本在共识秩序下的不可见者可见,不被理解的“牛哞”成为可被听见的话语^{[31](P39-42)}。朗西埃是在个体—构序的二元关系中、强调感性个体的非同一性及对现有秩序的扰乱,德曼则在个体—话语—行动的三元互动中、分析更为复杂的力量关系及相互解构,美学意识形态既可以作为政治话语的虚假统一,也可能释放出抵抗行动暴力的感性力量,因而打破了英法和德国真理/意识形态间的对立。这体现出当下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某种趋向,如齐泽克将“征兆”作为分析和批判意识形态的关键要素,将其分为“阴性”和“阳性”两类,阴性概念意味着征兆作为结构现实社会的快感—符号方式、现实已经为意识形态所中介,阳性概念则将征兆视为一个对现实秩序进行扰乱的因素,“因为它必然包含了一个特殊个案,该个案将打破意识形态普遍原则的一致性,暴露其虚假性”^{[21](P16)},意识形态在与现实的更为多元的关联中被重新审视。

德曼也提出自己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不应被认为是进步或退步的过程,不是由转义而来的认知。相反,历史是一个发生(occurrence)或一个事件(event),是“战役”“力量”等发生的时刻,是只有述行才能够产生的事件^{[6](P133)},它恰与认知断裂。但述行的历史无法抹除认知的形式,此形式能够召唤“前认知”的物质领域,“为了改变领域,为了介入历史,因此允许可改变的未来可能性,它使得那些现在被规定的拥有一个铭写的重塑”^{[25](Pviii)},这一被压抑的物质的重新释放,这一物质对述行的打断即是“物质的事件”,也即历史的辩证。随之而来的则是真正的时间,来自过去的记忆构成现在,并将自己投向将来,在“一个理想性的时间里,这种时间永远不是此时此地,而总是一种过去和一种无休止的未来”^{[4](P249)}。汤姆·科恩等人指出德曼的历史观与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的关联,本雅明提出,历史并非进步的、空泛的线性时间,“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意味着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出来时将其把握”^{[31](P267)},作为“单子”的历史主体为了被压迫的过去而朝向未来、爆发革命,以打破同质的历史结构并获得拯救。德曼则更为强调建基性的“述行的事件”和颠覆性的“物质的事件”间相互并置且不可调和,“历史无法成为历史”。

参考文献

- | | |
|---|--|
| [1][英]大卫·麦克里兰. 意识形态[M]. 孙兆政等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 [2][澳]安德鲁·文森特.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M]. 袁久红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 [5][德]康德. 判断力批判[M]. 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 [3][英]马丁·麦克奎兰. 导读德曼[M]. 孔锐才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 [6] Paul de Man. Aesthetic Ideology[M]. Minneapolis/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 |
| [4][美]保罗·德曼. 解构之图[M]. 李自修译. 北京: | [7]朱立元. 黑格尔美学引论[M]. 天津:天津教育出 |

版社, 2013.

[8] 邓晓芒. 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9] 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 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一卷)[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

[10] [英] 特里·伊格尔顿. 美学意识形态[M]. 王杰、付德根、麦永雄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11] [法] 罗兰·巴尔特. 神话——大众文化诠释[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167.

[12] Paul de Ma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M]. Minneapolis/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13] [英] 特里·伊格尔顿. 美学意识形态[M]. 王杰、付德根、麦永雄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14] [法] 雅克·德里达. 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M]. 薛梓骅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15] [英] 约翰·兰肖·奥斯汀. 如何以言行事[M]. 张洪芹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16] [美] 弗兰克·伦特里奇亚. 新批评之后[M]. 王丽明等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7] [德] 黑格尔. 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三部分)[M]. 杨祖陶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8] Jacques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M]. Translated by Alan Bass. Brighton: The Harvester Press, 1982.

[19] [法] 雅克·德里达. 声音与现象[M]. 杜小真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20] Andrzej Warminski. Ideology, Rhetoric, Aesthetics: For de Man[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21]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高客体[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22] [美] 林赛·沃特斯. 美学权威主义批判——保尔·德曼、瓦尔特·本雅明、萨义德新论[M]. 昂智慧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3] [法] 吉尔·德勒兹. 尼采与哲学[M]. 周颖、刘玉宇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24] [德]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25] Tom Cohen and others. Material Events: Paul de Man and the Afterlife of Theory[M]. Minneapolis/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26] Jacques Derrida. Glas [M]. Translated by John P. Leavey, Jr., and Richard Rand.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2.

[27] [法] 雅克·德里达. 论文字学[M]. 汪堂家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28] J. Hillis Miller. The Ethics of Reading: Kant, de Man, Eliot, Trollope, James and Benjamin[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29] [法] 雅克·德里达. 文学行动[M]. 赵兴国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30] [美] 乔纳森·卡勒. 理论中的文学[M]. 徐亮、王冠雷、于嘉龙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31] [法] 雅克·朗西埃. 歧义: 政治与哲学[M]. 刘纪蕙等译.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32] [德] 瓦尔特·本雅明. 启迪: 本雅明文选[M]. 汉娜·阿伦特编. 张旭东、王珽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8.

【责任编辑 刘绚兮】

(上接第130页)

发展[A]. 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编. 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妇女运动[C].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33]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委员会党史办公室编. 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M]. 海南行政区委员会党史办公室, 1986.

[34] 中共文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文昌县组织史资料民主革命时期部分送审稿[M]. 1987.

[35] 动员农村妇女参加抗日战争[A]. 黄秀华, 高惠平等编. 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5[G]. 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广东省档案馆, 1991.

[36] 全国妇联. 中国妇女运动史 1919—1949第五编[M]. 全国妇联编印, 1988.

[37] 琴秋. 动员妇女参战与保护妇女切身利益的关系[N]. 解放日报, 1941—10—12.

【责任编辑 刘绚兮】

主要城市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分析*

——兼论提升深圳高等教育竞争力路径

郑婉茵 王艺儒 黄卫华

(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 广东 珠海 519000)

[摘要] 以中国20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 构建城市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评价体系, 利用因子分析模型, 借助高等教育现状竞争力、经济科技支持竞争力、环境支持竞争力等指标对比得出城市排名, 对城市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进行横向分析评价。基于因子分析的结果, 以深圳市为例, 采用深圳市近年来高校规模、教学水平、科研水平等指标构建纵向评价体系, 就提升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提出发展思路 and 具体意见。

[关键词] 高等教育 潜在竞争力 因子分析 深圳

[中图分类号] G64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 (2020) 03-0151-07

一、绪论

近年来, 随着国家经济加速转型升级, 科技创新能力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显著。而高等院校作为培养具有高素质、高知识、高能力的人才的摇篮, 作为聚集科研机构与各行业高新技术人才的重镇, 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目前高等院校有以各个城市为中心, 逐步集中分布的趋势。因此, 以省会城市和主要城市为对象, 通过分析比较城市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来研究城市高等教育发展很有必要。然而, 目前在全国重点城市的高等教育发展状况中, 广东省深圳市的高等教育

收稿日期: 2020—03—09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国家一般项目“高等教育集群发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机制研究”(BGA190051)

作者简介: 郑婉茵,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合作、区域经济研究; 王艺儒,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合作、区域经济研究; 黄卫华, 博士, 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合作和金融发展研究。

发展更值得关注。深圳,是以高科技产业发展作为整个城市的主导发展方向的城市,其高等教育情况明显不能与城市发展规模相符。以高等院校数量为例,截至2017年,北京市和上海市的高等学校分别为91所、64所,而深圳仅有12所。考虑到深圳作为我国目前科技创新代表城市和改革开放的榜样城市,研究深圳的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主要城市和省会城市通常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省(自治区)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中心,拥有着远远不同于其他普通城市的各类优质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整个省区的综合实力的能力。由于主要城市和省会城市具有的这一代表性作用,并且考虑到选择区域的整体性和横向可对比性,因此选取各省(自治区)的省会城市和一些全国主要城市共计20个城市为样本,构建城市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定量横向评价不同样本城市的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为将来研究城市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新的切实可行的评估和参考。

同时,在进行横向评估之后,对城市多方面进行考虑,以深圳为例,从而进一步研究城市潜在教育竞争力的提升问题。深圳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同时也是一个创新型城市。但是与深圳城市经济政治发展规模相比较,由于高等教育发展起步晚,所以一定程度上深圳的高等教育依然存在着教育数量规模、科研水平、教学水平与深圳的社会经济水平不适应的严重问题。深圳的高等教育现阶段并不能为深圳经济、政治和科技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对深圳近些年的高等教育发展采用纵向对比分析,为城市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提出可行的建议,并落实到具体。

二、文献综述

高等教育现有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是内涵不同,具有明显差别概念。李鸣^[1]定义了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指某一高等教育所拥有的,由先进高等教育理念与组织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价值创新多方面整合而成的一种关键能力。基于其教育竞争力研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定义了高等教育竞争力,也就是说,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即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产出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和能力,其内涵包括:高等教育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对人力资源的贡献,高等教育对经济的贡献,以及高等教育对知识创新的贡献^[2]。在此基础上,可类比得到城市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的定义,即不单单指目前城市已有的高等教育水平现状,而是反映出未来城市高等教育的发展潜力和能力,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和根本所在。

国内关于教育竞争力的研究是从21世纪初开始的。根据已有文献,教育领域的学者主要是借用已经定义的城市竞争力概念,以教育作为研究对象,来界定教育竞争力。^[3]目前,国内学者研究以城市为对象的高等教育发展情况主要集中在基于目前已经存在的教育现状,对现有的高等教育进行评价。雷俊^[4]将高等教育竞争力指标分为“软件”和“硬件”两部分,将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得到各指标所占权重,对于全国29个主要城市,借助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了城市高等教育竞争力,并将高等教育竞争力评价与城市竞争力评价进行对比和关联度分析。国外学者 Alexander W. Austin^[5]建立了包括接受、参与高等教育的机会和高等教育环境在内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Glass, J. G.^[6]认为高等教育社会产出是评价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关键指标。

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对高等教育竞争力评价和构建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作为其中的重要分支,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家或各个省份以及各个城市,包括河北省、陕西省等。但是以提升城市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为研究目标,就具体城市发展给出有针对性指导意见的已有文献数量并不多。唐

金玲^[7]等从增强大学的人才培养能力、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推动高校学科和实验室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的对策。孙婧^[8]在对山东省高等教育进行实证研究后,提出了包括对高等教育增长适度控制、进一步扩大研究生规模、加强重点高校建设、政府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力度、提高高校办学效率等九项建议。通过对目前已有的文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以城市为例,结合城市自身发展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看到自身发展的优势和劣势,从而研究其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的提升途径,非常具有应用价值和社会意义。

三、指标构建和研究步骤

(一)城市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要准确地横向评价城市高等教育的潜在竞争力必须选取有效的评价指标和构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城市高等教育的潜在竞争力是结合不同城市现状教育竞争力、当前城市经济水平、国家政策、环境影响等因素综合横向评价得出的总评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高等教育未来潜在的竞争趋势。本文从经济科技支持竞争力、高等教育现状竞争力、环境支持竞争力三个角度选择了10个指标构建城市高等教育的潜在竞争力横向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7年各省(自治区)的省会城市和一些全国主要城市共计20个城市的统计年鉴,以及科技部,国家统计局网站。

表1 城市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横向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城市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 评价体系	经济科技支持 竞争力	地区生产总值
		政府教育投入的经费
		人均可支配收入
		专利授权数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高等教育现状竞争力	高等学校数量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比例
		高等学校专任老师
	环境支持竞争力	年末常住人口数量
		交通水平(年客运量)

(二)因子分析模型构建

由于不同数据有不同的单位和不同的变异程度,所以首先应该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使得不同数据能够同时进行分析。采用SPSS软件对20个省会城市和主要城市的标准化指标进行相关度检验。对样本进行分析,KMO检验值为0.701,Bartlett球度检验sig的值为0.000,表明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提取了三个主成分使得因子提取中主成分法默认的特征值大于1,代替原来多个指标变量,从而可对这三个主成分进行综合分析。三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7.749%,可以说明提取的三个主成分因子保留下原始样本数据大部分的信息。一定程度上,因子分析的降维使得对于城市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的评估的数据复杂性得到了很好的处理,在数据处理上得到相当程度上的简化。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城市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横向评价的结果分析

使用SPSS软件中的因子分析中的回归法自动生成各因子得分,借助各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对不同主因子进行计算,计算得到不同城市之间的城市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综合得分,在全国20个省会城市和主要城市间通过因子综合得分的高低进行排序(见表2)。

表2 全国20个城市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综合得分及排序

城市	第一因子	第二因子	第三因子	综合得分	综合排名
北京	2.14658	1.45432	-0.63737	1.45960	1
上海	1.90537	0.26587	0.00583	1.15006	2
广州	0.65818	1.46275	0.67842	0.73995	3
深圳	1.88389	-2.03652	-1.34811	0.53979	4
南京	0.42611	-0.1474	2.04814	0.42629	5
武汉	-0.24963	0.97374	1.57243	0.21195	6
杭州	0.49723	-0.74833	0.01881	0.13895	7
合肥	0.25701	-0.63043	0.92235	0.11705	8
天津	0.21092	0.13524	-0.39669	0.10757	9
西安	-0.51107	0.33523	0.80642	-0.14444	10
长沙	-0.51086	0.12177	0.71393	-0.19636	11
重庆	-0.69946	1.89896	-2.34341	-0.26490	12
哈尔滨	-0.58535	-0.23311	0.81833	-0.29922	13
福州	-0.17936	-1.04311	-0.28654	-0.34052	14
郑州	-0.78412	0.27415	-0.34159	-0.43171	15
成都	-1.05179	0.77112	-0.67346	-0.52081	16
沈阳	-0.77426	-0.21402	-0.32669	-0.52178	17
长春	-0.95087	-0.24994	-0.30093	-0.62792	18
呼和浩特	-0.57842	-1.38367	-0.32887	-0.64238	19
兰州	-1.1101	-1.00663	-0.601	-0.90117	20

从表2中可以看出,虽然都是省会城市和主要城市,但不同城市之间的城市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还是有很明显的差距。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武汉、杭州、合肥和天津的城市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综合得分大于0,明显领先于其他省会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四个超大城市,分数更是具有极大的领先优势。而西安、长沙等11个城市的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的综合得分都小于0,表明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较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从主因子得分来看,北京、上海、深圳在第一主因子上得分最高,表明其城市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主要来源于高等教育经济科技支持竞争力;其次是广州、杭州和南京,虽然由于城市规模和经济体量的原因,其竞争业绩不如北京、上海、深圳,但是也远高于平均水平,表明这些城市接下来可以继续发展经济科技支持竞争力水平,在现有优势上进一步提高;剩余14个城市在第一主因子上的得分都较小,目前的高等教育经济科技支持竞争力较低。

第二主因子表征的是城市现状高等教育竞争力,北京、广州、重庆因为高等院校的规模和在校

学生数量庞大,发展潜力最为强劲,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呼和浩特、兰州、福州等城市由于城市高等教育院校规模小以及城市本身对于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有限,因此现状高等教育竞争力较低。

第三主因子表征的是城市环境竞争力,随着全社会对于环境质量的重视程度加剧,优良的城市环境也可以作为吸引优质高等教育人才的重要竞争力因素。北京、上海的环境得分都在1分以上,城市基础环境最好,广州、深圳、南京等七个城市的环境支持力相对较好,得分在0~1之间;西安、长沙等11个城市的得分均为负值,交通和人口水平较弱,环境竞争力不强,对人才吸引能力有限,在城市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上表现依然较弱。

(二) 深圳市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分析

深圳作为高等教育的重点发展城市,在进行横向对比后,可以看出综合得分排名在全国20个城市中排名第4,综合得分并不低,也就是说,深圳的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占据优势的。因为深圳在占比最大的高等教育经济科技支持力,即第一主因子上占有绝对优势,政府资金雄厚,经济发展较快,经济科技水平较为突出。但可以看见的是,虽然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大力扶持,同时积极建设以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为首的优质高等院校,但由于发展时间短,发展规模较小,发展力度不够,目前与其他城市相对比,还不能形成核心有效的竞争力。因此可以看到表现为高等教育现状水平的第二主因子上还是与其他城市存在一定差异,并且差距较大。横向对比研究关于北京和深圳在高等教育现状水平的差距,从整个高等教育的高校规模、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等指标上进行分析,认识到深圳目前在高等教育规模、教学水平和研究水平上存在的不足:

表3 北京和深圳在教育现状水平的差距对比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北京	深圳
高校规模	普通高等院校数量(所)	91	12
	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万人)	58.84	9.19
	校舍总面积(万平方米)	3860.42	365.30
	公共教育经费支出总额(亿元)	887.38	414.72
教学水平	中科院院士与工程院院士数(人)	567	16
	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数量(人)	146082	9741
	普通高等学校专任老师数(人)	69374	5092
科研水平	专利申请量(项)	189129	145294
	专利授权量(项)	100578	75043
	高等院校R&D经费支出(万元)	160.44	10.56

资料来源:北京市、深圳市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网站

通过与北京对比,可以看出深圳作为一个经济技术增长较快的城市,在科研水平方面的成就,和北京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如专利授权和申请数量。从原因上来看,这得益于资金充足、高速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政府人才引进政策等因素。此外,深圳也有在加快高等教育的改革步伐,比如近年来清华北大等高校将研究生院设立在深圳,在引进高端创新型人才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深圳的劣势也很明显。很多的专利成果都来源于高新技术企业,而企业的人才很多都是从教育发达的地区引进的,属于深圳本地高校的高新技术成果较少。一方面是由于高等教育发展时间短,短时间内高等院校数量较少,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少,缺少属于深圳的知名老牌高校。另一方面教学水平也跟不上深圳社会经济的发展。高等学校专任老师人数相当缺少,教育资源缺乏,以

至于对外地高等教育学子的吸引力大大降低。给予高校的科研经费比较少,以至于高校的科研水平在发展上受到了一定限制,难以与深圳的科技实力相匹配。

五、深圳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提升建议

(一) 深圳高等教育现状分析

对深圳历年的高等教育发展指标进行纵向对比,从多个指标来研究近些年来深圳自身的高等教育发展情况,从中寻找深圳高等教育自身可发展情况,为深圳高等教育提出具体可实施的建议。

表4 深圳市近年高等教育发展现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高校规模	普通高等院校数量(所)	10	10	12	12
	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万人)	82401	87674	90112	91883
	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增长率(%)	0.0904	0.0640	0.0278	0.0197
	公共教育经费支出总额(亿元)	287.73	329.41	288.55	414.73
教学水平	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数量(人)	7603	8057	9061	9741
	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数量增长率(%)	0.1143	0.0597	0.1246	0.0750
	普通高等学校专任老师数(人)	4184	4462	4862	5092
	普通高等学校专任老师数增长率(%)	0.0759	0.0664	0.0896	0.0473
科研水平	专利申请量(项)	80657	82254	105481	145294
	专利申请量增长率(%)	0.1029	0.0198	0.2824	0.3774
	专利授权量(项)	49756	53687	72120	75043
	专利授权量增长率(%)	0.0225	0.0790	0.3433	0.0405
	高等院校R&D经费支出(万元)	24518	27566	81659	105573
	高等院校R&D经费支出增长率(%)	0.3943	0.1243	1.9623	0.2929

第一,在高校规模方面,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高校规模的各个指标中,普通高等教育院校数量、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和公共教育经费支出总额都在逐年递增,但就增加幅度来看,高校规模上的发展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缓慢的时期。而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增长率处于下降趋势,增长率从9.04%下降为1.97%,说明高等教育在校人数的增长速度逐渐变慢,表明深圳高校对于高等教育学子的吸引力还有待提升。

第二,在教学水平方面,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数量和普通高等学校专任老师数也在逐年增加,但可以看得出来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数量增长率和普通高等学校专任老师数增长率发展不规律,从7.59%下降为4.73%。高校专任老师的缺少,直接影响教育资源,影响到高校规模,同时对于高等教育学子的吸引力大大降低,会阻碍深圳市高等教育潜在竞争力的发展。

第三,在科研水平方面,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增长非常迅速,专利申请增长率从10%上升到37.74%,专利申请量增长率和专利授权量增长率在数值上相当可观。但可以看出,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的增长代表着深圳市创新力的发展,远远超过了高等教育的教育规模和教学水平的发展速度,目前的高等教育水平很难支持该市的经济科技创新水平。但是,高等院校R&D经费支出也

增长得很快,不过在GDP发展迅速的情况下,高等院校R&D经费支出增长率反而从39.43%下降到29.29%,说明该市在高等院校科研方面投入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

(二) 横向评价建议

在基于因子分析的横向评价中,对比其他的城市,深圳高等教育的经济科技支持力占有绝对优势。近些年来,在改革开放和新兴产业的带动下,深圳经济发展迅速,科技创新水平高。但在高等教育现状竞争力方面,深圳还处于弱势,对比其他省会城市和主要城市,差距较大。因此深圳应该认识到高等教育的现状,积极改善和发展高等教育,破除经济科技与文化教育之间的不平衡倾向,发展经济政治教育环境全方位的领先地位。

(三) 纵向评价建议

在基于深圳市高等教育现状的各种指标中,对比自身其他年份,深圳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指标值一直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但很明显的是,高等教育的发展相当缓慢,难以匹配深圳近些年在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发展速度。在高等教育现状的发展上还应该持续改进。

第一,在高等教育规模上,应该积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高校,同时引进名牌高校在深圳建立新的校区,提升深圳对高等教育学子的教育吸引力,从而增加高等教育在校人数,扩大高等教育整体规模。适当提高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大力支持全市高等教育发展。

第二,在高等教育教学水平上,应当积极引进教育人才,提高教师福利保障和住房保障,保障深圳高等教育学院专任老师的基本需求和学术需要;在保证人才不流失的情况下,提升教师本身的专业素养,打造更好的教育发展平台。

第三,在高等教育科研水平方面,应该积极建设高等教育学院科研实验室,鼓励学生老师创新创业发展,设立专门奖项和资金支持,提供更多的科研竞赛活动,加大高等教育科研经费投入,为高等教育科研事业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 [1]李鸣. 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的界定与提升策略[J].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2007(2): 143-145.
- [2]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高等教育竞争力: 模型、指标与国际比较[J]. 教育研究, 2012(7): 122-129.
- [3]倪鹏飞,刘峥. 中国城市教育竞争力比较研究——以长三角16城市为例[J]. 现代教育管理, 2012(03): 1-6.
- [4]雷俊. 高等教育竞争力评价与城市竞争力相关性度量[J]. 高等财经教育研究, 2012, 15(01): 9-15.
- [5]Alexand W. Astin. Assessment for Excellence: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of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M]. Westport : the Oryx Press, 1991: 38-94.
- [6]Glass, J.G. etc. The Achievement of Scale Efficiency in UK Universities: A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 Analysis [J]. Education Economics, 1995(3): 249-263.
- [7]唐金玲,曹霞. 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的对策[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8(11): 205-206.
- [8]孙菁. 山东省高等教育竞争力实证研究[D]. 济南: 山东财经大学, 2014.

【责任编辑 刘婉华】

Abstract

Evaluation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Based on Projection Pursuit Model of Genetic Algorithm——Data from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CHEN Gang, XUE Li & ZHANG Bi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is constructed. The multi-index cross-sectional data of 31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China in 2018 are selected, and the Real Code Accelerated Genetic Algorithm Projection Pursuit (RAGA-PP) model is used to realize linear projection dimension reduction. According to the linear projection values,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is carried out, and on this basis, the province-level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of our country is analyzed by region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our country'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are put forward.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educational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Future Income of Migrant Workers——Based on CFPS

ZHANG Nannan & CHEN Shanquan

Cultural consumption can be regarded as an expression of cultural capital and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economic returns (such as incom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n-educational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the future income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from 2014 to 2016 by using the data of China's family tracking survey in 2014 and 2016. First of all, the study found that migrant workers' investment in non-educational culture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ir future income. Secondly,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relevant theories focused on this study, namely, the change of recruitment and promotion related processes and the path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can not explain their prediction ability. Finally, through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non educational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future income of migrant worker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demands of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we believe that a reasonable cultural consumption policy will be an innovative path to increase income and improve poverty in the futur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overty eradication research.

Political Elite Formation in Rural China: Political Loyalty, Market Capacity and Social Capital

ZHUANG Yuyi & HU Rong

Who will become political elites in rural China? Applying existing research framework,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oles that various factors play in the formation of rural political elites from the lens of political loyalty, market capacity and social capital. We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assumptions and utilize a survey dataset based on 1,047 villagers in Hunan, Hubei,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 to test th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rty membership, education background, work experience, household income, family background, and social network in rural area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elit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in current China, economic elites, cultural elites and social elites can be effectively recruited and transformed into political elite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political systems in rural areas are open and dynamic.

Guangdong Women's Move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during the All-round Anti-Japanese War

ZHAO Jiajia

During the All-round Anti-Japanese War, the Guangdong Women's Movement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rew fastly. Local women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anti-Japanese propaganda, material supplies, combat support, intelligence work and even armed fight, making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vic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In this process, CPC also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women's movement.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establishment of various women's organizations,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libe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front have all contributed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Guangdong.

Substance, Paraphrase and Narration: Cognitive Structure and Language Mechanism of Ideology——on Paul de Man's Theory of Aesthetic Ideology

SUN Yunfei

Paul de Man connected ideology with aesthetics in epistemology, and thought that both of them were "phenomenology of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process". The essence of aesthetic ideology is the "trope" structure of language cognitive mode,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object itself and cannot close itself off, so it has uncertainty. In order to stop the uncertainty of cognition and turn to its own strength and utility, the mode of narration and action should erase the cognitive mode from which it comes. But de Man thought that this erasure could not be completed. The matter had been written in the diagram of "trope", and it was always juxtaposed with the line pattern, and the latter was interrupted by the way of coming to the scene in the future. The aesthetic ideology theory of de Man reveals the self-destruc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political action from the internal logic of language mechanism, refers to a certain trend of ideological theory development today, and puts forward the historical view of "material events".

《深圳社会科学》“庆祝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专辑征稿启事

2020年是深圳、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为系统总结经济特区建立40年来的创新经验和发展模式，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立论，对时代发展做出富有特色的理论阐述，《深圳社会科学》杂志拟于2020年第5期(9月)出版“庆祝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专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稿。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考选题

- (一) 经济特区发展的历史进程、主要成就与成功经验研究；
- (二) 经济特区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 (三) 经济特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研究；
- (四) 经济特区发展模式和典型案例研究；
- (五) 经济特区的世界比较研究；
- (六) 经济特区的深圳模式与深圳经验研究；
- (七) 经济特区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研究；
- (八)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研究；
- (九) 新时代经济特区创新发展研究；
- (十) 经济特区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研究；
- (十一) 经济特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研究；
- (十二) 经济特区40年思想观念发展研究；
- (十三) 经济特区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以上所列选题为参考范围，作者可在此范围内自定具体题目撰写论文。

二、征稿要求

(一)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主题鲜明，观点正确，文献资料翔实，具有学术原创性，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 立意新颖，逻辑严谨，语言流畅，文风朴实，有较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三) 符合本刊投稿规范，电脑字数在8000-15000字之间(含图表、注释、参考文献)，具体要求详见“本刊启事”。

三、投稿方式和稿酬标准

请于6月30日前，将论文电子版(要求为word版本)以附件形式发送至本刊邮箱：szshkx@szass.com，邮件标题注明“特区40年专辑投稿”。

经审核录用的稿件，给予每篇6000~15000元稿酬，优稿优酬。

《深圳社会科学》编辑部

2020年5月

本刊启事

《深圳社会科学》是深圳市人民政府主管、深圳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理论刊物。双月刊，逢单月10日出版。本刊以“全球视野、中国气派、深圳特色、时代精神”为办刊宗旨，以开放性、时代性、前瞻性、创新性为刊物特色，努力反映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成果。欢迎投稿，欢迎订阅。现将有关来稿规范要求说明如下：

一、本刊征稿范围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论文，常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研究”“‘一带一路’研究”“经济特区与改革开放研究”“深圳研究”等专栏。

二、注释主要用于对文内某一方面特定内容作必要的解释或说明，以脚注形式置于页下，序号用圆圈的阿拉伯数字表示，每页重新编码。

三、参考文献指对文中某个信息资源或其中一部分进行准确和详细著录的数据，置于文后，采用顺序编码制，根据引用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序号置于方括号内。一种文献反复引用者，用同一序号标示，需要表明引文出处的，可在序号后加圆括号注明页码或章、节、篇名。本刊参考文献著录方式执行GB/T7714-2015《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标注格式如下：

1. 专著：主要责任者. 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 其他责任者. 版本项.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

示例：[1]陈登原. 国史旧闻：第1卷[M]. 北京：中华书局，2000：29.

2. 专著中的析出文献：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 析出文献其他责任者//专著主要责任者. 专著题名：其他题名信息. 版本项.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的起止页码。

示例：[2]周易外传：卷5[M]//王夫之. 船山全书：第6册. 长沙：岳麓书社，2011：1109.

3. 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 连续出版物题名：其他题名信息，年，卷（期）：起止页码。

期刊示例：[3]莫世祥. 港澳苦力贸易与英葡论争[J]. 广东社会科学，2016（2）：80-89.

报纸示例：[4]程恩富，侯为民.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N]. 河北日报，2012-11-07（11）.

4. 电子资源：主要责任者. 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OL].（2012-01-16）[2013-03-26]. <http://www.cnnic.net.cn/hlwfxj/hlwzxbg/201201/P020120709345264469680.pdf>.

四、遵照新闻出版有关规定，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律用人民出版社最新权威版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用1995年版，《列宁选集》用1995年版，《列宁全集》用1984年以后版本，《毛泽东选集》用1991年版，《邓小平文选》用1994年版。

五、本刊的投稿信箱为szshkx@szass.com，本刊处理稿件以作者投寄的WORD版本电子文件为准。邮件主题请按此格式输入：学科+作者姓名+文章题目。

六、本刊实行同行专家评议和匿名审稿制度。来稿要求电脑字数在8000-15000字之间（含图表、注释、参考文献），需提供英文标题、200~300字的中文摘要、120~150个单词的英文摘要，3~5个关键词，请采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5版），注明本文所属类别，并另页附上作者工作单位、职务职称、详细地址、邮政编码、电子邮箱和联系电话。

七、本刊对采用稿件有删改权，不同意删改者请在来稿时注明。来稿一经刊用，即付稿酬，优稿优酬。来稿3个月未接到采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八、本刊发表的文章，已被有关数据库收录，作者著作权使用费和稿费一次性付清。如作者有不同意见，请在来稿时声明。

九、本刊倡导良好学风，严守学术规范。来稿征引文献必须注明出处，杜绝抄袭剽窃和弄虚作假行为。如发生侵犯他人著作权行为，作者应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一切损失。